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 重庆出版社

# 交往与社会进化

YANJIUCONGSHU  
YANJIUCONGSHU  
YANJIUCONGSHU

# 在研究当代各种思潮中 发展马克思主义

——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的出版而作

徐崇温

党的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学说 to 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建设到改革的发展，“都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扩展和深化，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各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的结合”；指出“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

要适应这样的大趋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就必须在研究实践的同时，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就是说，必须在积极探索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中的新问题，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律的同时，研究当代世界的新变化，研究当代各种思潮，批判地吸取和概括各门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

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必须在研究实践的同时，还要研究当代各种思潮？

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过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赢得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就是

因为它是在吸取和改造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中形成起来的；在今天，在世界发生着巨大变化，人类对自然、社会历史和人的思维本身的认识日益深化，并且在新的探索中，提出种种新的学说、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观念的时候，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吸取和改造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就显然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即使是资产阶级思潮，尽管它们大多以现代唯心主义的歪曲形式出现，却毕竟在这种形式下，提出了一系列真正由实践产生的问题，一些实际的、迫切的科学问题。把这些问题当作正面考察的对象，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从中引出应有的结论，可以使马克思主义者紧紧把握时代和实践的脉搏，从新的实践中吸取思想营养。

在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现时代，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尤其具有迫切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新的技术革命使得全球问题日益尖锐化，把人类生存的利益提到极其突出的地位，要求人们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以正确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十分明显，必须深入研究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的当代各种思潮，我们才能跟上时代和实践的足迹，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

而在当代各种思潮的研究中，对于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流派的考察，对于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宏伟事业来说，又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是因为这些思潮、流派都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为研究对象，二是因为它们又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之下，以不同的哲学世界观为指导去进行这种研究的，课题的同一性和观点的多样性相统一，这就使这种考察可以更加直接地有助于我们在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

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并结合亿万人民的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以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为例，长时期以来，人们对这个问题一直进行着热烈的讨论：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只按自己的规律运转、而同人的实践没有干系的体系，认为马克思在哲学领域中实现的革命变革是把实践引进了认识论，把人对客观世界的改变，看成是认识的基础；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则认为，世界是通过主体而得到中介的，因而，在马克思那里，不是物质的抽象，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性，才是唯物主义理论的真正对象和基础。

在这些不同思潮的撞击中去研究和把握马克思著作的精神，我们便不难发现：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具有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是把实践引进了本体论，强调也要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事物，即把事物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强调人类连续不断的感性活动，是现存感性世界的深刻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始终坚持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始终坚持劳动实践在多种层次上所受的自然制约性。

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联结、不可分割的。然而，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强调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即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却忽略了它的第一个基本点，即从主观方面把事物当作实践去理解，这就很难同旧唯物主义完全划清界限，这种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充其量只是一种片面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反之，“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虽然突出了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第一个基本点，却又忽略乃至否定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所以，尽管它们再三声称要纠正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缺陷，但在实际上，却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一个和苏联模式方向相反的歪曲，这样那样地陷入了唯心主义。

所以,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派的哲学,它们都没有从上述两个基本点的联结上去把握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因而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附加成分,我们必须从中引出应有的经验教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恢复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本来面貌,并且根据当代人类的实践去理解其深刻含意,把它推向前进。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就是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在重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编辑出版的。

就这套丛书的覆盖面来说,它既包括东方的,又包括西方的,但鉴于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西方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了解得较少,所以,在选材方面将以西方的研究为主。邓小平同志说过:“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要求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也在努力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努力为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公道、不合理现象直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154页)

就这套丛书的品种来说,既有对国外学者原著的翻译,又有我国学者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流派的研究和评述。但长期以来,我国读者接触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的原始材料太少,因此,这套丛书将以翻译国外原著为主,随着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研究的广泛展开和逐步深入,而逐渐增加我国学者研究专著的比重。

这套丛书的编选,力求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将根据这套丛书的指导思想,挑选一定的翻译和写作书目,组织合适的译者和作者去完成以后分期分批出版。另方面,我们又竭诚欢迎大家向我们推荐有关的书目、选题,包括推荐译者和作者,

还竭诚欢迎大家对丛书中已经出版的作品提出批评和意见。

希望通过这些办法，把这套丛书真正办成一套比较能够反映我国广大读者的需要和要求，在全党全国建设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在实践中学习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任务中，发挥一点促进作用的丛书。

# 中译本序

J·哈贝马斯是现今活跃在哲学舞台上并为世界公认的欧洲思想家之一。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著名代表。1929年出生于德国的杜塞尔多夫，曾在格廷根、苏黎世、波恩等地就读。50年代后期，哈贝马斯从师于法兰克福学派著名的思想家T·阿道尔诺，并大量研读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等人的著作。1961年到1964年，他在海德堡大学教授哲学，后又获得法兰克福大学的哲学与社会学教席，还曾协助阿道尔诺指导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工作。70年代到80年代初，哈贝马斯一直在联邦德国麦克斯·普朗克科学技术世界生存条件研究所担任领导职务，1983年又重返法兰克福大学的哲学讲坛。

哈贝马斯的学术兴趣是多方面的。他在哲学、社会学、语言学、政治学等方面都有重要建树。但是，构成哈贝马斯“批判理论”最主要内容的，却是以“交往”(communication)概念为核心的一整套理论设想。《交往与社会进化》一书，正是这个设想的高度凝缩、精炼和概括的表达。

本书的基本观点及其酝酿过程，“英译本序”已

经作出了很好的说明,这里不拟赘述。在这篇中译序言中,我主要想谈谈这本书对中国读者可能具有的启发性价值。

无庸讳言,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改革十载,大量新情况、新课题、新的社会矛盾、新的结构冲突正在一浪一浪地涌现出来,它们不仅动摇、改变着长久以来人们一直习以为常的许多思维定式,甚至直接就是对传统理论框架的挑战。简言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革新,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我们当然要利用我们已有的经验和财富,但更需借鉴当今世界上一切有价值的思想、研究成果,吸取其中有价值的东西。

《交往与社会进化》就属于这类研究的重要成果之列。

哈贝马斯本人在书中反复申明,《交往与社会进化》中呈现的整个理论构想还有相当浓厚的“方案”色彩,有待于在细节方面大力补充和完善,但整部作品所蕴含的深刻的启发力仍然给人以强烈印象。译者看来,这种启发力至少表现在下列四个方面:

1. 研究的全方位性。《交往与社会进化》不是就一两个具体问题进行精雕细琢的专门著作,而是试图从宏观整体上把握作为人的个体发生学与作为“种”的人类进化之间的联系以及这两种演变系列所依存的根据。“英译本序”认为,最好把哈贝马斯的整个设想描绘成“一个三层次并列的研究方案”,即:

基础层次——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普遍语用学);

中间层次——关于一般的社会化理论(交往资质发展理论);

最高层次——关于社会进化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这样,这个设想就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研究范例,即从奠定“普遍”行为基础出发,将微观行为与宏观行为的发展全部纳入某个统

一构架。

2. 独特的方法论特征。哈贝马斯虽然精通德国传统的思辨哲学,但对实证科学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属于那种“两面作战型”的人物:一方面,拒绝纯思辨的先验形而上学玄想,强调经验成分对哲学研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否认直接的经验-分析科学能洞察人类行为的本质,认为要真正认识人,就必须充分揭示“理解”的普遍先决条件,因为“理解”是构成“主观际”的核心要素。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就哲学释义学与其它社会科学之关系的争论、与卢曼就系统理论展开的论战,都显示出哈贝马斯思考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当然,这位思想家的观点未必都是正确的,但他所强调的哲学与经验科学相结合,却无疑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命题,也正是人的科学发展的希望所在。

3. 对历史唯物论的思考。以交往的一般理论为基础,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是哈贝马斯的宏大抱负之一。然而,他和那些只是对30年代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命题提出批评的其他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有所不同,在哈贝马斯的著作中(如本书第三、四章),既有捍卫历史唯物论,以此作为社会发展研究的基础理论的思想,又有补充新的理论要素和展开新角度研究的认真尝试。这一切,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至少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参照对象。

4. 明确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功利取向。不同于西方某些热衷于纯形而上学思辨的哲学家,哈贝马斯明确承认哲学的时代功能、历史反思功能和预言功能。他的实践哲学,按照“英译本序”的概括,乃是“经验的历史哲学与实践(政治)意图的结合。”本书第五章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合法化问题的分析,就是这种结合的一个例证。这里,具有启发性的,不仅是对具体研究课题(如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化危机)的精深透彻的分析,更在于透过这种分析所散发

出来的强烈的心理意向，即哲学要探讨时代最迫切、最本质的问题，哲学要回答时代的挑战！

自然，下列一点不必多加解释：承认一个理论、一种观点所具的启发作用，不等于全盘同意或接受它的结论（事实上，读者不难从本书中发现某些显然不够成熟、甚至有些幼稚的观点，如第三章论集体同一性发展时对中国的有关评论）。对哈贝马斯哲学更加全面、科学的评估，只有在深入研究、探讨了他的全部主要著作以后，才有可能作到。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曾得到我的导师徐崇温先生的许多指导；在某些专业词汇的翻译方面，曾请教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张金言先生；赵培杰同志校阅了本书的部分章节，付海健同志为本书注释中涉及德文的部分作了核对校阅，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译 者

1988年3月于北京

# 英 译 本 序

20年前J·哈贝马斯提出了批判的社会理论的设想。这个理论是经验的、科学的,但又不能还原为经验分析科学;是哲学的,但是在批判意义上而不是在没有任何前提的“第一哲学”的意义上;是历史的,但又非历史主义;是实践的,但是在以解放为方向的政治实践意义上,而非在技术-管理控制的意义上。<sup>①</sup> 尽管这些基本特征在哈贝马斯成熟了的批判理论中仍然清晰可辨,但较最初的概念已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本书译文提供了一个理论方案的总框架。在涉猎正文以前,以导言形式简略回顾哈贝马斯早年关于社会理论的研讨也许是适宜的,因为这可使读者了解哈贝马斯若干已经成为历史背景甚至全然消失的重要思想,进而了解他的批判的社会理论。

## 1

50年代末、60年代初,哈贝马斯写作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是:批判必须以某种方式置身于“哲学

和科学之间。”<sup>②</sup>他在阐述从古典政治学到现代政治科学的过渡时，注意到一个决定性的转换，该转换是在理论与实践概念及其相互关系间发生的。<sup>③</sup>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政治学乃是伦理学（一种关于善和公正生活的学说）的继续，它本身涉及人类的行为和实践领域，借以在城邦公民中获得和维持一套善良品行的秩序。政治学的实践意向及其题材的本质，决定了它的认知地位：政治学不能采取一种严密科学的形式，一种认识的形式，而只能满足于确立一些或多或少在大多数场合下通行的规则。人们据此而被培植出来的能力以及美德特征的根本要旨，就是phronesis<sup>〔注〕</sup>，即一种从自己应该作什么的角度来谨慎理解变化不定的情境。

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政治学的古典概念被剧烈地改变了。理论开始意味着有定量表达并有像定律那样精确陈述的逻辑完成系统，给予一个相关的初始条件，这类理论就可以用于（当然是在一定限度内）预测某系统的未来状态；提供一个可操纵的相关因素，亦能用于创制所期望的事物样态。由于在政治学中采纳了这种知识范型，霍布斯很早就拟定出一个方案，方案的核心及基础，就是把人类行为当作关于人、社会和国家的科学所需的材料。在对人类本性规律的正确理解基础上，一劳永逸地确立起恰当安排人类生活的条件，是可能的。以善的公正生活为目标的古典教诲、美德性格的形成以及谨慎行事的养成，统统会被拥有科学根据的社会理论的应用所取代，即被一种条件的创造所取代，该条件将导致根据自然律而被期望的行为。通过这种方式，实践领域就被纳入到技术领域之中，城邦公民道德生活的实践问题就转化为一种技术-管理问题，即调节社会交往，以保证国家的秩序和公民的安宁。

---

〔注〕 phronesis，哲学术语，一般指决定目标及达到目标之手段的智慧。

——中译者

在哈贝马斯看来,上述转化导致的最大的损失是关于理论-实践关系的纯粹技术式理解对直接进入实践的取代,最主要的收获则是社会研究中科学精确性的引入。相应的,对于后实证主义的社会探究方法论来说,仍待完成的任务就是设法实现哲学、实践要素与方法论的紧密结合,这种结合将是“现代科学不可逆转的成就物。”<sup>④</sup>当然,哈贝马斯心目中的实践哲学类型并不是古希腊式的,而是从康德到马克思的德国思想发展所呈现出来的那种类型,可以用一句短语概而言之:经验的历史哲学与实践(政治)意图的结合。

在描述这种批判理论特性时所用的哲学这个术语,并非标示着不赞成马克思下列名言:哲学的需要及其成果只能通过“对先前哲学的否定,对作为哲学的哲学的否定”来保持。哈贝马斯并没有在传统含义上使用“哲学”这个术语,即不是把哲学作为某种为自身提供基础的、无任何先决条件的思维模式。和马克思一样,他把哲学隶属于它所反映并必须回到的那个世界。内在于哲学的种种观念——真理和理性、自由和正义——不可能由思想本身加以实现。而历史哲学往往是与这种实现的失败结伴在一起的,它以对整个历史的沉思自许,宣称要揭示历史的意义(不管是未来的还是既往的),而且经常依据于历史必然朝着某种被保证了的目标进步的观念,这种目标可以归因于上帝或自然、理性或精神。

正如哈贝马斯解释的那样,青年马克思拒绝这种构想,对马克思来说,历史运动绝不是一种形而上的必然性,它在变化的经验条件和社会力量的实践介入这两方面都是偶然的。历史的意义、目标,都不是一个形而上的亚实体化问题,而是实践设计的对象,是这样一种意义:人们可以根据对客观条件的认识加以寻求,并赋与它意志和意识。传统历史哲学夸大认知要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

它不懂得历史前进标度本质上的实践性。被设计的未来（它给过去以意义）并非是沉思或科学预见的产物，而是情境性介入的实践理性的结果。

实际历史过程的意义之被揭示乃是在下列程度内，即我们——导源于“实践理性”——把握住了将要产生的东西，把握住了如若不然就将其取代的东西的意义……并对其实践现实化的前提条件进行了理论考察……我们必须从这种意义之实现的观点出发来解释实际过程和当前的社会力量。<sup>⑤</sup>

这样，哈贝马斯已经在青年马克思那里发现了许多他对传统哲学过分举动所作的必要纠正。但是，马克思由于力图把自己与黑格尔左派的“纯哲学”批判区别开来，而导致把自己的观点归结为直接经验的社会理论。在以后，在马克思的“正统”继承人的解释中，马克思主义似乎提供了一个关于历史前景的纯理论保证，批判的自我反思和启蒙性政治实践的重要性则退居到坚实的、客观的、无可阻挡的历史规律的必然性背后。正是这种倒退成为法兰克福学派复兴马克思主义哲学标度的动力因素之一，也是哈贝马斯把批判的社会理论和直接经验-分析科学加以明确区分（其明确性恰如马克思对自身理论与传统哲学所作的区分一样）的动力因素之一——把批判的理论置身于“哲学和科学之间”。

50年代末、60年代初，哈贝马斯为实践意识的启蒙、为构建某种集体政治意志、为理性地指导实践而提出把社会作为一个历史发展中的整体来领会的思想时，并没有提供这种理论类型的逻辑联接细节、方法论或理论结构。这方面的尝试是在60年代后期开始的，《为了社会科学的逻辑》（1967）和《认识与人的意趋》（1968）

两本书可作代表。<sup>⑥</sup>虽然这些研究仍被哈贝马斯标明是“预备性的”，但确实包含着扩展了的关于方法问题的讨论，这些方法一般是指社会探究方法，专指则为批判理论方法。这两本书的主要靶标之一，就是批判新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方法统一性的观点，特别是认为在人类科学中，社会科学的探究逻辑与自然科学的探究逻辑基本是相同的观点。贯穿于《为了社会科学的逻辑》一书中的主线，是对社会探究中的*verstehen*〈注〉、或解释性理解的性质和角色的思考。通过考察各种不同的、以社会为对象的理解方式——从新康德主义到韦伯主义，从社会相互作用理论到现象学和人种学方法论、乃至语言学和释义学等等的不同理解方式——哈贝马斯论证了这样一个思想，即深入用符号化建构起来的对象领域，要求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中发展出来的程序截然不同的程序，这种程序设计要求把握对社会现实来说具有构成性特征的“意义”。他指出，社会行为依赖于行为者的“情境界定”，而且这绝不仅仅是一个主观动机的问题，社会行为所指向的意义首先是一种主观际意义，它对个体在其中发现自身并在其中行为的社会文化母体来说具有构成性特征：可继承的价值和世界观，制度化角色和社会规范，等等；任何一种系统否定社会行为自身以之为中介的解释图式的方法论，任何一种追求从先验的社会现实之范畴形成物中抽象出概念和理论构造的方法论，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用A·舒兹(Schutz)的话来说，社会学概念乃是一种“次级水平结构”，而“初级水平结构”则指社会行为者借助于该结构已预先构建起社会世界、且先于对它的科学研究的那些东西。对“初级水平结构”的理解乃是构建“次级水平结构”的必要的出发点。

在提出以上论点时，哈贝马斯一直小心地保持着与这样一种

---

〈注〉 *verstehen*，德语，意为“理解”。——中译者

观点的距离,即认为解释性理解可能是唯一的社会探究方法论基础。在他与伽达默尔哲学释义学的长期争论中(他把该理论看作是上述观点充分发展形式),他指出了社会现实的不同侧面,提出社会现实要求超出单一解释性范围以外的探究模式。<sup>⑦</sup>譬如说,社会研究向意义解释的还原,依赖于把社会过程全部归入到主体所意向的意义或文化传递的意义这种无法保证的“纯化”。然而,如果对这些意义的思索是与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生活条件相联系,那么,意义解释既可能掩盖、歪曲这些条件,也可能揭示、表达这些条件。因此,正确的社会探究方法论应该把解释性理解与意识形态批判综合在一起。当然,这就要求一种参照系,这一要求超出了主体意向和文化传统,并把社会行为和经验条件——正是在这些条件下,传统历史地发生着变化——的客观框架系统地纳入考察范围。例如,经济和政治领域中的发展可能否定已被接受的解释模型,而这种发展作为规则并非简单地就是一种新的理解方式的结果,毋宁说,发展自身反倒导致了某种世界观的构建。这样一来,一个正确的社会探究方法论又应该把解释性理解、意识形态批判和以历史为指向的社会系统分析综合在一起。

通过这种方式来确定需要物,显然仅仅是通向充分发展的批判的社会理论的第一步。在《为了社会科学的逻辑》和《认识与人的意趋》两书中,哈贝马斯又明确提出了一些深入研究的方向性建议。他在《认识与人的意趋》中,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当作批判理论“有形的例证”加以运用,以便从中导出若干一般性的方法论线索,<sup>⑧</sup>认为弗洛伊德的著作是对系统被扭曲了的交往理论的研究,同时他也指出了超越纯粹的理解式意义解释的途径。与通常的释义学不同,精神分析学乃是把“本文”解释为既表达着又掩盖着“作者”的自我欺骗。由弗洛伊德发展起来的“深层释义学”,在较好处理这种“内在的外部领域”的同时,又有赖于某些理论假定,

这在他的著作中只是部分地得到阐明。因此，弗洛伊德理论更充分、更坚实的发展要求有某种一般的、关于正常(非扭曲)交往的理论，要求阐明交往资质需求及其变化，要求论证系统的扭曲性交往产生的条件。正是最后一点，弗洛伊德必须充分予以说明。弗洛伊德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早期儿童相互作用方式的一般性译解，并使之与个性形成的阶段-特征模型相协调。这个“一般性译解”或“译解图式”具有心理动力学发展的“系统一般化历史”的形式。弗洛伊德心理动力发展一般理论的方法确实提供了一条对批判理论来说颇有特色的线索。例如，这种译解图式的应用具有浓厚的释义学成分；它的概念是一种图式或类型概念，其解译必须纳入个体化的情况之中；它被运用于构建这样的历史，在其中，主体可以认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世界。然而，不同于普通的哲学释义学，这种个体生活历史的重建要求某种特殊的译解性理解和因果解释相结合。“我们不能‘理解’‘什么’——被系统扭曲了的表达的语义学内容——除非与此同时去‘解释’‘为什么’——系统扭曲自身的起源。”<sup>⑨</sup>这个解释性假说并非归诸于“自然的因果性”，而是归诸于(不妨说是)“命运的因果性”，归诸于被压抑动机的发动和其它“符号性内容”。被阐释的因果联结并没有表明自然律的不可更动性，只是表明了生活历史的不可更动性，它通过“大脑的符号化手段”得以运行，并因此能被分析式地予以分解。

弗洛伊德心理动力发展一般理论的方法还涉及到适合于系统一般化历史的证实类型。它所包含的种种假定(关于儿童及其与早期参照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模型，关于相应的冲突和反应冲突的形式，关于由此产生的个性结构，等等)乃是作为某种“叙述性衬托”服务于个体生活历史的重建的。这些假定作为大量、反复的临床经验的结果发展起来，并相应地得到经验的证实。这种证实颇具特色。医生试图把在分析性对话中获得的各种零碎信息结合起来，

并致力于病人生活历史的假设性重建,从本质上说要指望病人对这个叙述的反映。这样,一般性译解的证实最终依赖于自我形成过程的成功继续。“只有与作为整体的自我形成过程的脉胳连接才具有证明和证伪的力量。”<sup>⑩</sup>

对于批判理论涉及社会部分而言,“系统的”或“理论一般化的历史”这类概念的相关物,是在《为了社会科学的逻辑》一书中有帕森斯的讨论里提出的。<sup>⑪</sup>结构-功能主义作为综合行为理论与系统理论的尝试引起了哈贝马斯的注意。帕森斯并未忽视社会行为的意义,但他没有限定其意义,即社会行为是社会行为者所意向的或在文化传统中表达出来的东西。在帕森斯那里,社会系统乃是作为一个制度的功能复合体被设想的,在这个复合体中,文化方式或价值被用于对行为的制约,被归并为约束性社会规范和制度化了的。在这个框架内,研究各种社会规范之间的经验联结——这些联结超出了在此规范下进行活动的主体的主观意向——是可能的。另一方面,存在于社会角色系统中的客观联结的意义是潜在的,要把握它,必须发现各特定要素为了社会系统的自我维持而履行的职能。

哈贝马斯对这些理论的批评中心围绕着他把社会探究中的释义学和批判成分附属于经验-分析科学要求的作法。例如,帕森斯通过采纳简单化了的普遍价值图式的假定,在释义学侧度内短短绕了一周,所有价值系统都是从同一组基本价值标向(模型变量)中建构起来的,并以此构成所有社会行为的基础。然而,无论就普遍性还是完满性而言,帕森斯的范畴图表都是大有问题的。更精密的分析表明,四对可能的价值标向都被设计安排得适合于同一种历史过程,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的分析。因此,这里有一种对历史情境的预先理解,历史情境被归入到一些基本概念的公式图表中。如果把功能分析本身的历史情境特征一并纳入考

虑,那么对历史-释义学的方法和问题的反思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社会探究的批判侧度在结构-功能分析中也被砍掉了,因为它不允许对价值系统中乌托邦的、有目的-合理的、以及意识形态的各种内容作出分离。在帕森斯看来,文化价值是用于约束制度机构中的社会行为,社会行为将“价值标向”和“动机力量”综合在一起,从而保证着社会角色的规范有效性。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建构过于理想化了。

在行为理论框架中,行为动机乃是与制度化价值相协调的。那种非一体化的动机力量——它们不满意于角色系统所特许的机会——则没有被分析所把握。然而,我们可以假设,这些被压抑的需求虽然没有被并入社会角色,没有转化为动机并得到认可,却无论如何拥有它们的解释性表达。或是这些解释性表达“超出了”现存秩序的规定范围,并且作为乌托邦期望,标志着某种并未成功的集体同一性。或者,它们转化成了意识形态,服务于合乎意愿的替代物的设计以及压迫性权威的证实。……与这些背景相联系,一个均衡状态将取决于社会的统治系统是否在下列程度内实现了乌托邦的设想并消解了意识形态内容,这就是使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客观上成为可能。当然,这样一来,社会就再也不能被设想为一种自我保持系统了……毋宁说,与社会过程的功能衡量相联系的意义,在现在是与独立于统治的交往观念连在一起的。<sup>⑫</sup>

正如上述最后几句所表明的,历史-释义学的成分和批判的成

分向社会系统分析的合并,突破了功能主义的框架,这点至少就功能主义是在生物学模型的基础上被理解而言,确是如此。除了其它假设外,功能分析的有效性预先经验式地确定了所论系统的边界、系统意欲实现并维持的目标状态、系统自我维持的功能要求、以及所有这些在选择过程中的可能性。这种确定首先是一种生物学中的情形:一个有机体很容易从其环境中被界分出来,而且它对自身的状态的维持也能依据过程的必然性,用可确定的容限加以表征。对社会系统来说,情况却并非如此。在历史演进中,不仅社会要素,而且社会的边界和目标都在不断变化,结果,它们的同一性就成为非常模糊的东西。一个给定的更改体既可以被视为一种学习过程,一种初始系统的再生,也可以被看作一个分解过程,一种向新系统的转化。这里显然不可能独立于对该系统成员的译解而断定到底哪一种描述是正确的。<sup>⑬</sup>

哈贝马斯的结论是,如果社会系统分析确如以上建议的那样将历史-释义学的侧度和批判的侧度合为一体,那么它将再也不能被理解为一种直接形式的经验-分析科学,而不得不转化为以历史为指向、同时又带有实践意图的社会理论。这样一种理论将采取的形式则是“理论一般化了的历史”或“一般性译解”的形式,它们反思性地把社会的规范过程当作一个整体来把握,对当代情境的重建不仅借助于对过去的考察,而且也顾及到可预期的未来。它将是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

## 2

哈贝马斯在《为了社会科学的逻辑》和《认识与人的意趣》中对方法论问题的思考,并没有提供批判的社会理论的最终结果,<sup>⑭</sup> 他

把这种思考当作通往系统的概念阐释道路上的路标。系统的概念阐释正是他过去数十年研究的聚焦点,本书汇集的文章,可作为研究成果的宏观概览。哈贝马斯反复告诫提醒,这些研究成果并非是“完成了的产品”意义上的“结果”,批判理论的概念在这里仅是作为某种“研究方案”提出来的。当他热衷于论证方案的有效性时,他清楚地意识到方案的假说性质,意识到这样一种规模宏大的设想在它的成果——理论的和实践的——可以被适当判定前,要求自身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无论如何,批判的社会理论的主要脉络已在近年中明确形成了。或许可将它描绘成一个由三个层次或三个子方案组成的研究方案:(1)最基础的层次由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所构成,哈贝马斯称之为普遍的话语学;(2)次高层次以基础层次理论为元本,服务于一般的社会化理论的建构,并且通过发现交往性资质的理论来完成;(3)最高层次以前两个层次为基础,哈贝马斯勾画出一一种社会进化理论,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现在,在这个导言剩下的部分里,我打算简要评述各子方案和哈贝马斯如何应用他的理论分析当代社会。

1.正如上面提到的,哈贝马斯考察精神分析学的结论之一就是,作为一种系统被扭曲的交往理论,它必然以某种一般的(非扭曲的)交往理论为假设前提,而这又是他早些时候得出的更一般的结论中的一个特例,这个结论就是:批判理论的规范-理论性基础必须到人类水平上的、有特色的、到处渗透着的生活中介那里去寻求,这就是语言。1965年6月在法兰克福大学的就职演讲中,哈贝马斯就曾宣布过:“使我们人类超出自然之外的只有一件东西:语言。通过它的结构,自律和责任就都被安置在我们门下了。我们最初的语句毫无疑问地表达了那种普遍的、非强迫性的交感意向,而自律和责任一起(mündigkeit)构成着我们先天(在传统哲

学的意义上)所拥有的唯一观念。”<sup>⑮</sup>当然,在那个时候,这个演讲不过像一份宣言:指出了批判理论的规范-理论性基础急待更新,点明了不管是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向纯哲学的折返都不适于完成此项任务,声称早先那些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并未完成接连乃至奠定合理性概念(这个概念超越了“工具式”的狭窄界线)的基础,提出解决办法只有在关于语言的理论中才能发现。

只是借助于哈贝马斯交往理论基本概念的阐发,这个宣言才具有了更明确的研究方案的形式。本书所译(作了某些修改)第一篇“什么是普遍语用学”即扼要地说明了这个方案的战略与结构。<sup>⑯</sup>其中心思想是这样引入的,即把限定理性重建于抽象语言的句法和语义特征领域,而将其语用学方面排斥于外的通常作法当作参照物——根据后者,语用学方面的东西通常是作为适合于经验分析(非逻辑或纯语言学分析)的领域而随之产生的。普遍语用学的观念建筑在这样的立论基础上:不仅是句子(sentences)中的语言、句法、语义诸特征,而且还有话语(utterances)中的一些的语用学特征;不仅是语言(language),而且还有言语(speech);不仅是语言资质(competence),而且还有交往资质,都允许普遍意义上的理性重建。哈贝马斯就此论证道:“交往资质拥有和语言资质一样普适的核心。这样,一个关于言语行为的一般理论就有可能描述这个系统的基本规则。关于这个规则,成年主体是在下列程度内掌握、驾驭了它,即他们能满足在话语中恰当运用语句的要求,而不管这个语句属于哪一种个体语言,也不管该话语可能被嵌入何种偶然情境中。”理想言说者所具备的资质不仅包括创造并理解合乎语法的语句的能力,而且包括建立乃至理解交往模式和与外在世界相联结的能力,正是后一种资质使言语成为可能。在言语行为中处置语句的语用学规则关涉到与现实的关系,现实促使人们言说话法上完美的句子。话语行为把语句置于与外在现实的

关系之中(人们可以对它作出正确或错误陈述的“这个”对象世界及其事件);置于与内在现实的关系之中(可以或真诚、或真切、或不真诚、或不真切地表达出来的言说者“自己的”意向经验世界);置于与社会的规范现实性的关系之中(“我们”在其中共同承担价值与规范、角色与规则的社会生活世界,对这个世界来说,一个行为可能适于它也可能不适于它;这个世界自身也可能是正确的——合法的、可证明为正当的——或错误的)。从这种语用学观点出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言语必然(尽管常常是隐含地)被提出、认可、乃至于兑现“有效性要求”的任务所缠绕。言说者所言必须是可领会的(隐含的),同时还必须满足如下要求:他的陈述是真实的(如果没有作出陈述,也必须满足陈述性内容的存在性这一先决条件);他的意向表达是真诚的或真切的;他的话语(即他的言语行为)符合或适宜被认可的规范性关联域(或者,它与之相适宜的规范性关联域本身是合法的)。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的要求使言说者的话语超出语言学规则之外,而被置于与现实的联系中。言语的普遍语用学基础结构组成了在一个并列系统中调整诸言语情境要素的一般规则——这个并列系统是由三个世界组成的:“这个”外在世界、“自己的”内在世界、“我们”所共享的社会生活世界。很显然,一个充分发展了的普遍语用学将为各种各样极为不同又很少联系的理论努力——从认识理论到社会行为理论——提供一个统一的框架。

2.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一个颇具特征性的宗旨,是基本的心理学概念必须与基本的社会经济概念结合在一起,因为独立自存的自我的观点与解放了的社会的观点在本质上是相互依存的。通过这种方式,批判理论与独立自存的自我概念被串在一起。独立自存的自我概念来自德国唯心主义,但它却又在精神分析学框架内

拆除了唯心主义假设前提。哈氏也是从个性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相互依存性、同一性形式与社会一体化形式的相互依存性出发的,但他所采用的社会-心理学框架却包含着比重新适应精神分析理论多得多的内容,这个框架是一个综合化的自我发展模型,它横跨几个领域的发展性研究,从心理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包括道德意识研究)到社会相互作用论和精神分析学(包括分析的自我心理学)。<sup>①</sup>哈氏认为,在这个框架中,各种不同的人类发展侧度不仅可以分析地予以区别,而且其联结也将被系统地纳入考虑,同时,发展的经验机制和临界条件也必须被确定。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哈贝马斯至今还在为之努力。然而,这个方案的一般线索已经清楚了,他采用了资质-发展的途径以建立社会行为理论的基础。这里,基本的任务在于合理重建普遍的、“类范围的”资质,并证明每一种这样的资质都将在一个不可逆的、各有不同而又渐次复杂的发展系列中获得,这个系列也能在某种发展逻辑中加以分层列定。由于完成这个任务的侧度相应于普遍语用学对有效性要求的分类,即相应于交往在其中可能成功或可能失败的四个基本侧度:可领会性、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这些侧度不仅确定着合理性的各个方面,而且它们中的每一个也都标示着一个现实“领域”——语言、外在自然、社会和内在自然(与这些领域相联系,主体才能成为日益完美的独立自存者)。这样,个体发生就可以作为一个与语言、认知、相互作用、以及自我发展相互依存的过程加以构建了。

在语言、认知、相互作用、自我发展这四者中,前三者可以视为特定的发展线索,自我的个体发生并非可与它们分离发展,而是互补的过程:自我是在通过“内在自然”与语言、思维和行为结构融为一体的过程中得到演进的。当然,这些普遍资质的获得仅仅代表着同一性形成的一个方面,即结构方面。另一面是情感与动机的

形成。除非主体能在这些结构中适当地译解他自己的需求，发展有可能反常地发生变形。这样，构建自我发展的一般理论就必须把认知、语言、相互作用各方面相互依存的发展与情感和动机的发展通盘思考了。

本书所译第二篇文章《道德发展与自我同一性》就集中讨论了道德意识的发展，这是综合体中的一个关结点。借用柯尔伯格(Kohlberg)关于道德判断构造能力的层次图式，哈贝马斯把道德意识的发展置于一个更大的行为理论框架中，即把这种能力的诸发展阶段与相互作用资质的发展阶段协调起来。“我将从这样一个假设出发：‘道德意识’标示着运用相互作用资质去自觉处理与道德相关的冲突的能力。”然后，他又考察了道德意识的动机(作为与结构或“认知”相区别的东西)，也就是发展过程的心理动力学(超我的形成、防卫机制)。所有这些将有助于理解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之间经常出现的差异。这篇文章作为整体提供了新方法如何通过考察相互分离的各发展研究领域并从而将自身展开的一个例证，这种考察是在一个综合的、包含结构和情感-动机两方面在内的框架中进行的。

3. 第三篇和第四篇文章勾画出了哈贝马斯方案中相当于社会学的那一部分：社会进化理论。他认为这一部分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我坚信规范结构并非简单地遵循着再生产发展所走的道路……而是有着某种内在的历史。”这是他长期坚持下列主张的结果，这个主张就是：实践不能还原为技术，理论也不能还原为有目的的或工具式的理性；交往行为或相互作用领域内的理性化过程既不能等同于生产力领域中的理性化过程，也并非后者的直接结果。在拟定规范结构发展逻辑方案时，哈贝马斯采取了比较的办法，即把它与交往资质理论框架中提出的个体发生过程的发

展逻辑进行比较。这是老办法的一个新变体，并可能因试图在个体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画出两条平行线而落入旧方法的陷阱。哈贝马斯意识到了这种危险的存在，但他认为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人们确实可以在个体和种的历史中发现“相似的意识结构。”

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规范结构的发展》这篇文章中，哈贝马斯提出了三个可供比较的领域：自我发展中的理性结构和世界观进化中的理性结构；自我同一性的发展和集团（或集体）同一性的发展；道德意识的发展和道德与宗教表现物的进化。他简单勾画出在前两个领域中发现的相似模型后，在《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一篇中，更为详尽地考察了法律和道德的发展。这篇文章所提供的解释图式——行为理论（在资质-发展意义上）与系统理论的结合——表明哈贝马斯并没有提议把人类历史理解为某种精神的内在展开过程。规范结构的发展逻辑与其发展的动力学之间，有着一一种明确的区别：后者仅仅为复杂性渐次增长的结构形成物在规范结构中成形的逻辑范围划定一个界线，至于新的结构是否能产生，以及——如果是的话——何时产生，则要依赖于偶然的边界条件和经验的学习过程。

这个图式的基本要素所列如下：社会进化被设想为两种侧度并列的学习过程（认知与技术学习过程和道德与实践学习过程），这个过程经历的诸阶段可以在一个发展逻辑中结构性地加以描述和排列。被强调的要点并非特定内容的制度化（例如价值，参见帕森斯的有关论点），而是“理性结构的制度体现”，它使新水平上的学习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强调的是这样一种学习：它将应用于学习的结构条件。在某种意义上，只有那些社会化了的个体才从事学习。但是个体的学习能力又提供了某种“源泉”，即可以被用于构建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学习过程的结果被纳入文化传统，它们构成某种类型的认知潜能，当无法解决的系统问题要求社会一体

化基本形式彻底转变时,认知潜能就可以被社会改革运动所利用。超出一个社会结构性限定的适应能力是否能产生以及如何产生,则纯系偶然。合理性(技术的和实践的)之必要的(但非制度化了的)结构是否有效,运用认知潜能以迎接挑战的社会运动能否产生,该运动在使新的社会一体化形式制度化时有否建树,以及这些制度的稳定化能否完成,也都要依赖于情境的偶然性。但无论如何,可以在某种发展逻辑中,即在某个复杂性渐次增长的复合体和环绕它的理性形式的分层系列中,结构性地描述一个拥有不同发展阶段的过程。

4.批判理论并没有穷尽于社会进化理论的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它的最终目标是完成以历史为指向、同时又带有实践意图的对现代社会的分析(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重建)。与过去发展的逆溯性解释相比较,对现代社会的预测性分析具有某种直接实践的参考特征。

之所以对现代社会形态的进化阐述拥有某种直接实践的参考特征,是因为它们能协助诊断发展性问题。中止对历史物质逆溯性解释的限定,有利于某种从行为前景出发的逆溯性探究。当前问题的诊断者采取的是一种关于未来的过去之进化解释的假想性立场……作为一个规则,马克思主义者对发达资本主义的解释也带有这种理论家位置的不对称性:他们对现代社会系统发展性问题的分析,乃是借助于某种并未制度化(也可能永远不会制度化)的结构可能性的观点。由此不难发现,进化理论应用于现代只是在一种推论式的意志形成物——即在一种关于为什么特定情境中的特定行为者会选择特定行为

方式而非它者的实践论证——的框架内，才是有意义的。<sup>⑩</sup>

哈贝马斯对现代资本主义分析的主要贡献，见于《合法化危机》一书，<sup>⑪</sup>本书最后所译的《现代国家中的合法化问题》，提供了他在该书所作的论证，并有进一步阐发。其中，有些是对批评者的回答，或为澄清若干重要概念。这个论证的理论演化背景可以在证明水平的概念中发现——这个概念涉及不同种类的基础或理智可接受的规范条件，涉及不同类型的合法化效用的规范条件，还涉及这些合法化类型运用自身力量创造交感、形成动机的规范条件。——论证的核心是要说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合法化问题是植根于它们自身结构内部的基本冲突的产物，这个冲突存在于两极之间：与大众民主相应的社会福利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功能。国家不得不在若干限制性情境中去处理经济过程中功能失调的效果面，即在世界经济的范围内寻求经济稳定政策与社会改革政策的平衡。所有这些，都进一步限制了个体国家的行动范围，但又没能有效地控制社会一体化，故产生了“计划意识形态”。就国家未能把这些效果面保持在可接受范围内的意义而言，合法化问题显现了出来，如：围绕分配、经济动荡等问题日趋尖锐的斗争；改革政策的夭折；对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本质意义的动力模式的分解和功能失调在结构中日益扩散。正如那些熟悉《合法化危机》的读者可以回想起来的那样，恰恰是这个合法化消解的最后一种水平被哈贝马斯看作是最根本的问题所在。如果通过这样一些与系统相一致的酬报——诸如金钱、自由的时间、安全——得以反映的生活方式都不再能令人信服地加以合法化，那么“‘对幸福的追求’在未来也许会意味着某些不同的东西——例如，不是要积累作为私人所有的物质对象，而是要造就某种社会关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中，相互

共存将占据统治地位，满足也不再意味着一个人在压制他人需要基础上的成功。”

最后，谨对亚历山大·冯·洪堡基金会表示最诚挚的谢意，正是由于它的资助，才使我得以从1978年春开始，进行乃至完成本书的翻译。

托马斯·默伽塞(T·Mc Carthy)  
于波士顿大学

# 目 录

|                                                           |           |
|-----------------------------------------------------------|-----------|
| 在研究当代各种思潮中发展马克思主义<br>——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br>的出版而作 ..... | 徐崇温 ( 1 ) |
| 中译本序 .....                                                | ( 1 )     |
| 英译本序 .....                                                | ( 1 )     |
| 第一章 什么是普遍语用学 .....                                        | ( 1 )     |
| 第二章 道德发展与自我同一性 .....                                      | ( 71 )    |
| 第三章 历史唯物主义与规范结构的发展 .....                                  | ( 98 )    |
| 第四章 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                                     | ( 133 )   |
| 第五章 现代国家中的合法化问题 .....                                     | ( 183 )   |
| 注 释 .....                                                 | ( 214 )   |

## 第一章

# 什么是普遍语用学\*

### 1

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 (verständigung) 的普遍条件<sup>①</sup> (在其它场合, 也被称之为“交往的一般假设前提”), 而我更喜欢用“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这个说法, 因为我把达到理解为目的的行为看作是最根本的东西。如此, 我将从下列假设开始 (先不去论证它): 其它形式的社会行为——例如, 冲突、竞争、通常意义上的战略行为——统统是以达到理解为目标 (verständigungsorientiert) 的行为的衍生物。进而言之, 既然

---

• 我要对E·图根哈特和G·戈莱恩道尔夫两位先生深表谢意, 他们曾给本文初稿的写作以诸多批评和帮助。当然, 他们对现在的修改稿可能仍有不同意见。  
——J·哈贝马斯

语言是进化的社会文化阶段上理解的特殊媒介，那我就打算更进一步，将具有明晰性的言语行为从其它类型的交往行为中分列出来，同时不涉及非言语化行为及形体表达。<sup>②</sup>

### 言语的有效性基础

K-O·阿佩尔(Apel)曾就交感性言语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这样阐述道：要确定这样一种前提，我们就必须放弃行为事实观察者的观察方法，并反躬自问“对我们自己和他人来讲，什么是我们必然总是已经作为理解可能性的规范条件而预先设定了的？在这个意义上，什么又是我们必然总是已经接受了的？”<sup>③</sup>阿佩尔使用了演绎完成态的语言(immer, schon; 总是, 已经)，又加上必然性的词句，用以表达那种超验性的强制力。超验性的强制力是指我们作为言说者，一旦开始试行、理解一个言语行为或对之作出响应，就成为主体。只有在这个行为的施行之中或之后，才能逐渐意识到自己已经不自觉地作出了相当的假定，即阿佩尔所说的“理解可能性之规范条件”。这里，“规范”一词也许会导致某种误解。确实，人们可以说，当一个人在头脑中不仅具有行为标准、甚至一般准则的约束性特质，而且具有横贯其全部领域的言语的有效性基础时，那种普遍的、不可避免的（以及——在这个意义上——超验的）、可能理解的条件就有了规范性的内容。我想有必要简略说明我所讲的“言语的有效性基础”意味着什么。

我将展开这样一个论点：任何处于交往活动中的人，在施行任何言语行为时，必须满足若干普遍的有效性要求并假定它们可以被验证（或得到兑现：einlösen）。就他试图参与一个以理解为目标的过程而言，他不可避免要承担起满足下列——确切地讲，正好是这些——有效性要求的义务。这些要求包括：

1. 说出某种可理解的东西；

2. 提供(给听者)某种东西去理解;
3. 由此使他自己成为可理解的;以及
4. 达到与另一个人的默契。

将上述四点展开就是:言说者必须选择一个可领会的(*verst-  
ändlich*)表达以便说者和听者能够相互理解;言说者必须有提供一个真实(*wahr*)陈述(或陈述性内容,该内容的存在性先决条件已经得到满足)的意向,以便听者能分享说者的知识;言说者必须真诚地(*wahrhaftig*)表达他的意向以便听者能相信说者的话语(能信任他);最后,言说者必须选择一种本身是正确的(*richtig*)话语,以便听者能够接受之,从而使言说者和听者能在以公认的规范为背景的话语中达到认同。不但如此,一个交往行为要达到不受干扰地继续,只有在参与者全都假定他们相互提出的有效性要求已得到验证的情形下,才是可能的。

达到理解(*verständnis*)的目标是导向某种认同(*einverständnis*)。认同归于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两相符合的主观际相互依存。认同以对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正确性这些相应的有效性要求的认可为基础。不难发现,理解这个词是含混不清的,它最狭窄的意义是表示两个主体以同样方式理解一个语言学表达;而最宽泛的意义则是表示在与彼此认可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上,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调;此外还表示两个交往过程的参与者能对世界上的某种东西达成理解,并且彼此能使自己的意向为对方所理解。

如果包含上述四个方面的充分认同是语言交往中的正常现象,就没有必要再从导致认同的动态角度去分析理解过程了。在灰色区域中,典型的情形正好处于下列两极之间:一方面,非领会或误解,自觉或非自觉的不真实,隐含或公开的不谐和。另一方面,预先存在或已经获得的交感。达到理解是一个在可相互认可

的有效性要求的前设基础上导致认同的过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从属于这些译解（它们被参与者视作当然）的背景性交感出发的，一旦这种交感发生动摇，承诺相应的有效性要求将得以满足（或能够兑现）的假设前提便成为悬案。相互解释的任务就是要使这种情境获致某个能为所有参与者所认同的新定义。如果他们的努力失败了，交往行为就不可能继续。于是，人们基本上面临着两种选择：或是转向战略行为，完全中断交往；或是在不同的水平上——一个论辩性言语的水平上（其目的是推论式检验至今仍被视为假说的、有待澄清的有效性要求）——重新开始以达到理解为方向的活动。在下面的讨论中，我将只考察交感性言语行为，而不再顾及论辩和战略行为。

在交往活动中，参与者事先假定他们知道对彼此提出的有效性要求的相互认可意味着什么。如果他们能依靠某种共享的情境界定并因此而交感式地进行活动，则背景性交感就将包含如下内容：

1. 言说者和听者都暗知他们双方皆不得不提出如前所述的有效性要求，如果这里确实有某种交往（在以达到理解为方向的行为意义上）存在的话；

2. 双方都假设他们实际上的确满足了这些交往的先决条件，即他们能验证他们的有效性要求；

3. 如此，则有一种共同确信存在：任何被提出的有效性要求都或是已经兑现的（如被言说的句子的可领会性），或是能够被兑现的（如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因为句子、陈述、被表达的意向以现及话语，使相应的适宜条件得到了满足。

这样，我把以下三者区分开来：（1）下列各项的有效性条件：语法性语句、真实的陈述、真诚的意向表达或与其关联域相吻合的规范上正确的话语等；（2）主观际认可下列各项的要求：言说者句

子的完美构造、陈述的真实、意向表达的真诚、以及言语行为的正确等；(3)已被验证的有效性要求的兑现或履行。兑现意味着该言说者，不管是通过直觉或经验，还是通过论辩或行为结果，总是把要求的价值立足于得到认可（*anerkenntnis würdigkeit*）的基础上，并导致对有效性的某种超主观的承认。在接受由言说者加以满足的有效性要求时，听者认可了符号结构的有效性，即承认某个句子是符合语法的，某个陈述是真实的，某个意向表达是真诚的，或某个话语是正确的。这些符号结构的有效性建立在下列事实基础上，即它们使一定的适宜条件得到了满足。但该有效性的意义又由被认可的价值所组成，或由这样一种保证所组成：主观际的认可可以在适宜的条件下得以实现。<sup>④</sup>

我已经提议用普遍语用学来指称那种以重建言语的普遍有效性基础为目的的研究，<sup>⑤</sup>现在，我想初步界定一下这项研究方案的主题。在继续讨论言语行为理论之前（这个讨论见本文的第二部分），有必要明确几个指导性要点，它们是：(1)初级界定普遍语用学对象领域；(2)阐明合理重建的程序（通过与较狭窄意义上的经验-分析程序相对照）；(3)由语言学要求具有重建性科学的地位这个事实引出的几个方法论上的困难；(4)关于普遍语用学的地位：究竟是假设了某种超验性反思理论，还是假设了具有经验内容的重建性科学。我将仅限于作出若干定向性评论，因为当这些问题乃是基础性的、并值得加以独立研讨的问题时，它们仅仅形成我将处理的主题的关联域，并因而必然保留在背景领域中。

### 关于对象领域的初级界定

阿佩尔在他的几部著作中，已经注意到那种抽象谬误，它们构成趋近于科学逻辑的流行方法的基础。<sup>⑥</sup>由卡尔纳普发端的语言的逻辑分析首先所专注的是语言形成中句法的和语义学的特性。

像结构主义语言学一样,语言的逻辑分析对自身对象领域的界定,是把对象领域从语言的语用特性中抽象出来,随后,把语用侧度引向这样一个方向:在这里,一方面存在言说与行为主体的衍生技能,同时,与言语的一般结构之间的构成性联结,又不可能进入研究视野。当然,在作为结构的语言与作为过程的言说之间进行抽象区分,乃是一种符合传统的作法。这样一来,语言就将被理解为某种为形成表达而建立的规则系统,而所有构造完美的表达(如句子)都可被认作是这种语言的要素。有能力言说的主体作为交往过程的参与者,又能使用这样的表达:他们既能言说句子,又能理解并响应被表达的句子。这种从存在于言语(与 *langue* 相对的 *parole*)中的语言的应用得出的语言的抽象——该抽象通过逻辑分析和语言的结构主义分析而获得——是意味深长的。然而,这种方法论步骤并不足以成为下列看法的理由,即人们用以抽象的语言的语用学侧度乃是逸出于规范分析之外的。语言学规则系统成功地(起码是有希望地)重建这个事实,不能作为将规范分析限定于该对象领域的根据。两种分析水平的分类(语言和言语),不能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进行,似乎语言的语用学侧度只适合于经验分析,即只适合于经验科学,例如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我坚持这样的论点:不仅语言,而且言语——即在话语中对句子的使用——也是可以进行规范分析的。正如语言的要素单位(句子)一样,言语的要素单位(话语)能够在某种重建性科学的方法论态度中加以分析。

自从C·莫里斯(Charles Morris)的《符号学》一书问世以来,<sup>⑦</sup>交往的一般理论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交往的一般理论将语言学行为主义的模型(被刺激的个体有机体的符号性中介行为反应)和信息传递模型(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为给定信道和至少是部分共同的符号库而进行的信号编码和译解)综合到自己的基本

概念框架中。然而,如果言说过程就这样被概念化,普遍语用学的基本问题(有关可能理解的一般条件),就不可能被适宜地提出来。例如,意义的主观际性(它至少对两个言说者来说是同一的)甚至没有为交往的一般理论所重视,如果(1)这种意义的同一性被减少为行为特性的外延的等同类,就像语言学行为主义所作的那样;<sup>⑧</sup>或(2)在分析水平上,预先设定在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共用电码和符号库,就像信息理论所作的那样。

除了由莫里斯符号理论开始、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对问题的经验主义探寻以外,还有若干有趣的、并接近对言语和行为普遍结构的规范分析的方式。下列诸分析可以被理解为沿此途径达到普遍语用学的某些贡献:(1)B·希莱尔(Bar Hillel)早就指出过逻辑语义学语用延伸的必然性,<sup>⑨</sup>同样提示也见之于关于道义学逻辑的建议〔哈雷(Hare)、怀特(H·von Wright)、瑞舍尔(N·Rescher)〕<sup>⑩</sup>以及相应的使此类言语行为(如命令和询问)形式化的努力〔阿波斯岱尔(Apostel)〕<sup>⑪</sup>中;有关非演绎性论辩逻辑的尝试〔图尔敏(Toulmin)、鲍萨(Botha)〕也属于这一类。<sup>⑫</sup>(2)在语言学那里,对假设前提〔凯弗尔(Kiefer)、帕多菲(Petöfi)〕<sup>⑬</sup>、交谈准则〔戈瑞斯(Grice)、拉考弗(Lakoff)〕<sup>⑭</sup>、言语行为〔罗斯(Ross)、莫考勒(Mc Cawley)、冯特利希(Wunderlich)〕<sup>⑮</sup>、以及对话和本文〔费尔莫(Fillmore)、波斯纳尔(Posner)〕<sup>⑯</sup>的研究,导致从重建主义角度对语言的语用学方面的思考。(3)语义学理论中的困难〔卡兹(Katz)、莱昂斯(Lyons)〕也在上述几个方面。<sup>⑰</sup>在规范语义学那里,关于陈述结构、参考性术语及属性结构的讨论〔斯特森(Strawson)〕<sup>⑱</sup>——这种讨论可以上溯到弗莱格和罗素——对普遍语用学来讲,具有特殊的意义。(4)分析行为理论〔丹托(Danto)、汉姆普舍尔(Hampshire)、施威特(Schwyder)〕<sup>⑲</sup>以及意向性行为解释的逻辑相联系而进行的讨论

〔魏林赤(Winch)、泰勒(Taylor)、怀特(Von Wright)〕<sup>②</sup>中,也可以看到同样情形。(5)由维特根斯坦倡导的意义的理论具有普遍-语用学的特征〔阿尔斯顿(Alston)〕,<sup>③</sup>戈瑞斯把意义追溯到言说者意向那里的努力亦是如此〔贝纳特(Bennett)、希福尔(Schiffer)〕。<sup>④</sup>(6)我将主要引用由奥斯丁(Austin)创始的言语行为理论〔塞尔(Searle)、冯特利希〕,<sup>⑤</sup>并把它视为走向某种普遍语用学的最有希望的出发点。

上述种种从逻辑、语言学和语言的分析哲学出发的接近方式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即从规范分析的角度澄清语言应用的过程。但如果就它们对普遍语用学的贡献加以评价的话,那么它们的缺点是很明显的,在许多场合,我都看到一种关于可能理解的条件分析被丧送的危险。这是因为:

1. 这些接近方式没有达到充分的概括化,不能通过偶然性关联的水平达到一般的、不可避免的假设前提、即先决条件的水平。譬如大多数关于语义和语用的先决条件的语言学研究就属于这种情形。

2. 它们把自身限制于在逻辑与语法中发展起来的工具手段里,甚至在这些手段不足以搞清语用关系时也执拗而行。我们可以在有关言语行为的施行性特征的句法学解释中找到这种例证。<sup>⑥</sup>

3. 它们错误地引导人们进入一个基本概念的形式化领域中,这个领域迄今还没有人认真地加以分析过。在我看来,那种把行为规范上溯到命令的规范逻辑的作法,就暴露出这种性质。

4. 它们是从某种孤立的、有目的-理性的行为者模型开始,并因此而未能〔就像戈瑞斯和莱维(Lewis)<sup>⑦</sup>所作的那样〕通过一种适当方式,在同一性意义的理解或主观际有效性要求的认可中,重构有关相互关系的特殊要素。

我的总印象是:言语行为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上述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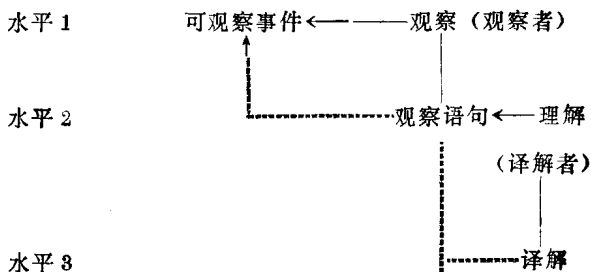
并克服了它们所具的缺点。

### 关于合理重建程序的说明

我已经使用了规范分析这种表达以反对经验-分析程序(在较狭窄意义上)的说法,但没有给出更详尽的说明,这至少容易使人误解。我并不是在某种标准的谓项逻辑或任何一种特殊逻辑的意义上运用规范分析这个概念,我所理解的并适合这个概念的含义,最好是通过我在概念、标准、规则及图式之合理重建中所采用的方法论态度来表征。这样,我们所说的就是意义及概念的解释、先决条件及规则之分析的解释。当然,重建程序对经验-分析研究来说同样是重要的,例如,对基本概念的框架的阐释;对最初在普通语言中系统表征的假定进行的规范化工作;对特殊假说中演绎性关系的澄清;对衡量结果的译解等等。这类科学的特征是发展了有关可观察事件领域的理论性假说,重建程序不属于它们的特征,而是下面这类科学的特征:它们系统地重构有能力主体的直觉性认识。

我愿意从区分知觉性经验或观察与交往性经验或理解(verstehen)入手,进而澄清有关经验-分析与重建性科学之间的区别。观察指向可感觉事物和事件(或状态);理解则指向话语的意义。<sup>②</sup>在经验过程中,观察者原则上是特立独行的,尽管经验所被承认要求有某种客观性于其中的范畴之网已经为几个(甚至全体)个体所共享。与此不同,以理解意义为己任的译解者在与其他个体建立起来的符号化主观际联系的基础上,基本是作为交往过程的与人从事经验的,尽管他实际上可能只是和一本书、一份公文、或一部艺术作品打交道。这里,我不打算进一步分析观察与理解间的复杂关系,而想把注意力集中于这样一个问题,即存在于可感觉的现实性与某种符号化构成物之可理解的意义这一水平上的差别。知觉

性经验直接与现实的有关方面相联系，交往性经验则必须是有中介的，正如下列图表所示：



这个图表提供了三种不同的关系：

1. 经验行为与其对象间的认识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理解行为与符号表达相联系(这里指观察语句的符号表达)，正如观察行为与被观察事件相联系一样。

2. 陈述性语句中呈示与现实之某一方面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译解呈示着语义学内容(这里指观察语句的语义学内容)，正如观察语句反过来呈示相应的事件一样。

3. 表达意向性行为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理解(这里指对观察语句的理解)在译解的陈述性内容中被表达，正如观察在观察语句的陈述性内容中被表达一样。

上述三种类型的关系都指向基本问题这个事实。但是在阐明观察者和译解者之间所存在的对其对象间的认识关系方面的精确差别，以及阐明一方面存在于观察语句对现实的表现性关系，另一方面存在于译解语句对符号化预先建构的现实的表現性关系这两类关系的精确差别时，还有着—个附加的困难，这种阐明要求在观察和译解、描述和解释之间作出比较。就目前而言，上列图表仅仅给出了知觉性与交往性经验与之相联系的两种现实水平，而存在

于可感觉的现实性与符号化预先建构的现实性这种水平上的差别,则在由通过现实观察直接进入的方法与通过理解某个涉及事件的话语而加以交往性中介的进入方法所构成的裂缝中得到反映。

这样两对概念——可感觉的现实性与符号化预先建构的现实性相对应,观察与理解相对应——可以与描述和解释这对概念相对应地联系起来。通过运用一个报道某项观察的语句,我能够描述现实的被观察方面;通过运用一个表达某种关于符号化构成物意义的译解语句,我能解释这样一种话语的意义。自然,只有当符号化构成物的意义模糊不清时,解释才需要作为独立的分析步骤被提出。对那种我们用以描述事件的语句来讲,在不同水平上可能还存在某些问题。如果所描述的现象需要解析,我们就希求某种因果性描述,从而使有关现象的产生过程清晰起来;如果描述本身就是费解的,我们则希求某种解释,从而使观察者所用话语的意义以及需要阐述的符号化表达的发生过程清晰起来。在前一种场合,一种令人满意的回答将具有借助于某种因果性假设而进行解析的形式;在后一种场合,我们所说的则是有关意义的解释(当然,意义的解释不需要限制在描述性语句中。任何有意义的结构化构成物都可以成为意义解释活动的对象)。

描述和解释有着不同的区域,它们可以从表层开始进而达到深层结构。我们对于这个与自然现象的解析有关的事实都很熟悉——理论或多或少可以是普遍的,同样的真实性也适用于意义解释。当然,解释区域并不依赖于那种外在现实结构(这种结构对观察而言是可达到的)的理论知识的普遍化水平,而依赖于对理解而言是可达到的、某种现实之深层结构的认识,这是一种根据规则而形成的符号化构成物的现实。自然现象的解析与表达意义的解释,是在不同的方向上被推进的。

我还要把意义解释区分为两种水平。一句被写出的语句、一次行动、一个姿势、一部艺术作品、一种工具、一种理论、一种日用品、一份被传递的文献,等等,如果它们的意义是不清楚的,那么,有关其意义的解释,将首先指向这种符号化构成物的语义学内容。在试图理解其内容时,我们是站在与“作者”写文章、作出姿势、运用工具、应用理论等等时所采纳的同一种角度,通常我们还必须跃出作者本人给出、或意欲给出的意义范围,进一步考察作者并未意识到的关联域。<sup>②</sup>然而,典型的情形是,对内容的理解追踪着这样一种联系,费解的构成物的表层结构常与其它相似构成物的表层结构连接起来。这样,语言学表达将通过同种语言中的释义过程或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表达的过程而得到解释。在这两种情况下,有能力的言说者都将直觉地借助于在某些语言或两种语言共有的专门词汇中获得的已知意义联系。

如果译解者通过这种方式仍然不能达到其目的,他可能会改变自己的态度,把原来以理解内容(在这种内容中,他似乎是通过符号化构成物看到那被言说的世界)为标志的态度转变为这样一种态度,即把注意力直接引向表达本身的衍生性结构,译解者将试图根据作者进行写作的规则解释该符号构成物的意义。在通常的释义和翻译过程中,译解者通过某种特定方法诉诸语义学的意义联系(例如在同一语句不同词汇间的意义联系)。这里,他是简单运用与该语言有能力的言说者所共享的知识,在此意义上,译解者占据的角色(在适宜条件下)可以被认为就是作者本身。然而,一旦译解者不仅想应用这种直觉性知识,而且还想重建它,态度的转变就发生了,他将转而不理睬符号化构成物的表层结构,不再带着直接意图通过它去观察世界,则试图取代那种表面现象的比较(像过去所作的那样)而进入符号化构成物本身,以发现符号化构成物由以建构的规则(就是语言的专用词汇由以建构的规则)。理解的

对象也不再是某种符号表达的内容或某位特定作者在某个特定情境下表达的东西，而是一位有能力的言说者在他自己的语言中所具有的直觉性规则意识。

我们不妨借用赖尔 (Ryle) 的术语，<sup>28</sup> 把知道-如何 (know-how) 和知道-为何 (know-that) 两者区分开来：前者指有能力的言说者理解如何构造或施行某物的能力；后者指他何以会达到这种理解的明晰的知识。作者话语所意味的与译解者对其内容所理解的，属于初级水平的知道-为何。在作者的话语乃属正确构成并因此而成为可领会的程度内，他是根据一定的规则或在相应结构的基础上构造了它。他理解自己语言的规则系统及其特定关联域的应用，对这种语言规则系统，他具备某种前理论的知识，这至少足以使他有能力构造有关的话语，这种隐含的规则意识就是知道-如何。反过来，译解者不但享有、而且要去理解有能力言说者的这种隐含的知识，必须将上述的知道-如何翻译成二级水平的知道-为何。这正是重建性理解的任务，即在合理重建隐藏于符号化构成物构造过程背后的衍生性结构这个意义上，完成意义的解释。由于被重建的规则意识是一种范畴性知识，重建势必首先将我们导向概念解释的运作活动。

卡尔纳普曾经提出概念解释必须遵循的四条要求，以使解释成为适当的：

- (1) 解释 (the explicans) 应该与被解释者 (the explicandum) 一致，也就是说，解释应能在所有场合取代被解释者。
- (2) 应该有某些规则，以便将解释的运用 (与其它科学概念相联系) 固定在某种严格的程式中。
- (3) 对一般命题的阐释来讲，解释应能证明自身是富有成果的。
- (4) 如果前三项要求已经满足，解释应尽可能地简单化。<sup>29</sup>

冯特利希(Wunderlich)这样总结了他对上述概念解释要求的思考:

(1)解释总是借助于理论来进行的(与卡尔纳普的第二至四项要求相一致),或是中心概念(如“意义”)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译解,即整个理论都作为解释(explicans)与其相应,或是不同的概念在相互联系中被解释。(2)在解释中,我们总是要借助于某些清晰的实例,以便能与它们的联系中,用精确的论据取代我们的直觉。但是,对那些不甚清晰明确的实例,理论也能提供某些答案,或者我们要分别解释什么情形才属于“明确实例”或“不明确实例”。(3)解释语言与被解释语言(如普通语言或从普通语言中导出的标准化语言)乃是处于同样的水平上,这样,问题就不再是与被解释语言相对的描述性语言或元语言了(解释并不描述被解释者)。<sup>⑤</sup>

在以上关于概念解释的思考中,有一个发挥不甚淋漓的观点打动了,这就是规则意识的评价性运用。重建计划被指向前理论认识领域,即不是指向任何隐含性观点,而是某种已证实的直觉性先见(fore knowledge)。有能力言说者的规则意识是作为某种评价机构发挥着功能,对句子的合语法性的评价就是如此。重建性理解不同于关于内容的理解(这种理解可以指向任何一种话语),它只能诉诸被有能力主体自身刻意完成的符号化客体。这样,如像句法理论、命题逻辑、科学理论以及伦理学等等,皆分别开始于句法学意义上无可指摘的语句、正确形成的命题、已经确证的理论,还涉及规范冲突的道德上无可非议的解决,以便重建这类规则。正是依靠这些规则,上述构成物才能被创制出来。在普遍-有

效的要求(句子的合语法性、陈述的连贯性、假说的真理性、行为规范的正确性)构成直觉性评价的基础这种意义上——就像我们的例子所表明的——重建活动乃是与某种一般的前理论认识、与一种普遍化潜能相联系,而不是仅仅与特定集团的特殊资质或特殊个体的才能相联系。当被重建的前理论认识表达出某种普遍能力,表达出某种一般认知的、语言的、相互作用的资质(或子资质)时,那种以意义解释为起始的工作,就将以类资质(species competences)的重建为目标了。在范围和性质上,这种重建可与一般性理论相比较。<sup>⑩</sup>

乔姆斯基在他的语法理论(最早见于1957年出版的《句法结构》一书)中拓展了上述思想,乃是他的一项伟大功绩。概略地讲,通过下列方式重建为所有有能力言说者所共具的规则意识,正是语法理论的任务所在,这个方式就是:重建计划显示出规则系统,规则系统使潜在的言说者至少在一种语言(L)中获得该种语言资质,使他能构造并理解合乎L语言语法规则的语句,以及能将L语言中完美构成的句子从不合语法的句子中区别出来。<sup>⑪</sup>

### 与经验主义语言学相对的重建语言学

我想我已经阐明了这样一种科学的重建程序:它把已被有能力主体实践化熟练运用的前理论认识(知道-如何)转换为某种客观的、明晰的知识(知道-为何),而且是在这样一种程度上,即这种阐述是以使我所运用的规范分析这种表达的确切含义更加清楚。在提及重建语言学的某些方法论困难之前,我想更宽泛地比较一下语言科学两种变体间的区别:经验分析与重建(冯特利希称之为经验-描述的语言科学和经验-解释的语言科学)。<sup>⑫</sup>

资料。就经验基础被认为是通过独自观察即可获得而言,语言学资料乃由语言行为中的可衡量变量所组成;就重建性理解是可

进行的而论,其资料则由有能力言说者的规则意识所提供(也就是说,是通过借助于系统组织起来的实例而进行的适宜的提问)。这样,资料将根据它们的本体论水平被区分开:(1)实际的言语行为是可感觉现实的一部分;规则意识则指向符号化构成物的生产(在该构成物中,有某种关乎现实的东西被言说)。<sup>④</sup>(2)进一步讲,观察总是意味着某种特殊事物的知识;而规则意识却含有范畴性知识。(3)观察性资料的选择,仅仅出自语言学者的分析角度;重建性资料则是有能力言说者自己评价和预先选择可能的资料,并且是从着眼于可能资料的合语法性的完美形成物(well-formedness)出发来进行选择。

理论与对象领域。只要自然语言被当作语言学描写的对象而不是当作某种可重建的前理论认识的表现形式,语言学理论就是作为一种经验理论与其对象领域相联系,这种经验理论借助于法理性假设去解析语言现实中的语言描述。反之,如果语言学理论被认为是服务于重建前理论认识,则理论就是作为针对被解释者进行的意义解释而与对象领域相联系。在经验主义变体那里,理论对被解析的语言的关系基本上不能区别于存在于其它法理性科学中的理论与现实的关系;而在解释性变体那里,对象的语言学特征则使那种只能存在于不同语言表达间的关系成为必要:这是一种解释与被解释者之间的关系,解释的语言(也就是语言科学中的构造性语言,它是一种普通语言的规范变体)原则上与被解释的自然语言属于同一水平(无论是理论形成的描述性场合还是解释性场合,语言学理论与其对象领域的关系都不能设想为某种元语言与对象语言的关系)。<sup>⑤</sup>

理论与日常认识。还有另一种特性发生于上述不同趋向的概念化过程。一种较狭窄意义上的经验-分析理论可以(而且,作为某种规则,必将)反驳对象领域的日常认识(我们拥有这种日常认

识先于拥有科学),并且用某种暂时认作真实的、正确的理论知识将其取而代之。与此不同,一种重建计划可以或多或少明晰地、适宜地呈示前理论认识,但绝不能证明其为假。至多,一个有关言说者直觉的报道能被证明是虚假的,但这绝非直觉本身。<sup>⑧</sup>非直觉证明属于资料的范围,而资料只能被解析,不能被评判。资料顶多可以作为是否合适而加以评论,即对某项特殊的理论目的来说,它是否是被失当地收集,是否是被错误地选择。

在相当程度上,重建提出了一种本质主义的要求。理论描述在与重建所提供出的被解释的深层结构相似(如果它是正确的)的意义上,也与有关的现实结构相应(如果它是真实的);同时,理论描述与被断言的对象间存在的相应,又容许许多不同于现实性译解(例如工具主义的或因袭主义的)的认识性译解。而理性的重建则要重新构造那种仅仅是在本质论意义上进行解释的前理论知识,如果它们是真实的,必将与这类规则相呼应:这些规则在对象领域中,具有操作性效应,实际决定着表层结构的生成。<sup>⑨</sup>这样一来,乔姆斯基的相互关系假设就成为坚不可摧的了(至少在起点方面),根据这一假设,语言学意义上的语法,就言说者而言,是相应的心灵语法(mental grammar)的呈示。

方法论方面的困难。随着乔姆斯基创立的作为语言资质之合理重构的一般语言科学这一方案的提出,与此相联系的若干方法论性的困难已经露出了端倪。我想从方法论角度,对两个日见发展而又颇难对付的问题作一些考察:有能力言说者之直觉性知识的性质与可靠性和语言学意义上的语法与心灵语法间的关系。

首先,有两种反对选择言说者的直觉作为重建性理论构造的出发点的异议。<sup>⑩</sup>一种异议认为,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一种重建语言学是否可能达到关于语言资质的理论?在被选择的资料的基础上,它是否还是关乎、甚至是去发展(这是最理想的情况)有能力言

说者对自身语言所拥有的直觉性理解的理论? 或者发展本身就是被制约的? 由于人们对自身普通语言的元语言学式的运用, 即一种求助于言说者判断力的科学必须诉诸于普遍语言之中, 不同于对语言的直接运用, 而且两种运用可能附属于不同的法则, 乔姆斯基类型的语法理论最多能够重建语言资质中支配着元语言学运用的那一特殊部分, 而不能重建直接构成言说和理解语言之基础的资质本身。

经验的问题在于, 是否一种彻底的语言直觉理论与一种彻底的人类语言资质理论具有同一性……乔姆斯基对这种同一性没有任何怀疑。……这样一来, 那种关乎一类语言行为的理论, 即对诸如合语法性及释义性等事项作出的元语言学判断, 就将作为一个整体被构入下面这种理论中, 该理论把其它形式的语言行为, 例如言说和理解, 作为对象……如果我们把语言行为区分为基本的和衍生的两大类, 那么语言的言说和理解恰恰构成基本形式的范畴, 而元语言学判断则被认为是高度衍生的、人造的语言行为方式。此外, 在发展过程中, 后者的被需求要迟于前者……(结果), 语言心理学中的经验性问题就被依此划分为两种: 一种是有关语言运用中心理因素的研究, 另一种是关于语言直觉的心理学研究。<sup>③</sup>

我认为, 这种反对意见混淆了上文已经阐述过的两种研究类型: 经验分析与重建。对此, 我想作出如下三点评论:

1. 重建与有能力言说者的前理论认识相联系, 后者表现在自然语言的句子构造中, 以及语言表达之合语法性的评价中。重建的对象乃是有能力言说者构造句子、并使之符合一套语法性语句

规则的过程，有能力言说者用以评价他们所听到语句的元语言学的话语，并不是重建的对象，而是被搜集的资料的一部分。

2. 由于自然语言的反身特性，言及某种已经说过的东西，对言语成分直接或间接地提及，本来就属于以理解为目标的语言过程。而在某种自然语言中，对同种语言的语句进行元语言学判断这种表达，则假设了一种实际并不存在的不同的水平。自然语言可以被用于其自身语言的解释，这确实是自然语言非常有趣的特点之一（以后，我还将回到这个论点上来）。

3. 在我看来，误解首先在于莱费尔特(Leveldt·W·J·M)的下列考虑：他求助存在于深层研究范例之抽象中的言说者的直觉。只有当人们事先假设了用以探查自然语言的现实性及存在于该种语言中的话语的某种狭义上的经验-分析方式时，人们才能把言说和理解语言（一方面）以及在语言中进行判断和判断某种语言（另一方面）当作两种不同的对象领域，一旦人们选择了重建的探查方式，他就要选择该对象领域的概念化过程。根据对象领域的概念化过程，一个有能力言说者语言学意义上的“知道-如何”乃是他借助于（而且也只能借助于）这种“知道-如何”构造语句的根本基础。如这种研究范例可能被证明为无结果，那它并非在批判的水平上表明已经预先假设了某种与之竞争的范例，只是表明竞争范例存在的可能性。

另一种异议直接指向建立在直观基础上的言说者直觉的不可靠性。对这种反对意见来讲，存在着颇为有力的经验证据。<sup>⑩</sup>而在我看来，它似乎再一次表明，有关言说者判断的经验主义译解促动了错误的期望，开出了拙劣的药方。直觉性认识这样一种表达不应该被理解为下面这种含意：言说者关于句子之合语法性的前理论认识（语源关系的严格、理论的中肯、等等）乃是某种可直接确定的直觉，而这种直觉不能被推论式地加以证明。恰恰相反，隐含

的认识之被引入意识,必须通过适当的正例和反例的选择,通过不同的和相似的关系,通过翻译、释义、以及诸如此类的其它东西——也就是说,通过被很好思考过的麦尤蒂克(maeutic)讯问方法。确定某个言说者的所谓直觉,已经是对其解释的开始。鉴于这个理由,由乔姆斯基和其他许多人制定的程序,对我来说似乎是有意义的和适宜的。人们从清晰的例子开始(在这种例子中,主体的反应都集中在一起),在此基础上展开结构性描述,然后按照已获得的假说,再提出不太清晰的例子,整个过程采用这种方式:讯问的过程同样可以导致这些例子的适当的澄清。在上述循环程序中,我没有看到任何错误的东西,每一个研究过程都经历着这种理论形成和对象领域精确说明之间的循环。<sup>④</sup>

第二个方法论方面的问题要困难些。在过去10年中,语言学意义上的语法与心灵语法的关系问题在心理语言学中一直被当作经验性课题,人们为之倾注了大量研究工作,研究的中心集中于在关于语法的语言学理论与心灵语法(人们所常说的言说者“头脑中的”东西)之间是否存在着直接的对应关系?<sup>⑤</sup>根据这个相互关系假说,语言重建并非简单地将语言学资料清楚易懂而又简明扼要地加以重新呈示,而是有着某种实际生产过程的心理学意义上的复杂性,并被假定与转换的复杂性相应,这种转换的复杂性可以靠语言表达的结构性描述来读解。这里,我不可能深入讨论个体研究的设计及不同的译解过程。很明显,在心理语言学中,有一种日渐增长的否定原初相互关系假说的趋向。按照贝福尔(Bever)、瓦特(Watt)及其他一些人的意见,心灵语法构成在心理学意义上可视为同一的语言生产过程及相应的理解过程之基础,它不能在某种资质理论的框架中被解析,不能在某种以重建为方向的语言学框架中被解析。我不敢肯定如何去评判这场争论,只想提出下面两点意见,就我所知,它们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到足够的讨论。

1. 本质论者对被重构的规则系统之心理现实性的重建性语言学的断言是何等地强烈! 我认为乔姆斯基确定的假设——即语法理论精确地呈现出内在的意向性质, 后者足以使儿童去展开那指向语言捕获物的假说, 去处理存在于环境中的语言学资料——似乎有些过头了。<sup>⑬</sup> 在重建主义的概念方略中, 那种显得更合理的假设——语法理论呈现了成年言说者的语言资质——已足够了。这种资质依次讲来乃是学习过程的结果, 而学习过程可能(像皮亚杰认知主义方法意义上的认知发展那样) 遵循某些理性的可重构模式。<sup>⑭</sup> 正如贝福尔所建议的, 甚至这种论点都可以被减弱, 以允许一般意义上非语言的感觉机制或非语言的认知系统对语法性规则知识的获得和应用所施加的限制, 而不必放弃资质理论的范畴框架。

2. 我不清楚心理语言学批评乔姆斯基资质理论的本质论内涵是在何种研究范例的混乱中发生的, 只有在用以检验和证伪资质理论的方法得到澄清时, 这个问题才能适当地加以讨论。我有一种印象, 心理语言学的研究继续了经验-分析研究的传统, 并且 a limine否定了资质与施行(performance)之间的区别。<sup>⑮</sup>

### 与超验释义学相对的普遍语用学

在提出有关重建性科学的想法, 并通过重建语言学(及其两个方法论困难)的思考对之加以简约阐明后, 我想进一步提出下列问题: 存在于关于可能理解过程之一般的、不可避免的前提条件的普遍语用学之重建与超验分析的关系是什么? 康德所谓“超验的”这个术语, 意指研究乃是要辨认、分析经验可能性的先验条件, 其含意本是一目了然的: 除了与经验对象相联系的经验知识之外, 还应假设有一种一般的、先于经验而存在的有关概念对象的超验知识, 而这种一般的先验概念被显示为可能经验之有效条件的方法却不

甚清楚。对下面这个命题的含义来讲,这里已经出现了不一致:“一般的可能经验的先验条件同时就是关于经验对象可能性的条件。”<sup>④</sup>

对康德方案的分析式采纳〔斯特温(Strawson)的工作就是一个类似的例子〕<sup>⑤</sup>导致某种关于超验的最简单的译解。每一个相关经验都被组织在一个范畴网络中,在任何其它相关经验中都发现有同样的内含概念结构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称这种可能经验的基础概念系统为超验的。这个概念否定了康德运用其超验演绎证明超验知识为正当的试图,也放弃了一种权力,这就是可能经验之概念对象在某种意义上要求客观有效性的证据的权力。<sup>⑥</sup>这样,康德哲学中强烈的先验主义衰变为一种较弱的变体。从现在起,超验研究必须依靠认识主体的资质,该认识主体判断哪些经验可以称之为相关的经验,以便去分析这些材料,达到一般的、必要的范畴性先决条件;每个有关可能经验之基础概念系统的重建都必须被看作某种假说性建议,使之能接受新经验的检验。只有当有关重建的必然性、普遍性之断言不再被驳回时,我们才可以称在所有相关经验中重复出现的概念结构为超验的。在这种较弱的变体中,那种关于结构可以被先验地论证的主张确实销声匿迹了。

但是,上述变更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几乎不可能与原方案相容的结果:人们再也不能排除下列可能性,我们关于可能经验之对象的概念只有在偶然性边界的条件下才可能成功地运用,而这种偶然性边界条件迄今为止已经被自然的永恒性、有规律性所履行了;<sup>⑦</sup>人们再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可能经验的基础性概念结构已经在种系发生的意义上得到发展,并且在每一个正常的个体发生过程中、在每一个可以被经验地加以分析的过程中屡屡再生;<sup>⑧</sup>人们甚至不能不认真考虑,某种先验的经验——这是把它作为相对物描述而言——只有对于特定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深深扎根的

行为系统来说,才是有效的,每一个这样的行为系统都使一种特定方略的客观现实化成为可能。由C·S·皮尔士开创的、以超验性为定向的实用主义试图表明,在经验和工具性行为间存在着这样一种结构性联系。<sup>①</sup>而起源于狄尔泰的释义学则试图——与上述先验的经验正好相对——对某种附加的先验理解或交往行为作出适当评判。<sup>②</sup>

从某种转形了的超验哲学(阿佩尔意义上的)的角度看,由于对康德方案的分析式采纳而招致的两个弃绝(经验构成概念的弃绝和关于有效性问题之明确处理的弃绝)似乎更加剧了。在我看来,保留某种强烈的先验主义绝不要求将自身限制于关于可能经验之条件的逻辑-语义学分析,如果我们放弃超验主义的概念——指这样一种主体,它完成综合并与其建构知识一起,从所有经验中迁移出来——这并非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否定有关可能经验对象概念之应用的普遍语用学分析,即关于经验构成的研究;<sup>③</sup>也绝不会产生像放弃某种超验演绎计划时所呈现的结果:人们必须将有效性问题移交给其它研究领域,例如科学理论或真理理论。当然,存在于可能经验的客观性与陈述真实性之间的关系看起来比康德式的假定还略有不同。我们现在可以用论证式兑现有效性要求的超验研究来代替那种先验的证明,这些有效性要求至少隐含地与哲学推论化证明相联系。<sup>④</sup>

在我看来,能否将这样一种对有关交往的一般的、不可避免的假设前提即先决条件(在这个场合,指论辩性言语的先决条件)的研究称作超验的,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术语问题。如果我们想使达到理解的过程(言语)隶属于某种以一般的、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为指向的重建性分析,并且是用认知过程中已经实现的同样方式,<sup>⑤</sup>那么,超验哲学模式就将无可辩驳地建议自身,特别是鉴于语言和行为理论还没有〔尽管有洪堡(Humboldt)存在〕发现它的

康德。自然，只有当人们在心中拥有上面提到的超验哲学的较弱的变体之一时，求助于这种模式才是可理解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佩尔提出“超验释义学”或“超验语用学”以表明其研究方案的特征。我想提出两点理由来说明我在采纳阿佩尔的用法时何以踌躇不决。

1. 我认为：只要是从经验过程的角度来看待理解过程的超验研究，那它就是合理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去谈论交往性经验。在作为交往过程的参与者去理解另一个言说者的话语时，听者（就像感受现实的某一部分的观察者那样）拥有某种经验。从这种比较性测度出发，具体的话语将与经验对象相对应，一般性话语则与一般性对象（即在可能经验对象意义上的一般对象）相对应。正如我们分析自己的一般性对象的先验概念、即分析有关任何相关感觉的概念结构一样，我们也能分析自己的一般性话语的先验概念、即分析有关可能理解情境的基础性概念或概念结构。一般性话语的先验概念使我们在正确的话语中运用句子，像意义和意向性、言说能力和行为能力（能动作用）、人际关系以及其它类似的概念，都可以归于这个概念性框架之内。

然而，与“可能经验的对象”这一表达相应的“可能理解的情境”的表达表明，获得在交往过程中我们所拥有的经验，对于交往过程为之服务的目标、即达到理解来说，乃是第二位的東西。言语的一般结构必须首先从理解的角度而不是从经验的角度进行研究，一旦我们承认这一点，那种超验哲学（不管它是如何被设想的）的平行物就退回到幕后背景中了。支撑着超验哲学的一个基本观念乃是——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我们是从恒常的观点出发去构造经验并使之客观化。这种客观化在一般性对象中显示自身，而一般性对象在每一个相关经验中又必须被事先假定，这些对象可以作为基础概念系统依次得到分析。然而，我没有发现任何上

述观念的对应物,而只有根据这些对应物,有关交往的一般性前提条件的分析才可以被完成。如果我们遵循康德的基本想法,即经验乃是被构成的,那么话语则至多是衍生的。这样一来,以理解过程为对象的超验研究就不得不另择它途了——可能是深层和表层结构模式,但不会是经验构造的认识论模式。

2.不但如此,采用超验的这种表达似乎将隐匿与先验论绝交,尽管这种绝交已经在同时实现。康德曾不得不把经验分析从超验分析中果决地分离出来。如果我们现在是在关于经验的一般的、不可避免的前提条件之重建(这些经验可以被认为具有客观性)的意义上理解超验研究,那么,这里当然保留了重建性分析与经验-分析性分析之间的区别。但是存在于诉诸先验知识和诉诸后验(*posteriori*)知识间的不同却变得模糊不清了,一方面,有能力言说者的规则意识,对他们来讲乃是一种先验知识;另一方面,关于这种知识的重建又要求有由经验的言说者担负的询问——即语言学家自身要努力获得某种后验知识。有能力言说者隐含的知识与知识的语言学表述的明确形式间有着极大的不同,后者不可能依赖于个体语言学家关于他自身言语直觉的反思。在构造和检验假说、估价竞争中的不同重建计划、收集和选择材料等等过程中使用的程序,在许多方面类似于理论科学中运用的程序。那种可以上溯到资料结构上的不同(一方面是可观察事件,另一方面是可理解符号)、以及可以上溯到规律和规则结构上的不同的方法论方面的区别,并不足以将语言学从经验科学的领地中驱逐出去。

这一点对于个体发生学的理论来说,尤其是正确的。这类理论——像皮亚杰的认知发展心理学——乃是把资质(以及被重建的资质的发展模式)的结构性描述与涉及因果机制的假设连接起来。<sup>⑥</sup>乔姆斯基和皮亚杰提供的范例已经导致了一种研究类型,与其说它决定于规范分析与经验分析的古典式分离,不如说它决

定于它们二者间的特殊结合。因此，超验的这种表达——人们用它表示与经验科学的区别——即便是在不存在误解的情况下，也不适于说明像普遍语用学这类研究的特征。术语问题的背后还隐藏着系统性的问题，系统性问题涉及迄今为止仍未被完全搞清的重建类型中非法则性的经验科学的性质。现在，我不得不把这个问题暂且搁置一旁。无论如何，那种试图缩小本来是极有趣味的方法论方面的差别，并试图在统一化科学方案的意义上译解它们的作法，似乎没有什么成功的希望。<sup>⑤</sup>

## 2

在言语行为理论的讨论中，已经产生了某些观念，它们可以成为普遍语用学基本假设的基础。<sup>⑥</sup>然而，我选择和讨论这些观念的普遍-语用学的角度，又将导致这样一种译解：它们在若干重要的方面，与奥斯丁(Austin)和塞尔(Searle)的有关理解确有很大不同。

### 普遍语用学的三个方面

言语-行为理论之基本的普遍语用学倾向乃是在下列事实中得以表现的：它对言语的要素单位(话语)主题化的态度类似于语言学对语言的单位(句子)主题化的态度。重建性语言分析的目标在于对这样一类规则的清晰的描述：有能力言说者必须遵从这些规则，以便于构造语法性句子并用一种可接受的方式言说它们。言语行为理论与语言学共同负有这项任务。语言学是从每一个成年言说者都拥有某种内在的重建性知识(在其中，他的构造语句的语言学规则资质得到表征)的假设开始的；言语行为理论则以相应的交往性规则资质(即在言语行为中使用语句的资质)为假想前提，

并进一步假设了交往性资质恰恰具有同语言学资质同样普遍的核心。这样,一个有关言语行为的理论将精确地描述成年主体所掌握的基本规则系统——所谓掌握,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他们能将在话语中恰当使用语句的条件付诸实现,而不管这些语句可能属于何种特定语言,也不管这些话语可能被置于何种偶然性关联域。

在资质理论题目下研究语言应用的计划,要求修正资质与施行(performance)这两个概念。乔姆斯基是这样理解上述概念的:它们使得句子的语音学、句法学、语义学诸方面的性质都在语言学资质重建框架内得到研究,而话语的语用学性质则留给了语言学施行理论。<sup>③</sup>这样一种概念化导致了如下的问题:交往性资质是否不属于某种混合概念?我最初曾将语言学与普遍语用学的区分建立在语句与话语的惯常区分的基础上,根据语法规则,对语句的构造不同于根据语用学规则对语句的运用,这些语用学规则两个重要构成一般性言语情境的基础。但是这种区分带来了下列两个重要问题:

(1) 言语的普遍结构——它对所有独立于特定关联域的话语都具有共同性——能否通过普遍的句子结构被适当地决定?如果能,那么拥有某种语言可重建性的语言学资质的言说者,将同时掌握可能理解的情境,并被言说句子的一般性能力武装起来。但这样一来,有关不同于语言学资质的一般交往性资质的假设,就无从得到证实。

(2) 句子(或单词)的语义学性质,就意义的应用理论而言,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与可能的典型运用的情境相关才会被解释?若如此,则句子与话语间的区分将成为不贴切的,至少就语义学理论来说是这样(只要,总而言之,话语的充分典型的关联域被加以考虑)。一旦存在于句子的语言学分析与话语的语用学分析间的区别依稀难辨,普遍语用学的对象领域就将面临崩溃的

危险。

对问题(1)(言语的普遍结构能否通过普遍的句子结构被适当地决定?), 我将同意——当然带有相当的限制条件<sup>⑩</sup>——这样一种论断: 一个言说者, 在将刻意而就的语句变换为以达到理解为导向的行动时, 仅仅实现了那句子结构中所固有的东西。但这并没有否定语法性句子的构造与在某种可能理解的情境中该语句运用之间的区别, 也没有否定有能力言说者在每一个场合不得不使之满足的诸普遍性先决条件之间的区别。为了言说一个句子, 言说者必须满足交往的一般性假设前提; 甚至当他满足了与句子使用时已经被给与的结构相吻合的先决条件时, 他也可能只是很好地构造了句子本身而没有同时满足特别指向交往一端的先决条件。这种情形通过诉诸与现实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 每一个语句都首先通过言说行为而被嵌入——可以变得十分清晰可辨。要被言说, 一个句子必须和下列诸方面发生联系: (1) 已被假定是事物现存状态的外在现实; (2) 言说者愿意在公开场合作为自己的意向而表达的内在现实; (3) 作为合法的人际关系而获得主观际承认的规范现实。这样, 一个句子将被置于若干有效性要求之下。有效性要求没必要、也不可能作为非情境的语句、作为纯粹的语法性构造物为句子提供满足。一个符号系列如能根据语法规则系统GL而被很好构成, 它就可以被“当作”某种自然语言的语句L。从语用学的角度看, 一个句子的合语法性意味着: 当句子被某个言说者言说时, 对所有已经掌握GL的听者来说都是可领会的, 可领会性对语言来说乃是所有普遍性要求中能够被内在的得以满足的唯一的一个要求。陈述性内容的有效性则不同, 它依赖于被陈述的命题是否提供了一个事实(或被提及的陈述性内容的存在性先决条件是否被持有); 一个被表达意向的有效性依赖于它是否与言说者实际意向的东西相对应; 一个被实施的话语的有效性则依赖于

这个行动是否与被认可的规范背景相一致。鉴于语法性语句使可领会性的要求得到满足,一个成功的话语必须满足三项附加的有效性要求:(1)对参与者来说,它必须被认为是真实的,就它所显示的某种东西而言;(2)它必须被认为是真诚的,就它表达出言说者意向的某些内容而言;(3)它必须被认为是正确的,就它与社会认可的期望相一致而言。

自然,我们可以使语句的表层结构特征同一化,语句的表层结构对话语的三种一般语用学功能(呈示某些东西、表达某个意向、建立某种合法人际关系)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陈述性语句可用于呈示事物的现存状态(或在非断言性言语行为中间接地提及它们);意向性动词、情态、语气形式以及其它等等,可用于表达言说者的意向;施行性短语、“以言行事”的表征物一类,则可用于建立言说者与听者之间的人际关系。这样一来,言语的一般结构也在句子的结构水平上得到反映。可迄今为止,由于我们一直把句子当作某种语法性构成物,当作不同于语句在句子中得以言说的言语情境的东西来考虑,致使一般的语用学功能并没有能“占据一席之地”。例如,要构造一个语法性句子,对有能力言说者来说,只需满足可领会性的要求即可,而语言学家则必须掌握相应的语法规则系统,我们把这一点称作他的语言学能力,而且这种能力可以通过语言学的方式加以分析。然而,运用这种能力去进行交往则是另一回事,交往只有进行语用学分析才是适宜的。我通过“交往性资质”这个术语所理解的,正是以相互理解为指向的言说者把完美构成的语句运用于现实之中,并使二者相吻合的能力,它包括:

1. 选择陈述性语句的能力:通过这种选择,或是被陈述命题的真实性条件,或是被提及命题内容的存在性先决条件,被假设得到了满足,从而使听者能够分享言说者的知识。

2. 表达言说者本人的意向的能力:所用的语言学表达呈示出

被意向的东西,使听者能够相信言说者。

3. 实施言语行为的能力: 该行为与被认可的规范或被接受的自我-影象相一致,使听者能够在共同具备的价值取向中认同言说者。

在这些决定并非依赖于特定的认识性先决条件,以及改变关联域就将导致一般性语句中渗入呈示、表达和合法性人际关系等普遍语用学功能的程度内,上面三条所表述的东西,正是我所谓的交往性资质,为此,我才提出了普遍语用学的研究建议。

普遍语用学中发展最充分的乃是与话语的呈示性功能相联系的那一部分,如陈述性语句的应用。从弗莱格到杜姆特(Dummet),这个规范语义学的古典领域早已经历过一番逐鹿。<sup>⑧</sup>说它是一个普遍语用学的研究对象,可以从下列事实中窥见一斑:陈述的真实价值受到了系统的注意。谓词理论并没有研究一般性语句(就像语言学所作的那样),而是研究了语句呈示事实的功能,这种分析首先指向谓词运用的逻辑以及那些使我们诉诸对象的表达。当然,普遍语用学的这一部分对于交往理论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从普遍语用学的角度出发,关于意向性的分析,关于认可性内容的讨论以及有关私人言语的论争,就它们理清了话语的表达性功能而言,不过仅仅是开始。<sup>⑨</sup>言语-行为理论最终将是要提供普遍语用学中与话语的人际功能相联系的那一部分研究的出发点。

对于问题(2)(句子或单词的语义学性质,就意义的应用理论而言,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与可能的典型运用的情境相关才会被解释?),人们可从下列事实中发现很多与我关于使普遍语用学概念化的提议相联系的困难,这个事实就是:通常的语义学并非能很好地适应于涉及句子的语言学分析与涉及话语的语用学分析之间的区分。到达语用学理论,有着许多不同途径和方式,如以语言学为定向的意义理论<sup>⑩</sup>试图系统地把语言表达的语义学内

容。但在转换生成语法框架中,关于句子的表层结构的解析不是从语义学深层结构出发,就是依赖进入句法结构的语义学设计,这条途径导致了构造某种一般语义学表征物的结合性系统。词汇语义学继续运用了类似的方法,它通过对意义关系的规范分析,澄清了给定词汇的意义结构。上述语言学途径的弱点在于:它们仅仅是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引进句子应用的语用学侧度。然而,由维特根斯坦的工作发展起来的意义的<sub>应用</sub>理论表明,语言学表达的意义只有参照可能运用情境才能得到鉴定。

对这个部分来讲,语义学的语用学理论<sup>④</sup>面临着从下列关联域中给语言学表达的典型运用情境定界的困难:这种关联域碰巧具有附加的意义-衍生力量,但没有影响该语言学表达的语义学核心。参考语义学<sup>⑤</sup> (reference semantics),不管是作为外延的还是内涵的指示理论而构成,都决定着表达的意义,并且是通过这样一些对象的种类,对该种类来说,表达可以在真实的语句中加以应用。在上述前提下,人们可以解释陈述性语句中出现的表达的意义。然而,我不懂为什么语义学理论就应该垄断性地邻选出语言的呈示性功能、而置语言在其表达性功能和人际功能发展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于不顾。

以上的初步思考,仅仅是想支持这样的推测,即语义学理论不可能作为统一化理论而成功地得到发展。但是,如果它确由众多异质所构成,那就没有什么反对意见——反对将句子结构分析和话语结构分析作方法性的区分——可以从把语义学从语用学中划出的困难中推断出来(这种困难同样存在于语义学和句法学的区分之中)。言语的一般结构的分析确实可以从一般句子结构开始,然而,这种指向语句的规范性质的研究,只能是从运用语句作为言语要素(呈示、表达、人际诸功能)的可能性的角度来进行。普遍语用学同样可以被理解为语义分析,但是它与其它意义理论的不同

乃在于,对它来讲,只有在语言学表达的意义有助于使言语行为满足真实性、真诚性、规范的正确性等有效性要求的程度上,该语言学表达的意义才算是贴切的。另一方面,普遍语用学又不同于经验语用学,如社会语言学,只有当语言学表达的意义决定于一般性言语情境的规范性质,而不是决定于运用的特殊情境时,该语言学表达的意义才会被加以考虑。

现在,我想就不同水平的分析及与此相应的符号学对象领域作一个总结:

1. 与话语相对的语句。如果我们是从存在于特定关联域中的具体的言语行为开始,并且不去涉及这些话语所具有的语用学功能的所有方面,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语言学的表达。鉴于言语的基本单位是言语行为,语言的基本单位就是句子,划分乃是通过诉诸有效性条件获得的:一个语法性完美构成的语句满足了可领会性的要求;一个交往性的、成功的言语行为除了语言学表达的可领会性以外,还要求交往过程的参与者准备达到理解,要求他们高扬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等有效性要求,并且相互地予以满足。句子是语言学分析的对象(b、c),言语行为则是语用学分析的对象(d、e)。

2. 与一般语言相对的个体语言。语言学的任务首先在于为每一种个体语言提供语法,使得一种结构性描述可与该语言的任何语句相联系。一般的语法理论声称要重建成年言说者的普遍语言学能力,它往往专注于重建某种规则系统,这种规则系统构成了主体在任何语言中创造构造完美的语句之能力的基础(在一种较强的变体中,这种语言学资质意味着发展那种在内在意向的基础上指导语言捕获物的假说的能力;而在一种较弱的变体中,该语言学资质则呈示着学习过程的结果,这种结果在皮亚杰结构主义的意义上的被译解)。

3. 语言学分析诸方面。每一个语言学性的话语,都可以至少从三种分析侧度加以考察。语音学把语言表达作为基础介质的铭刻物来研究(如作为声音的构成物);句法理论对语言学表达的探讨则诉诸最小意义单位的规范联结;语义学理论研究语言学表达的意义内容。显然,只有语音学和句法学是自我充足的语言学理论,而语义学不可能在语言学式的态度中、在无视语用学角度的情况下被彻底研究。

4. 与言语行为的普遍方面相对的特殊方面。经验语用学的任务起始于描述一定背景下的典型言语行为,典型言语行为也可以从社会学、人类文化学以及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一般语用学理论专注于重建这类规则系统:该系统构成主体在任何适宜情境下言说句子之能力的基础。所以,普遍语用学提出了重建成年言说者下列能力的要求:使语句与现实通过交往发生联系,即发挥呈示、表达以及建立合法性人际关系的普遍语用学功能。这种交往性资质通过如下成就得到了表征:释义学使自身程式化为某种艺术,也就是说,它对话语的解释乃是借助于同种语言中相似的关联域来实现,或把它们翻译成外国语言中具有可比较关联域的话语。

5. 普遍-语用学的诸方面。三项基本的语用学功能(借助于语句呈示世界中的某种东西、表达言说者的意向、建立合法的人际关系)乃是话语在特定关联域中可能具有的全部特殊功能的基础。这些一般性功能的实现要依据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等有效性条件来衡量。因此,每一个言语行为都可以从相应的分析角度加以研讨。如通常的语义学考察基本陈述的结构,参考及谓词断言的行为;一个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意向性理论考察意向表达——就它们在第一言说者的语句中发挥的功能而言;言语行为理论从建立某种合法的人际关系的角度出发,考察以言行事力量(illocutionary force)。

下图可反映诸符号学方面的差别：

| 理论水平              | 对象领域            |
|-------------------|-----------------|
| <u>语言学</u>        | 语句              |
| 语法                | 某一个体语言的语句       |
| 语法理论              | 在任何一种语言中构造句子的规则 |
| <u>语言学分析诸方面</u>   |                 |
| 语音学理论             | 铭刻(语音)          |
| 句法学理论             | 句法规则            |
| 语义学理论             | 词汇单位            |
| <u>语用学</u>        | 言语行为            |
| 经验语用学             | 关联域范围内的言语行为     |
| 普遍语用学             | 在话语中运用句子的规则     |
| <u>普遍语用学分析诸方面</u> |                 |
| 基本陈述理论            | 参考及谓词断言行为       |
| 第一言说者语句理论         | 意向的语言学表达        |
| 以言行事行为理论          | 人际关系的建立         |

交往行为理论的核心乃建立在话语的第三方面、即人际关系方面。为此，我将把言语行为理论当作我的出发点。

### 言语行为的标准形式——塞尔的可表达性原则 (principle of expressibility)

言语行为理论的首要任务在于澄清语言中话语的施行性特征。奥斯丁曾经分析过在言语行为中，“我”把言说语句作为该言语行为的以言行事力量的含义。在言说一项诺言、一种主张、一个警告的时候，伴随着相应的语句，“我”实施了某个行动——我试图许诺一个诺言，或宣扬一种主张，或提出一项警告。“我通过说些什么

而作了什么”虽然也可以运用语言的其它形式(奥斯丁提到了写诗和说笑话)来表达,但以言行事力量的运用似乎构成了所有语言应用形式的基础。为了在一个给定情境中被理解,每个话语必须、至少是含蓄地建立起并表达出言说者与交往伙伴间的某种确定关系,可以说,言语行为的以言行事力量存在于被言说内容的交往性功能的“固定到位”中。

话语的内容与其关系性特征的通常区别,在开始时具有极平常的意义。<sup>⑥</sup>据说,一个句子在被言说时,就被嵌入特定的人际关系中,通过一定的方式,每一个清晰的施行性话语既建立又呈现了某种人际关系。只要仅仅是将言语的话语特征与其语义学内容在关系角度中进行对比,上述情形就仍保持着平常性。但如一个言语行为的以言行事力量没有意味着更多的东西,“以言行事”这个概念就至多可用来阐释下列事实:语言学话语具有行为的特征,也就是说,是一种言语行为。显然,“以言行事”这一概念的关键之点不可能栖息在自身内部,我是在言语行为的特殊衍生力量中发现它的。

正是为了理解这种特殊衍生力量,我追溯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言语行为可以获得成功,也可以以失败告终。如果言说者与听者之间产生了某种关系——这种关系是由言说者引起的——并且,听者在该内容被表征的意义上(作出一次诺言、一种主张、一个建议等等)能够理解并接受言说者说出的内容,这个言语行为就获得了成功。因此,衍生性力量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中:言说者在实施一个言语行为时,可以通过使听者与他发生某种人际联系的方式影响听者。<sup>⑦</sup>当然不仅仅是言语行为,任何一种相互作用,都可以建立起人际关系。不管交往行为是否具有明晰的语言形式,它总是与行为规范和价值的关联域相联系。如没有日常规则、角色、生活方式,总之,如没有惯例的规范背景,个体行为就将保持不确定性。所有交往性行为都要满足或破坏正常期望或惯例,而在行为

中满足惯例则意味着一个能够言说和行动的主体至少与另一个这样的主体发生了人际关系,这样一来,人际关系的建立就是我们的目的来说不甚充分的尺度。我在开始时曾强调我将把自己的分析限定于以达到理解为指向的语言性的清晰行为的范例,这种限定现在必须进一步精确化。在这样作的时候,我们不妨从标准的例句开始(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就是由此而来的)。下面就是几个典型的言行-行为模式:⑧

1. “我……你……”

(动词) (句子)

例:“我(特此)答应你我将在明天来。”

2. “你被…… ”

(动词)[被动部分] (句子)

例:“你被要求戒烟。”

3. “我…… …… 你…… ”

(助动词) (动词) (句子)

例:“我可以向你保证那不是我。”

我想提出下列的术语学规则:如果一个明晰的言语行为是由以言行事成分和陈述性成分所构成,那么,它将在自身的表层结构中满足标准形式的要求。以言行事成分存在于以言行事行为中;以言行事行为借助于施行性语句得以负载。这类句子由一般陈述性的肯定语词所构成,并且拥有作为逻辑主体的第一者和作为逻辑(直接)对象的第二者。由施行性表达构成的谓词,在一般情况下允许虚词(例“特此”)的出现。⑨施行性成分需要由陈述性内容所构建,无论它在断言性(constative)言语行为中何时被应用,含有陈述性内容的语句都将采取陈述性语句(aussagesatz)的形式。陈述性语句在其基本结构中包括:(1)一个名称或有关的表达,借助于此,言说者使他意欲说些什么的对象明确化。(2)一个谓项表达,说明言说者对对象或同意、或拒绝的一般决定。而在非断言性

言语行为中,陈述性内容不是被陈述的,而是被言及的(mentioned)。在这种场合,陈述性内容恰好与通常被称为“非直陈的”(unasserted)陈述相吻合〔因此,我将下列两者区别开来:一个是名词化的陈述“that P”,它表达了事物的某种状态;另一个是陈述“P”,它呈示了某个事实,它的直陈性力量归于“直陈”(assertion)型言语行为可以嵌入其中的环境,并因此而与直陈的以言行事行为相联结。当然,在通常的逻辑中,我们是把陈述当作独立自存的单位;只有与“名词化的陈述”成对比性区别的“陈述”的真实性价值,才是陈述与某些断言性言语行为相联结的提醒物,这乃是一种系统地被忽略的联结〕。<sup>⑩</sup>

我把具有真实性价值结构的言语行为称作陈述被区分了的(propositionally differentiated)言语行为。它们与那种符号化中介的相互作用被区别开来——例如,一声喊叫“火!”激发起相应的行动,救援或是逃生——这里,言语的陈述性成分与其以言行事的行为彼此“脱钩”,结果,(1)陈述性内容可以在以言行事潜能的变化中恒定地保持;(2)言语的整体论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呈示、表达与行为期望仍然是同一东西)被言语的分化性模式所取代。在下一节中,我将再回到这个题目上来。不过,我想先指出:这种言语区分的水平,对于用以发挥呈示性功能的行为能力(也就是去言说关于世界的某些事情,不管是通过直接的陈述形式,还是在非断言性言语行为中通过间接言及陈述性内容的形式)来说,乃是一种前提条件。

明晰的言语行为总含有某种陈述性成分,使事物的状态得到表达。非语言性行为通常缺乏这种成分,所以它们不能被认为具有呈示的功能。例如,向出租汽车发出的信号(为使我8点时能在办公室开始工作);一位父亲对寻儿无望的可悲消息作出的反应;对某一次示威游行的加入;通过缺席表达对某项邀请的拒绝;与入选

的候选人握手；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非语言性行为，这些行为不过是遵守或违反了某种惯例。这些规范化期望虽具有某些陈述性内容，但如果那个被表达的行为是可理解的，那么，该内容对参与者来讲必须是已知的。非语言性表达不能把预先假设的规范陈述性内容诉诸表达，因为它不具备呈示的功能，但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标示物，这种标示物使人想起预先假设的规范陈述性内容。

对行为者来讲，陈述被区分了的言语行为使他握有更大程度的自由，这要归功于该言语行为的呈示性功能。“8点开始工作”仅仅提供了一种选择：到场或没有到场；到场是准时或是迟到；未到场是可谅解或不可谅解，如此等等。非语言行为通常是“是”与“否”这一决定之“树”的结果。但如果行为者运用语言来表达自身，他就会获得远为宽阔的选择范围，可以用极不相同的方式，表达同样的言语行为，如一个命令；也可以通过极不相同的言语行为，满足同一个角色的需要，如一位正在授课的德语教师。总之，陈述被区分了的言语比那种非语言的相互作用给行为者带来更大程度的、与被认可的规范背景相关的自由。

陈述被区分了的话语也像语法化符号语言那样，并非总具有一种语言形式，这可以聋哑人的标准化语言和意义手势为例。意义手势提供了一种与参考术语等效的应用，因而补充了陈述性言语。也有不属于陈述性区分了的言语行为，这就是带有以言行事特征并缩略了的言语行为，诸如以“你好！”作为问候的客套话；以“将军”作为下棋过程中挪子运着的规范化表达。陈述成分中缺乏的情境将语言性话语置于通常非语言行为的水平，当这样的行为确实在诉诸约定俗成的陈述性内容时，它并没有表达它们。

在界定分析的语用学单位时，首先可以从建立在相互提出并认可的有效性要求这一交感性基础上的交往行为的总集合中，提出陈述被区分了的言语行为进行说明，但这种说明并不具有足

够的选择和界定性。因为,在这些话语中,我们仍可以发现像“打赌”、“洗礼”、“任命”之类的言语行为。尽管它们也具有陈述被区分了的内容,但其运用只限于某个单独的团体(或团体的某部分),所以它们可以被看作一种满足了预先假设之规范要求<sub>的</sub>等效行为,或者是非语言性形式,或者是通过带有以言行事特征的缩略形式。这些言语行为的团体性约束(institutional bond)除其它表征外,还可在下列事实里看到:可允许的陈述内容被打赌、洗礼、任命、结婚等等的规范意义所囿限,如人们是为赌注而打赌,为教名而洗礼,“任命”者必为公职,成婚则意味着家庭。每当谈到团体性约束的言语行为时,总要涉及特定的团体。而当说的是一个非团体性约束的言语行为时,必须触及的只有一般化的关联域条件(对一个要发生的相应行为来说)。团体性约束的言语行为对某个特定团体的表达,采用的方式与非陈述被区分了的言语行为和非语言性行为表达某个约定了的规范的方式相同。解释打赌或洗礼行为的意义,必须诉诸于打赌或洗礼的团体。与此不同,命令、劝告、提问等没有涉及团体,而是言语行为的类型,适用于极不相同的团体场合。确实,“团体性约束”作为一种尺度,并非总坚持毫不含混的分类原则,命令可以存在于所有权威制度化了的关系中;任命却事先假设了特定的、官僚化了的组织;结婚则要求某种单独的团体(它可以普遍地被发现),但这些并没有破坏上述分析的有用性。非团体性约束的言语行为,就其拥有所有方面的调节意义而言,乃与一般性行为规范的各种侧度相联系,并没有固定于某个特殊团体的场合。

现在,可以将拟议中的分析单位,定义为陈述被区分了的和非团体性约束的言语行为。自然,只有具备清晰的语言形式的言语行为,才适于进行分析。言语行为常被置于其中的关联域,使标准的语言形式成为不必要。例如,当某个施行性意义被话语的关

联域单独决定时,或当施行性意义只是通过语音、标点、词的位置、或虚词(如“不是这样么?”“对吗?”“确实。”“显然。”“是的。”)以及类似的东西来象征及表达时,情形就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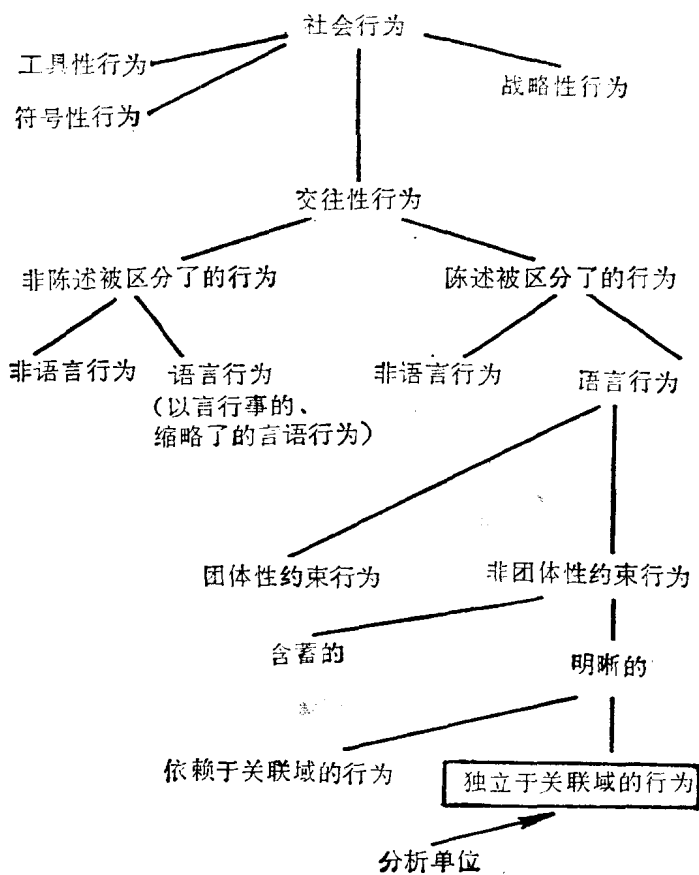
还需在标准形式中排除这样一些清晰的言语行为,它们出现在使意义发生转换的关联域中。一个依赖于关联域的言语行为的语用学意义背离了在言语行为中运用的语句的意义(并且背离了必须遇到的、一般化关联域的确定意义)就属于这类情形。塞尔的“可表达性原则”认为,如言说者精确地、清晰地、并且实实在在地表达了他的意向,那么,在原则上,每一个被施行或可施行的言语行为都可能由一个复杂语句加以说明。

康格塞尔(Kanngiesser)给该原则以下列形式:“每一个意义X都存在着这样的情形:如果言说者S在某个语言共同体P中,且P意味着X,则这样一种表达的存在是可能的,即这种表达见之于由P言说的语言,并且,这一语言是对X的精确表达。”<sup>⑩</sup>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可以弱化上述基准,只要求在一种给定的语言中,对每个言说者试图与其语言共同体的其他成员明确建立的人际关系来讲,一种适宜的施行性表达,或是有效的,或是能通过某种有效表达的说明而加以引入。有了上述更改,我们就可以考虑那些与塞尔原则有关、并得到表达的保留物了。<sup>⑪</sup>无论如何,它的启发意义还是很清楚的:如果可表达性的基准确属有效,分析就可以限于那些存在于标准形式中的、非团体性约束的、清晰的言语行为了。

后图汇总了我划分言语行为、并作为分析之基础的视角点。

我并没有解释在行为的其它类型中交往性行为(“以达到理解为指向”)的嵌入。对我来讲,战略<sub>性</sub>行为(“以行为者的成功为指向”,通常指相应于有目的-理性的行为之功利化模式的行为方式)以及(至今还没有被充分分析的)符<sub>号</sub>性<sub>行</sub>为(通常指限定于符号

## 言语行为理论之分析单位的衍生关系图



表达之非陈述性系统的行为方式,如一场音乐会、一个舞蹈)在个体的有效性要求乃是被悬置的(在战略性行为中,是真诚性;在符号性行为中,是真实性)这点上,不同于交往性行为。<sup>⑩</sup>我以前对“劳动”和“相互作用”的分析也没有充分抓住工具性行为和社会性(或交往性)行为的最一般的区别特征。这里,我不可能继续追踪这些如此重要的问题了。

### 关于言语的双重结构

再回到言语的双重结构特征这个问题上来,它可以脱离言语行为的标准形式来考察。显然,“以言行事的”和“陈述性的”彼此是极为独立的,我们能在恒定保持一个陈述性内容的同时,采用不同类型的言语行为。从被直陈陈述中抽象出陈述内容,它显露了人类语言的一项基本成就,这就是陈述被区分了的言语将人类从已被人类观察到的其它灵长类动物的符号性中介的相互作用中区别了出来。<sup>⑪</sup>这种相对于恒定陈述性内容的言语行为,可以举出无数例证,如对于“贝蒂正在抽烟”这一陈述性内容,就可举出下列不同的表达:

“我断定你(贝蒂)在抽烟。”

“我请你(贝蒂)抽烟。”

“我问你(贝蒂)抽烟吗?”

“我对你(贝蒂)抽烟提出警告。”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相对于恒定陈述性内容的言语行为,是在言语的形成和转化中,因以言行事成分和陈述性成分分离而出现的。这种分离对于言语双重结构的区分,对于言说者和听者必须立于其上、以同时达到理解(如果他们想把自己的意向传达给别人)的两种交往水平的区分来说,乃是一个条件。我要区分的是:(1)主观际性的水平。在这个水平上,言说者和听者通过以言行事行为

建立起达到相互理解的关系；(2) 陈述性内容的水平。它是可传达的。相应于每个话语都可以在其中分析的关系和内容方面，存在着(在标准形式中)言语行为的以言行事成分和陈述性成分。以言行事行为使被运用的陈述性内容的含义得到了固定，行为-补充物则决定着那种在已确定的交往性功能中“作为某物……”而被理解的内容(释义学上的“作为”可以在两种水平上加以区分：对于陈述“P”，一个可认同的预先设定的对象可以作为某物，例如作为“红的”、“柔滑的”或“理想的”对象而被表征；在与以言行事行为的联结中，即通过被嵌入某个言语行为内，这种陈述性内容又可以作为某物，例如，作为一个命令或断言而得到言说)。语言内在的反身性这个基本特征联结着言语的双重结构，对于直接或间接地提及言语来说，标准化了的可能性只是使一种已经在每个言语行为中获得的自我参照(self-reference)更明晰了。在使语言的双重结构不断丰富、充实的过程中，对话的参与者同时在两种水平上进行着交往，他们将内容的交往和角色的交往(在这种角色中，被交流的内容得到了运用)结合了起来。这里，关于“……的交往”这种表达可能给人以误解，因为它可以和元语言相联系并在大脑中引发某种涉及语言水平的联想，根据这种联想，在每一个较高的水平上，都可以作出次级较低水平上的对象语言的元语言学的陈述。但是，这种语言层次概念乃是为规范语言所采用的，规范语言恰恰缺乏普通语言所具的反身性。不但如此，在元语言中，人们总是诉诸存在于行为者判断事实或观察事件时那种客观性态度之中的对象语言，形成元语言学的陈述。与此不同，在主观际性的水平上，人们选择陈述性内容在其中运用的以言行事角色，这种含义的交往(在其中使用带有陈述性内容的语句)，要求一种代表这些交往的施行性态度。这样一来，自然语言特殊的反身性就首先依赖于两种交往的结合，即内容的交往(在客观性态度中被实现)与涉及该内容

在其中得到理解的关系性方面的交往(在施行性态度中被实现)的结合。

当然,对话的参与者通常具有使作为另一个继起的言语行为的内容而施行以言行事行为的选择自由。对于前一个言语行为的以言行事成分,他们可以采取一种客观性态度,并将该成分转换到陈述性内容的水平。自然,只是在实施一个新的言语行为、并该言语行为又依此具有某种非客观化的以言行事成分时,他们才能够这样作。对言语的直接和间接的提及,使明确表达自然语言反身性特点的可能性标准化了。一个发生于 $T_n$ 的言语行为在主观际水平上的交往,可以在发生于 $T_{n+i}$ 的某个进一步的断言性言语行为中、在陈述性内容的水平上被描述。但同时去实施和客观化一个以言行事行为,则是不可能的。<sup>⑥</sup>

对于甚至连语用学理论都成为其捕猎对象的描述主义谬误来说,这种选择有时提供了一种机会和场合。我们可以仅仅在客观化态度中分析言语结构,就像分析任何其它对象那样。在这样作的时候,实际伴随的以言行事成分不可能成为*uno acto*的对象,这种情形导致了许多语言理论家的一种错误认识,认为交往过程只是在一个单独水平、即内容或信息传递水平上发生着。结果,事情的关系方面失去了相对于内容方面的独立性,话语的交往作用失去了自身的构成性意义并被填加到信息内容之中,陈述的语用学操作——它在形式化了的呈示过程(例如符号逻辑)中呈示着话语的以言行事成分——也因此不再作为达到陈述性内容之理解的特定方式来译解,而被错误地解释为被传递信息的一部分。

与上述观点相反,我认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乃在于言语双重结构的合理重建。以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为出发点,我想在与意义和有效性等问题的关联中使这个任务更加精确化。

### 意义的普遍-语用学的范畴

奥斯丁关于以言表意行为(locutionary act)和以言行事行为的对比,引发出了一场广泛的讨论,使意义理论得到某些澄清。奥斯丁限定意义这个概念为“带有陈述性内容的语句的意义”。他运用力量这个概念,则仅仅是在言说带有陈述性内容之语句的以言行事行为的场合。所有这些导致如下两组配合关系:

意义:含义和参照,以言表意行为。

力量:试图达到某种领会(uptake),以言行事行为。

奥斯丁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带有同样陈述性内容的语句可以用不同类型的言语行为来言说,即运用不同的以言行事力量。然而,他对意义和力量的区分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如果人们仅仅是在语言学含义上,作为语句的意义而引进意义概念(在其中,或是句子的意义作为词汇意义的功能来接受,或是像弗莱格所认为的那样,词汇意义作为可能的句子意义的功能来接受),那么,将该意义限定于言语行为的陈述性成分就并非有理。很显然,言语的以言行事成分也具有一种语言学含义上的意义。在清晰的施行性话语的场合,被使用的施行性动词拥有某种词汇意义,并使被构造的施行性语句拥有某种在一定程度上和带有陈述性内容的、非独立的语句相似的意义。“那种被奥斯丁称为话语的以言行事力量的东西,就是它的意义方面,话语的意义或是被它的清晰的施行性前缀所传达(如果它确有前缀的话),或是可能已经被这样一种表达的应用所传达。”<sup>⑥</sup>

然而,上述论辩忽略了一个事实:力量乃是这样一种东西,在特定含义上,它仅仅属于话语而不属于语句。因此,人们可能首先发出保留“力量”于内容的想法,该内容对于句子来讲,乃是通过自身的被言说、通过自身被嵌入到言语结构中而产生的。当然,我们可以把通过在话语中使用句子而发生的意义现象和纯然的语句

意义区别开来；可以在语用学含义上讨论话语的意义，就像我们在语言学含义上对语句意义所作的那样。因此，奥斯丁已经把同样的言语行为可以用不同语句来施行的事实当作承认语用学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优先于语言学意义的理由，根据意义应用理论，他建议语句意义和词汇意义乃是它们在其中被运用的言语行为意义的功能。<sup>⑦</sup> 这项建议的困难在于，它没有充分考虑句子意义的相对独立性，即一个句子在不同关联域中被应用时，意义可能发生偶然性变化。进一步说，句子的意义与话语的意义相比，它显然更少依赖于言说者的意向。

虽然一个语句在应用时经常带有不同的意向，而且处于使意义发生语用学转换的关联域中，它的语言学意义却没有变化。那么，当一定的社会角色规定某命令要用请求的方式来言说时，该话语的语用学意义（作为命令）就不会改变被言说句子的语言学意义（作为请求）。对于之所以要确立一个清晰的言语行为的语用学意义并确立在该言语行为中所运用的语句的语言学意义由以符合的标准条件来说，这乃是一个附加的理由。然而，恰恰是在处于标准形式中的清晰的言语行为的场合，那种起初用于陈述性语句之表达的意义与以言行事力量的意义（以及被表达意向的意义）之间的范畴性区别，就显露了出来。这表明，联系句子的语言学意义与话语的语用学意义间的差别，来解释意义概念与力量概念的相对性的作法是没有意义的。

关于句子意义的语言学分析，乃是从句子与现实的一定关系（句子一旦被言说，就马上进入了这种关系）、以及从句子本身由以处置的有效性要求的抽象中得出的。同时，一个坚实的意义分析又不可能不顾及可能应用的某些情境。每一个语言学表达都可以用于形成陈述，甚至以言行事短语、包括初始性的意向表达，都能成为陈述性语句的一部分。这说明，对于语言表达意义的语言学

分析来讲,可以通过把它与它在每一个场合中所构造陈述的可能贡献相联系,从而获得某种确定的统一。但这仅对能在言语的陈述性成分中单独出现的表达来说,才是有意义的。施行性表达的意义,要通过诉诸它们对形成以言行事行为的可能贡献来呈明;初始性意向表达的意义,则需要诉诸它们对形成表达愿望、感觉、意向等等的第一者语句的可能贡献来澄明。例如,对“许诺”意义的语言学解释,就应该围绕着这个词对构造语句的贡献来进行:

1.“我特此向你许诺……”

而不是

2.“他正在向他许诺……”

相应的,对“讨厌”意义的解释,也要诉诸于句子:

1a.“我讨厌你。”

用以取代下面的句子:

2a.“他讨厌他。”

只是因为、并且只要意义的语言学分析对陈述形式2或2a有利,用话语(以及言说者意向)的以言行事力量的意义来补充陈述性语句的意义就是必要的。毫无疑问,正是这种情形促使奥斯丁在意义和力量之间作出了区分。但我认为,下列作法可能更好一些:区分表达的语言学意义要根据它们对形成不同类型的言语行为(以及言语行为的不同成分)的可能贡献来进行。让我们考虑这样两个例子:

3.“我告诉你,父亲的新汽车是黄色的。”

4.“我问你,父亲的新汽车是黄色的吗?”

对这两个不同的以言行事行为的理解乃受制于其它的前提条件,而并非它们一致的陈述性内容。只要一回到某些情境必须满足的条件,这种区别就是可感觉的了。“父亲的新汽车是黄色的。”一个听者可以在这样陈述的条件下理解带有这种陈述性内容的语

句的意义，该条件是他已经学会在如下直陈句中正确地运用陈述性语句：

5. “我告诉你，父亲的新汽车是黄色的。”——以便于去报告一个观察结果：父亲的新汽车是黄色的。具有这种或相似经验的能力必须是预先设定的。在5中，一个陈述性句子的适当运用，至少对言说者提出下列要求：

a. 前提条件的存在——有一个、并且只有一个对象，对它来说，“父亲的新汽车”这一表征可以适用。

b. 可认同性能力的预先假设——“父亲的新汽车”这一特征化中包含着的（指示性运用的）陈述内容，在一个给定的关联域中，对去选择那个（也只能是那个）该特征由以应用的对象 的听者来说，乃是一个足够充分的表征。

c. 论断性行为——谓词“黄色的”可以归于被指示的对象。

相应的，对包容于5中的陈述性语句的意义的理解，也要求听者：

1). 享有言说者的前提条件a。

2). 满足言说者的预先假设b，也就是说，实际认同那被诉诸的对象。

3). 承担对他说来的论断行为c。

此外，它还带有话语的以言行事成分3和4。听者可以在后面所述条件下理解询问的意义，该条件是听者已学会参加下列类型的成功的言语行为：

6. “我（特此）告知你……”

7. “我（特此）问你是否……”

这就是说，听者已经学会去承担（行为中的）言说者和（合作中的）听者的双重角色。一个以言行事行为的施行不能作为陈述性语句可能的应用服务于某项观察的报道，而且，这里也没有对那种

感觉能力作出基础性的预先假设。相反，言语行为的实施乃是经验可能性的条件，这里的经验指听者接受包含在已给出的言语行为中的内容，并且深入到被要求的和言说者联结时所拥有的交往性经验。

鉴于理解5预先假设了知觉经验(亦即这样一种类型的经验：观察)的可能性，理解6和理解7自身都显示了交往性经验(其经验类型是“参与观察”)。

存在于初始性以言行事意义和初始性陈述意义(奥斯丁所说的力量和意义)之间的区别，可以上溯到可能认识情境方面的区别。我们仅仅是在言语行为参与者的施行性态度中，来认识以言行事行为的意义。与此不同，我们认识带有陈述性内容这类语句的意义，却是在观察者(该观察者在陈述中正确报道了他的经验)的客观性态度中获得的；<sup>⑧</sup>我们所获得的初始性以言行事意义与我们在深入到主观际性的水平、并建立人际关系的过程中所拥有的交往性经验相联系；我们所获得的初始性陈述意义却是在报道世界发生的某些事情时实现的。当然，尽管存在着上述区别，在施行性态度中获得的意义，也可以出现于带有陈述性内容的语句中：

8.“我向你保证昨天他告知我……”

9.“我告诉你昨天他问我是否……”

这个事实可以解释为什么两种意义范畴间已被表征的区别，常常为人们所忽略。然而，在陈述性内容的语句里，我们可以将表达的意义(它可以在某种施行性态度中运用)和词汇的意义(它仅被允许作为带有陈述性内容的句子的意义成分而存在)区分开来。例如，在8和9中，“告知”和“问”两个词就带有这样一种意义的暗影：该意义来自于它们只在以言行事角色——像6和7——中才拥有的力量。

我们可以在力量和意义这两个意义范畴的含义上，保留奥斯

丁所作的区分。这样,力量就代表表达的意义,表达在与以言行事行为的联结中首先得到运用;意义则代表那种最初与陈述相联结而被运用的表达的意义。如此,我们对力量和意义作为两个意义范畴的区分,就既涉及了人际关系之建立的一般语用学功能,又涉及了事实之呈示(意义的第三个范畴,则相应于表达功能,也就是说,相应于言说者愿望、感觉、意向等等的揭示。在第一人称语言中,我暂且把它搁置一旁,尽管这样一种反思——它类似于在考察以言行事行为时被贯彻到底的那种反思——也同样适用于它们)。

我想强调下列结果:

1. 为言语行为的陈述性成分而保留语义学内容的概念,或仅仅用语用学操作(它代表某种特定的以言行事力量)去说明以言行事成分之意义的特征的作法,都是不足取的。

2. 下列作法也不能令人满意,这就是在重建施行性语句的意义时,采取与重建带有陈述性内容之语句的意义完全相同的方式;言语行为的以言行事成分既没有表达一个陈述,也没有涉及陈述性的内容。<sup>⑨</sup>

3. 同样不能令人满意的是,把以言行事力量和意义成分(它通过话语行为增加了句子的意义)混为一谈。

4. 从普遍语用学的观点看来,语言表达的意义可以根据下述情况加以范畴性的区分:看它是否能仅仅在具有呈示性功能的语句中出现,或者,它是否可以特定地服务于建立人际关系或表达意向。<sup>⑩</sup>

### 有效性要求的主题化(thematization)和交往模式

奥斯丁关于以言表意行为和以言行事行为的区分具有非常的重要性,这不仅是对意义理论而言,有关言语行为类型和语言的

基本模式的讨论也集中在这对概念上。首先，奥斯丁试图用这样一种方式勾画出范围：“施行性应该是作某事，以有别于仅仅说某事；施行性乃是愉快或不愉快的，以有别于真实或虚伪的。”<sup>⑧</sup> 由此出发，可以得出下列关系结果：

以言表意行为：断言性的，真实或不真实；

以言行事行为：施行性的，愉快或不愉快。

但是，当所有言语行为——包括断言性的——都包含有以言表意成分（在带有陈述性内容的语句形式中）和以言行事成分（在施行性语句的形式中）这一点日益变得明显时，奥斯丁有关以言表意行为和以言行事行为的划分就将无法维持了。<sup>⑨</sup> 奥斯丁当作以言表意行为首先引进的断言性，被如下两者所取代：（1）在每一个清晰的施行性话语中包含的陈述性成分；（2）暗示着真实性之有效要求的某一特定类型的以言行事行为——断言性言语行为。后来，奥斯丁自己又把断言性言语行为仅仅当作言语行为的不同类型之一。这样两个句子：

“我断言……”

“我警告你……”

二者同样表达了以言行事的行为，<sup>⑩</sup> 但它却拥有一个有趣的结果，那就是断言性言语行为（真实或虚伪）中包含的有效性要求，仅仅呈示了言说者在言语行为中为与之相对的听者提供的有效性要求的一个特例。

一般地，我们可以说，在陈述（以及——例如——描绘）和警告等场合，这样一个问题可能被提出来——你是否（暂且承认你确实提出了警告并拥有提出警告的权力，确实作出了陈述或规劝）是正确地陈述、警告或规劝。并且，问题不是在这种含义上被提出：你的陈述、规劝、警告

是否属于某种巧合或权宜之计,而是说,涉及事实,涉及你所拥有的关于事实的知识,涉及你之所以言说的目的等,它们是否是属于适宜被言说的东西。<sup>⑤4</sup>

在这段文字中,奥斯丁强调了正确性这个有效性要求,正确性是在任何(而不仅仅是断言性的)言语行为中都将提出的。但是他只是把正确性与一般化了的关联域条件作了偶然性的区分,即仅把正确性与一般意义上的愉快或不愉快条件作了区分。如果一个相应类型的言语行为准备继续的话,正确性的有效要求必须分类地加以满足。下列情形对断言来说的真实性正如它对警告、规劝、许诺等等诸如此类言语行为的真实性一样,那就是,它们要被继续,必须满足两个条件:(1)合乎规则的(in order),(2)正确的。

但是,真正的结论必须是:我们需要……相对于各种类型的以言行事行为——警告,评估,判断,陈述以及描写——(1)确定它们(如果确实有)归于哪种特定的以言行事行为方式。在其中,它们首先被判定为是否符合规则;其次,被判定为“正确的”或“错误的”。(2)确定对不同类型的以言行事行为应该施行什么样的评价性和非评价性术语、以及这些术语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宽广的领域,而且显然不会导致某种关于真实和虚伪的简单的区分,也不会导致陈述与其它言语行为的区分,因为陈述仅仅是如此大量的以言行事言语行为种类中的一类。<sup>⑤5</sup>

相对于分别被限定的关联域,言语行为可以是符合规则的。但只有相对于言说者在其以言行事行为中提出的基础性要求,言语

行为才可以是有效的。我将回到这两个必须被满足、以便使言语行为得以继续的条件上来。这里,我对这样一个事实感兴趣:断言性与非断言性言语行为间的比较使明显支撑着所有言语行为的有效性基础得到了澄清。

应该承认,上述讨论确实引发出了断言性言语行为的特定位置。在言语的施行性与陈述性双重结构方面,直陈并非有别于其它类型的言语行为,也没有借助于一般化了的关联域的条件,因为一般化了的关联域的条件对所有言语行为来讲,都在通过某种典型方式发生着变化。但直陈在下列方面的确不同于所有其它类型的言语行为,那就是直陈初看起来暗示着某种明白无误的有效性要求——真实性的要求。不可否认,其它类型的言语行为同样暗示着某些有效性要求,但在严格确定它们暗示着什么有效要求时,我们很少碰到像“真实性”(在陈述真实的含义上)这样如此清楚而又被普遍认可的有效性要求。其原因是很容易发现的:断言性言语行为的有效要求是由每一种类型的言语行为通过一定方式预先假设的。在非断言性言语行为中提及的陈述性内容的意义,可以通过将陈述性内容的语句“that P”转变为陈述性语句“P”加以澄清;而真实性要求本质上属于由此表达的陈述的意义。这样一来,真实性要求就是被建筑在一般可能言语结构之上的一类有效性要求。真实是一个普遍的有效性要求,它的普遍性在言语的双重结构中得到了反映。

反过来看,奥斯丁坚信自己指出的断言性与非断言性言语行为(与施行性相对应的断言性)的差别:

在断言性话语中,我们对……言语行为的以言行事方面进行了抽象,并专注于以言表意方面。进一步讲,我们运用了与事实相应的、过于简单化的概念。……我们

的目的在于想发现在所有情境中,为任何一种目的、对任何一位读者,等等,怎样才算是正确地去言说。也许,这是间或实现的。在施行性话语中,我们则尽可能地专注于话语的以言行事力量,并且把与事实相对应的测度进行了抽象。<sup>⑧</sup>

当奥斯丁承认断言性言语行为仅仅显示了言语行为诸多类型中的一种之后,便放弃了前述那种差别,以图建立某种非规则的言语行为家族。然而,我认为,奥斯丁用断言性与施行性之区别意欲达到的目标,可以适当地予以重建。

我们已经看到,只有当参与者在相互就某件事情进行交往的过程中,同时进入交往的两种水平——他们由以建立人际关系的主观际性水平和陈述性内容的水平——语言的交往才能发生。在言说时,可以或使人际关系、或使陈述性内容更加核心化、主题化,并相应地使自己的语言更加相互作用式地(interactive)、或更加认识式地(cognitive)得到运用。在语言的相互作用式运用中,我们将言说者和听者由以进入的关系——作为警告、诺言、请求——主题化,与此同时,我们仅仅是提及了话语的陈述性内容。在语言的认识式运用中则正好相反,我们是把话语的内容主题化,该话语乃是作为发生于(或将要发生于)世界中的某事的陈述(被言说);同时,仅仅是间接表达了人际方面的关系,这一附带的特征可以在下面这个事实中被发现:在英语中,直陈的清晰形式(“我〈向你〉断定……”),尽管在语法上是正确的,却很少与无视人际关系的简略形式相对比。

当内容在语言的认识式运用中被主题化时,只有具备了为陈述性内容假定了清晰的陈述形式于其中的言语行为才是被允许的,借助于断言性言语行为,我们对被断言的陈述提出了真实性的

要求；在人际关系被主题化强调的语言的相互作用式运用中，我们则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诉诸言语行为之规范性关联域的有效性。

对于后一种运用，被公认的命令具有某种范例性意义，它类似于直陈对语言的认识式运用所具有的意义。真实性仅仅是在通常言语结构中得到反映的、最明显的、但不是唯一的有效性要求。那种生发出参与者之间合法(或不合法)人际关系的言语行为的以言行事力量，乃是借助被认可的行为规范(或评价规范)的约束力量；在言语行为是一种行为的意义上，这种约束力量使某种已建立的关系模型现实化了。组织、角色、社会文化之惯常的生活方式(即习惯形式)的规范性背景的有效性，总是被预先设定的，这绝非仅仅对于团体性约束的言语行为，例如打赌、致敬、受洗、任命、许诺等等(这当中的每一种行为，都要满足某种特定的团体、或更为狭小的集团的规范)才是真实的。在推荐、禁止、建议、以及类似的行为(它们并没有受到外在团体的规约)中，言说者所言暗含了某种有效性要求，如果言语行为意欲继续，暗含的有效性要求必须被现存的规范所涵括，并意味着对“这些规范的存在是正确的”在事实上的认可。上述有效性要求间的内在联系隐含地生成于言语行为中，其规范性关联域的有效性也在语言的相互作用式运用中得到了强调，恰如真实性要求在语言的认识式运用中被强调一样。正像只有断言性言语行为才被允许存在于语言的认识式运用里一样，在语言的相互作用式运用中，只有这样一些言语行为才是被允许的：它们表征着言说者和听者都可以采纳的、与行为规范或评价规范之间的特定联系，我称之为调整性(regulative)言语行为。<sup>⑥</sup>借助言语行为的以言行事力量，规范的有效性要求——正确或适当(richtigkeit, angemessenheit)——就像真实性要求一样，被普遍构入言语结构之中。但是，一个规范关联域的有效性要求，却只是在调整性言语行为中(命令和训戒，禁止和拒绝，许诺

和应允,警告、道歉、推荐、接纳,如此等等)才被明确地启用,至于同时被涉及的陈述内容的真实性参照,则仅仅是隐含地保留着,只附属于它的存在性预先假定。反之,在明确提出真实性要求的断言性言语行为中,规范的有效性要求则是隐含地保留着,虽然这些要求(例如,在报道、解释、交流、阐发、叙述等等中)也必须相应于已建立的价值定向模式,必须与某种被认可的规范性关联域相一致——如果那种被预期的人际关系将要产生的话。

在我看来,奥斯丁通过断言性与施行性话语的分类在他头脑中划定(后来又被他弃绝)的东西似乎是从语言的认识式运用与相互作用式运用的区分中猎取来的。在语言的认识式运用中,借助于断言性言语行为的帮助,我们把一个话语的陈述性内容主题化;而在语言的相互作用式运用中,借助于调整性言语行为的帮助,我们把那种被建立的人际关系类型主题化。这种主题化方面的区别,乃是由强调普遍栖居于言语中的有效性要求的某一侧面引起的,是从这样一个事实中引起的——在语言的认识式运用中,我们高扬了陈述的真实性要求;而在语言的相互作用式运用中,我们则要求适合于人际关系的规范性关联域的有效性。奥斯丁本人并没有得出这个结果,这是因为他仅仅考虑了一种普遍有效性要求,即用相应的真实性理论的术语来译解的陈述的真实性,同时他又试图使这种单一的有效性要求和许多不同于断言性言语行为的其它言语行为类型相吻合,“这样,如果我们放松一下自己关于真实和虚伪的观念,我们就将看到,陈述,当它与事实相联系而被估价时,毕竟并非如此不同于规劝、警告、裁决之类的东西。”<sup>⑧</sup>这种有利于一个更宽泛的评价侧度的真实性概念的放松(在其中,一个直陈同样可以向真实或虚伪那样作为或夸张、或精确、或不甚恰当的东西被赋与特征)以某种方式被归结为所有有效性要求向陈述真实性要求的同化,“我们看到,当我们提出一个规则、或警告、或规劝时,存在

着一个如何与事实相联系的问题。这种问题与我们在讨论一个陈述如何与事实相联系时所提的问题，可能并非如此地不同。”<sup>⑧</sup>而在我看来，奥斯丁似乎把陈述真实性的有效性要求（它可以首先用相应于陈述和事实的术语来译解）和规范正确性的有效性要求（它不适于用与真实性相对应的理论来译解）混在了一起。

就警告、规劝依赖于被预言的事物而言，它们乃是言语的认识式运用的一部分。卷入者是否在给定情境中正确地言说了一定的警告或规劝，这有赖于在这种场合中相应的被预言事物的真实性。作为言语的相互作用式运用的一部分，警告和规劝也可以具有规范性意义。这样，提出一项警告或规劝的正确性，就依赖于它们由以诉诸的预先假定的规范是有效的（是主观际认可的）、还是无效的（以及在下一个阶段上，应该有效还是应该无效）。但是，大多数言语行为类型可以被更清楚地划归到某个单一的语言应用模式中。一个估价是好是坏，显然依赖于相应陈述的真实性，估价通常出现在语言的认识式运用中。另一方面，一次法院裁决、一个私人惩罚或一个涉及一定行为的上级对下属的命令，它们是否属于明确的、理所当然的或正确给定的，也同样依赖于一个被认可的规范（正确的规范）是否已被正确地应用到给定情境中。法律裁决、惩罚和规则可以仅仅是语言相互作用式运用的一部分。奥斯丁自己也曾一度考虑过这种反对意见，即不同的有效性要求在某些例证中都在发挥作用：

假设宣布被告有罪时，你尽管已使你的裁决达到适当和充满诚意，仍然有一个问题留待解答：该裁决是否公正或公平？即使你有权力像你所作的那样去惩罚他，并且你的行为没有任何恶意，人们仍然可以问：你的惩罚是否是理所应当的？……有这样一种情况：人们常受提出异

议的引诱,反对在上述第二种类型的批评与适合于陈述的那种类型间作任何比较。这就等于说:难道那些关于某事某人是否友善、公正、公平,是否理所当然的问题完全不同于真实和虚假一类的问题么?确实,这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黑与白问题:要么话语相应于事实,要么没有相应。这就是一切。<sup>④</sup>

运用某种特殊的评价性准则基质在真实性中领会真实的普遍有效性要求时,奥斯丁抹去了命题真实性之普遍有效性要求与规范正确性(以及真诚性)之间的明确区别。但这已被证明是多余的,如果我们能在一个给定的言语行为中区别出:

- 1.一般化了的关联域之隐含的、预先假设的条件;
- 2.被建立的人际关系之特定意义;
- 3.隐含提出的、一般的有效性要求。

鉴于1和2确定了标准化言语行为的区别类型(在不同的语言中,有不同的类型),3就决定着交往的普遍模式,一种一般性言语中所内在具有的模式。

在进入1和2之前,我想指出,奥斯丁区分施行性和断言性话语的出发点,提供了一种过于狭窄的视角,言语的有效性谱系并非穷尽于我在上述区别中引申出来的两种交往模式。当然,可能不存在这样一种交往模式,在其中,因为每一个言语行为都必须用同样方式满足可领会性的预先假设,故话语的可理解性得到主题的强调。如果在某些交往过程中,发生了可理解性的崩溃,关于可领会性的要求则只有通过诉诸释义学的论证,并进而与有关的语言系统相联结,才能被主题化。然而,一个言说者用以言说其意向的真诚性,却可以通过与强调陈述的真实性以及人际关系的正确性(或适当性)的方式相同的方式,在交往行为的水平上得到强调。真

诚信保证主体在语言中显示自身的透明性,它特别在语言的表达式(expressive)运用中受到重视。范例则是第一人称的语句,这种语句揭示了言说者的愿望、感觉、意向等等(它们在每一个言语行为中被附带地表达出来):

1.“我想念你。”

2.“我希望……”

这类句子很少被明确嵌入到一个以言行事行为中,例如:

1a.“我特此向你表达,我想念你。”

在语言的表达式运用中,具有公开的自我呈示功能的人际关系不是主题,它只是在言说者真诚性的预先假定有问题时才需要被提及,表白(avowals)乃是一个范例:

3.“我必须向你承认……”

4.“我不想对你隐瞒……”

由于这个理由,表达性言语行为(揭发、隐瞒、暴露等等)与语言的表达式运用(这种运用在一定意义上,没有以言行事行为也行)相关连,不能采用与断言性言语行为相关于语言的认识式运用相同的方法;也不能采用与调整性言语行为相关于语言的相互作用相同式运用的方法。只要交往行为的预先假设没有被悬置,真诚性就是言语的一个普遍性内涵。在言语的认识式运用中,言说者必须真诚地表述他的思想、意见、假设等等。然而,由于他直陈了一个陈述,问题的焦点就不是其意向的真诚性,而是其陈述的真实性。与此相似,在语言的相互作用式运用中,言说者表达了承诺、惩罚、拒绝以及诸如此类的意向,由于他造成了与听者之间的人际关系,其意向的真诚性就仅仅成了一个必要条件,重要的则是其行为要适合于被认可的规范性关联域。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下列关系表:

| 交往模式  | 言语行为类型 | 主 题    | 主题化的有效性要求 |
|-------|--------|--------|-----------|
| 认识式   | 断言性    | 陈述内容   | 真实性       |
| 相互作用式 | 调整性    | 人际关系   | 正确性、适当性   |
| 表达式   | 表白性    | 言说者的意向 | 真诚性       |

(请注意:语言运用模式可以被相互区分这一点,仅仅是范例性的,我并没有要求每一个言语行为都能根据上述图表被明确地加以划分。我只是说每一个有能力言说者原则上都有明确选择一种模式的可能性。因为在每个言语行为中,他必须满足三项普遍有效性要求,所以,他能够在三者之中提出一个,使其言语成分主题化。)

### 以言行事力量的合理基础

在对言语行为基本类型的意义结构和有效性基础作简约阐述后,我想回到这样一个问题上来:一个话语的以言行事力量是由什么组成的?我们最初只知道如果言语行为被进行,将导致某种人际关系的发生。奥斯丁和塞尔已经通过寻找言语行为成功或失败的条件对以言行事力量作了分析。一个被言说的内容乃是通过使相应的人际关系由以发生的标准条件得到满足而获得某种特定的交往功能。言说者提供的某种东西,可能被接受者接受;但由于各种偶然性原因,也可能遭到接收者的拒绝——他们拒绝进入言说者提供的关系之中。我们感兴趣的不是此类情形,而是另外一类情形,在那里,言说者自己对言语行为的失败负有责任,因为他言说的话语乃是不可接受的。当言说者构造了一个显然没有包含严肃内容的言说时,他就不可能指望那种他所欲求的关系的发生。

我认为,只有当接受者不仅懂得被言说句子的意义,而且实际进入了言说者所欲求的关系时,一个言语行为才能是成功的。此

外,我还要用“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这个术语来分析言语行为成功的条件。我在开始时就把讨论限定在交往性行为方面、即限定在以达到理解为指向的行为方面,而一个言语行为要被接受,只有在言说者真诚地提供了一种严肃内容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一个严肃的提供物要求言说者方面的某种确定的保证。但是,在详细讨论这些之前,我还想就以言行事行为的不可接受性问题提及若干补充的理由。

奥斯丁提出了他的“不适当行为”(infelicities)学说,其基本着眼点乃是团体性约束的言语行为。由于这个缘故,那些“无效果”的例子(诸如错误祈祷、错误实施、错误申请等)被认作是所有可能的违规行为的典型。这样,言语行为的不可接受性就可以导源于基础行为规范的被侵越。如果在一个婚礼上,神父没能正确、或完全正确地宣读规定好了的婚仪致词,那么,这种错误就与下面这种错误处于同一水平:某位正在课堂讲课的大学教师,以命令方式向他的学生发话,而学生则(有权——让我们假定)回答说:“你确实可以要求我的赞同,但你不能命令我这样作。”总之,可接受性的条件并没有被满足。但是在这两个例子中,这些条件都被一个给定的规范性关联域所界定。而我们要寻求的乃是这样一种可接受性条件:它存在于非团体性约束行为自身中。

塞尔曾经分析过不同类型言语行为的习惯性前提条件(这些条件必须被满足,如果它们的以言行事力量是可领会的和可接受的话),在“预备规则”(preparatory rules)的标题下,他详细列举了对言语行为各种可能类型而言是被一般化了的或被限定了的关联域。下列条件(存在于其它条件之中)如没有得到满足,一个诺言乃是不可接受的:(1)H(听者)喜欢S(说者)去作A(某种特定的行为),更甚于S不去作A,且S也相信情形确是如此;(2)S将在规范的事件过程中去作A这一点,对S和H来讲并非是显而易

见的事情。<sup>⑩</sup>如果这两点习惯性前提条件没有被满足,那么许诺的行为就是无意义的。这就是说,言说者试图实现许诺的以言行事行为的努力,没有产生效果,并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失败。<sup>⑪</sup>

对非团体性约束的言语行为而言的、一般化了的关联域条件,不同于那种在已建立的行为规范中运用的条件。<sup>⑫</sup>如果(非团体性约束的)言语行为被显示为一个贮藏库,行为主体借助于有限数目类型的帮助,就可以汇集任何数量的、与规范相应的行为的话,言语行为类型的应用条件和关于行为规范的应用条件,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彼此独立地发生变异。

以言行事的特殊力量——这种力量在非团体性约束之言语行为的场合并非直接来自已建立的行为规范的有效性——不能依据言语-行为-类型的关联域限制来解释。对它的解释,只有借助于塞尔在“本质规则”(essential rules)的标题下引入的特定前提条件才有可能。在这样作的时候,他确实好像仅仅是在解释相应的施行性动词的意义(例如,这样一个请求:“当作尝试,使H去作A”;或问题:“当作尝试,从H那里诱引出信息。”)。然而,颇有意思的是,这些行为领域都包括一个共同的决定“当作尝试……”。一个以言行事行为成功的本质性前提条件存在于言说者对某种特殊约定(engagement)的进入之中,如此,接受者才能给以响应。一个话语可以当作一种许诺、断言、请求、提问或声明,只要、而且仅仅只要言说者构造了一个他力图使之完美的提供物——当然是就听者可接受的意义而言。言说者必须自我约定,即他必须表明,在一定情境中他将作出一定的行为结果。约定的内容不同于约定的诚意。这个由塞尔作为“诚意规则”(sincerity rules)引入的条件,凡在以达到理解为指向的交往性行为的场合中,都必须被满足。这样,在下面的讨论中,我在谈及言说者约定的时候,将把约定的一定内容及其诚意——心怀诚意,言说者愿意进入他自己的约定之

中——皆作为假设前提来处理。就我至今所看到的言语行为的分析而言,都不令人满意,因为它们没有澄清言说者的约定,而言说者话语的可接受性,恰恰有赖于此。

与一般性关联域条件相比较,言说者进入由特定类型人际联结的、可辨别的和诚挚的意愿有着某种特殊的性质。那种特定类型言语行为预先假设的、被限定的关联域必须:(1)是给定的;(2)是由参与者假定为存在的。由此导致下列两个陈述(statement):①一个涉及一定关联域所获效果的陈述,它们确实是被当时所论问题的类型所要求的;②一个涉及言说者和听者假设这些关联域所获效果的陈述。但关于言说者约定的特殊的前提条件,却不应该采用同样方式加以分析,也就是说,不该提出这样两个陈述:(1)一个涉及如下效果的陈述,即在言说者一方,存在着某个确定的约定;(2)一个涉及另一效果的陈述,即听者假设这个言说者获得约定。人们可以选择这种分析方略,但我不认为它是适当的。应该在谈论被限定的关联域之存在的同样含义上去谈论一个约定的存在。我可以运用某种适当的方法,通过观察或询问,去确定一般化的关联域条件是否获得,但却只能检验一个言说者是否通过某种特定方式实现了自我约定,并使自己承担起相应行为结果的义务。我最多能确定,对于某提供物将能经受住检验这样一种推测,是否有着足够的表征。

言说者借助以言行事行为试图进入的联结意味着某种担保,即在其话语的结果中,他将满足一定的条件。例如,某个问题被当作已解决的,当满意的答案被给出时;放弃一个断言,当它已被证明是虚假时;遵循他自己的劝告,当他发现自己与听者处于同样境况时;强调一个要求,当它没有被遵守时;根据某种被声明所揭示的意向去行动,等等。因此,一个可接受的言语行为的以言行事力量由如下事实构成,即它能使听者相信言说者言语-行为-类型的义务。

承诺。但是，如果以言行事力量具有某种比启发性更大的影响力，又是什么东西促动着听者把自己的行为建筑在这样一个前提——言说者将严肃兑现他所表明的约定——之上呢？当这是一个团体性约束的言语行为问题时，他可能能依赖已建立的行为规范的制约力量。然而，在非团体性约束的言语行为的场合，以言行事力量却不能直接追溯到规范性关联域的制约力量。言说者在实现其言语行为的过程中借以影响听者的以言行事力量，只有当我们把那些彼此在有效性要求的相互认可基础上联结起来的言语行为系列一并考虑时，才能被理解。

借助于以言行事行为，言说者和听者都提出了有效性要求并希求它们被认可。但是这种认可不需要无理性地跟随，因为有效性要求具有某种认识特征并可以被检验。正因为如此，我坚持下列论点：归根结底，言说者能够以言行事式地影响听者，反之亦然，因为言语-行为-类型的义务承诺乃与认识性可检验的有效性要求相关连——也就是说，因为这种相互结合具有合理的基础。进入约定的言说者通常都有这样一种特定感觉，在这种感觉中，他愿意运用主题化被强调的有效性要求，从事某种人际关系的建立，并因此而选择某种特定的交往模式。

这样一来，直陈、描述、分类、估价、预言、异议等虽各有不同的特定意义，但这些不同人际关系提出的要求都是相应陈述的真实性，即以陈述的真实性或主体的认识能力为基础。相应的，请求、指示、告诫、许诺、应允、谅解、承认等，也具有不同的特定意义，但在这些不同的人际关系中提出的要求，却是规范的正确性，即要求诉诸于其本身的正确性或主体假定响应度的能力。我们是否可以说，在不同的言语行为中，言说者约定的内容乃由诉诸同样的、主题化被强调的、普遍的有效性要求的不同方式所决定，而且，鉴于——作为对普遍的有效性要求之诉诸的结果——言语-行为-类

型的承诺被赋与提供根据、或证明可信性的义务式特征,听者能够合理地<sub>被</sub>言说者的信号化约定所催动,从而去接受言说者的提供物。我很愿意分别就三种交往模式来阐明这一点。

在语言的认识式运用中,言说者自我表明了一个言语行为内在的义务,即提供根据(*bergründungsverpflichtung*)。断言性言语行为包含有这样一种提供物——如果必要的话,它将重新回到经验源泉那里,言说者正是在那里获得了自己的陈述为真实的确定性。如果这个直接根据没有消除某些特别的怀疑,则持续未定的真实性要求就将成为理论探讨的一个主题。在语言的相互作用式运用中,言说者自我表明了去提供正当性(*rechtfertigungsverpflichtung*)这样一个言语行为内在的义务。当然,调整性言语行为仅仅包含这样一个提供物,它表征着——如果必要的话——那种使言说者确信自己的话语是正确的规范性关联域。如果这个直接的正当性没有消除某种特别的怀疑,我们可以拓展到实践探讨水平。然而,在实践探讨中,推论和验察的主题并不是与言语行为直接相连的正确性要求,而是基础规范的有效性要求。在言语的表达式运用中,言说者也深入到言语行为之中,这种深入可称之为证明可信性的义务(*bewährungsverpflichtung*),用以在自己的行为结果中显示:他已经表达了实际指导自己行为的意向。当用以表达对言说者自己而言是不言而喻的东西的直接保证不能消除某种特别的怀疑时,话语的真诚性就只能依靠言说者以后行为的连贯性来加以验证了。

每一个言语行为内在的义务都可以在两种水平上使之完美实现:(1)在话语的关联域中直接实现。或是通过诉诸某种经验根据,或是通过表征一个相应的规范性关联域,或是通过证实那对自己来说本是不言而喻的东西;(2)在探讨论辩或在随之而来的行为中间接实现。但是,只有在提供根据和证实可信性的义务场合

(我们是借助断言性和表达性言语行为进入其中的), 我们才归诸于同样的真实性或真诚性要求。那种借助调整性言语行为得以进入的、提供正当性的义务, 则直接归诸于下述要求: 被施行的言语行为要适合现存的规范性背景。反过来, 随着向实践性论辩的深入, 讨论的主题则恰恰是规范的有效性, 而言说者的正确性要求不过是从规范的有效性那里引借过来的而已。

我们的思考已经导致如下不甚成熟的结果:

1. 一个言语行为如果是可领会的与可接受的, 并被听者所接受, 那它就是成功的, 这就是说, 它导致了言说者企图实现的人际关系。

2. 言语行为的可接受性依赖于(许多条件中的)两个语用学前提条件的满足:

(1) 存在言语-行为-类型被限定的关联域(预备规则)。

(2) 言说者能进入一定的言语-行为-类型义务(本质规则、诚意规则)的可认可的约定。

3. 言语行为的以言行事力量由这样一种能力构成: 它能催动听者按照蕴含在言说者所给出的约定中的前提来行动。

在团体性约束言语行为的场合, 言说者可以从现存规范的制约力量中引借出这种力量。

在非团体性约束言语行为的场合, 言说者可以通过诱发对有效性要求的认可来发展这种力量。

4. 言说者和听者能够彼此相互推动去承认有效性要求, 因为言说者之约定的内容决定于某个主题化被强调的有效性要求的特定参照, 言说者借此(通过某种认识性可检验的方式)假设了:

(1) 提供根据的义务(运用真实性要求)。

(2) 提供正当性的义务(运用正确性要求)。

(3) 提供可信性的义务(运用真诚性要求)。

### 一个语言交往的模型

以上分析了奥斯丁所谓话语的以言行事力量，分析结果引导我们回到了言语的有效性基础问题。非团体性约束的言语行为将它们的以言行事力量归结为言说者和听者不得不作为已被证明是正当而提出和认可的一组有效性要求。如果语法性的（以及因此是可领会的）语句是在导致成功的交往这样一种方式中被运用，那么，一个交往过程的参与者以达到理解为指向的活动只能在下述条件下进行：参与者在其言语行为中使用可领会的句子时，需通过某种可接受的方式提出三项有效性要求，（1）对一个被陈述的陈述性内容或被提及的陈述内容的存在性先决条件，他要求真实性；（2）对规范（或价值）——在一个给定的关联域中，这些规范或价值将证明一个施行式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为正当——他要求正确性（或适宜性）；（3）对被表达的意向，他要求真诚性。当然，单个有效性要求可以被主题化强调。由此，①在语言的认识式运用中，陈述内容的真实性就居于显著地位；②在语言的相互作用式运用中，人际关系的正确性（或适宜性）就居于显著地位；③在语言的表达式运用中，则是言说者的真诚性居于显著地位。但是在每一个交往行为的实际场合，所有有效性要求系统都将投入运作。它们必须并总是同时被提出，尽管它们并非同时被强调。

内在于言语结构的有效性要求的普遍性也许有助于阐明语言的系统性地位。语言是这样一种中介物，通过它，言说者和听者实现了一定的基础性界分。主体将他自己界分了出来——（1）从他作为观察者的第三者态度出发而将自己客观化的环境中，（2）从他作为参与者的自我-变更态度出发而对其遵从或背离的环境中，（3）从他作为第一者的态度出发而加以表达或掩饰的他自己的主体性中，（4）从语言自身的中介中——界分了出来。对于上述现实领域我已建议用这样几个多少有些专断的术语来表示：外在

自然,社会;内在自然,语言。以达到理解为指向的言语中的不可避免地暗示的有效性要求,表明了这四重领域必须、并总是同时浮现。我想运用若干现象学表征说明这些领域浮现方式的特性。

外在自然这个术语,我意指成年主体能够(尽管仅仅是间接地)感知、能够操纵并在现实中客观化了的那一部分。当然,一个人采纳客观性态度,不仅可以指向无生命的自然,也可以指向所有对感觉经验而言乃是直接或间接可理解的事物和对象。社会则意味着成年主体可以在某种非遵从性态度中加以理解的——作为一个交往行为中的人、一个交往系统的参与者而理解的——现实中前符号化结构的那一部分。合法的人际关系就隶属于此项,例如,制度、传统、文化价值等等。我们能够用某种指向社会的客观性态度取代遵从性态度;反而言之,我们也能将某种遵从性态度转换到这样的领域,在其中,我们今天的行为通常是客观式的,例如,在与动物和植物的关系中;我作为内在自然而加以分类的乃是全部欲望、感觉、意向等等。对所有这些来说,“我”拥有深入内在自然的特权,并能把作为“我自己”的经验在公众面前表述。恰恰是在这种表达性态度中,“我”不仅作为主体知道“我自己”,而且也作为某物知道“我自己”——作为在认识、语言、以及同时发生的相互作用中,总是已经超越了单纯主体性之囿限的某物知道“我自己”。确实,如果主体采用了一种朝向自己的客观性态度,这将改变意向可以在主体中表达的感觉。<sup>⑥</sup>

最后,我将引入我们话语的语言中介物作为一个特别领域。恰恰因为语言(包括非陈述性符号系统)在我们交往行为及表达的施行过程中保留着某种特殊的半超越状态,它将自身作为现实中独特的一个部分(前意识地)呈示给了言说者和行为者。同样,这并没有妨碍我们能够对语言学话语或符号系统采取某种指向语音或符号的客观性态度。

这里直觉式给出的,乃是一种交往模型,在其中,语法性句子通过普遍的有效性要求,被嵌入与现实的三种关系之中,并由此承担了相应的语用学功能:呈示事实,建立合法的人际关系,表达言说者自身的主体性。根据这个模型,语言可以作为相互关联的三种世界的媒介物而被设想,这就是说,对每一个成功的言语行为来讲,都存在着下列三重关系:(1)话语与作为现存物的总体性的“外在世界”的关系;(2)话语与作为所有被规范化调整了的人际关系(在一个给定社会中,它们被认为是合法的)之总体性的“我们的社会世界”的关系;(3)话语与作为言说者意向经验之总体性的“特殊的内在世界”的关系。

我们可以检验每一个话语,看它是真实的还是不真实的,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真诚的还是不真诚的。因为在言语中,不管什么被强调,语法性句子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被嵌入到与现实的关系之中:在一个可接受的言语行为那里,外在自然、社会和内在自然诸层面总是一起浮现出来,语言自身也在言语中浮现。因为言语是一种媒介,在言语中,那种被工具性加以运用的语言学含义,也是被反省的。在言语中,只要语言话语的符号基质、意义和概指可以被区分,言语就将作为一个独特的现实,把自身从外在自然、社会和内在自然诸领域中分离出来。本章最后所列图表呈现出若干相互关系,它们存在于:

1. 每一个言语行为都与之发生关系的现实领域;
2. 在特定交往模式中占优势的言说者的态度;
3. 由以建立与现实之联系的有效性要求;
4. 语法性句子在其与现实的联系中承担的一般性功能。

| <u>现实领域</u>       | <u>交往模式：基本态度</u> | <u>有效性要求</u> | <u>言语的一般性功能</u> |
|-------------------|------------------|--------------|-----------------|
| 关于外在自然的<br>“那个”世界 | 认识式：<br>客观性态度    | 真 实 性        | 事实之呈示           |
| 关于社会的<br>“我们的”世界  | 相互作用式：<br>遵从性态度  | 正 确 性        | 合法人际关系之建立       |
| 关于内在自然的<br>“我的”世界 | 表达式：<br>表达性态度    | 真 诚 性        | 言说者主体性之揭示       |
| 语言                |                  | 可领会性         |                 |

## 第二章

# 道德发展与自我同一性

1974年7月，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为纪念成立50周年，举办了一系列讲座。H·马尔库兹、L·劳温塞尔、O·内格特、A·施密特、以及J·哈贝马斯等人分别作了讲演。本文即J·哈贝马斯的讲演稿。

法兰克福研究所的传统已经直接体现在H·马尔库兹和L·劳温塞尔的讲演中，他们两人用战后一代的贡献，从两个基本方面对法兰克福研究所的传统作了介绍，这使我从这类纪念场合自然强加的责任中解脱了出来，不再有发表礼仪性的致词的必要，更何况批判的社会理论现今对自我状况的发现——如果人们把这种状况与它当下的经典式表达相对照的话——没有提供值得庆贺的理由。对往昔赞颂的某种程度的节制，还有着传统上的根据：研

究所早期的成员总感觉他们自己带有精神分析理论的倾向，那就是将过去的力量斩断，而转到现实中来。确实，他们一直试图通过以未来为指向的记忆去实现这种意向，就像精神分析学所作的那样。

## 1

今天我打算处理的、我的同事和我本人都深感兴趣的课题，与这样一项经验性研究相关联：它涉及存在于年轻一代中的那种冲突与冷漠的潜在势力。<sup>①</sup>在社会化范型、青春期独特的发展、有关青春期危机的相应的解决办法、以及由年轻人构建的同一性形式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可以解释深深扎根的、与政治有关的种种态度。这个问题引发我们去思考道德的发展与自我同一性——一个这样的主题：它使我们自然地超出了原来的范围而进入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问题领域，即进入到其基础概念的规范含义问题之中。自我同一性概念显然具有比描述更多的意义，它描绘出一个自我的符号性组织。自我的符号性组织一方面自命为某种普遍理念，因为它是在一般形成过程的结构中被发现的，并使那些具有文化恒定性的、重复出现的行为问题的最理想的解决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一个独立存在的自我组织又决不意味着某种定期发展的东西，某种——比如说——类似于自然界成熟过程的结果，事实上，它通常并没有完全实现。

如人们思考自我强力这类概念的规范含义，除去超我中与自我远隔的部分，并且缩小无意识防卫机制发挥功能的领域，那么，精神分析学也可遴选出一定的个性结构作为理念。当精神分析理论作为一种语言分析形式被译解时，它的规范意义就将在下列事

实中展示出来：所谓自我、本我、超我三者的结构性模型预先假设了非强迫性的、非病理性扭曲的交往。<sup>②</sup>当然，在精神分析学的文献中，上述规范性含义通常是在直接与分析疗程的医学目的相关联的情况下被表征的。而在社会研究所的大量社会心理学著作里，精神分析理论的基本概念之所以能完整地进入描述、假说构形、以及衡量手段（的角色），恰恰是因为它们所具的规范性内容。弗罗姆关于施虐-受虐狂特征及霍克海默尔关于权威与家庭的早期研究，阿道尔诺对权威性人格中偏见形成机制的探讨、以及马尔库兹有关本能结构与社会理论著作，都遵循着同样的概念方略：心理学与社会学的基本概念能够交织在一起，是因为它们所设计的独立自主的自我与不为习俗所约束的社会这两个侧度乃是相互需要的。这一连结着社会批判理论与自我概念——后者在绝非唯心主义的精神分析概念中保存着唯心主义哲学的遗产——的链条甚至可以在阿道尔诺和马尔库兹公开宣布精神分析学已过时时仍然被保留：“社会超出了这样的阶段范围：在这个范围内，精神分析理论可以阐明它对个体心理结构的深入、并因此能够揭示存在于个体中的社会控制机制。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石乃在于这样一种观念，即社会控制产生于本能需要和社会需要间的斗争，产生于个体内部的斗争。”<sup>③</sup>恰恰是这种存在于灵魂深处的对抗，在整个社会化了的社会中被认为是已经陈腐了的东西，这种社会据说已消灭了家庭，直接把集体自我的理念刻印在儿童心灵中。阿道尔诺早些时曾用相似的思路论辩道：“对于使其不受一般之侵害的被保护的特别来说，心理学并不是一块保留地。社会对抗越增长，心理学自身的那种彻底自由的、个体性的概念就显然越是失去其意义。前资本主义世界不知道心理学；全都社会化了的世界也不会知道它，与这种社会相应的乃是分析的修正主义，这对于社会与个体力量间的转换是适当的。因为在全部社会化了的世界中，社会力量几

乎不再需要自我和个体性一类的中介，它作为所谓自我心理学的成长表明着自身；与此同时，个体心理动力学则被个体对社会的部分自觉、部分倒退的适当所取代”。<sup>④</sup>但是，甚至这种令人伤感的与精神分析学的告别，也要求助于与自身同一的某种非强制性的自我的观念。如果不是在这样一个事实——即总体社会化既没有造就，也没有默认独立的个体——中去认可总体社会化的形成，又到哪里去寻找这种认可呢？

这里，我不打算深入讨论个体的终局这个问题。<sup>⑤</sup>在我看来，阿道尔诺和马尔库兹已经被带有一定倾向性的、过于敏感的知觉和过于简单化的译解所诱使，故发展了某种与流行一时的极权统治理论相对的左翼变体。我上述言词不过是想提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社会批判理论仍然抓住独立自存的自我这个概念不放，甚至在它们被作出如此令人沮丧的判断，即认为自我正在丧失它的根基时，也固执原见。然而，阿道尔诺总是拒绝提供有关基本批判概念的规范性内容的直接解释，那种试图测定在总体社会中被搞得支离破碎的自我结构之组成的作法，已经被他认作是虚伪的确定性。阿道尔诺有着很好的理由去否定涉及社会解放和自我独立性的确定性概念的需求，他在对第一哲学的批判中，理论化地展开了这些理由：本体论或人类学为自身寻求某种规范性基础——该基础是原初的、非中介的——的努力，乃是注定要失败的。他的另一个理由来自对下列实践方面的考虑：确定性理论为合法化隐匿了某种潜能，合法化——恰好与它们表述出来的意向相反——将被用于剥削和压迫一类的目的（正像经典的自然律学说所表明的那样）。他还认为，基本批判概念的规范性内容可非本体论式地加以重建，即不必求助于原初的、非中介的东西，这种重建也可以只在某种展开式逻辑的形式中辩证地进行。不过，阿道尔诺尽管有黑格尔主义的倾向，却并不相信展开式逻辑的概念，因为他认为历史

进程(即是种的,也是个体的历史进程)的开放性和初始力量与某种进化模型的封闭性质是不相容的。

阿道尔诺所认为的确实都是很好的理由,能够起到警告的作用,但不能因此得以免除下列责任,即去证明为了某种批判意图而运用的概念的正当性。在哲学讨论的场合,阿道尔诺也并非总是避免这样作。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他曾谈到康德概念的可理解特征,“根据康德模型,主体在如下程度内是自由的:他们意识到了自己,与自己是同一的。在这样一种同一性中,主体又在如下程度内是不自由的:他们乃是被迫地立于同一之上,并使这种被迫性质永久化。作为非同一的、离散的自然物,主体并不自由。然而正由于如此,他们又是自由的,因为在一种给他们以过强力量的冲动中,他们摒除了同一性本身的强迫特征”。<sup>⑥</sup>我把这些文字理解为对决定着自我同一性的aporetic发展的描述,该发展使那种无需以不幸福、或对人的内在本性的亵渎为代价的自由成为可能。我试图用仍显粗糙的社会行为理论工具去译解上述自我同一性的辩证概念,并且不惧怕那种虚伪的确定性;我还准备用这样一种方式去实现以上的设想,那就是(不再被掩盖的)规范性内容可以在经验理论中得到体现,而且,拟议中的这种内容之重建可以面对非直接的检验。

## 2

自我同一性概念的发展问题,曾在三种不同的理论传统中得到考察:分析的自我心理学〔H·S·萨勒温(Sullivan),埃里克森(Erikson)〕;认知发展心理学〔皮亚杰(Piaget),柯尔伯格(Kohlberg)〕;行为的符号性相互作用理论〔米德(Mead),布鲁麦尔(Blu-

mer), 哥弗曼(Goffman)以及其他人士。<sup>⑦</sup>如果我们暂且退回一步去寻找三者之间的聚焦点, 就将发现某些基本概念。试把这些基本概念(通过一种简化了的方式)汇总如下:

1. 成年主体言说和行为的能力乃是成熟之综合与学习过程的结果。然而, 在过程中的相互影响或作用, 我们还未能充分理解。我们能够区分开认识发展、语言发展与精神上有性的特性的(或曰动力的)发展。这种动力的发展似乎隐舍地与相互作用资质——即加入相互作用(行为与论辩)的能力——的获得相关连。

2. 主体言说和行为能力的形成过程, 要逐次地历经不可逆转的一系列分离、并日渐复杂的发展阶段, 其中任何阶段都不能逾越, 每个较高的阶段都在发展的合理性可重建模型的意义上暗示着前面阶段的存在。在皮亚杰的学说中, 这种发展性逻辑的概念得到详尽的阐发, 并在分析的自我心理学和行为的符号性相互作用理论这两种理论传统中得到一定的响应。<sup>⑧</sup>

3. 主体言说和行为能力的形成过程不仅具有间断性, 而且是一种——作为一种规则——受危机支配的。特定阶段的发展问题的解决, 既有赖于结构的消解, 也部分地有赖于结构的回归。危机的生产性解决经验——战胜发展的病理学趋向的危险的经验——对于克服以后的危机, 乃是一个条件。<sup>⑨</sup>成熟性危机的概念在精神分析学那里已经得到了阐明。但是, 与青春期阶段相联系, 它对于认知发展的心理学和行为的符号性相互作用理论这两种理论传统来说, 也有着某种意义。<sup>⑩</sup>

4. 主体言说和行为能力形成过程的发展方向乃由日益增长的独立自存所表征。我的“独立自存”这个术语, 意指自我通过成功地解决问题、通过日益增长的解决问题之能力而获得的独立性, 它要处理的内容包括:

(1) 可以从战略角度加以控制的外在自然和社会的现实;

(2)部分内在化了的文化与社会的非客体化的符号结构;

(3)文化转译了的需要、并非服从于交往的本能冲动以及肉体的内在本性。<sup>②</sup>

5.自我同一性表征着言说和行为主体满足一定的连贯性要求的资质。埃里克森曾提出这样一个假想的关系式:对自我同一性的感知乃是积累起来的自信,在他人看来,自信是一个人所拥有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它包含着某种支撑内在统一性和连续性的能力。<sup>③</sup>自我同一性虽依赖于一定的认知性前提条件,但它并非决定于一个认识性的自我,而是由这样一种资质所构建,这种资质形成于社会的相互作用中。同一性乃是通过社会化产生出来的,即是通过这一事实——成长中的儿童借助于符号化普遍性的汲取,把自己结合到特定的社会系统之中;然后,又通过个性化、通过增长中的、相对于社会系统的独立性使自身得到维护和发展——而产生出来的。

6.从外在结构到内在结构的转换,乃是一个重要的学习机制。皮亚杰把行为图式(即对象的操作规则)内在化地转换和转译为领悟及思维图式的过程称作内化过程。精神分析学和相互作用主义理论则提出了相似的从相互作用关系模型到内存于头脑中的关系模型的转换(内在化)。<sup>④</sup>这个机制又与如下进一步的原则相关连,即通过积极重复人们最初本是消极经验和经历的东西去成就独立性本身——不管是相对于外在客体,还是相对于有关的他人,还是相对于自己的本能冲动。

尽管有着上述(应该承认多少有些程式化的)诸项基础性概念,三种不同的理论传统仍然没有一个能生发出有关发展问题的、解释上强有力的理论,一种将允许某种精确的、具有经验性意义的、有关自我同一性概念的测定(不过,这个概念却正在愈来愈频繁地被运用着)。然而,以分析的自我心理学作为出发点,J·劳温格

尔(Loevinger)已经试图去构造某种理论,这种理论对自我发展的把握,既独立于认知发展,又独立于精神上有性的特性的发展。<sup>⑤</sup>根据这个概念,自我的发展与精神上有性的特性的发展都被认为是决定着动机的发展(见图表1)。我不打算在此详细讨论这项建议,只想指出存在于图表1中的三个困难:

1.那种声称在某种犀利的分析方式中,通过运用行为控制或超自我的形成、相互作用类型以及特定阶段上的发展性问题等侧度,已经把握住像自我发展这类对象的主张,因其没有充足的理由而不能打动我。因为在第三栏中所列举的发展性问题,显然不是用单一的侧度所能说明的,它涉及到认知动力以及交往等诸类事项。第一栏中所界定的超自我的形成,似乎也不能独立于精神上有性的特性的发展来分析。

2.再就是那种给定的发展阶段遵循某内在逻辑的主张,该主张甚至不能直觉式地使自身完美。一个个单项未能表示出结构化整体的特性;彼此衔接的各发展阶段的愈益复杂的层次,也不能从图表中抽象出来。

3.对被主张的自我发展之逻辑与该逻辑在具体生活历史中得以现实化的经验条件之间的关系,没能给以充分的考虑。是否有其它的发展道路可以通向同样的目标?什么时候偏差将从可合理重建的发展模型中发生?对于这样的偏差来讲,个性系统及社会结构的承受限度能有多大?该发展阶段及社会的基本组织如何与个体发生学的发展模型相冲突?

我打算通项处理这些困难。(1)我将分离出自我发展中一个中心性的、经过认真探查的方面,即道德意识。在这一分离中,我甚至也将只考虑问题的认知性一面,也就是构造道德判断的能力(在图表Ia中,我已经使柯尔伯格提出的道德意识诸阶段与图表I,亦即J·劳温格尔提出的自我发展诸阶段协调了起来,以便强调

图表 I

## 自我的发展阶段

(根据J. 劳温格尔)

| 阶 段           | 控制并决定发展<br>特征的推动力         | 人际关系<br>类 型                            | 有意识专注<br>的 事 物          |
|---------------|---------------------------|----------------------------------------|-------------------------|
| 前社会阶段<br>共生阶段 |                           | 自我中心的<br>共生的                           | 与非自身相对的自身               |
| 受冲动支配<br>的阶段  | 受冲动的支配<br>惧怕报复            | 自私式利用的<br>依赖性的                         | 肉体感觉, 特别是性<br>及侵犯性      |
| 机 会 阶 段       | 权宜手段, 惧怕<br>被控制           | 自私式利用的,<br>操作性的, 一<br>方得益而引起<br>另一方损失的 | 优势, 控制                  |
| 遵 奉 阶 段       | 遵从外在的规<br>羞耻感             | 相互的<br>表面性的                            | 事物<br>外表<br>名誉          |
| 诚 意 阶 段       | 内在化了的<br>规则<br>内疚感        | 强化的<br>责任性的                            | 被分化了的内在感觉<br>成就<br>品质   |
| 自 主 阶 段       | 内在冲突的<br>模写<br>对差别的宽容     | 强化的<br>关注于自主<br>性的                     | (同上)角色概念化<br>发展<br>自我实现 |
| 一体化阶段         | 内在冲突的和解<br>对无法实现之物<br>的否认 | (同上)<br>执着于个性的                         | (同上)<br>同一性             |

材料来源: J劳温格尔“自我发展的意义及尺度”, 摘自《美国心理学家》21, (1966), P198。

道德发展代表着个性发展的那一部分。而个性发展对于自我同一性来说,乃是决定性的)。(2)我将表明柯尔伯格的道德意识诸阶段通过在某种一般的行为-理论框架中的再现,满足了对一个发展性逻辑而言的规范条件。(3)我将把限制移至交往行为的认知性一面,并表明自我同一性不仅要求交往的一般水平的认知性控制权,而且要求在这些交往结构中,对人们自己的需要也实事求是的能力。只要自我从其内在本性中被割断,并且否认对需要的依赖(这种需要仍然期待着适当的译解),那么,自由——不管它是怎样受到原则的指引——都将在实际上保留着在现存规范系统关系中的

图表 1a

## 道德意识诸阶段

(根据L·柯尔伯格)

|         |                                                                  |             |
|---------|------------------------------------------------------------------|-------------|
| 服从和惩罚倾向 | 自我中心服从来自上面的力量或威望,避免麻烦的一套办法,客观响应性。                                | I.<br>前习惯水平 |
| 工具享乐主义  | 正确的行为乃是工具式满足自己的需要,偶然场合下亦满足他人的需要,质朴的平等主义,倾向于交换和互惠。                |             |
| 好儿童倾向   | 倾向于对他人的赞同、使他人满意并帮助他人。遵从于成年或自然角色行为的立体映象,以及根据意向的判断。                | II.<br>习惯水平 |
| 法律-秩序倾向 | 倾向于固定化规则的权威及对社会秩序的维持。正确的行为乃由克尽职守、表现对权威的尊重以及为社会之缘故而对既定社会秩序的维护所构成。 |             |

契约-条文主 正确的行为乃是按照已经社会全体检  
主 倾 向 验并认可的个体权力及个体规范加以  
定义的。热心于建立并维护个体权  
力、平等和自由。区别存在于已经普  
遍地、约定俗成式地被运用的价值和  
仅仅对某个特定社会才适用的价值之  
间。

Ⅱ.

后习惯水平

普遍伦理原则 正确性由与诉诸逻辑可领会性、普遍  
倾 向 性及连贯性的自我选择伦理原则相一  
致的良心决定所定义。这些原则是抽  
象的,并非具体的道德规则。存在着关  
于正义、关于人类权力的交互性与平  
等性、以及关于对作为个体的人的尊  
严之尊重等普遍化原则。

---

材料来源: E·图赖尔“青春期道德发展中的冲突与变异”,载《儿童发展》,45  
(1974),PP14~29。

不自由性质。

### 3

柯尔伯格把可以合理重建的道德意识的发展定义为六个阶段。道德意识最初是在与道德相关的行为冲突的判断中表达出自身。我把那些可以通过交感方式解决的行为冲突,称作“与道德相关的”。行为冲突的道德解决排除了明显的力量运用和“便宜的”妥协办法,它可以被理解为交往行为——即以达到理解为指向的行为——的某种继续,并且是运用推论的手段。这样一来,唯一可允许的解决方式是:至少危害一个被卷入或被影响群体的利益。然

而,允许被卷入利益的可传递的调整,这种卷入是从作为可交感性而被接受的角度——一种理想而公正的生活角度——出发的。

(另一方面)限定制裁于失败的场合(惩罚、羞耻、内疚)。

请对照图 表 I b 中柯尔伯格关于道德意识诸阶段的定义。正如图表 2 所表明的,不同的制裁及有效领域与这些阶段是相对应的。

**图表 I b                      道德诸阶段定义**

### **I. 前习惯水平**

在这个水平上,儿童能对文化规则以及好与坏、对与错之类的标准作出响应。但他们对这些标准的理解,或是依据行为(惩罚、奖赏、礼物的交换等)的物质和享乐性结果,或是依据发布上述规则与标准的人所拥有的物质力量。前习惯水平又被划分为两个阶段:

阶段1:惩罚与服从的倾向。行为的物质结果决定着它的好与坏,而不管这些结果的人文意义或价值。避免惩罚与对力量的无条件的服从,都是根据他们自己的是非标准,而不是根据对惩罚权威由以支撑的基础性道德规约的遵从(后者属于阶段4的情形)。

阶段2:工具相对主义倾向。正确行为乃由那种可以工具性地满足自己的需要、偶然情况下也满足他人需要的行为所构成。人类关系被看作类似于市场交换关系,公平互惠、平等共享等要素都被包容于其中。但它们总是在某种物质实用主义的方式中被译解,互惠乃指“你为我搔痒,我就为你擦背”,并无忠诚、感激与正义可言。

### **I. 习惯水平**

在这个水平上,维护个体家庭、集团、国家的期望,作为可在自己的权力中予以评估的东西被接受,而不管其直接的、显而易见的结果。此时的态度不再是仅仅遵从于个人期望与社会规则,而是对社会规则的忠诚,并积极维护、支持它,替它辩护,以至于与卷入其中的个人与集团同一化。习惯水平亦被划分为两个阶段:

阶段3:人际和谐或“好儿童”倾向。好的行为乃是帮助他人、使他人愉快并得到他人赞许的行为,并存在着对成年、“自然”行为的立体映象的强烈遵从。行为经常根据意向被判断——“他想得很好”第一次成为重要的东西。一个人由于“心地是美好的”而赢得赞许。

阶段4:法律和秩序倾向。存在着一种朝向权威并固定化了的规则,以及对社会秩序维护的倾向。正确的行为乃是由克尽职守,尊重权威,为了社会而维护既定社会秩序所构成。

### Ⅱ. 后习惯性的、自律的、或原则化的水平

在这个水平上,明确出现某种为界定道德价值与原则的努力。除提出这些原则的集团或个人的权威、以及个体自身对这些集团的认同以外,这些道德价值与原则亦拥有有效性和适用性。这一水平同样可以区分为两个阶段:

阶段5:社会契约条文主义倾向。功利性色彩很重,正确的行为被倾向于按照已经社会全体批评式检验并认可的个体权力及规范加以界定。存在着关于个人价值与意见相对性的明确意识、以及对达到交感之程序规则的相应强调(而不是像在阶段4“法律和秩序”中那样,把它冻结起来)。在法律领域以外,自由协定与契约则是义务的约束性要素。

阶段6:普遍伦理原则倾向。正确行为是由与诉诸逻辑可领会性、普遍性及连贯性的自我选择伦理原则相一致的良心决定所定义。这些原则不是类似于摩西十诫那样的具体道德规则,而是抽象的、伦理性的(黄金规则,范畴化命令),是在内心深处存在着的关于正义、人类权力的交互性与平等性以及对作为个体的人的尊严之尊重等等普遍化原则。

---

材料来源: L·柯尔伯格“从是到应是”,载 T·米切尔主编的《认知发展与认识论》(纽约,1971),PP151~236。

图表2 关于道德意识诸阶段的解析(柯尔伯格)

| 认识性<br>前提条件   | 道德意识阶段       | 良好与公正生<br>活的观念      | 制 裁               | 有效性领域             |
|---------------|--------------|---------------------|-------------------|-------------------|
| I a<br>具体操作思维 | 1. 惩罚与服从倾向   | 通过服从获得最大限<br>度的愉快   | 惩罚(物质奖赏的剥<br>夺)   | 自然和社会环境<br>(未分化的) |
|               | 2. 工具享乐主义    | 通过平等交换获得最<br>大限度的愉快 |                   |                   |
|               | 3. 好儿童倾向     | 使相互作用得到满足<br>的具体道德  | 羞耻(爱与社会承认<br>的收回) | 基本涉及者集团           |
|               | 4. 法律-秩序倾向   | 规范之惯常系统的具<br>体道德    |                   | 政治共同体成员           |
| I c<br>规范操作思维 | 5. 社会契约条文主义  | 公民自由和公共福利           | 内疚(良心的反映)         | 一般法律联合体           |
|               | 6. 伦理原则化了的倾向 | 道德自由                |                   | 一般私人个体            |

一般认为,上述得到经验支持的、关于道德判断表述的分类,满足了呈示道德意识发展诸阶段的理论要求。如果我们要承担起为这种分类提供证据的责任——柯尔伯格自己没有真正做到——就要自我保证能表明道德类型的描述性系列代表着一种发展-逻辑的关系〔在福莱维尔(Flavell)的意义上〕,我想通过道德意识与角色行为的一般性限定的相互联结,来达到提供分类证据这一目标。下面所述的三项步骤,都服务于这个目的:(1)我将通过这样一个系列来引入可能交往行为的结构,在其中,主体经由儿童成长并进入到符号化普遍性阶段;我还要将交往行为的基本结构与儿童必须获得以便能在社会环境的各种水平上活动的认知能力或资质相协调,即儿童先参加不完整的相互作用,继而参加完整的相互作用,最终参加到交往中来,参与交往要求从交往性行为到论辩的转变。(2)我试图(至少是暂时的)从发展-逻辑的角度审视有关角色行为的一般限定系列。(3)从各种相互作用性资质的阶段中推出道德意识的诸阶段。

首先必须论及交往行为的基本概念,它对于道德冲突的感知来讲,乃是必备的前提条件,包括:(1)具体的行为期望及相应的意向性行为;(2)彼此间相互联结的、一般化了的的行为期望,即由以调整行为的社会角色与规范;(3)能服务于证明或导出规范的原则;(4)与行为相联结的情境要素(例如行为后果)或与规范相联结的情境要素(例如作为应用条件或作为边际效果);(5)彼此就某事进行交往的行为者;(6)作为动机而对行为发生影响的行为指向。我将采用由米德(Mead)创始继而由帕森斯(Parsons)发展了的行为理论框架,不打算接受习惯角色理论<sup>⑧</sup>(在图表3中,我已从成长过程中的儿童的社会化角度,将这些组成部分一一列定)。

水平I。对于在认知方面仍处于前操作性思维阶段的学龄前儿童来说,他的与行为相切合的符号化普遍性部分,仅仅是由个体

图 表 3  
交往行为的一般结构  
角色行为的限定

| 认知性前提条件     | 相互作用水平   | 行为水平         | 行为动机       | 行为者   | 对规范的感知                | 对动机的感知                | 对行为者的感知                          |
|-------------|----------|--------------|------------|-------|-----------------------|-----------------------|----------------------------------|
| I. 前操作性思维   | 不完整的相互作用 | 具体行为和具体行为的结果 | 一般化了的愉快或痛苦 | 自然同一性 | 理解并遵循行为期望             | 表达并满足行为意向(希望)         | 可感知的具体的行为和行为者                    |
| II. 具体操作思维  | 完整的相互作用  | 角色规范系统       | 文化化了的需要    | 角色同一性 | 理解并遵循“应该”和反思性行为期望(规范) | “应该”和“想要”之间的区别(责任或偏好) | 行为与规范的区别; 个体主体与角色承担者的区别          |
| III. 规范操作思维 | 交往行为与论辩  | 原则           | 需要的竞争性转译   | 自我同一性 | 理解并运用反思性规范(原则)        | 自律与他律的区别              | 特殊规范与一般规范间的区别; 个性与一般性的区别; 自我间的区别 |

的、具体的行为期望与行为、由能作为奖励或惩罚而理解的行为结果所构成。

水平Ⅱ。一旦儿童学会进入社会角色，作为一个有能力的成员去参与相互作用，他的符号化普遍性部分就不再仅仅由表达具体意向的行为所组成了(例如，希望或希望的满足)，他已把行为作为现实性一般化了的行爲期望(或作为对它们的违犯)来理解。

水平Ⅲ。当青年已经学会提出社会角色的有效性以及行为规范一类的问题时，他的符号化普遍性部分再一次得到了扩展，开始出现这样的原则，根据该原则，对立方面的规范也能被判断。通过这种判断去处理假说性有效要求，或要求将强制性行为暂时悬置起来，或要求进入这样一种论辩：通过争论，实践问题可以得以澄清。

行为者及其需要在上述三种水平的递进中上升着，达到进入符号化普遍性。在水平Ⅰ，指导行为的指向在这样一个程度内被完成：它们可以在愉快、痛苦的侧度中一般化。只是在水平Ⅱ，需要的满足才是通过基本涉及者的符号化奉献，或是通过如下方式由扩大了集团中的社会性认可加以中介的：它解除了奖励的自身天秤的自我中心束缚。在这种方式中，行为动机要求某种文化化了的需要形式，而行为动机的满足则依赖于随之而来的、为社会认可了的期望。在水平Ⅲ，需要转译的半自然过程——这种过程届时将依赖某种非控制的文化传统及其在团体系统中的变化——可以自身提升为推论式意志形成物的对象。在自身提升中，除已经文化化了的需要以外，关于需要转译的批判与证明也获得了使行为定向的力量。

儿童由以成长并进入交往行为一般结构的诸阶段，已经被推进到这样一点，在这点上，开始出现相应于行为者(也就是相互作用的支撑主体)感知与自我感知的表征物。当儿童越过共生阶段

领域而成为可以从道德基点——首先是从惩罚与服从的角度——去感知的主体时，他就已经学会了把自己和自己的肉体与环境区分开，尽管他还没有作到把环境中的物理对象与社会对象直接区分开；他已经因此而获得“自然”同一性，并把这种同一性归因于自己肉体——作为维持主体边界的有机体——征服时间的能力。植物和动物已经是环境中的系统，它们不仅对我们来说拥有某种同一性（与观察者的同一），而且拥有与它们自身的同一，<sup>①</sup>就像运动中的肉体所作的那样。所以，在水平Ⅰ上，行为者还没有进入符号化世界，那里只有自然的代理人（那种可领会的意向就被归因于此），而没有这样一种主体：人们可以根据一般化了的行为期望，要求他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只是在水平Ⅱ上，同一性才从行为者的肉体外象中被剥落出来。就儿童先是被其家庭环境中若干基本角色的符号化一般性所同化，继而又被扩大了集团的行为规范所同化而言，他的自然同一性通过被某种符号化支持的角色同一性得到了改造，诸如性别、体质、年龄等等一类肉体特征，也被并入符号化定义之中。在水平Ⅱ上，行为者作为角色-依赖的涉及者出现，然后又作为无个性特征的角色承担者出现。只有在水平Ⅲ上，角色承担者才转变为这样一种个体：他能够宣称他的同一性独立于具体角色和特殊的规则系统。在这里，我们假定青年人在获得规范之间的区分的同时，也获得了由以衍生规范的原则，从而也就获得了根据原则进行判断的能力。他意识到传统的、平静如水的生活方式，可能被证明为仅仅是某种惯性，是某种无理性的东西。如此，他不得不把隐藏在所有特殊角色与规范之后的他自己的自我夺回，并通过下述抽象能力使其稳定化：在任何情境中，他都作为可以满足连贯性要求（甚至是在面对着不相容的角色期望的情况下，或者是在传统的生活时代的序列中）的一个人来呈示自身。角色同一性被自我同一性所取代了，行为者作为个体与他们生活

的客观关联域发生了交合。

到此为止，我们是把自己的注意力直接集中于符号化普遍性的组成成分上，这种组成成分在儿童成长的若干阶段获得了现实性。如果采用某种心理学的态度，把注意力转向行为主体必须获得、以便能在交往行为结构中自如运动的能力，我们就将碰到构成相互作用资质的角色行为的一般性限定。对交往行为一般结构的日益增长的掌握以及相关的行为主体独立于关联域的成长来说，存在着相应的、分为若干层次的相互作用资质，这种资质可以在三种侧度中被列定（正如图表 3 的右半部分所表明的）。假若从这些侧度中引发出来、并用某种规范性观点加以处理的决定物，能构成一种层次阶梯，以致能证实三种水平中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发展-逻辑连结关系的断言，我们就足以卸下提供证据这付担子了。

第一个侧度把握的是对于角色限定的认知性成分的感知，行为者必须能理解并遵从另一个人的个体行为期望（水平Ⅰ），必须能理解并服从（或违犯）反思性行为期望——角色和规范（水平Ⅱ），必须能理解并运用反思性规范（水平Ⅲ）。三种水平是根据反思程度加以区分的：第一种水平那种简单的行为期望在第二种水平上成为反思性的——期望本身可以被相互期望；第二种水平上的反思性行为期望，在第三种水平上再次成为反思的——规范本身可以被规范。

第二个侧度相关于一般角色限定的动机性成分的感知。首先，自然因果性还没有同自由因果性区分开——强调规则不论是在自然中，还是在社会中，都是作为具体希望的表达来理解（水平Ⅰ）；尔后，行为者必须能区分义务行为与单纯意愿行为（责任和偏好），即能区分规范的有效性和单纯意志表达的事实性（水平Ⅱ）；最后，他必须能区分他律与自律，也就是说，能理解仅仅属于传统的（或强制的）规范与通过原则证明为正当的规范之间的区别。三

种水平是根据抽象程度与变异程度加以区分的：指导行为间的指向变得越来越抽象——从具体需要到责任、再到独立自存的意志。与此同时，对于与行为规范相联系的所谓正确（或“公正”）的有效性要求，三种水平指向亦变得越来越不同。

第三个侧度则专注于对一般角色限定中这样一种成分的感知，该成分预先假设了其它两者，并同时拥有认知性与动机性两个方面。首先，行为与被感知的行为者乃是依赖于关联域的，是具体的——这里仅仅存在着特殊（水平Ⅰ）；在水平Ⅱ上，符号化结构必须被区分为一般与特殊两者——与规范相对的个体行为和与角色承担者相对的个体行为；在水平Ⅲ上，必须有可能从一般化能力的角度去检验特殊的规范，以使特殊规范与一般规范的区分成为可能。同时，行为者亦不再被理解为角色标志的结合物，而被认为是个体化了的主体。通过原则的使用，他们中的每一个都能构成一部清晰晓畅的个人传说。换言之，在这个阶段上，个性与“一般性自我”（*ich überhaupt*）必须被区分开。这里，三种水平的划分是根据一般化的不同程度进行的。

上述关于图表3所列内容的简短讨论，已经表明角色限定可以从（a）反思性、（b）抽象和变异，以及（c）一般化这三个规范角度被置于某个确定的层次阶梯中，它为下列推测，即为某种较深入的分析在皮亚杰理论的意义上进使发展-逻辑模式同一化，提供了初始基础。在目前情况下，我不得不使讨论依仗于这种推测。如果它是对的，那么，就这些阶段可以从角色资质的不同水平导出而言，同样的推测也适用于道德意识诸阶段。关于这种导出，这里同样只能给以粗略地说明。

我将从下列假定开始这个说明：“道德意识”意味着运用相互作用资质去自觉处理与道德相关的行为冲突的能力。行为冲突的交互式解决要求某种对舆论是公开的观点，借助于这种公开观点，

冲突中的利益的过渡性调整才能够建立起来。但是,有能力的执行者对于这样一种基础性观点的认同(该认同具有独立于社会原点、传统、基本姿态等等东西的、偶然的共同性)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有可能:这种对舆论是公开的观点恰恰是从可能相互作用的结构中生发出来的。行为主体间的交互性正是这样一种观点,在交往行为中,一种至少是不彻底的交互关系乃是通过被卷入各方之间的人际联系得以建立的。两个人在下列意义内是处于不彻底的交互关系中:其中一人可以作、或期望于X作,仅仅是在另一人可以作、或期望于Y作的程度上(例如:教师与学生;家长与孩子)。但如果双方在可比较的情况下能够作、并期望同样的事情,他们的关系就是彻底交互性的( $X = Y$ , 例如民法规范)。在一篇现今十分著名的论文中,A·古尔德纳(Gouldner)曾主张交互性规范构成全部相互作用的基础。<sup>⑧</sup>这种表达并不完全贴切,因为交互性并不是一个规范,而是被固定在可能相互作用的一般结构中的东西,这样;交互性观点严格说来,是属于言说和行为主体的相互作用知识了。

如果上面所述可以假定为正确,道德意识的诸阶段就能通过把交互性要求运用于成长中的儿童在每一个不同水平上感知的行为结构来导出(图表4)。

1.在水平Ⅰ,只有(作为奖励或制裁而被理解的)具体行为和行为结果可能与道德相关。如果这里要求不完全的交互性,我们就得到了柯尔伯格的阶段Ⅰ(惩罚-服从倾向)。完全的交互性产生于阶段2(工具享乐主义)。

2.在水平Ⅱ,与行为相关的部分被扩展了。如果我们要求对涉及者来说是被制约的具体期望的不完全的交互性,则得到了柯尔伯格的阶段3(好儿童倾向)。而对于规范系统的同样要求,则产生于阶段4(法律-秩序倾向)。

图 表 4

角色素质

道德意识诸阶段

| 年龄水平 | 交往水平    | 交互性要求               | 道德意识阶段 | 关于美好生活的观念              | 有效性领域    | 哲学重构    | 年龄水平 |
|------|---------|---------------------|--------|------------------------|----------|---------|------|
| I    | 行为和行为结果 | 一般化了了的愉快或痛苦         | 1      | 通过服从达到最大限度的愉快和对痛苦的避免   | 自然和社会环境  | 质朴的享乐主义 | I a  |
|      |         | 不彻底的交互性             | 2      | 通过平等交换达到最大限度的愉快和对痛苦的避免 |          |         |      |
| II   | 角色规范系统  | 文化化了了的愉快或痛苦需要(具体责任) | 3      | 初级集团的具体道德              | 初级涉及者集团  |         | I b  |
|      |         | 普遍化的愉快或痛苦(功利性)      | 4      | 次级集团的具体道德              |          |         |      |
| III  | 原则      | 普遍化的愉快或痛苦(功利性)      | 5      | 公民自由公共利益               | 所有的法律联合体 | 理性的自然律  | I c  |
|      |         | 普遍化的责任              | 6      | 道德自由                   |          |         |      |
|      |         | 普遍化的需要转译            | 7      | 道德和政治自由                |          |         |      |

3. 在水平Ⅱ, 原则变成了道德主题。由于逻辑的原因, 这里必须要求完全的交互性。在这一水平上, 道德意识阶段根据行为动机符号性结构化的程度, 发生了分化。如果与行为相关的需要被允许保留在符号化普遍性之外, 那么, 可接受的行为规范将具有谋取最大功利和一般法律规范的规则特征, 这种法律规范提供了在每一个人的利己主义式自由和其他人的同类自由共存相容的条件下, 去战略式地追逐私人利益的宏观范围。借助于这些, 第二阶段的自我中心主义就实际上升为原则。这与柯尔伯格的阶段5是相对应的(契约-条文主义倾向)。如果需要被理解为文化化转译了的东西却作为自然之物被归结于个体, 那么, 可接受的普遍行为规范就将具有一般道德规范的特征, 每一个个体都被认为要经过规范一般化之能力的独自式测试。它相应于柯尔伯格的阶段6(良心倾向)。只有在言语的普遍伦理(sprachethik)水平, 需要转译的自身——每个个体认为他应该理解并作为自己的“真实”利益而呈现的东西——才能变成实践论辩的对象。柯尔伯格并没有从阶段6中区分出这个阶段, 尽管这里存在着质的不同: 规范的证实原则不再是那种可独白式运用的一般化能力原则, 而是一种共同遵循的、采用推论方式兑现规范的有效性要求的程序。

我们从相互作用资质诸阶段导出道德意识诸阶段的努力, 获得了一个事先没有料到的结果, 那就是证明了柯尔伯格的阶段图式乃是不完全的。

#### 4

在自我同一性中, 表达了某种相互矛盾的关系: 作为一个一般的人, 自我与所有其他的人都一样; 但作为一个个体, 他却绝对不

同于其他所有个体。自我同一性在某种能力中证明了自身，这种能力使成年人在冲突环境中构建了新的同一性，并使新的同一性与过去的、被取代的同一性相和谐，从而把他自己和他的相互作用——在一般性原则和程序模式的指导下——纳入统一的生活历史。到此为止，我只是展开了自我同一性概念中认知性的一面，而非动力性的一面。我已经选择了这样一个角度，通过这一角度，我们可以观察儿童的自我如何在各个阶段上获得交往行为的一般结构；如何通过这些结构，获得相互作用资质、稳定性和行为自律。然而，这个角度摒除了过程形成的心理动力学，忽略了自我发展混杂于其中的本能性过程。在超自我形成的动力学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力比多能量以某种对自身自我陶醉的依恋形式，在自我理念的发展中所充当的工具性角色；还可以看到侵犯性能量在良心权威的建立中所假设的、正好与自身相对立的功能。<sup>⑩</sup>最重要的是，两个主要的成熟转折点——恋母情结阶段和青春期阶段（在这一阶段，性角色开始被习得，文化传统的动机形成力量也受到了检验）——表明，只有在自我的需要被允许纳入符号化普遍性、并得到适当转译的情况下，自我才能进入并穿透相互作用结构以外的领域，在这方面，自我发展作为某种非常危险的过程显示着自身。没有必要去诉诸病理学的发展以证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举出存在于规范范围内的一个不甚惹人注目的标示物，那就是道德判断与道德行为间经常出现的差异。

各相互作用的资质水平和道德意识诸阶段之间的相互关系（见图表4），意味着拥有某个特定阶段相互作用资质的人，如果他的动机结构并没有妨碍他在行为冲突的交感性调整中对日常行为结构的维护（甚至是在压力下的维护），那么他将会发展同样阶段的道德意识。然而，在许多场合，那种足以应付正常情形的角色行为的一般限定，却不能在公开冲突的重压下保持稳固。结果，不能

保持稳定的部分就将在他的道德行为、甚至是同时在道德行为与道德判断两方面引起倒退,降至他的相互作用资质的临界点以下,从而发生了正常的角色行为阶段与他通过道德冲突由以进行工作的阶段之间的转换。由于这种转换把行为主体置于有意识调整冲突的强制性规则之下,道德意识就成为一般相互作用资质稳定程度的指征。

有意识的冲突解决方式与道德之间的联结,在某些极端场合变得越益清晰。这些场合不承认明确的道德解决办法,又使对规则的违犯(过失行为)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一个处于这样的情境中,却又以道德为根基的行为被称为“悲剧性的”,悲剧概念包括对惩罚或内疚的意向性假设,即包括在面临着无法解决的道德困境时,对那种意识的道德公设的满足。这种情况给一般性道德行为的意义投入了一束阳光,我们把那些保持着相互作用资质的人称作道德完美的人,这些人甚至在处于压力下的(大规模自由冲突的)典型情境中,或在与道德相关的行为冲突中,仍然能执着于相互作用资质,用以代替对冲突的无意识的抵御。

正如自我心理学所表明的,自我为下列情形设计了某些机制:在这些情形中,自我似乎在有意识地回避冲突,这些避免冲突的精巧的策略,能对那种类于溃退的危险作出反应,由于自我仿佛把自身藏于策略之后,危险被摒除于意识之外。外在现实与本能冲动并非危险的唯一源泉,超我的制裁也呈示着某种威胁,如果我们在道德冲突中的行为不同于我们根据清晰的判断后作出的自信的行为,这将引起我们的忧虑。在抵御这些忧虑(它指征着早期忧虑的重现)时,我们同时将自己的判断能力与行为意志之间的差异隐藏了起来。然而,自从A·弗洛伊德(Freud)率先在系统化方面作出短暂的努力以来,防卫机制理论并没有获得引人注目的改进。<sup>②①</sup>饶有趣味的是,近来完成的若干项研究认为,某种对由道德

命令侵越而导致的发展-逻辑的调整(如对惩罚的恐惧,羞耻,或良心的疑虑),有可能对防卫机制进行理想的分类。<sup>②</sup>特定同一性的形成促进了这类调整的产生。因为它使道德洞见——这些洞见比那些可以在其限度内被激发起来的行为动机更高深——的获致变成了可能。

当然,自我同一性的双重性质,不但反映出自我发展中认知-动力的二元性,而且反映出伸延到同一性形成内部的社会与自然的相互依赖性。一个非强迫性的自我同一性模型比那种从道德角度排外式发展起来的自律模型更丰富,更雄心勃勃,这一点可以在我们给出的道德意识发展阶段的最末层次那里看到。从第6阶段到第7阶段(用哲学语言来说,就是从责任的形式伦理学到言语的普遍伦理学)过渡的意义可以在下列事实中发现:需要转译不再被假定为给定的,而是被划入意志的推论形成物,内在自然也因此而步入某种乌托邦视野,即在这个阶段上,内在自然可能不再屈身于由文化传统通过某种准自然方式所固定的转译框架之内来接受检验,不再根据某种独白式运用的一般化原则来测定,然后再被分裂为合法与不合法,责任与偏好。在下列程度内,内在自然表现为交往性流质的和半透明的:需要可以通过表述的美学形式保持自身的清晰性(sprachfähig),或者从表达的原始符号化的前语言性中被免除。但是这意味着内在自然对于自我独立自存的需要来讲,在任何被给定时代预先形成的文化中,都不是主体性的,它通过某种依赖性自我,获得了达到文化传统转译可能性的自由通道。在参入了美学经验的价值-形成和规范-形成这些交往的媒介之后,传统文化内容不再是一块简单的模板,也不再由这块模板将需要塑造成型。恰恰相反,在这些交往媒介中,需要可以寻求并发现适当的转译。当然,这种交往之流要求感受性、依赖性,要求对障碍的排除,一句话,要求某种作为依赖领域而被标明的认知类型。自

我在通向自律的征途中，将首先克服这种认知类型，并用感知和思维的独立领域类型取而代之。那种阻遏了自我进入其内在自然的交往之途的自律，仍然表征着不自由。自我同一性则意味着另外一种自由，它在调和——如果不是使其同一——价值和幸福的意向中限制着自身。

### 第三章

## 历史唯物主义与 规范结构的发展

本文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重建》  
一书的导言，文中评述该书或与  
该书有关的部分已省略。

#### 1

近年来，我努力去发展我将其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重建的理论方案。复原这个词意味着回到那已被讹用的初始含义，但我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兴趣并非教义式的，也不是历史-哲学式的；复兴意味着一段时间内已被埋葬的某种传统的再生，而马克思主义并不需要这种再生；在现在这个场合，重建意味着把一个理论分

解开,然后在某种新形式中,再将其整合在一起,以便更充分地实现它为自己确立的目标,这对于处理那些在许多方面需要修正、但其潜在的鼓舞力尚未枯竭的理论来说,乃是一种标准的方式(在我看来,这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同样是标准的)。

(在同一时期内),并非出于偶然,我一直在从事交往行为理论的研究。虽然交往理论意欲解决的问题是哲学性的,并关涉社会科学的基础,但我仍然认为它与那些和社会进化理论相联系的问题密切相关。这个断言似乎显得有些离题,因此,我打算从对下列情境的回顾开始谈起:

1.在可以上溯到马克思的理论传统中只要存在着抑制哲学问题以利于对科学的科学式理解的倾向,理论沦为坏哲学的危险就总是特别地大。甚至对马克思本人来讲历史哲学的遗产有时也非反省式地发挥着作用。<sup>①</sup>这种历史客观主义首先是在第二国际的进化理论中产生了影响。<sup>②</sup>如:考茨基和“达美特”(diamat)的理论。这样一来,如果我们今天再次拾起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进化的基本假定,就必须格外地小心谨慎。这种努力不能由借自物理学模型演变而来的方法论中的一系列禁令所组成,这些禁令阻遏着通向发展的社会科学理论的道路(由于弗洛伊德、米德、皮亚杰、还有乔姆斯基等人的倡导,发展的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已取得某些进展)。<sup>③</sup>但是,谨慎小心在两种选择上是必要的,那就是决定着交往行为对象领域的基本概念的选择,以及在此基础上历史唯物主义能够相信自身由以确立的知识类型的选择。

2.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规范基础方面,从最初起就缺乏某种明晰性。这个理论并没有打算使古典自然规律的本体论要求获得再生,也没有想为理论科学的描述性要求作辩护。它在可以避免暗含的评估理论的自然主义谬见的限度内,被认为是“批判的”社会理论。马克思相信自己运用巧妙的手法,即通过对黑格尔逻辑

的唯物主义改造，已经解决了社会理论的规范基础问题。<sup>④</sup>当然，他并没有使自己特别专注于这项任务。鉴于他的实践性研究目的，他可以满足于运用这种研究语言去内在地批判在自然律和政治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理论的规范性内容。这种规范性内容已经被并入到当代革命的资产阶级的组织结构之中，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意识已经变成玩世不恭的东西。正像社会科学——特别是法学实证主义、新古典派经济学以及最近的政治理论——所表明的，资产阶级理论在约束性规范内容方面，已经彻底地空空如也了。然而，如果（正如衰退时期变得更明显的）资产阶级理念确已形将就木。这里就没有那种内在的批判怀着一致的期望可能由以诉诸的规范与价值了。另一方面，伦理社会主义悦耳动听的音调也已经在没有任何结果的情况下销声匿迹。<sup>⑤</sup>今天，只有在我们能够重建交往的一般前提条件和重建用于证明规范与价值的程序的情况下，一个没有被限制于元伦理学陈述的哲学伦理学才是可能的。<sup>⑥</sup>

在实际论辩中，我们乃是把由言语的有效性基础支撑着言语行为的有效性要求的某一项加以主题化。在以达到理解为指向的行为中，有效性要求“总是并已经”暗含地被提出（即符号化表达的可领会性、陈述内容的真实性、意向表达的真诚信、言语行为相对于现存规范价值而言的正确性）、并在可能交往的一般结构中得以建立。通过有效性要求，交往理论能够确定某种温和、顽固，虽然很少诉诸根据但从未沉默过的要求。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存在着交感性行为，这个要求都必须在事实上被认可。<sup>⑦</sup>如果这是唯心主义，那么唯心主义就将在一种最自然的方式中，属于种的再生产的前提条件。这个种必须通过劳动和相互作用保持它的生活，即借助于真实性的陈述和需要加以证明的规范。<sup>⑧</sup>

3. 不仅交往行为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间有着某些关联，在检验进化理论的个体性假定时，我们也遇到了那类使对交往

理论的反思成为必要的问题。

鉴于马克思把学习过程对进化的重要性局限于客观思维这个侧度——也就是技术和组织知识的侧度，工具行为和战略行为的侧度，一句话，生产力的侧度——中，这就同时有理由假设：学习过程同样发生于道德洞见、实践知识、交往行为以及对行为冲突的交感性调整这类侧度内。这些学习过程乃是在社会一体化的更为成熟的形式中、在新的生产关系中被沉淀化的，这种沉淀化使新的生产力的引发成为可能。从理论角度看来，在世界观、道德表现和同一性形成中被表达的理性结构，在社会运动中变得卓有成效、并被最终嵌入组织系统的理性结构，并因此而获得了某种战略上十分重要的位置。关于规范结构之发展的系统的可重建的模型，在目前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些结构模型描述了内在于文化传统和组织变化的某种发展逻辑，该逻辑并没有涉及发展的机制，仅仅指出了变异的范围。在变异中，文化价值、道德表现、规范、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在某种给定的社会组织水平上，可以产生变化并发现不同的历史表达。在变异的发展动力学方面，规范结构的变化一直有赖于未解决的、以经济为条件的系统问题所提出的进化挑战，以及响应这些挑战的学习过程。换言之，文化一直是一种上层建筑现象，尽管它在向新的发展水平的过渡中，似乎发挥着比迄今为止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所承认的更为突出的作用。据我看来，这种突出性已解释了交往理论可能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更新作出贡献。在以下的讨论中，我将扼要说明这种贡献可能由哪些东西所构成。

## 2

通过语言建立的主观际性结构——该结构能在与基本言语行

为的关联中,接受标准化检验——乃是社会系统与个体系统的条件。社会系统可以视作交往行为网,个体系统则可在言语与行为能力这个大方位下进行考察。如果人们去检验社会组织和社会化个体行为资质的一般特征,就将碰到意识的同样结构。这一点,可以在与下列调整和定向的联系中被显示出来:这些调整和定向专门关注于维护在行为冲突的场合——法律与道德——受到危害的、理解的主观际性。当习惯了的日常规则的体验背景被破坏时,对行为冲突的交感性调整(该调整通过力量的自我克制来实现)就将为交往行为的继续提供其它手段。在这个限度内,法律和道德标示着相互作用的核心领域,人们在此能看到意识结构的同一性,道德意识一方面被嵌入法律与道德的组织之中,另一方面又在道德判断与个体行为那里得到表达。认知发展心理学已经表明,在个体成长过程中,道德意识要经历不同的阶段,这些阶段尤其可以作为问题解决的前习惯模型和后习惯模型加以描述。<sup>⑨</sup>同样的模型在道德与法律呈示物的社会进化中,将再次出现。个体发生学模式当然比它们的社会-进化副本更能得到较深入的分析 and 确证。如果我们考虑到通过语言建立起来的、理解的主观际性标示着种的历史中的一件新事物,这种主观际性使社会文化的学习水平成为可能,那么,在种的历史中存在着某些相似的意识结构就不应令人感到惊奇。在社会文化的学习水平上,社会再生产与其成员的社会化乃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它们互相依存于同一结构之中。

在个体历史与种的历史中,意识的相似结构并非局限于法与道德的领域。在此所提出的带有尝试性特征的理论研讨方案也要求对这样两个领域中的理性结构进行研究:自我发展与世界观进化的领域,自我同一性与集团同一性的领域,<sup>⑩</sup>它们迄今为止很少被问津(不管是概念式的,还是经验式的)。

自我发展的概念,个体发生,可以根据认知、言语和行为三种

能力加以分析。发展的三个方面(认知性的、语言性的和相互作用性的),可以从统一的自我发展的观念中导出——自我乃是在一个被区分的系统中形成的。内在自然的主体性,是在与可感知的外在自然的客观性的联系中、在与社会规范性的联系中以及在与语言的主观际性的联系中,将自身区分出来的。在完成自身区分时,自我不仅作为主体,而且作为“总是并已经”在认知、言语和相互作用诸方面同时超越了主体界限的某物认识到自身,自我能够在区别纯主体和非主体的过程中精确地与自身相同一。从黑格尔、弗洛伊德到皮亚杰,这样一种观念——主体和客体乃是相互构成的,主体只有在与客体世界相联系、并经由客体世界的构建才能把握住自身——已经得到了发展。与纯主体相应的非主体,在皮亚杰理论的意义上,是某种“客体”,是某种认知性客体化的、可操纵的现实。同时,它又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客体”,一个由交往过程展示出来、又通过同一化促成的相互作用领域。进入皮亚杰的“客体”领域环境不同于进入弗洛伊德的“客体”领域环境:前者是外在自然,后者是社会。两个现实领域通过相互折射,彼此都得到了补充(例如,自然作为“友好的”,在与社会的类比意义上被关照;或者社会作为某种策略游戏、作为某个系统或类似系统的东西,在与自然的类比意义上被关照)。语言则作为一个直达自身的存在地带,把自己从客体领域中抽离了出来。

精神分析学和认知发展心理学已经为某种假说搜集了证据,该假说认为:自我发展要经历若干个不同阶段。我尝试着对此作如下划分:(1)共生阶段;(2)自我中心阶段;(3)社会中心-客体化阶段;(4)普遍化阶段。<sup>①</sup>

1.在生命的第一年中,没有发现任何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作出主观区分的清晰的标示物。显然,在这个阶段,婴儿不能把自己的肉体物质作为身体,作为有边界的维持系统来感知。存在于婴

儿、涉及人和物理环境中的共生现象,乃是如此之密不可分,以至我们无法在直接的含义上去有意义地谈论主体性的界定。

2. 在生命进程的第二个环节(该环节相应于皮亚杰的感知-运动发展的前操作性阶段),儿童才成功地在自我与环境之间作出了区分。他学会去感知环境中的持久性客体,但还没有清楚地把环境区分为物理领域和社会领域。进一步说,那种与环境相连的对自我的界定,也并非是完全客观的。这一点可以在认知和道德的自我中心主义的表现中看到。儿童不能感知、理解,不能判断独立于自身立足点的那些情境,只能从被身体限定了的角度去思维和行动。

3. 伴随着具体操作阶段的开始,儿童进入了构造分界体系的决定性阶段。他在可感知的和可操纵的事物与事件之间作出了区分,同时又在可理解的行为主体和他们的话语之间作出了区分,语言信号也不再与符号的参照物和意义相混淆。在逐渐意识自身立足点的可透视特征的过程中,他们学会了区分与外在自然和社会相联系的主体性。大约在7岁左右,伪-伸展期(pseudo-lying)结束了,它标志着幻想与知觉、冲动与义务之间的区分已经完成。紧接着,认知发展已经导致外在自然的客观化,语言-交往的发展导致对言语行为系统的把握,而相互作用的发展则导致一般化的行为期望的补充性联结。

4. 只有当青春期到来时,青年才能成功地将自身从前面各发展阶段的教义式垄断中进一步解放出来。借助于假说性思维和进行论辩的能力,自我-区分系统具有了反思性。直到这时,囿限于具体操作的认识自我,才开始面对客体化的自然;沉浸于集团观念的实践性自我,才在规范的半自然系统中得到分解。但是,当青年不再天真地接受在断言与规范中包含的有效性要求时,他将超越给定自然的客观性,运用假说,从偶然的边界条件出发去解释这个给定。他还能冲破社会中心主义的传统规约,运用原则,把现存规

范仅仅作为习惯力量来理解,甚至对之加以评判。在给定和现存这类教条主义已被摧毁的意义上,前科学性构建的客观领域可以通过与自我-区分系统的联系而被相对化。这样,理论就能追溯到研究主体的认知技能,规范系统则可以追溯到共同生存的主体的意志形成过程。

如果我们现在去寻找自我发展与世界观进化的相似性,就必须小心,不要草率地把二者看成是平行的。因为:

(1) 结构与内容的混淆很容易导致谬误——个体意识和文化传统在其内容上可以一致,但没有表现出相同的意识结构。

(2) 并非所有个体都同样代表着他们所处社会的发展阶段。这样,在现代社会中,法律就拥有某种普遍性结构,虽然很多成员并没有处于根据原则去进行判断的位置。反言之,在古代社会里,确有这样一些个体,他们已经掌握了标准的思维操作规则,虽然那种集体共有的神话世界观乃与较低水平的认知发展相适应。

(3) 发展的个体发生学模型不能映射出种的历史结构,因为意识的集体结构仅仅对成年成员才是适用的。个体发生学意义上的早期阶段的不完全相互作用,甚至在最古老的社会中,也没有与之相应的对应物。因为,(在家庭组织中)社会关系从一开始就不得不具有补充性联结的、一般性行为期望的形式(也就是完全的相互作用的形式)。

(4) 相同的意识结构由以体现的参照点,在个体历史和种的历史中,乃是各不相同的。个体系统的保持较之社会系统的保持,有着大相径庭的规则。

(5) 自我发展与世界观发展的结构比较,还有一个特别的附带条件。世界观统一力量的矛头所向,不仅相逆于认知的不和谐,而且相逆于社会的瓦解。正因为如此,在转译系统中,贮存和协调化的知识累积的一致性结构,就不但与认识性自我的统一相联系,

而且与实践性自我的统一相联系。法律和道德呈示物是依次从直接服务于使自我与集团同一性稳固化的概念和结构中区分出来的——例如,初始力量、上帝、灵魂表象的概念、命运的概念,如此等等。这个复杂的建构不允许在自我发展和世界观发展之间进行某种总括性比较。我们不得不将那些特殊的、抽象的、用于比较的参照点突出出来。这样一来,就可能有一个与自我发展相呼应的世界观的分化过程。对于较狭窄意义上的认知发展来说,我们则可以在集体转译系统里的基本概念和逻辑联结中,去寻找那些同态现象。

尽管有上述这些限定,还是可以发现一定的相似性,至少对于认知发展来说是如此。在个体发生学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基本概念和逻辑结构,它们和世界观进化中可观察到的东西很相似。<sup>⑫</sup>如:(1)对时间水平和可通过物理手段测量并可亲身加以体验的时间间距的区分;(2)因果概念的连接(它首先只能总括性地被把握),这种因果概念之成为特定,一方面是就事物与事件的因果联结而言,另一方面是就行为与动机联结而言,尔后,因果概念又作为自然规律和行为规范的假说性概念的基础而被运用;(3)把实体概念(它首先指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物质)区分为可操纵的客体和可以作为在相互作用中与己相对的成员而相遇的社会客体〔如R·道勃特(Döbert)曾试图从对基础的行为理论概念的逐层解释角度出发,去重建从原始神话到现代宗教的宗教发展,而这种现代宗教已经缩变为某种关于交往的世俗伦理〕。<sup>⑬</sup>相似的观察也可以在逻辑结构的处理中作出:(1)神话学允许借助于典型传说的那种叙述式解析;(2)宇宙论世界观、哲学和高级宗教则已允许从第一原则出发进行演绎式解析(原初的神话行为已经转化为立论的“开始”,抛开这一点,论证就无法继续);(3)现代科学借助于可修正的理论和根据经验进行调整的建构活动,允许理论解析与实践验证。当这些不同的解释(和证明)类型被予以形式化分析后,我们将发现某

些与个体发生学之间的发展-逻辑的关联。然而,我们更感兴趣的并不是世界观与(较狭窄意义上的)认知发展的结构性类比,而是世界观与自我划分系统的结构性类比。

很明显,旧石器时代所呈现的那种充满魔幻色彩的、动物性的世界,既极为特殊,又不甚连贯。神话学排列有序的呈示物首先使一种复杂类比的建构成为可能,在这种复杂类比中,所有自然与社会现象都被交织在一起,并能够相互转化。在儿童的自我中心世界概念(它处于思维的前操作水平)中,交织现象是和儿童的自我中心相联系而被构造的。与此相类似,在社会形态的世界观中,交织现象则是和部落集团中心相联系而被构造的。这并非意味着集团成员已经形成了和客体自然不同的、社会规范现实性的明确意识,因为客体自然与社会规范还没有被清楚地区分为两个不同领域。只有伴随着向以国家为中心的、组织化社会的过渡,神话世界观才能获得统治结构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已经预先假设着道德化了的法的习惯阶段)。这样,那种对神话的质朴的态度,在过渡时代,一定已经发生了变化。在某种分化更强烈的时间水平中,神话远离着这样一种传统:该传统出自社会的规范现实性和某种局部客体化了的自然。伴随着对部落社会形态的坚持,这些发展了的神话在外部表现的多样性中,建立起一种统一。就统一的规范方面而言,这个统一类似于儿童在具体操作阶段所具有的社会中心-客体化的世界概念。

古代文明向发展了的文明进一步过渡,以神话思维的被打破为标志,出现了一些宇宙论世界观、哲学和较高级的宗教,它们用论辩性原则取代了神话的叙述性解释。那些回到伟大创始者的传统乃是某种可明确教授的知识。这种知识能被教义化,即能被职业性合理化,在它清晰晓畅的形式中,理性化了的世界观乃是规范-操作思维和由原则指导的道德意识的表达。那种当作宇宙性的

或一神教的东西而被设想的世界的总体性，通常相应于青年在普遍主义阶段能够建立的统一。当然，这种世界观的普遍结构不得与倾向于政治秩序的传统态度相吻合。这种政治秩序在古代帝国中占据着统治地位。这种吻合是可能的，因为所有论辩所依据的最高原则已经把自身从论辩中解脱了出来，并排除了异议存在的可能。在本体论的思维传统中，这种终局通过绝对概念(或完全的自我充实概念)得到了保证。

在建立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国家中的交往的普遍形式的过程中，那种朝向犹太基督教和古希腊本体论遗产的态度又在某种主体性倾向中得到了折射(宗教改革和现代哲学)，最高原则失去了它不容质疑的特性，宗教信仰和理论态度都成了反思性的。现代科学的进步和道德-实践意志形成物的发展，因不再根据某种规则——这种规则虽有根基，却纯属专断——而受到歧视。破天荒的第一次，那种已经在理性化世界观中获得的普遍性潜能能够被释放出来，世界的统一再也不是根据哲学实在化的统一原则(上帝，存在或自然)来对象式地促成。从此后，世界的统一将只是反思性的，并通过理智的统一(或通过理性的世界组织，即理智的现实化)而被断言。这样，理论理智与实践理智的统一，对于当代世界的译解(这种译解已经失去了其作为世界观的特征)来说，就成了问题的关键。

上面这些简略的讨论，只是想指出自我结构与世界观结构具有相似性这种推测所包含的启发性成果。在这两种侧度中，发展显然都导致译解系统某种日益增长的非中心化(decentration)，<sup>④</sup>并且导致与外在自然的客体性、规范的社会现实性以及语言现实的主观际性不同的、关于内在自然之主体性的、较过去更为清晰的范畴界定。

## 3

在自我同一性结构和集团同一性结构之间，也有某些相似之处。认识性自我（作为一般的自我）乃是由这样一些认知、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一般结构所表征：这些结构为每一个个体自我与所有其它自我所共有。然而，实践性自我却是作为施行自我行为的个体而形成和保持着自身。实践性自我在一般性自我的认识结构内部促成个体的同一性，它通过反复地实现自我-验明来维持生命历史的延续和个体系统的符号边界。实践性自我是用正确地、有意识地把自已设置在社会生活世界的主观际联系中的方式，来作到上述一切的。确实，个体的同一性在相当程度上是个体把自身的成就同一化的结果。<sup>⑮</sup>

在我们对事物和事件（以及由此衍生的对个体及其话语）的陈述性态度中，即在构造或理解一个有关事物和事件的陈述中，我们从事着某种验明。为了这个目的，我们使用名称、特征描写、论证性断言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直证式（deictic）表述或恣态含有若干验明性特征，验明性特征对于在给定的关联域里、从一类相似的对象中挑选出某个特殊的——确实是预料之中的——对象来说，乃是足够的（例如，从所有其它石头中区分出我想对之断言什么的这块石头）。时空位置是最抽象的特征，适用于任何物体的鉴定。人也可以在一种陈述性态度中被验明，如通过与某些肉体特征的联系，像身高、头发、眼睛的颜色、表面的伤疤、指纹等等，<sup>⑯</sup>但在复杂的场合，这些犯罪学上的特征是不充分的。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只能要求被涉及的人去澄清自己的身分。只要被验明的人否认陈述式归之于他的同一性，我们就无法确定他是否只是简单地拒绝承

认身分,或是他没有处于证明其身分的位置(他是否具有分裂的人格),或者他完全不是我们根据外在特征怀疑他是的那个人。对于一个人的躯体同一性来说,可能有铁一般无可撼动的证据。但想获得关于某人之同一性的确定性,我们必须放弃自己的陈述式态度,而要在某种施行性态度中去询问被涉及者的身分,要求他去自我验明。在某些存有疑虑的场合,我们就是根据被涉及者由以自身验证的特征去鉴别被涉及者的。

没有人能够独立于他人的鉴定而构造一种同一性。<sup>⑥</sup>这些来自他人的鉴定自然不是出自观察者的陈述式态度,而是出自相互作用中的参与者的施行性态度。确实,自我并没有在陈述式态度中完成它的自身-验明,而是作为施行性交往行为的实践的自我把自身呈示给自己。在交往行为中,参与者必须相互假设,自己与他人的区分乃是被他人所认可的。这样,对人们自身的同一性作出断言的基础,就不是真正的自身-验明,而是主观际认可的自身-验明。

像“我”和“你”这样的表达,作为第三者的人际代词不具有被陈述式加以运用的概指性表达的关联意义,毋宁说人际代词是从语言施行的以言行事作用中借得这种关联意义的,它们起初是在相互自身呈示的主观际认可的基础上,具有个人自身呈示的意义。“我们”和“你们”这样的表达与复数第三者人际代词间的关系,与“我”和“你”与单数第三者人际代词间的关系是一样的。但是,这里有一个颇有趣味的不对称现象:表达“我们”并非仅仅用于面对面的集体言语行为场合,在这种场合,存在着被假定承担交往中“你们”这种角色的接受人。在交互性条件下,“我们”反过来亦可成为“他们”的“你们”。在个体言语行为中,“我们”也可以在这种情况下被运用:这就是一个相应语句所预先假设的并不是与另一个集团的互补关系,而是与自己集团中另外一些个体的互补关系。

1. 我们参加了游行示威(而你们却坐在家里)。

2. 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

句子1是说给另一个集团的, 句子2则是说给自己集团中的其它成员的。像2这种类型的语句, 不仅具有通常的自身-关联意义, 而且还有自身-验明意义——我们是X(X可代表德国人、汉堡的公民、女人、红色头领、工人、黑人, 等等)。表达“我”也可以用于自身-验明的目的。但是, “我”的自身-验明要求其他“我”的主观际认可, 这些其他的“我”必须反过来被假设着“你”的角色。而一个集团的自身-验明并不依赖于另一个集团的主观际认可, 作为“我们”使自身同一的“我”可以通过另外一个运用同样的“我们”使自身同一的“我”加以证实, 集团成员间的交互性认可要求着我-你-我们类型的关系。

对于集团同一性的构造来说, 这里已经有了结果。我想为关联性集团保留集体同一性这种表达, 这种集团对于它的成员的同一性来说, 乃是基本的。集体同一性通过一定方式被“归结”为个体, 同时又不能由他们自由选择。集体同一性还拥有某种连续性, 这种连续性超出了其成员个体生命历史的范围。对于这样一种集体同一性的构造来说, 我-你-我们的关系是足够的, 而我们-你们关系则并非一个必要的条件(因为我-你关系乃是服务于个体同一性的构造, 即一个集团可以作为总体性集团来专断地理解并定义自身, 以至于使他们生活在这样一种观念中, 似乎他们包含了全部相互作用的可能参与者, 而所有那些不属于此列的人则变成了中性的, 可以把他们作为第三者来陈述, 但不能在直接意义上与他们发生人际关系的交往, 就像不能与生活在古代文明边缘之外的野蛮人进行交往一样。这里, 我不能进一步去讨论人际代词运用的逻辑——该逻辑对于同一性概念来说, 乃是关键之所在<sup>⑧</sup>——只想简略地回顾一下同一性形成的个体发生诸阶段, 以便精确判定自我

同一性作为支撑一个人自身同一性之能力而被理解的含义。

我把那种陈述式归结于事物与事件的同一性和人们对自身要求的、并在交往行为中予以坚持的同一性区分开来,而没有提及维持自身边界这类有机体的同一性,这种有机体之拥有某种同一性,不仅是对作为观察的“我们”而言,而且是“对他们自己”而言。但是,这种对他们自己而言的同一性却不能在通过语言建立起来的主观际性的媒介中予以呈示或促成〔H·普列斯内尔(Plessner)在其重要著作《有机体的发展序列》(1928)中,运用深受费希特反思哲学影响的概念手段,曾试图区分不同的“位置性”并澄清有关活的存在之自然同一性概念。〕早期童年时代的“自然同一性”可能也建立在维持自身边界的特征基础上,儿童逐渐学会把自己的身体从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区分了出来。通过主观际认可的自身-验明(C·H·米德曾对此作过分析)而构建的个人的统一,却是以下列两点为基础:一方面它隶属于、又将自己区别于某个集团的符号化现实,另一方面它又隶属于把自己定位于集团之中的可能性。个体的统一乃是通过起初依附于具体参照人,尔后又从具体参照人那里抽出的角色内在化而形成的——这里首先是指决定着家庭结构的辈份与性别角色。这种以性别和年龄为中心、并被并入儿童自己肉体映象的角色同一性,变得越来越抽象,同时又越来越个体化,直到这样一种程度:年轻人把超出家庭范围的角色系统挪至并归入政治规则中,政治规则乃是由复杂的传统加以转译和证实的。

角色同一性保证自身连续性的特征以主观际要求和行为期望的时间稳定性为基础,如果道德意识的发展导致超出这个习惯阶段,角色同一性就将被粉碎,因为届时自我将把所有特殊角色甩在身后。一个被期望去判断——根据内在化了的原则——任何给定规范、也就是去假说式地思考给定规范并提供理由的自我,将不再把自身的同一性和特定的、预先给定的角色及规范系统系在一

起。<sup>⑩</sup>现在,连续性可以只通过自我自身的综合成就来建立。

当成长中的儿童丢弃自己早期的、主要维系于家庭角色的同一性,以便最终获得对政治共同体的组织和传统而言的、越益抽象的同一性的时候,上述能力经历了典型的实践。在自我用如下办法去解决同一性危机的程度内,角色同一性被自我同一性所取代。这种方法是指:自我使获得的能力一般化,以便克服旧的同一性构造新的同一性,并学会通过在较高水平上重建自身与变化了的社会现实之间被打乱了平衡来实现这一点。这样,自我可在与他人的联系中维持自我同一性,在所有相关的角色游戏中表达那种既与他人相似、又绝然不同于他人的、自相矛盾的关系,并且作为这样一个人——他将自身的相互作用编入生活历史的某种无可争议的复合情结之中——呈示着自身。<sup>⑪</sup>

在现代社会里,上述自我同一性可以由个人天职角色(vocational roles)所支持。根据韦伯的理解,这种天职角色对于设计统一的生活历史行程乃是最有意义的推进器。今天,这种推进器的作用似乎正在日渐消失,女权主义就是一个解放运动的例子,它在自我实现的口号下正在寻求对下列难题的范例式解决:如何在把那些、特别是对妇女而言是悬而未决的东西归结到使生活历史的核心具体化的天职角色的条件下,使自我同一性稳定化。

在寻找同一性发展模型与集体同一性之历史连接的相似时,我们必须再次避免草率地在二者间划出平行线。除前文曾经提及的诸限制条件在这里仍然适用外,我增加下列三个内容:

1. 集团或社会的集体同一性保证着连续性与可认可性,鉴于此,集团或社会的集体同一性随着该社会由以使维持自身的要求确定化的现实概念发生着变化。个人的生命历史也是在不同的认知发展水平上表示出来的,但它至少被生与死加以客观的限定。对于一个社会的历史存在及其延伸久远的年代和经常出现的新纪元

来讲,则没有那种可比较的客观的切断点。

2. 进一步看,集团同一性决定着一个社会如何把自己同自身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区分开。在这个方面,也缺乏(与个体生活的)清晰的类比。个人的生活世界乃是被所有可能经验与行为(这些经验和行为能在个人与社会环境的交流中被归因于个体)的水平线所界定的。与此不同,一个社会的符号化边界却首先是作为这样一类行为(这类行为乃是该社会的成员内在相互归结为自身的东西)的水平线而被界定。

3. 更重要的是——集团同一性调整着社会中的所有个体成员(并且能作出排斥)。在这方面,自我与集团同一性间有着某种互补的关系,因为个人的统一乃是通过与同一集团中他人的关系形成的。正像我在前面所谈,同一性的发展乃被这样一个事实所表征:具体的、不甚复杂的集团(家庭)的早期同一将逐渐弱化,并服从于与包容量更大的、更抽象的单位(城市、国家)的同一。这种情形说明我们可以从自我发展的个体发生学诸阶段推断出部落集团、国家以及最后全球形式交往的互补性社会结构。在其它场合,我曾对这种推断作过尝试。<sup>④</sup>但现在我发现,我低估了集体同一性与世界观和规范系统连接的复杂性。效仿帕森斯的作法,我们可以区分开在文化价值、价值中制度化了的行为系统以及在这些系统中行动的集体。而在文化与行为系统中,只有一个确定部分对集体同一性来说是重要的——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交感性的基本价值和制度,它们在集团中享有某种类型的基础有效性。集团中的个体成员必然要把对这种规范核心的破坏或违犯当作对他们自身同一性的某种威胁来体察。不同形式的集体同一性只有在这样一类规范核心中才能被发现:在这些规范中,个体成员乃是彼此都“把自己当作一员来理解”。

在新石器时代社会中,集体同一性是通过下列事实促成的:个

体追溯他们的血统直至某个共同祖先，并因此而集团在神话世界世界观的框架内，相信某种共同的宇宙起源。同时，个人的个体同一性也通过与部落集团的同一而得到发展，这种同一是作为在相互作用范畴中被译解的自然的一部分而被依次领悟的。由于社会现实还未能清楚地从自然现实中区分出来，社会世界的边界就消失在自然世界的边界之中。<sup>②</sup> 没有明确定义的社会系统之边界，也就没有直接意义上的自然或社会环境。与外来部落的接触，乃是根据家庭亲属联系而被译解。另一方面，与那种不同于外来部落的、再也不能被同化到自身世界中的文明的遭遇，对于按照亲族关系组织起来的社会的集体同一性来说，则呈示出某种危险（独立于殖民征服的真正的危险）。<sup>③</sup>

向通过国家组织起来的社会的过渡要求，把部落同一性作为相对物处理，并构造某种更抽象的同一性。更抽象的同一性不再将个体关系建立在共同血缘的基础上，而且建立在同属于一个地域性组织的基础上。这首先是通过与统治者的同一发生的，这种统治者能够要求与神话性初始力量的紧密连结和特权性地达到这种力量的通路。在神话世界观的框架中，不同部落传统的综合乃是通过一种大规模的、关于神的世界的、诸说混同的扩展而完成的——这是一种已被证明为极不稳固的解决方式。由于这个缘故，以帝国形式发展起来的文明不得不在这样一种方式中促成自己的集体同一性，该方式预先假设了与神话思维的决裂。关于宗教的伟大创始者和伟大哲学家的普遍化世界的译解乃以公众的信服为基础，公众的信服是通过传授传统和只允许抽象的同一性客体加以中介的。由于成员信仰的普遍共同性，公民才能认可他们的统治者和由统治者制订的制度。只要在某种作为世界秩序的遗产和被相信、并绝对加以假设的灵魂拯救的遗产基础上去实施政治统治，这种统治就能为公民所认可。

那些伟大的帝国不得不把它们自己从某种远离社会化的外在自然中、从不同于帝国本身的社会环境中界分出来,这是与古代部落社会不同之处。但是,由于集体同一性现在只能通过带有普遍性要求的教义来促成,政治秩序也就不得不仰仗这种要求了:帝国并非仅仅在名义上是普遍的,帝国由同盟集团与附属集团所组成,边缘区域是流动的。不但如此,这里还有人们既试图征服又希望使其皈依的野蛮人,他们是一种异己者,也是潜在的社会成员,但只要他们还不具备公民的地位,就不能作为完整的人来对待。只有其它帝国的现实性才与上述关于一个帝国之边界与社会环境的定义不相容。尽管有贸易联系的存在,尽管有新鲜事物的渗入,帝国仍然抵御了这种危险。在现实的帝国之间,并没有那种维持组织化对外政策意义上的外交联系,在任何情况下,它们的政治存在都没有依赖于某种相互认可的系统。

上述同一性形式的局限也内在地自我表现了出来。在根据亲属关系组织起来的社会中,集体同一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与那种通过亲属结构建立起来的个体的角色同一性相联系。在神话世界观的框架内,不存在使同一性的发展超出这个阶段的刺激力,个体差异在教士和巫师的角色中,可以很容易地被调解。<sup>④</sup>而在较高层次的文明中,帝国同一性的综合力量不得不恰恰在使国家、贵族、城市商人、牧师和官员等意识的非同步进化结构得到统一,并把统一限定于同样的政治秩序的过程中去证明自身。一个朝向同样传统的较宽泛的信仰态度系列是被允许的。而那种对某人来讲很像是与魔术实践相联系的神话一类的东西,不管它是被什么礼仪所支持,对他人来说,都是一种信仰传统,教义知识的宗教组织体经常用争论的力量替换传统的力量,并且用一种理论态度去取代建立在教义权威基础上的信仰态度。但是,如果统治者和公民地位的特殊性——它们仅仅被帝国普遍性的要求所遮盖——仍然是不可

察觉的、并且没能导致有意义的差异,这种普遍化潜能就不可能被大规模地释放出来。

在古代帝国中,这样的差异曾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只是伴随着向现代世界的过渡,普遍化潜能的被释放才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资本主义的组织原则意味着向某种非政治化的、市场调节的经济体系的演变,这个由分散了的个体所决定的领域乃是在资产阶级民法的框架内、按照普遍化原则组织起来的。所以,资产阶级民法假设了私人的、独立自存的、法律的主体在道德化了的交往领域中,运用某种有目的的、合理的手段(在与一般准则相一致的条件)下来追求自身利益。<sup>⑤</sup>在从生产领域到普遍化指向的转换中,不断产生着促进个性结构发展的剧烈的结构性强制力,这种发展以自我同一性取代了习惯性的角色同一性。事实上,自身的习惯同一性已经被粉碎、从而使自身解放了的资产阶级社会成员能够把自己理解为这样一个人,他和其他公民一样拥有下列特征:(1)作为自由和平等的民法主体(作为私人财产所有者的公民);(2)作为自由的道德主体(作为私人存在的公民);(3)作为自由的政治主体(作为享有国家民主公民权的公民)。<sup>⑥</sup>这样,资产阶级社会的集体同一性就是在高度抽象的法、道德和主权的观念下发展起来的,至少在现代自然律的构建和形式主义伦理学中,它是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着自身。

然而,上述抽象规定与世界公民的同一性最为相称,而并非适合于那种不得不通过反对其它国家而维持自身的某一特殊国家的公民。现代国家乃是在16世纪作为国家系统的成员出现的。一个国家的主权在所有其它国家的主权那里发现了自己的界限;确实,特殊国家的主权仅仅是在以相互认可为基础的系统构造起来的。尽管该系统可能已经界定了非欧洲世界作为边缘线的存在(非欧洲世界从一开始就从经济意义上被卷入系统中),但它仍然不能

在一个庞大帝国的规模上，作为普遍统一体去显示自身；它是被主权国家间的国际关系所排斥的——这种关系归根结底乃以军事力量的威慑为基础。进而言之，现代国家比部落社会的国家更加依赖于忠诚和牺牲某个群体以取得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意志。世界公民的同一性显然没有强烈到足以去建立普遍兵役制，这可以从现代国家公民的双重同一性中被发现——他同时既是人，又是公民。<sup>②</sup>

这种双重同一性之间的竞争通过民族联系被暂时平息了下来；民族乃是现代同一性的形成，它一方面拆除了资产阶级法律的区域性普遍主义与道德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又拆除了个体国家的特殊性。今天，有许多征候表明，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解决不再是稳固的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拥有了第一支这样的军队：忠于职守的执行者期望它在没有敌方映象的情况下去保持战斗戒备。<sup>③</sup>冲突之火在民族同一性的临界值以下被点燃，并与种族、宗教信仰、语言、地域差异以及其它亚文化问题相联系，到处燃烧起来。<sup>④</sup>

目前，瓦解民族同一性的一个选择就是欧洲工人阶级运动。把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作为出发点历史唯物主义设计了某种与普遍化自我结构相一致的集体同一性。那种 18 世纪在世界主义的红色标题下思考过的东西现正作为社会主义被设想着。但由历史唯物主义设计的集体同一性被划入了未来并因此为政治实践提出了任务，它乃是一种已成为反思性的同一性，一种不再回溯式地囚禁于特定教义和生活方式而是前进式地与导致新事物的计划与规则相联系的集体同一性的第一个例证。到今为止，该种类型的同一性形式只能在社会运动中被保持，处于正常状态中的社会能否发展这样一种流质式的同一性还是一个问题。它将不得不使自己适应于高度的流动性，这不仅是对生产资源而言，而且是对规范和价值形成的过程而言。现今，只有中国正在从事这类调整的实验。

上面给出的概略性说明至多可以建议如何把个体同一性的发展作为一把钥匙,运用于集体同一性演变的研究。在两种侧度中,个体同一性和集体同一性设计显然都变得越来越一般和抽象,直到设计机制自身成为自觉的、并且同一性形态在下列认识中也采取了反思的形式:个体和社会乃是自己建立起它们的同一性。<sup>③</sup>

#### 4

前面两节意欲说明寻求自我发展意识结构与两个领域的社会进化(即世界观和集体同一性)之间相似性的这种作法的似乎合理,迄今为止,自我发展意识结构、世界观和集体同一性这三者几乎没有作为法律和道德呈示物的结构被认真研究过。这三种复合体都导回到通过语言建立起来的主观际性结构中:(1)法律和道德乃服务于交感性地调整行为冲突,并因此而在言说和行为主体中保持某种被危及的理解的主观际性;(2)不同普遍对象领域的界分——①在观察者的陈述性态度中作为外在自然出现;②在相互作用的参与者的施行性态度中作为规范的社会现实出现;③在意向表达者的表达性态度中作为他自己的主体自然出现——使这些有效性要求(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的分化(而且,如果必要的话,还有主题化)成为可能,这些有效性要求,我们乃是隐含地把它们与所有言语行为相联系;(3)个体同一性以及相应的集体同一性的构建,对于承当一般的交往性角色来说,乃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它被提供给每一个言说和行为情境,并且在人际代词的运用中发现了自身的表达。

应该承认,我所主张的交往理论还没有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使我们足以对构成法律和道德之基础的符号化结构(这是构

成主观际性的世界)以及个体和集体的同一性进行充分的分析。而且,我们确实离下列目标还差得很远,即提供令人信服的关于个体发生学和种的历史中上述结构发展的重建模型。恰恰是发展性逻辑这个概概念,在我们能够依据该概念作为普遍化、个体化、非中心化和自主化等蕴含、而去准确地说明描绘个体发生与种的历史的发展方向到底意味着什么之前,变得更加尖锐,并成为反思性我之所以坚持这个主题不放——尽管目前我们的解释还不甚令人满意——是因为我坚信规范结构并非简单地遵循再生产过程的发展道路,也不是简单地对系统问题模式作出反应,它自身确实拥有某种内在的历史。在早些时的研究中,我已试图去论证,像生产活动 and 实践这样的整体性概念必须还原为交往行为和有目的的理性行为的基础概念,以避免把这两种决定着社会进化的理性化过程混为一谈。<sup>⑪</sup>行为的理性化不仅对生产力有效,而且对规范结构也独立地发生效用。<sup>⑫</sup>

有目的-理性的行为可以在两个不同方面被考察——技术手段的经验效能和各适宜手段间选择的连贯性,行为和行为系统在这两方面都能被理性化。手段的理性化要求技术功利性的经验性的知识;决定的理性化则要求价值系统、决策准则以及行为选择之正确推导的解释和内在连贯性。我将把竞争场合中的行为称为战略性的,这是针对这类行为是由相互影响对方决策的意向所决定,并通过某种有目的-理性的方式,即通过仅仅以自身成功为指向的方式来进行的而言。

在社会行为的关联域中,手段的理性化和手段的选择标示着某种生产力的提高,或曰某种具有社会意义的知识工具的获得,借助它,人类能够改进技术装备、组织管理和利用劳动力的水平。马克思从这个过程中看到了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当然,更精确地作出下列区分是必要的:(1)可以转化为技术、组织方略和合格手段的

理性结构与(如果适当的话)知识的发展逻辑;(2)可以解释该知识的获得机制和相应的学习过程;(3)可利用的知识在某种具有社会意义的方式中能够被运用的边界条件。只有这三个条件综合在一起,才能在生产力发展的意义上解释理性化过程。然而,还有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这就是是否其它的理性化过程对于社会进化的解释来说也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除生产力的发展以外,马克思亦重视社会运动。但是,当他把被压迫阶级组织起来的斗争本身也设想为某种生产力时,他就在下面两种社会发展动力——技术-组织的进步与阶级斗争——之间,建立起某种混乱的、未加以充分分析的联结。

与有目的-理性的行为不同,交往性行为是定向于主观际地遵循与相互期望相联系的有效性规范。在交往行为中,言语的有效性基础是预先设定的,参与者之间所提出的(至少是暗含的)并且相互认可的普遍有效性要求(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使一般负载着行为的交感成为可能。在战略行为中,则缺乏这种背景性交感,人们并不期望被表达意向的真诚性,而且话语对规范的遵循(或规范自身的正确性)与交往行为中的情形相比,也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即言语的有效性基础是偶然性地被预先设定的。一个反复走出无意义棋着的人,使自己不能成为合格的下棋者;而一个遵循比棋艺规则更多东西的人则不是在下棋。战略性行为保留着相对于行为动机条件的冷淡持中性,交往行为的交感性预先假设却可以促成行为动机。这样,战略行为必须是团体化的,即必须被嵌入到主观际的约束性规范中,主观际的约束性规范保持着动机条件的满足。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从由规范指导的交往行为的框架中区分出有目的-理性的行为的任务方面(借用帕森斯的术语)。在有目的-理性的行为中,仅仅假设每一个主体都在遵循他已经为自己确定的偏爱和决策准则,这种偏爱和决策准则是独白式的,并完

全不顾及是否与其他主体相一致。这样,当一个战略行为系统(例如,战争)使若干主体在一定偏好方面的一致成为必要的时候(这种一致事实上并没有被利益情境所保证),有目的-理性的行为必须以某种方式被限定或被团体化(例如在海牙非常议会的框架内)。团体化再一次意味着交感行为的组织,交感行为的组织则依赖于主观际被认可的有效性要求。

交往行为既不能在被选择手段的技术方面、也不能在手段选择的战略方面被理性化,而只能在行为主体的响应性、行为规范的可证实性的道德-实践方面被理性化。鉴于有目的-理性的行为的理性化有赖于真实(经验性真实或分析性真实)知识的积累,交往行为的可理性化方面在陈述真实性侧度内也就没有什么可作的了。但是,在意向表达的真诚性和规范的正确性方面,交往行为的可理性化却要作一切要作的事情。以达到理解为指向的行为的合理性乃是依据下列两点被衡量的:

1. 主体是否在其行为中真诚地表达了他的意向。或者,主体因行为规范不能满足他自己的需要,以致引起冲突上升,故不得不通过设置交往的内在屏障而无意识地进行抵御,这种情形的结果是欺骗了他自己和他人。

2. 与行为规范相联系、并在事实上被认可的有效性要求是否为合法。或者,是否现实的规范性关联域没有表达可一般化的、可调和的利益,进而只有当这些被影响的关联域被那些不显眼的、关于交往的限制阻遏了对规范的有效性要求的推论式检验时,才可能在其事实上的有效性中稳定化。

这里,理性化意味着根除这样一些力量关系:它们恰恰是在交往结构中不惹人注目地建立起来的,并凭借存在于人头脑中或存在于人际联系中的交往屏障,去阻止冲突的自觉平息和交感式调解。<sup>③</sup> 理性化意味着克服这些被系统扭曲了的交往,在这类交往

中,凡涉及到相互提出的有效性所要求的、被行为所支撑的交感——特别是涉及到意向表达的真诚性和基础规范的正确性的交感——都只能在表面上被承认,因而这种交感只能是反事实的、被扭曲了的交感。法律和道德的发展、自我界定和世界观的发展、个体和集体同一性形态的发展,都属于理性化过程中的发展,它们的进步不能靠正确战略的选择来衡量,而要靠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获得的理解的主观际性来衡量,要靠与未扭曲的交往之重建并譬而行的交感行为领域的扩展来衡量。

这样,有目的-理性的行为与交往行为之间的范畴性区分就允许我们去分离开行为可以在其中理性化的各个方面,正如学习过程不仅在客观思维的侧度中发生,而且也在道德-实践洞见这个侧度内发生一样,行为的理性化亦不仅是在生产力中,而且也在——通过社会运动之动力的媒介——社会一体化的形式中被积淀。<sup>④</sup> 理性结构不仅体现在有目的的、理性的行为的扩展上,即不体现在技术、战略、组织和合格手段的扩展上,而且也体现在交往行为的媒介性质上,体现在调解冲突的机制、世界观以及同一性的形成上。我甚至要坚持这样的观点:这些规范结构的发展乃是社会进化的领步者,因为新的社会组织原则意味着新的社会一体化的形式,而新的社会一体化首先使可利用的生产力的实施或新的生产力的创造成为可能,并使社会复杂性的增加成为可能。

我在社会进化框架中赋予规范结构以突出位置,这可能会导致若干误解:以为种的历史的动力学可以通过某种精神的内在历史来解释;或认为一种发展的逻辑再一次取代了历史偶然性。在前一种误解的后面隐藏着如下怀疑:我正在悄悄地丢弃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假定;后一种误解则怀疑一种新的历史泛逻辑化和哲学神秘主义化的理论取代了经验-科学的分析。但这些都只是误解。

让我们暂且假定，一定社会规范结构的发展模型能够被重建和证实(这里，我不是在谈任何随意选择的阶段分类，而是皮亚杰意义上的发展逻辑，它必须满足被称作为非概然的条件)，<sup>⑤</sup>这样一来，社会规范结构的理性式可重建模型就将呈现出问题解决之可能的规则。这就是说，只有规范限制(而不是机制)可能解释个体解决问题的过程，更不用说一般解决问题能力的获得了。学习机制必须首先在心理学水平上去寻求。如果这一步成功了，那么借助于认知发展心理学的帮助，就产生了进一步的经验假设的需要，这种假设可以社会学式地解释个体学习过程如何进入社会的、可集体式接受的知识库。以个体方式获得的学习能力和信息，在它们可以通过某种社会性有意义的方式被运用之前，或曰在它们能被转化为社会学习过程之前，在世界观方面必须具有潜在的有效性。

由于个体的认知发展是在社会边界条件下发生的，社会学习与个体学习之间就有了一个循环过程。确实，人们可以在下列基础上为社会的而不是个体的意识结构的首要性辩护：在家庭中得到体现的理性结构必须首先由儿童在自己相互作用资质的发展中所吸收(因为他超出了前习惯性阶段)。另一方面，古代社会的初始状态——它是由某种习惯性亲族组织、某种法律的前习惯阶段和某种自我中心式的译解系统加以表征的——又只能由社会化了个体部分的建设性学习使自身得以改变。只是在一种派生的含义上，社会才“学习”。对于社会的进化性学习过程，我假设了两个初始条件系列：(1)代表着挑战的未解决的系统问题；(2)已经在世界观方面获得并具有潜在的有效性，但还没有被并入行为系统，不具备在团体中发挥作用的新的学习水平。

系统问题乃是以被规范式固定在自己同一性中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失调来表达自身的。那些超过某个社会适应能力的问题是

否会发生,则属于偶然的事情。当这类问题确实发生的时候,社会的再生产就将成为疑问,除非社会接受这种进化挑战、并改变已建立的社会一体化形式,因为旧的社会一体化形式限制着资源的使用和发展。马克思将这种改变描述为某种生产关系的废除。但改变是否实际可能的,以及它如何具有逻辑发展的可能性,则不能离开上述系统问题来解答,可以这样说:改变是一个进入某种新的学习水平的问题。对于导致危机的难题的解决要求:(1)通过使已经在世界观中发展起来的理性结构体现在新制度中的办法,去努力拓宽社会一体化的现存形式;(2)创造有利于使成功的努力稳定化的条件和背景。每一项经济进步,都能根据下一个更高阶段发展的理性结构在其中具体化的制度而被赋予特征。例如,皇家法院在文明发展的初期,就允许处于习惯性道德意识水平的司法管理;资本主义公司、国家的理性化管理以及资产阶级的民法规范等,它们在现代历史的初始阶段,构成了根据普遍化原则而立的、在道德上属于中性的战略行为领域。以前的社会学家们只是谈“价值的制度化”,通过这种制度化,一定的价值取向对行为者来说,变成了约束力量。现在,当我试图借助于“理性结构的制度化体现”这个概念,去把握进化学过程时,问题就不再是构造约束性的取向内容,而是开辟行为理性化的结构可能性了。

对比这种解释战略〔这个战略已经在K·埃德(Eder)关于以国家形式组织起来的社会之形成的研究中得到了证明〕,上面提到的反对意见就显得没有意义了。对发展动力学的分析,就它把系统问题制造的危机与生产领域联系起来而言,乃是“唯物主义的”;就它必须在偶然情境的全部范围内寻求进化性变异的原因而言它还保持着“历史的”取向。在这些偶然情境下:(1)新结构在个体意识中获得并转换为世界观结构;(2)系统问题上升并超过社会的驾驭能力;(3)新的理性结构的制度体现可以被尝试并能够实现

稳固化；(4)资源动员的新侧度可以付诸实用。只有当理性化过程(该过程同时要求着历史的和唯物主义的解释)已经历史地实现以后，我们才能详细确定社会规范结构的发展模型。这些被诉诸的发展逻辑(以及在这个程度内，内在的历史)乃是独立于精神的。

## 5

最后，我想再提到两种异议，它们可能反对我已经表明的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我的出发点的意向。(1)关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研究——马克思曾经大力专注于此——在对社会进化基本假设的再阐述中，几乎不再发挥什么作用。取而代之的则明显是些来自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外来品。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长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2)如果通过对当代社会形式的分析，将能更好地服务于以行动为目标的意向，人们为什么仍应该全然追求历史唯物主义？

对于第一种异议，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解剖乃是对前现代社会的解剖的一个关键，在这个程度内，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提供了一个进入社会进化理论的理想入口：社会组织原则的一般概念之所以可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辨认出，是因为在那里，借助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阶级结构乃是第一次在纯粹的、即经济的形式中呈现出来的；威胁着社会存在的危机的衍生模式之所以能够在与积累过程的联结中发展，是因为——借助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一个具有处理物质再生产任务之特定功能的系统乃是第一次被分划了出来；合法化统治的机制之所以可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被把握是因为那种与阶级结构并非一致的普遍价值系统也是第一次被无保留地清晰化并在辩论中立下了根基。在这个程度内，这种生产

方式的构成性特征对于先前阶段的社会形态来说也具有启发性。但是从这里,人们不能推演出这样一种要求,似乎“资本的逻辑”可以作为社会进化逻辑的钥匙来运用,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再生产过程出现失调的方式不能被一般化并转换到其它的社会形式里去。进而言之,如果社会系统对进化的挑战作出反响的话,我们就无法在系统问题产生的逻辑中发现那种社会系统亦将遵循的逻辑。设若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乃是对受危机支配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适宜反应,它就不能从任何再生过程的“形式决定”中演绎出来,而要根据民主化过程,即根据普遍化结构进入行为领域的穿透力——这种情形尽管有着手段选择的有目的性和合理性,但对个体独立自存地建立这个目的来说,仍然被预先保留着——来加以解释。

至于说把结构主义的若干观点纳入思考范围,我倒愿意承认自己确实从古德莱尔(Godelier)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上学到了某些东西。<sup>⑥</sup>他们已经重新思考了基础-上层建筑关系,并且通过如下方式将其概念化,这就是规范结构的特有贡献可以从还原主义的循环短缺中被拯救出来。确实,客观精神的概念和在从卢卡奇到阿道尔诺的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发展起来的文化概念并不需要这种再阐述。那种鼓舞着我把规范结构纳入某种发展-逻辑的问题领域的刺激力,同样来自皮亚杰的发生学结构主义,换言之,来自一种概念,该概念已经克服了与进化主义正相对立的传统结构主义,并且已经吸收、同化了从康德到皮尔士的理论知识主旨[L·古尔德曼(Goldmann)很早就承认了皮亚杰的工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具有的意义]。<sup>⑦</sup>

功能主义则遵循着一条导致越出30年代和40年代文化人类学轨道的道路,并再一次使与19世纪发展理论的连接成为可能。T·帕森斯的新进化主义把一般系统理论的概念手段运用于社会

和社会系统之结构性变化的研究。功能主义分析对社会进化的处理是在一种“复杂性增长”的观点下进行的,在另外的几篇文章中,我已经试图表明这种方法存在的弱点。功能主义乃是通过把功能方面等效的解决方式和系统问题相联结来解释进化发展的,这样,它就避开对进化学习过程的单独性解释。功能主义者在解释上的缺口对于像N·爱因斯塔特(Eisenstadt)这样的功能主义早先的代表人物来说相当地明显(这种解释上的缺口可以用某种社会运动的理论加以充填),如果我没弄错,A·托尔兰尼(Tourraine)乃是头一个把某种社会运动的理论系统引入社会进化理论之中的人。<sup>38</sup>自然,那种在社会运动中获得统治地位的行为指向,对功能主义者来说,是由文化传统构成的。如果人们把社会运动作为一个学习过程来设想,通过这种学习过程,具有潜在有效性的理性结构被转换为社会实践<sup>39</sup>——在最终,人们将发现某种组织性体现物——这里就有了使传统本身之理性潜能同一化的进一步的任务。

然而,无论如何,系统理论对于分析进化性创新的初始条件,也就是分析超过了结构性限定的启动能力、并引发产生足以威胁系统继续存在的危机的系统问题来说,还是提供了有用的手段。C·奥菲(Offe)已经表明,如果人们能把系统理论与行为理论相联结的话,系统理论的概念和假说可以怎样精确地运用于危机的分析。<sup>40</sup>但这样一来,我们就需要某种马克思为连接循环过程和阶级结构、价值关系和力量关系而(以价值理论形式)提出的转译规则的等效物。

至于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是否并不是仅仅用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回溯性考察来补充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并把它视为偶然之举,以及对当代社会形成的分析是否不应该建立在自己的基地之上,这些都属于另外一类问题(即第二个问题)。马克思专

心于证明并解释表明着适应能力之结构性限制的发展过程，并使变化的实践必然性建立在社会组织原则之上成为可能。如果历史唯物主义确实不能为这些问题(的解决)贡献很多，那么，关于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的兴趣也已经唤醒了对逃避现实之空想的怀疑。但是我还坚持这种意见，即马克思已经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某种可领会的社会进化理论来理解，并把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看作其中的一部分。即便是把马克思的观点放在一边，社会进化理论对于当代的分析——这种分析要追究现存社会结构创新与适应潜力枯竭的原因——来说，也具有某种可详细阐明的系统性意义

有关社会组织原则、学习能力以及可能结构变异范围的假设，在历史发展已经把临界性生存界线诉诸检验之前，不可能经验式地得到清晰的验证。从进化角度进行的对当代的分析总是被阻碍，是因为该分析不能回溯式地考察它们的对象。鉴于这个理由，凡是从进化角度出发的理论类型，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都被迫在某种有启发力的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去调整它们的假设——一种已经构成关于对象的界定和描述之前提的假设。社会作为工业的、后工业的、技术的、科学的、资本主义的、晚近资本主义的、国家垄断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总体式的、管理的、三重化的、现代的、后现代的以及诸如此类东西的特征化，就像许多发展模型一样，根源于当代社会形态与早先社会之间的联结。从这种角度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借助于——例如——关于传统社会因之碰壁的系统问题的陈述，关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因之受到进化挑战的创新发明的陈述，在现存社会形式起源的意义上，承担起确定当代社会组织化原则的任务。我想举两个这类问题的例子，在我看来，它们都要求历史唯物主义来重执牛耳。

在一份室内工作报告中，R·房克(Funke)比较了两种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分析的理论方法的不同，一个是“静止资本主义”的

理论，其思想出发点是，资本主义组织原则已经被某种新的政治的组织原则（该组织原则必须加以进一步说明）限定在自己的效用之中；另一个是“仍待完成的资本主义”，它是从下列思想出发的：资本主义仍在建立之中，仍处于从半自然的社会关系及其基础结构中清除其传统残留物、并把它们归并到积累过程和商品生产形式内的过程之中。从进化角度看，同一事实的意义可以是极为不同的，这要看它们是否被假设去支持某种关于政府的观点，该政府乃是作为替代物填补着市场的功能性裂缝；或是它们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这种政府不过表征着对先前半自然的社会关系来说是某种新的、可管理的商品生产形式的建立。同一个危机现象，从一种侧度观察标志着被资本主义限定了的变异范围的穷尽；换一个侧度观察，则标示着某种资本主义的两难处境：它不得不去改变固有的社会关系和基础结构而又没能使其稳定性力量获得再生。设若——就像我为了自己的观点将要假设的那样——相互竞争的各种译解都能或多或少是同样完美地解释一个通用资料，我们又如何在它们之间作出选择呢？

如果我们拥有某种社会进化理论，它可以把向现代世界的转变解释成某种新的、并（进一步讲来）被明确界定的社会组织原则的出现的话，这里就有了检验两种相互竞争中的方法哪一个更切合于上述解释的可能，因为这两种不同的译解为资本主义发展提出了不同的组织原则。根据第一种意见，资本主义发展的组织原则是由某种非生产性政府和非政治化的经济系统的补充性关系所构成，非政治化的经济系统乃是作为一个从事战略行为的私人主体的非中心化决策领域，是通过市场加以组织的，即是根据一般的、抽象的规则加以组织的。而政府则为这种经济（它是从自己的统治领域中分化出去的）持续存在的前提条件提供着担保，并因此把自身从生产过程中排除了出来，尽管与此同时——作为一个以税

收为基础的政府——它又使自己依赖于它。<sup>④</sup>根据另一种意见,资本主义发展的组织原则则存在于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之中。然而,政府不得不作为一种力量,为这种组织原则在最初是异己的环境中的确立而发挥功能。在一种场合,那种事实上是通过市场控制的生产过程的非政治化,对于生产模式而言,是组织性的;在另一种场合,则那种形式上通过交换关系来调整,实际由政府强力推动的相互关系网络的扩张,才是组织性的。

另外一个可以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重要性的例子,是关于官僚-社会主义社会的分类归属问题。这里,我甚至不能简略地回顾一下对这个问题已经提出的最主要的各观点。作为替代,我想提出一种角度,以此为基准,可以对那些不同的观点大体分类。一种意见认为,官僚-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与发达资本主义相比较,已经达到一个更高的进化阶段。而在另一种意见看来,问题则在于有两种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变体,即同一个组织原则有不同的历史表达。第二种意见不仅通过大量论文(有许多不甚有力)以平常形式提出,而且也得到了理论家们的论证,这些理论家——例如阿道尔诺——绝没有轻视生产方式中特殊系统间的区别,但又(如M·韦伯)把它自身的重力归因于工具理性的独立自存化。<sup>⑤</sup>如果这种意见能够被证实,则代表着现代社会特征的政府与经济之间的互补性关系,就将不得不以相当抽象的形式被把握,因为这样一来,以税收为基础的政府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对于资产阶级社会来说是组织性的——将仅仅显示出这种关系可能现实化的一个方面。在这个假设前提下,批判的发展并没有自动地把结构性所限制的驾驭能力的枯竭当作表征物。在一定的情境中,这种枯竭也是一种信号,说明那种在现时代已经变成可接受的理性结构并没有枯竭,而且,还允许某种可领会的组织体现物在一种广阔的民主化过程形式中的存在。<sup>⑥</sup>

以上这些例子具有浓厚的综合性思考特点。正因为这个原因，这些例子服务于阐述这样一类问题，该问题具有足够的重要性，值得进行更仔细的研讨。而且，这些例子将能够在某种更严格的研讨方法中被处理，如果我们没有从外面拒绝满足它们要求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水平或社会进化理论的分析水平的話。一个从进化角度出发的对当代的分析（这个时代确实在否定着自身）必须带着我已经为之提供了例证的这类问题，义无反顾地继续下去。<sup>④</sup>

## 第四章

# 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马克思曾两次联系性、基础性地表示自己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见。<sup>①</sup>他还以历史学家的身分,运用这个理论框架,去阐释某些特殊的历史情境或发展,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 18 日》中就是如此。恩格斯则赋予历史唯物主义以指导和方法的特性。<sup>②</sup>这可能造成一种印象,似乎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仅仅看作是具有启发性的东西,以帮助我们带着系统意图去构造(现在也与从前一样)历史的描述性图象。但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按照这种方式被理解的——不管是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或工人运动的历史中。正因为如此,我将不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某种启发物,而看作是一种理论,一种社会进化理论,该理论——归功于它的反思特性——对于政治行动的目的来说,也具有增进知识的价值,并且可以在一定情境中,与有关革命

的理论和战略相联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大纲》和《资本论》中阐述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学说，就作为一种子理论，被纳入到历史唯物主义之中。

1938年，斯大林编纂、整理了历史唯物主义，<sup>③</sup>他所采取的方式导致了巨大的后果，以致以后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一直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定在这个理论框架内。<sup>④</sup>斯大林确立的这个理论变体需要加以重建；我本人从事这种重建的努力还包含下列意图：对若干其它的竞争学派之观点作进一步的批判性汲取——这首先是针对新进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批判性汲取。当然，我只能在几个论点上尽力而为，从这些论点出发，上面所说的那种重建可以被尝试，并带有几分成功的希望。

我想首先介绍并批判地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的若干基础概念和假设，然后指出应用这些假说时将会出现的困难，继而提出并论证为解决这些困难而设想的一项（抽象的）建议，最后，考察一下我们从其它竞争学派那里可能学到些什么。

## 1

首先，我想考察社会劳动和种的历史这两个概念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三项基本假定。

一、社会组织化的劳动乃是人类——与动物正相反——从事其生活再生产的特定方式。

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旦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

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须的生活资料,同时也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sup>⑤</sup>〈注1〉

在对人类生活方式而言并非特殊的描述水平上,有机体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交换可以用物质变换过程的生理学术语来阐述。但要去把握那对人类生活方式来说乃是特殊的东西,人们就必须在劳动过程的水平上去描绘有机体与环境间的关系。从物理角度看,劳动过程水平上的有机体与环境的关系标示着人类能量的支出和能量在外在自然经济系统中的变换,而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根据工具行为规则而进行的、有目标作为指导的物质转换这一社会角度。<sup>⑥</sup>

当然,马克思不仅把“生产”理解为单个个体的工具性行为,而且也包括不同个体间的社会合作:“生活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活的生产(通过劳动)或是他人生活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至于这种合作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则是无关紧要的。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必须始终将‘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注2〉

不同个体的工具性行为,通过某种有目的-理性的方式、即借助于生产目标被协调起来。战略行为规则(合作正是与此相吻合才

---

〈注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P24。——中译者

〈注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PP33~34。——中译者

得以出现)则是劳动过程的一个必然要素。

生活资料的生产仅仅是为了消费。劳动产品的分配,就像劳动本身一样,是社会地加以组织的。分配规则所涉及的并不是正在处理的物质,也不是经过适当协调的对产品的申请,而是相互式期望或利益的系统联结。这样一来,产品的分配就要求某些相互作用规则,这些规则可以在语言理解的水平上主观际性地被建立,并从个体那里拆分出来,作为被认可的交往行为规范或规则而永久化。

我们把社会地调节劳动和分配的系统称作经济系统,这样,马克思认为,生活再生产的经济形式就表征着人类的发展阶段。

作为人类生活再生产形式的社会劳动这一概念有若干种内涵,这一概念对于现代主体哲学或反思哲学的大部分基本假设来说是批判性的。请看这样一个命题:

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⑥<注>

根据《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这个命题可以在具有认识论倾向的实用主义意义上来理解,也就是说,作为对任何形式的现象主义、经验主义或理性主义(它们都把认知主体看作某种被动的、自我包容的意识)的批判来理解。这个命题也具有唯物主义的内涵,它同时反对着理论的和实践的唯心主义,这些唯心主义断言:精神与自然相比是第一性的,思想与利益相比,亦是第一性的。或者,考虑下面这个命题:

---

<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P24。——中译者

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⑨</sup>〈注〉

这里,深受黑格尔客观精神概念熏陶的马克思向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方面的个体主义和英国、法国道德哲学的实践个体主义进行了公开宣战,两种不同的个体主义都把行为主体看作某种孤立的单子。

当下,我们自然对这样一个问题深感兴趣,即社会劳动的概念是否适合于表征人类生活再生产的形式。必须更严格地确定,我们通过“人类的生活方式”这种术语,希望理解些什么。在上代人那里,人类学已经获得了从灵长目动物到人类的长达400余万年的时间里的人类进化过程中的许多新知识。人类进化从被假设的人类共同祖先黑猩猩开始,经由直立人(homo erectus)到现代人(homo sapiens),这个过程是由有机的和文化的发展机制的共同作用所决定的。人类在这个起源和发展的时期中,出现了两种进化机制:一方面以一长系列的变异为基础,出现了脑体积和重要的结构形态特征方面的变化;另一方面,那种选择压力由以施行的环境也不再仅仅由自然生态所决定,而要通过原始人类联合狩猎所取得的积极的、适应性的成就来进行。只是在到达现代人的入口处,这个混合的有机-文化形式的进化才让位给独立的社会进化,进化的自然机制停顿了下来,再没有什么新种出现。然而,那种成为现代人社会化之基础的族外婚姻却在一个广阔的种内传播过程和遗传因子混杂中获得了结果,这个内在的分化乃是文化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在社会学习过程的多重性中得到了证实——

---

〈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P 18。——中译者

的自然基础。所以，对发展的社会文化阶段——单独的社会进化就在这个阶段上发生，社会被卷入进化过程中——的界定，不仅要从灵长类阶段（在这个阶段，仍然保持着独立的自然进化，也就是物种被卷入进化过程）中分出，而且要从原始人类阶段（在这个阶段，两种进化机制是在一起工作，脑进化成为最重要的单独变量）中分出。<sup>⑩</sup>

二、如果我们借助于近来的人类学发现来考察社会劳动的概念，下列情况就变得更为明显，即社会劳动这个概念在进化刻度上刻得太深了，原始人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类人猿那里区分出来的，他们通过社会劳动来改变再生产并发展出一种经济。成年男子形成狩猎团伙，这使：（1）武器和工具（技术）得到运用；（2）通过劳动分工来共同活动（合作组织）；（3）在集团内部分配捕获物（分配原则）。生产资料的制造，劳动的社会组织及其产品的分配，满足了生活再生产之经济形式的条件。

重建原始人的社会比重建其生产方式更加困难。我们不清楚他们的交往系统究竟在超出以手势为中介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已经在灵长目动物中发现）方面进步了多远。有关的推测是，他们拥有某种手势语言和某种信号召集系统。<sup>⑪</sup>由于在任何场合中，共同性的大规模狩猎都要求达到对经验的理解，故我们不得不假设存在某种原始语言，这种语言至少为认知能力、情感表达以及人际关系这些非常重要的人类进化要素的系统联结铺平了道路。原始人群中的劳动分工大概导致了两个子系统的发展：在平等的狩猎团伙中聚在一起、并从整体上看占据某种统治地位的成年男子群体；采集果实并照料子女、与子女生活在一起的女子群体。与灵长目社会相比较，合作的战略形式和分配规则都是新的，这两个方面的发明都与第一个生产方式的建立即合作狩猎直接相关。

这样，马克思关于社会劳动的概念对于确定原始人的生活方

式与灵长类动物的生活方式的区分来说,乃是适宜的,但它并没有抓住人类生活再生产的特殊性。不是原始人类,而是人类,才第一次结束了在脊椎动物中形成的社会结构——一个单侧度的系列,在其中,每个动物都被过渡性地指定具有一种、而且仅仅具有一种身分(在黑猩猩和狒狒中间,这个身分系统控制着特别是成年雄性之间的侵犯性关系、雄性和雌性之间的性关系以及长幼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时,家庭似的关系仅仅存在于母亲和她的子女之间、以及兄弟姐妹之间。母亲和成长中的儿子的乱伦是不允许的,<sup>⑩</sup>但却没有相应的父亲与女儿之间的乱伦界线,因为父亲这个角色并不存在。甚至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原始人社会也不知道什么叫家庭结构。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家庭是怎样出现的。康特(Count)认为,<sup>⑪</sup>社会式组织的狩猎这种生产方式制造了某种系统,它通过男性的家庭化得到解决,即通过引入以异族婚姻为基础的亲族系统得以解决。狩猎团体的男性社会变得独立于从事植物采集的女性及其子女团体,后一团体在围猎远征期间仍旧被保留着。伴随着这种分化,以劳动分工为链条,出现了某种新的一体化需要,即两个子系统之间被控制的交换的需要。但是原始人在他们的支配力方面,显然只拥有依赖于身分的性关系模型,这种模型对于新的一体化需要来说是力不胜任的。对身分的性关系模型依赖越少,灵长目中的身分秩序就越被这样一种力量——该力量乃是在朝向狩猎团体内部的平等关系方向推进的——所冲蚀。只有那种以婚姻和被规约的血统关系为基础的家庭才允许成年男性以父亲角色为媒介,把狩猎团体男性系统中的身分同女子和子女系统中的身分连接起来,并因此:(1)把社会劳动的功能与养育后代的功能合为一体;(2)把男子狩猎的协调功能与女子采集的协调功能合为一体。

三、只有当狩猎经济被补以家庭式社会结构时,我们才能在人

类意义上谈论人的生活的再生产。这个过程持续了数百万年，且最终完成了一个重要的取代：用以语言为先决条件的社会规范系统取代动物身分系统。动物身分系统在类人猿那里已经是以符号性中介的相互作用（在米德的意义上）为基础了。原始人的等级秩序是单侧度性的，每个个体都具有一种、而且只能是一种——也就是说，在所有功能领域中的同一种——身分。只有当同一个个体可以统一不同的身分，而不同的个体亦可以占据同一种身分时，功能各不相同的子系统之间的社会式调整的交换才成为可能。动物身分系统是以身分占据者施加威胁的能力为基础的，即是以作为个人标志的力量为基础。与此不同，社会角色系统却是以对规范化的行为期望的主观际认可为基础，否认了仅根据占有者个体结构的特殊性，来考虑对一个角色占有之制裁的可能性。这种变化意味着某种行为动机的道德化。社会角色可以依靠某种相互性动机系统的形成与两种不同的行为期望条件性地连在一起。埃尔特可以依靠自我满足他的（埃尔特的）期望，是因为自我也依靠埃尔特来满足他的（自我的）期望。通过社会角色，那种对他人动机产生作用的社会影响就能够独立于偶然的环境性关联域而被制造出来，而且，动机的形成亦可以被引入符号化的相互作用世界之中。然而，要想使这一切发生，还要满足下列三个条件：

1. 社会角色不仅预先假设了相互作用的参与者能假定其他参与者的角度（这一点在符号化中介的相互作用中已经如此），而且预先假设了参与者们也能把参与者的角度变换为观察者的角度。参与者必须能采纳——对于他们自己以及他人而言的——某种观察者的角度，以达到从外部审视自己的期望和行为系统，否则，他们就不能把自己的相互期望条件性地连接起来，并使他们——作为一个系统——成为自身行动的基础。<sup>④</sup>

2. 只有当相互作用的参与者拥有某种超出行为的瞬间性实际

后果的时间识见时,社会角色才能被构成。否则,那些在空间、时间、物质诸方面被分化的行为期望就不能相互性地连在一个单一的社会角色里。丧葬仪式就是一个表征,即作为家庭生活在一起,导致了某种范畴性扩展了的时间意识。<sup>⑮</sup>

3. 如果社会角色意欲控制参与者的行为动机,那么,它不得不与制裁机制相连接。由于(在初级人类社会)制裁的可能性不再(像原始人社会那样)被具体涉及者的偶然性体魄所揽括,也不像在文明社会中那样被政治统治的力量手段所揽括,它就只能存在于关于已有规范的矛盾式精神专注的译解中。正像在禁忌发挥功能的方式中所看到的那样,译解模型把社会角色——这些社会角色重新体验着矛盾的心理感觉,该感觉必须由驱力系统的分化所——囿限于规范有效性的意识之内,即囿限于响应已有规范的情愿之内。<sup>⑯</sup>

鉴于若干理由,上述三项条件在语言充分发展起来以前,不可能得到满足。我们可以假设,那种导向特定的人类再生产形式以及因此导向社会进化的初始状态的发展,首先发生在劳动结构与语言中,劳动和语言比人及其社会更古老。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人类学概念来说,这一点可能意味着:

1. 社会劳动的概念乃是基本的,因为社会式组织的劳动和分配所取得的进化成就显然先于发展了的语言交往的出现,而且先于社会角色系统的发展。

2. 只有当我们把社会劳动的概念和家庭式组织原则的概念相结合,具有特定意义的人类生产方式才能得到适当的描述。

3. 角色行为结构标志着与社会劳动结构相联系的某种新的发展阶段。交往行为的规则,也就是主观际有效的、仪式化被保证的行为规范,不能被简化为工具性的、或战略性的行为规则。

4. 生产和社会化,社会劳动与养育后代,二者对于种的再生

产来说是同样重要的。这样，同时控制着二者的家庭式社会结构——即外在自然与内在自然的一体化——就是最基本的了。<sup>①</sup>

## 2

马克思是把社会劳动的概念与种的历史的概念连在一起的，这一连结试图标示出下列唯物主义的信息：在一个单一物种的场合，自然进化是通过其它手段，即通过社会化个体自身的生产活动得以继续的。在通过社会劳动维持人生命的过程中，人同时生产出物质的生活关系。他们生产着他们的社会及其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是与他们的社会一道发生着变化。重建种的历史的关键是由生产方式这个概念提供的。马克思把历史设想为一个生产方式的分离的系列，这一分离系列在自己发展的、逻辑的顺序中揭示出社会进化的方向。我们不妨重温一下几个最重要的定义。

一个生产方式是由某种生产力发展的特定状态与社会交往、亦即生产关系的特定形式所表征的。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包括：(1)介入生产过程的劳动力量，即生产者；(2)技术意义上有用的知识，它们可以变为使生产率得以提高的劳动工具，也就是变为生产技术；(3)组织性知识，它们可以有效地推动、改善劳动力量，有效地协调与劳动分工相一致的劳动者的合作(劳动力量的可推动性、合格性和组织性)。生产力决定着对自然过程的可能控制的程度。生产关系则指这样一些制度和社会机制，它们决定着(在某种给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劳动力量与可利用的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方式。对生产资料结合规则的调整、社会式雇用的劳动力量的控制方式，也

都间接决定着社会生产的财富的分配。生产关系表达社会力量的分配组合,借助于社会认可的、需要满足之机会的分配模式,生产关系预先判断出一个社会的利益结构。历史唯物主义起缘于这样一个假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非独立地发生变化,而是形成若干种结构,它们(1)彼此进行着呼应;(2)产生有限数量的结构性相似的发展阶段;(3)出现一系列根据某种发展逻辑加以顺序化的生产方式(手工劳动生产出封建的社会,蒸汽机则带来工业资本主义社会)。<sup>⑮</sup>

在正统的解释中,有五种(或六种)生产方式被区别开来:(1)文明时代以前的氏族部落原始公社制;(2)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古代生产方式;(3)封建生产方式;(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5)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关于古代东方的和古代美洲的生产制度如何被纳进这个历史发展的讨论,导致了(6)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插入。<sup>⑯</sup>这六种生产方式被认为是标志着社会进化的普遍阶段。从某种进化立场看,每一个特殊的经济结构都可以运用若干种生产方式来分析,这些生产方式已经进入某个历史的、具体的社会层次性结合〔关于这一点,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德古莱尔(Godelier)对西班牙殖民化时期印加文化的分析〕。<sup>⑰</sup>

关于种的历史概念的教条主义变体,和18世纪历史哲学的构思一样,含有若干弱点。那种显示着五个或六个生产方式序列的世界历史的进程,记下了某种宏观主体的单线式的、必然的、未中断的和前进式的发展。我倾向于反对这种种的历史模型,这是一种脆弱的解释,它禁不起对历史哲学之客观主义的相似的批判。<sup>⑱</sup>

1. 历史唯物主义并不需要假设某种经历着进化的种的主体,进化的承担者应该是社会和纳入社会中的行为主体。社会进化可以在这样一些结构中被辨认出,这些结构被那些与某种可合理重建的模型相一致的、更可领会的结构所取代。在那些结构形成的过

程中,②社会和个体与他们的自我同一性和集团同一性一起经历着变化。既然社会进化应该指向统一化了的个体自觉影响他们自身进化进程的方向,这里自然不会出现大规模的主体,至多是自我建立的、高水平的、主观际性的共同性(关于发展概念的性质是另外一个问题:在什么意义上人们可以把新结构的产生当作某种运动来设想?——只有经验物质才处于运动之中)。(③)

2.如果我们要从发展的动力学中析分出逻辑——也就是从经验物质在其中得到发展的过程中析分出可合理重建的、具有越益复杂之可领会性的结构层次模型来,那么,我们既不需要追求历史的单线性,也不需要追求历史的必然性;既不需要连续性,也不需要不可逆性。我们当然要认真考虑人类学性质的、深深扎根的一般性结构,该结构是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并规定着社会进化的初始状态。一般性结构在下述意义内是可推测地产生的:类人猿的认知和动机潜在在语言交往的条件下被改造并得到认可。这点可能相应于今天4岁到7岁的儿童通常具有的意识结构,只要这个年龄阶段的儿童的认知能力、语言能力和相互作用能力是彼此综合为一体的。

一般性结构描绘出更可领会的结构形态在其中成型的逻辑空间。新的结构形态是否完全产生出来,以及——如果是的话——何时才能产生,则依赖于偶然性的边界条件和可以经验式予以考察的学习过程。关于为什么某个特定社会能获得某种特定发展水平的发生学解释,是独立于关于某个系统(该系统在每个给定阶段都与其所获致的结构逻辑相一致)如何运作的结构性解释的。导致同样的发展水平,可以有许多条途径,单线式发展的可能性越少,进化的单位就越多。进一步讲,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担保发展的不中断性,发展的不中断性依赖于一个社会是否被非生产性地阻遏在发展的入口,或是通过发展新的结构解决了自身的系统问题等

等情境的偶然组合。进化中的倒退亦是可能的，而且在许多场合已被经验所证实。当然，一旦某种发展水平被建立起来，社会将不会在没有强迫性倒退现象的伴随下，落到该发展水平的后面，法西斯德国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并不是进化过程是不可逆的，而是一个社会必须经历的结构系列是不可逆的，如果——而且在下列程度内——结构系列已被卷入进化过程的话。

3. 自然，最具尖锐的争议之点是目的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目的论是内在于历史之中的。当我们谈到进化时，我们确实在事实上意指着展示出某种方向的累积过程。新进化主义把增长中的复杂性看作一种可接受的方向尺度，一个系统可以呈现的状态越多，它将与之竞争并依靠竞争使自身得以维持的环境就越复杂。马克思也十分看重“劳动的社会分工”这一范畴的巨大意义，在他那里，这个范畴意味着系统分化的过程 and 在一个更高水平上各个功能特化了的系统的综合过程，即意味着一个社会内在复杂性的增长以及因此而来的适应能力提高的过程。然而，作为某种社会进化的方向性尺度，复杂性却有着若干不适之处：

(1) 复杂性是一个多维的概念。一个社会是复杂的，可以是就其大小、相互依存性和可变异性而论，也可以是就其一般化的成就、一体化和再规范化的成就而论。作为结果，复杂性比较容易变得模糊不清，也可能变成总括分类的问题，<sup>②</sup> 这从复杂性角度是无法测定的。

(2) 进一步看，在复杂性与自我保存之间并不存在一种清晰的联系。存在这样的情形：复杂性的增长结果是进化方面的死亡结局。而如无这种联系，复杂性的增长就不适于作为方向性表征。

(3) 复杂性与自我保存之间的连结之所以成为问题，还因为社会——不像有机体——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和在客观意义上可决定的自我保存问题。社会再生产不是根据再生产的比率，也不

是根据其成员肉体延续的可能性来衡量的，而是根据某种规范性指定了的社会同一性的促成、一种文化转译了的“好的”或“过得去的”生活的促成来衡量的。<sup>②</sup>

马克思判断社会发展并不是根据复杂性的增长，而是根据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成熟性。<sup>③</sup>生产力的发展依赖于技术上现有知识的运用；社会的基本制度则体现着道德-实践的知识。这两方面进步的测量有赖于两个我们在衡量经验知识和道德-实践洞见的进步时也要用到的普遍有效性要求，即陈述的真实性和规范的正确性。如此，我坚持这样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把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成熟性作为社会进步的标尺，这种精选出的方法及其内容能被系统地加以证明。后面我还要回到这个论点上来。

### 3

在阐释了社会劳动和种的历史的概念之后，我想简短考察一下历史唯物主义的两项基本假设：上层建筑原理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法。

#### 1. 人们熟知的、关于上层建筑原理的经典表述是这样的：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

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sup>②</sup>〈注〉

在每个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形成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相一致的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决定着所有其它的社会系统——长期以来，这种上层建筑原理的经济主义变体一直居于统治地位。按照这种解释，每个社会都可根据它的复杂程度被区分为若干子系统，这些子系统可以依次分层地加以排列：经济层面、管理-政治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这样，这一上层建筑原理宣称在任何较高层面子系统上发生的过程都是被——在因果依赖关系意义上——低于它的子系统层面上发生的过程所决定的。这种观点的一种较弱的变体则声称，较低层面的子系统对于比它高的系统的发展施加着结构性限制。结果，正像恩格斯谈到的，经济系统“归根结底”决定着其它子系统的可能发展范围。在普列汉诺夫那里，我们发现了支持第一种译解的表述；在拉伯里奥拉(Labriola)和M·阿德勒(Adler)那里，则可发现支持第二种译解的信息；在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卢卡奇、柯尔施以及阿道尔诺等人中间，社会总体性的概念完全排除了上述水平层次模型，在社会总体性概念中，上层建筑原理假定着所有社会表象对经济结构的同心式依赖关系，经济结构被辩证地设想为存在于诸多可观察现象中的本质。

然而，马克思由此提出上层建筑原理的关联域却清楚地表明，上层建筑对基础的依赖首先仅仅意指这样一个批判性阶段：社会开始进入某种新的发展水平。被意指的并不是对于社会的本体论译解，而是假设在社会进化中，经济结构起着领头作用。非常有趣

---

〔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P 82。——中译者

的是卡尔·考茨基的下面这段话：

只是在最后，全部法律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机构才被看作某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这决不适用于它们在历史中的个体表象。不论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还是其它类型的历史性个体表象，在某些方面将作为基础而活动，在另一些方面又将作为上层建筑而活动。马克思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论断只是对于历史中的新表象来说才是无条件有效的。<sup>②</sup>

马克思引进基础这个概念为的是界定这样一个问题领域，对该领域来说，某种关于进化性创新的解释必须列入参考之列。这种解释认为，只有进化性创新才能解决那些在社会基础领域中发生的难题。

关于基础和经济结构的问题可能导致下列认识：基础领域总是和经济系统相一致。其实，这只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讲才是真实的。我们已经通过生产关系调整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进而间接调整社会财富分配的功能，把生产关系确定了下来。在原始社会中，这种功能是由亲族系统来执行的；在文明社会中，则由统治系统来执行；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当市场与它的操纵功能一道被假设为具有使阶级关系稳定化的功能的时候，生产关系才作为这样一种东西出现并采取了某种经济形式。关于后工业社会的理论甚至展望了这样一种情景，在其中，进化优势将从经济系统转移到教育和科学系统。<sup>③</sup> 设若趋势确实如此，则生产关系就将担负不同的组织作用了。<sup>④</sup>

生产关系围之环境并使之具体化的组织内核，规定着某种特定形式的社会一体化。关于社会一体化，我和杜克海姆(Durkhei-

m) 都把它理解为通过价值和规范来保障某种社会生活世界的统一。如果系统问题不能在社会一体化的统治形式框架内得到解决, 如果社会一体化的统治形式框架自身必须被革除, 以便为新的问题解决方式创造条件, 那么社会的同一性就岌岌可危了。

## 2. 马克思对危机机制的看法有如下述: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 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 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 那时, 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 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sup>④</sup>〈注〉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法经常在某种技术意义上被理解。结果, 该原理就变成: 生产技术不仅使一定的组织和推动劳动力量的形式成为必要, 而且, 通过劳动的社会组织, 使适应于它的生产关系成为必要。生产过程被设想得如此统一, 以至于生产关系恰恰是建立在这个生产力运用的过程中。在青年马克思那里, 这样一类理想主义的概念手段(“劳动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颇有助于支持上述观念。而在恩格斯、普列汉诺夫、斯大林以及其他一些人那里, 生产关系由生产力“引出”被由工具主义的行为模型“引出”所取代。<sup>⑤</sup>

然而, 我们必须从工具行为和战略行为水平中分离出交往行为的水平来(在社会的共同活动中二者是结合在一起的)。如果我们把这一点考虑进去, 那么, 上述原理则可理解为: (1) 存在着某种

---

〈注〉: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 第2卷, P 83。——中译者

内在的学习机制，它规定着技术和组织性有用知识的自发增长及其向生产力的转换；（2）只有在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与生产关系的发展阶段之间有着某种结构性适应时，一个生产方式才处于均衡状态；（3）内在引起的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系列之间出现结构差异；（4）两个发展系列的结构性差异将打破给定生产方式中的均衡状态，并必然引向现存生产关系的废除（例如，古德莱尔就是在这种结构主义意义上解释该原理的<sup>⑧</sup>）。

在这种阐述中，同样没有清楚地表明什么样的机制将有助于解释进化性创新。被假定的学习机制解释了认知潜能的增长；可能也解释了向技术战略（它们使生产率得到提高）的转换；也能解释系统问题的出现，这种系统问题——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结构差异变得足够大时——将威胁该生产方式的继续存在。但它没有解释已产生的问题如何能被解决。新的社会一体化形式的引入（例如，国家对亲族系统的取代）要求某种道德-实践类型的知识，而不是那种可以在工具行为和战略行为规则中加以施行的技术性可用知识。新的社会一体化形式不要求我们对外在自然控制的扩展，而要求这样一种知识，它可以体现于相互作用的结构之中，即体现了与我们自己的内在自然相联系的社会自律的扩展。

这一点可以在工业发达社会的例子中显示出来：生产力的进步已经导致高度分化的劳动分工过程和工业当中劳动组织的分化。但是，已经进入上述“生产社会化”的认识潜能对于道德实践意识——该意识能够支持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运动，这种运动反映了革命变革的迫切要求——来说，却不具有结构的相似性。这样，工业进步就没有——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的那样——“用劳动者的革命结合取代他们的孤立性”，<sup>⑨</sup>而只是用某种新的劳动组织取代了旧的劳动组织。

这样一来，生产力的发展就可以被理解为某种问题产生的机

制——它触发了、但没有导致生产关系的废除和生产方式的进化性更新。但就是在这种阐释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原理也几乎不能被捍卫。确实，我们知道的若干例证证明，超过以亲族方式组织起来的社会适应能力、并破坏了原始公社原有秩序的系统问题，是作为生产力增长的结果而产生的——这一点在波利尼西亚和南非的例子中非常明显。<sup>⑤</sup>但是，导致第一个文明的出现或导致欧洲资本主义产生的伟大的、内在的进化性进步，尽管是跟随着生产力有意义的发展，却不是以生产力有意义的发展为条件。在这些场合中，生产力的发展并没能导致某种进化挑战。

在可利用知识的潜能和这种知识的运用之间作出区分是可取的。情况似乎是这样：不能不学习的机制〔关于这种机制，莫斯科维希(Moscovici)已经给出了直觉性的支持〕一次比一次提供着更多的东西，这些剩余物包含有某种技术-组织的知识潜能，这种知识潜能只能部分地、而非全部地被运用。当这些认识潜能被启用时，它就变成劳动之社会分工(狩猎与采集，农耕与家畜饲养，农业与城市手工业，手工业与大工业，等等，等等)的结构形态的基础。<sup>⑥</sup>这样，知识的内在增长就是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但是，只有当某种新的组织框架已经出现时，那种尚未解决的系统问题才能借助于累积的认知潜能加以处理。由此出发，才有生产力增长的结果。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才能为下列命题辩护：无论什么社会形态“在它们由以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框架内成熟之前”<sup>⑦</sup>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方式亦绝不会将旧的取而代之。〈注〉

我们的讨论已经导致下列暂时性结论：

1. 那种没有进化性创新便无法解决的系统问题乃是在社会的

〈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P 83。——中译者

基础领域内产生的。

2. 每种新的生产方式都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一体化形式，新的社会一体化形式围绕着一新的组织内核并使之具体化。

3. 内在的学习机制保证了认知潜能的积累，这些认知潜能可用于解决导致危机的系统问题。

4. 然而，上述知识之被运用于生产力的发展，只在下列情形下才有可能，即走向新的组织框架和新的社会一体化形式的进化步骤已经被进行。

剩下的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这个步骤是如何进行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描述性回答是，这个步骤是通过社会冲突、斗争，社会运动和政治对抗（所有这些，当它们是在某种阶级结构条件下发生的时候，就可以作为阶级斗争来分析）来进行。但是，只有分析性回答才能解释为什么社会要实施某项进化步骤，以及我们怎样去理解一定条件下的社会斗争会导致新的社会发展水平。我想建议用下面的思路回答：（人类）物种所学习的，不仅是对生产力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技术性的有用知识，而且包括对相互作用结构具有决定意义的道德-实践意识。交往行为规则确实对工具行为和战略行为领域内的变化作出了反应、并推进了后者，但在这样做的时候，它们是遵循着自己的逻辑。

#### 4

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种的历史的概念要求用生产方式发展序列的语言去重建社会的发展。我想简要说明应用这种概念时的若干优势和困难，然后，再讨论已推荐的解决办法。

1. 优势可以通过比较来体现，这个比较是指和其它与之竞争

的、试图发现历史物质由以在某种发展逻辑中被序列化的理论框架的比较。关于时代分期,存在着几种意见,它们或是以被加工的基本物质为基础(石器、青铜器、铁器,直到今天的合成产品);或是以被开发的最重要的能源为基础(火力、水力、风力,直到原子能和太阳能)。但是,试图在上述序列中发现某种发展模型的努力迅速导向了使自然资源成为可用的、并加工它们的技术序列。事实上,这似乎是一种技术历史的发展模型。<sup>⑧</sup> 无论如何,技术发展模型使自己适合于这样一种译解,好像人类已经成功地把有目的的、理性的行为系统(它首先是依赖于人的有机体)的基本要素落实到技术手段水平,并由此解除了人类自身的相应功能——首先是运动器官的功能(腿和手),然后是感觉器官的功能(眼、耳、皮肤),最后是大脑的功能。

我们当然可以越出上述技术历史的水平。在个体发生学侧度内,皮亚杰已经指出对认知发展而言的某种普遍发展序列的存在——从前操作思维。经具体操作思维再到规范操作思维。技术历史可能通过世界观的进化与社会的巨大进化性进步相联系,而且,这种发展可能反过来又通过思维的规范结构成为可解释的,对该思维结构来说,认知心理学已经提供了一种经过认真检验的个体发生学模型,这种个体发生学模型能使我们确定这些结构在发展-逻辑的序列中的位置。<sup>⑨</sup>

自从“新石器革命”以来,在任何情况下,伟大的技术发现都没有导致新时代的产生,而仅仅是伴随着它们。技术的历史,不论它多么能合理地予以重建,终归不适于界定社会形态。生产方式的概念已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生产力的发展,尽管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但对社会分期来说,却不是决定性的。其它有关分期问题的建议则是以共同活动形式的分类为指导的,当然,从家庭作坊,到小范围手工业合作,到工厂,到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

国家企业,直到多国公司的发展,确实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但这种发展链条只能在一种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的形态中去追溯。这表明,社会进化不能根据劳动力的组织形式去重建。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市场的发展(从家庭经济,到城镇和国家经济,再到世界经济)或劳动的社会分工的发展(狩猎和采集,农耕与家畜饲养,城市手工业与农业,农业与大工业,如此等等),这些发展增加了社会组织的复杂性。但是,当某种新的组织形式、某种新的交往媒介、或某种新的功能机构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增长了支配外在自然力的力量)时,当它们服务于对内在自然的压抑并不得被理解为生产关系的某种要素时,它们却没能明白无误地将生产关系表明。鉴于这个理由,直接通过生产关系决定不同的生产方式并根据生产方式去分析社会复杂性的变化,显然很有益的。<sup>④</sup>

2. 自然,在应用生产关系这个概念时,也有若干项困难。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是如何被调整的。现今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特征,是以对五种普遍的、发展-逻辑的生产方式序列的接受为标志:<sup>⑤</sup>(1)在原始社会里,劳动和分配通过亲族关系来加以组织,不存在私人与自然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原始公社的生产方式)。(2)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古中国、古印度和前哥伦布时期美洲的早期文明中,土地被国家所拥有,并由教士、军队和官僚来管理,这个范围还包括遗留下来的乡村公社所有制(即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3)在古希腊、罗马和其它地中海社会中,私人土地所有者则把家庭经济框架内统治奴隶和日工劳动者的专制地位与城邦或国家政治共同体中的自由公民的地位结合在一起(古代生产方式)。(4)在中世纪的欧洲,封建主义以大量私人庄园为基础,这些庄园被赐给那些与封建君主有着各式各样依赖关系的人(包括农奴制),这些关系立刻具有了政治的和经济的性质(封建生产方式)。(5)在资本主义中,劳动力成为商品,结果,直接生产者对

生产资料所有者的依赖性就通过劳动契约的法律形式和劳动市场的经济形式被促成。

上面这个应用图式,在人类学研究和历史研究中陷入了困境。部分地说,存在着混和形式和过渡形式的问题——只有几个例证,在其中,某个特定社会的经济结构与某种单一的生产方式相一致。不论是文化之间的扩散还是时间性的交错,都允许复杂结构的产生,复杂结构不得被译解为若干生产方式的结合。但更重要的问题是由生产方式之发展-逻辑的顺序本身提出的。如果我没弄错,当前的讨论主要围绕着下面这些关节点:

1. 我们究竟怎样以同一个原始公社生产方式为基础,来区分新石器社会和旧石器社会?这一点是完全不清楚的。“新石器革命”不仅标志着某种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且标志着某种新的生活方式。<sup>⑫</sup> 由于这个理由,有些人已经提议把占用经济阶段从生产经济阶段中区分出来。新石器社会的人,不同于狩猎者和采集者,(后者只是直接利用索取到的自然财富),农耕和家畜饲养已经提出了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土壤和耕地,家畜),正是这种需求使所有权问题得以突出。<sup>⑬</sup> 其它差别则与社会组织的复杂性相联系(团伙、部落、宗族)。<sup>⑭</sup> 最后,有可能为下面这种推测提供基础,即标志着向新石器社会过渡的技术发明是依赖于具有连贯性的神话世界观的发展的。<sup>⑮</sup>

2. 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多方面的讨论,已经提出了一整套系统问题。该生产方式是否可以被理解为原始公社制度的最后阶段?抑或是阶级社会的第一种形式?<sup>⑯</sup> 如果后一种观点确乎显得有理——就像我们所相信的那样——那么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标志着某种普遍的发展阶段呢,还是与古代生产方式并行的、阶级社会发展的一种特殊途径?或者,它是否是古代生产方式和封建生产方式的某种混合形式?<sup>⑰</sup>

3. 关于封建主义的分类也同样遇到很大困难。<sup>⑧</sup>它是否是一种可清晰界定的生产方式? 还是仅仅为一个无需分析的集合性概念? 如果确有一种这个类型的、独立的生产方式, 它是否标示着某种普遍的发展阶段? 如果是, 是否只有中世纪的欧洲社会达到了这个阶段?

4. 第3点提出的问题又进一步与如下的问题相关连: 古代文明如何与发展了的文明区分开? 社会子系统的分化和层次的增加乃是在同一个政治阶级的框架内发生的。在所有从进化意义上讲是获得成功的文明中, 都有某种显著的、世界观方面的结构性变化——从神话的宇宙世界观转变为以宇宙伦理学形式出现的、理性化的世界观——这个变化发生于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3世纪的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和希腊。<sup>⑨</sup>这种情形怎样根据唯物主义原则加以解释?

5. 以后工业社会理论为一方, 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理论为另一方, 二者之间的争论也属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这个关联域范围以内。除其它问题外, 它还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 在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中, 通过政府干预对资本主义的调整, 是标示着旧生产方式的最后阶段, 还是标示着向新生产方式的过渡?

6. 所谓社会主义过渡性社会的分类也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官僚化的社会主义与发达资本主义相比较, 是否在任何意义上都是某种进化方面更高级的社会形式? 或者, 它们仅仅是同一个发展阶段的两种变体?

上面这些重要的问题及其它类似的问题已经使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例如霍布斯鲍姆(Hobsbawm)产生了对发展的普遍阶段的怀疑(见他对马克思“前资本主义经济诸形式”一文的介绍)。当然, 这里仍然保留着如下的疑问: 上述问题是否仅仅与某种正常的科学探讨途径相联系, 还是必须被理解为一些信号, 标志着研究方

案的无结果性?我的意见是,目前最好不要以这种方式作出定论,因为生产方式的概念也许并不像一把没有经过充分控制的钥匙那样,如此不适于开启社会发展的逻辑这把锁。

## 5

生产方式概念的抽象程度不足以捕获社会发展的普遍性。生产方式可以在两种水平上被比较:(1)生产资料的结合规则;(2)这种结合规则与生产力发展阶段的结构适应性。在第一种水平上,马克思的区分是根据财产的公有或私有作出的。然而,关于生产资料独占性支配的观点仅仅导致有阶级结构的社会和没有阶级结构的社会间的界定。那种根据私人财产权被建立的程度、以及根据剥削形式(国家对乡村公社的剥削,奴隶制剥削,农奴制剥削,以及雇佣劳动制剥削)而作出的进一步的区分,却又太不明确,以至不允许进行毫不含糊的比较。<sup>⑤</sup>为了获得更大程度的精确性,芬莱(Finley)建议采用如下观察点:(1)与对事物的支配力相应的对财产的要求;(2)与对人的活动的支配力相应的对人的劳动力的支配力;(3)与从惩罚角度出发的豁免相对应的惩罚力;(4)司法审判过程中的权力和义务;(5)家庭范围内的特权;(6)社会变动性的特权(水平的和垂直的);(7)在宗教、政治及军事领域中与责任相对应的特权。<sup>⑥</sup>这些一般社会学的观点当然允许对某种给定经济结构作出更具体的描述,但它们的分析广有余而深不足,结果将是把诸生产方式变成许多各自独立的东西,并减弱了它们发展的逻辑性,这种归纳主义道路最终将导致种的历史概念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丢弃。当然,这样一种可能性——有朝一日,人类学-历史的研究可能迫使我们丢弃种的历史概念和历史唯物主义——不能

先验地加以排除。但同时,另有一条迄今还没有充分考察过的、可能引向另一种(正好相反)方向的道路却打动了。

它所指向的是一种甚至更具一般化色彩的方向,即对高度抽象的社会组织原则的寻求。我所理解的组织原则,指这样一些创新发明,它们通过可发展地、逻辑地加以重建的诸学习阶段使自身成为可能,并使新的社会学习水平制度化。<sup>⑤</sup>一个社会的组织原则限定着可能性的范围,它特别决定着:在哪种结构里,制度系统的变化才是可能的;在什么程度上,生产力可利用的能力能被社会地加以运用;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又在什么意义内才能被催动;在什么程度上,系统复杂性和适应性能力可以被提高。一种组织原则由若干调节规则所构成,这些调节规则是如此地抽象,以至在由它们决定的社会形态里,若干种功能等效的生产方式的存在都是可能的。正因为如此,一个给定社会的经济结构必须在两种分析水平上被考察:首先,是根据已经具体地结合到该结构中的生产方式;其次,是根据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所隶属的社会形态。论证这种类型的假设,要比提出这种类型的观点困难得多,我现在只能力图阐明这个研究方案,并使它尽量合理一些。

社会的组织原则首先可以近似地通过决定着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一体化形式的组织内核来表征。这些组织内核——作为总体组织的亲族系统,作为一般政治秩序的国家,存在于功能特化了的政府和被区别的经济系统之间的互补性联系——并没有被深入到其规范组成要素中进行彻底地分析。但在这里,我不打算继续循着这条分析途径,因为这些基本组织的规范性构成要素存在于如此众多的不同侧度内,以至几乎不可能把它们纳入某种发展-逻辑的序列之中。一种更有希望的努力,则是直接去划分——根据进化性特征——被社会组织原则所决定的社会一体化形式。

对于行为资质、特别是对道德意识的个体发生学而言的发展-

逻辑的连结,已经被近乎合理地研究过。当然,我们不应从个体发生学那里过于草率地引申出有关发展的社会水平的结论。恰恰是个体系统,才是个体发生学意义上的学习过程的承担者。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只有社会性主体才能从事学习。但是,社会系统借助于社会性主体的学习能力,能够形成新的结构,以解决威胁自己继续存在的转向问题(steering problems)。在这个程度内,社会进化意义上的学习过程依赖于自身所属的个体的资质。反过来,个体又要求他们的资质不是作为孤立的单子,而要成长并进入生活世界的符号化结构。这个发展要经历三个交往阶段。下面,我打算非常粗略地阐述一下这三个阶段的特征。

在符号化中介的相互作用阶段,言说和行为仍然被囿限在单个的、强制性的交往模式框架内。借助于交往性符号,A表达了一个行为期望,对此B在满足A的期望的意向中,用一个行动作出了反应。这里,交往性符号的意义和行为的意义乃是相互界定的。参与者假设在人际关系中,他们原则上能够互相交换其位置,但是,他们仍然被限制在自身的施行性态度中。

在陈述性被区分的言语阶段,言说和行为第一次被分离开来。A和B可以把参与者的施行性态度和观察者的陈述性态度连在一起。他们中的每一个都不仅能采纳另一个人的角度,而且可以把参与者的角度变换为观察者的角度。这样,两种相互的行为期望就可以通过下列方式被协调,即他们组成某种交互动机系统,或者——就像我们也可以说的——某种社会角色,在这个阶段,行为是与规范分开着的。

在论辩言语阶段,我们与言语行为相联系的有效性要求,可以被主题化。在为某种主张立基或为某种行为辩护的过程中,我们把论证或(支撑着行为的)规范看作假想性的,也就是说,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设想:论证或规范可能是这样,也可能不是这样;它

们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不是合法的。规范和角色是作为证明的需要而出现的，它们的有效性可以参照原则而被质疑或者被确定。

我不准备处理这个交往发展的认知性一面，而只想指出社会现实将其刻度于自身的、一步步的分化过程：（1）在第一个阶段，动机（或行为期望）与行为主体在某种单一的现实平面上被知觉。（2）在次一个阶段，行为与规范分离了开来。规范与行为者及其动机是在这样一个平面上靠拢的，该平面存在于——不妨说——行为的现实平面的背后。（3）在最后阶段，行为规范由以产生的原则与这些规范本身也被区别开来，原则与行为者及其动机一起，被置于甚至是规范系列（也就是现存行为系统）的背后。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获得行为发生学理论的若干基本概念，这些概念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理解：或是作为资质概念——这些资质为进入某种符号化普遍性的言说和行为主体在各个发展阶段所获得——或是作为行为系统自身的基础概念。我想在作为行为系统自身基础概念的意义上应用它们，以说明不同形式的社会一体化的特征。在这样作的时候，我准备区分开用以调节正常情形的机制和这样一些特殊机制，它们在冲突的场合重新建立起被危及的理解的主观际性（法律和道德）。

在行为冲突并非通过强力或战略手段得以调节，而是把这种调节建立在交感基础之上的意义内，有这样一些标示着个体道德意识和社会的法律与道德系统的结构开始发挥作用。它们由上面提及的一般行为结构的核心领域所组成，即是使支撑着所有相互作用的相互性关系具体化的正义的呈示物。在皮亚杰主义的研究传统中，道德意识的发展阶段已经被揭示出来，这个发展系列是与相互作用资质的发展系列相对应的。<sup>⑨</sup>在行为动机和行为主体仍然在某种单一的现实平面被知觉的前习惯性阶段，只有行为后果在冲突的场合被评价。在习惯性阶段，动机则可独立于具体行为

后果而被评价,对一定社会角色或现存规范系统的遵循,乃是这个阶段评价的标准。而在后习惯性阶段,这些规范系统丧失了自身准自然的有效性,它们被要求从普遍性的观点出发加以证明。

我已经对支撑正常状态(几乎没有冲突)的一般行为结构和构成对冲突的交感性调整之基础的核心结构作出了区分。这些道德意识结构既可以简单地在对行为冲突的判断中,也可以在活跃地解决它们的活动中发现自身的表达。如果我们同时留意着上述结构据以序列化的诸发展阶段,我们就能直觉式地、近乎合理地说明为什么在某些行为领域中,会经常出现结构性的差异。这些差异是:(1)驾驭正常行为情境的能力和把冲突情境置于道德-法律之下的能力间的差异。(2)道德判断与道德行为间的差异正像个体行为领域的情形那样,阶段差异也出现在社会系统水平上。例如,在新石器社会,道德和法律系统乃处于仲裁和部落律法的前习惯性阶段,而正常情境(几乎没有冲突)的调节却是在亲族系统的框架内,即在习惯性阶段上被进行的。相似的情形也可以见之于这样一些意识结构,它们已经在译解系统中明确建立起来,却没有在行为系统中发现自身的组织体现物。这样,在许多原始社会的神话中,就已经出现某些与道德意识发展的习惯性阶段相应的、叙述性构建起来的冲突及其解决模式。与此同时,那种组织化了的法却又满足着道德意识之前习惯性阶段的标准。

由于上述一切,在我们区分诸社会一体化水平的(带有很大尝试性的)努力中,将下列方面加以区分显然是可取的:(1)行为的一般结构;(2)世界观结构,就它们对于道德和法律的限定意义而言;(3)组织化了的法的结构和制约性的道德呈示物结构。

新石器社会:(1)习惯性构建的行为系统(符号化现实性被调整到行为水平和规范水平);(2)仍然直接与行为系统缠在一起(与解决行为的道德冲突的习惯模型缠在一起)的神话世界观;(3)从

前习惯性立足点出发的对冲突的法律调节(行为后果的估价,对作为结果而发生的损害的补偿,对原先状况的恢复)。

早期文明: (1)习惯性构建的行为系统; (2)从行为系统出发的神话世界观发挥着使权力位置的占有者合法化的功能。(3)从习惯性道德观点出发的对冲突的调节,这种习惯道德乃与施行或代表着法律的统治者相联系(根据行为意向的评价,从报复到惩罚的转换,以及从共同责任到个人责任的转换)。

发展了的文明: (1)习惯性构建的行为系统; (2)神话思维的斩断,理性化世界观的发展(和后习惯性的法与道德呈示物一起); (3)从习惯性道德观点出发的对冲突的调节,这种习惯性道德已从统治者那里拆分出来(发展了的司法管理系统,依存于传统的、但已制度化了的法)。

现代: (1)后习惯性构建的行为领域(某种普遍式被调节的战略行为领域的分化,如资本主义企业,资产阶级民法),通向某种以原则(规范意义上的民主)为基础的、政治的意志形态的途径; (2)普遍式发展了的合法化学说(理性自然律); (3)从某种对法律与道德作出严格区分的观点出发的对冲突的调节,一般的、规范的和理性化的法,被原则所指导的私人道德。

## 6

现在,我打算举例说明,对社会进化理论来说,如何能使上述方法富于成果。我将选择阶级社会的产生这个例子,因为对此我可以借助上面提及的K·埃德(Eder)的有关研究。<sup>⑨</sup>

1. 阶级社会是在某种政治秩序框架内发展起来的。社会一体化不再需要通过亲族系统来继续,它可以由国家来接任。现在已经

有多种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对此,我打算作一个简短的评述。<sup>⑤</sup>

(1) 叠·加·理·论。<sup>⑥</sup>是用游牧部落对定居农民的征服及征服者统治的建立来解释政治统治阶级的产生和政治秩序的确立的。现今,这种理论被视为已被经验所驳倒,因为游牧生活是在第一种文明之后方才出现的。<sup>⑦</sup>国家的产生显然有其内在的原因。

(2) 劳·动·分·工·理·论。<sup>⑧</sup>在复杂性方面有所进展。农业生产获得剩余产品,并且(与人口的增长相结合)导致劳动力的丰富,这使劳动的社会分工成为可能。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集团分别占用着社会财富并形成了社会阶级,这些阶级中,(至少)有一个被假设具有统治功能。尽管这种理论颇具启发力,但它并不清楚连贯。劳动的社会分工意味着职业系统中的功能特化。但是,由知识和技能加以区分的职业集团,其本来性质并不需要发展为在与生产资料结合方式上那种导致分化的对立利益。也没有论据表明,为什么统治功能必须产生于植根在职业特化内的利益差别。存在着政治统治阶级内部的劳动社会分工(教士、军官和国家官僚),也存在着劳动群体内的劳动社会分工(例如农民和手工业工人)。

(3) 不·均·等·理·论。<sup>⑨</sup>它把国家的产生直接追溯到分配问题。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出现了剩余产品和生产资料,财富方面增长中的分化导致了社会的分化,社会的分化乃是相对来说更平均主义化的亲族系统所无法应付的,分配问题要求某种不同的社会交往组织。如果这个论点是正确的,它将能够解释那些可能由某种国家组织加以解决的系统问题的产生,但仍不能解释这个新的社会一体化形式本身。进一步说,关于生产力自动增长的假设是不正确的,至少对于农业生产来说是这样。例如,亚马孙河流域的印第安人拥有生产剩余粮食的全部技术手段,但只是在与欧洲移民接触后,才提供了运用这些生产潜能的促动力。<sup>⑩</sup>当然,对于畜牧业农民来说,不均等问题是可以考虑的,因为牧群可以很容易地

被扩大。

(4) 水利成因假说。<sup>⑩</sup>它是用这样一种欲望,即通过大规模水利系统的建设解决土地干旱问题,来解释若干村社共同体向某种政治统一体的合并。对于水利系统的建设,管理机关乃是一种功能性需要,并成为国家的组织核心。这种假设已被经验所驳倒,因为在美索不达米亚、中国以及墨西哥,国家的形成都先于水利设施的兴建。不但如此,这种理论只能解释系统问题的出现,而不能解释通过什么方式,它们将得以解决。

(5) 人口稠密理论。<sup>⑪</sup>它主要通过生态因素和人口统计因素来解释国家的产生。人们可以假设,某种内成的人口增长通常会导致部分社会的空间性扩展,也就是导致向新地区的移民。然而,当生态情境、比邻的高山、大海或沙漠、贫脊的土地,或其它类似的自然因素阻碍了移民的进展时,冲突就将被人口의稠密和土地的匮乏所激发。这样,剩下的唯一选择只能是对人口中绝大部分人实行镇压,使其处于某个得胜部落的政治统治之下。而人口密集化的大量居民的集结,也只能通过国家组织加以管理。尽管这种类型的人口问题可以在所有早期文明中见到,但这个理论与其它理论一样,也没有解释上述问题为什么、以及怎样才能被解决。

以上理论没有一个能区分开那种超过亲族系统适应能力的系统问题和由以解释向新的社会一体化形式之转变的进化学习过程。只有借助于学习机制,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若干社会能够发现那些引发其进化的解决方式,为什么他们能够准确地发现作为解决途径的国家组织。如此,我趋向于采纳下列定位点处理这个问题:

(1)(认知发展心理学意义上的)诸发展阶段可以在知与行能力的个体发生学范围内加以区分。我把这些阶段理解为规定着可能学习过程之条件的学习水平。由于学习机制属于人类有机体的

装置(言语能力),社会进化之依赖于个体学习能力,只有在(部分是特定的)边界条件被满足的情况下才成为可能。

(2)被社会的个体成员或边缘社会集团首先获得的学习能力,通过范例性学习过程进入到该社会的译解系统中。集体享有的意识结构和知识储存代表着——从经验知识和道德-实践洞见方面——某种可社会地加以运用的认识潜能。

(3)我们也可以在社会的角度上谈论进化学习过程,就进化学习解决那些代表进化挑战的系统问题而言。这些问题超过了既定社会形式所限定的适应能力。社会能通过应用包含于世界观中的认知潜能于重组行为系统,进化性地进行学习。这个过程可以被呈示为某种已经在世界观中发展了的理性结构的制度体现。

(4)新的组织原则的引入意味着新的社会一体化水平的建立。这一点反过来又使提供(或制造新的)可利用的技术-组织知识成为可能,它创造了一种可能性,也就是,生产力的某种增长和系统复杂性的某种延伸。这样,对于社会进化来说,道德-实践意识领域中的学习过程就作为领步者发挥着功能。

2.根据这些定位点,我打算给出下列有关阶级社会起源的解释概略:<sup>⑤</sup>

(1)需要解释的现象乃是政治秩序的产生,该政治秩序将社会加以组织,以便社会成员隶属于不同的血统世系。社会一体化功能从亲族关系转变为政治关系,集体同一性不再由某个共同祖先、而是由某个共同统治者来代表。

(2)该现象的理论阐释。一个统治位置赋予运用合法力量的权力,力量的合法性不能仅仅以亲族身分的委认为基础,因为建立在家庭地位或一般的合法化亲族关系基础上的要求,乃是被统治者的政治权力严格限定的。在法律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即它拥有习惯性道德的特征——被认可后,合法性力量就使司法管理

的功能、司法者的地位具体化。当司法者代替了那种被束缚于仅仅是被卷入集团的偶然性力量群集的仲裁者角色、又能根据主观际认可的并被传统所承奉的法律规范进行判断时,当他把当事人的意向与具体行为的后果一并考虑时,当他不再由对破坏者施加报复和恢复原状的观念作指导、而是惩罚犯罪一方对某种规则的亵渎时,情形就是如此。合法性力量首先拥有在习惯性司法管理中运用制裁力量的形式,与此同时,神话世界观作为对自身解释功能的补充,也在合法统治的意义上发挥着证明功能。

(3) 解释目标所遵循的思路。统治地位的分化预先假设着可推测的统治者借助于司法的习惯性管理而构筑的合法性权力。这样,国家的产生就应该通过司法地位成功的稳定化加以解释,这种司法地位允许在习惯性道德水平上对行为冲突的交感性调整。

该解释概略为如下:

① 最初的国家。我把这样一些新石器社会——在其中,亲族系统的复杂性已经导致某种更强有力的等级组织——看作在进化方面有希望的社会。它们已经使非恒常性限定的政治角色组织化。酋长、国王或头领乃是根据他们的具体行为被判定,他们的行为并非天生就是合法的,这些角色只是暂时性地被组织化(例如,为了战争),或被限定于特殊任务的实施(例如,为防涝或丰收提供保证)。从社会结构的观点看,这些角色还没有进入社会组织的核心。<sup>④</sup>

② 特殊的系统问题。在拥有进化希望的新石器社会里,产生了那些由亲族组织原则限定的适应能力所无法处理的问题。例如由生态条件决定的土地匮乏与人口稠密的矛盾,或 by 社会财富不平等的分配所导致的问题。这些在既定框架中不可能解决的难题变得越来越明显,它们越益经常地引起超越古代法律组织(仲裁机构、世仇法)能力范围的冲突。

③ 新结构的试验。若干处于(由上述问题带来的)进化挑战压

力下的社会开始运用其世界观中的认知潜能，并且——首先在尝试的基础上——使习惯水平上的司法管理组织化。这样一来，例如，战争首领之被授权宣战，就不再仅是根据权力的具体分配，而是根据社会认可的、立足于传统的规范。法律不再仅仅是当事人之间的一致或认同了。

④通过系统形成的稳定化过程。这些司法定位可能成为社会进化的领步者。然而，正如非洲巴罗兹(Barotse)帝国的情形所表明，并非所有有希望的试验都会凭借这样一些司法功能导向统治定位的永久性制度化，即不是都能导向进化的成功。只有在适宜的条件下——例如，当部落取得军事胜利或一项水利工程完工时——这些角色才能被永久性地予以分化，也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使角色稳定化：他们将成为某个政治子系统的核心。这一点把进化上成功的社会系统同仅仅是有进化希望的社会系统划分开来。

⑤阶级结构的出现。“在政治统治的基础上，物质生产过程将从亲族系统的限定条件里挣脱出来，并凭借统治关系重新加以组织”。<sup>⑥</sup>统治者通过为他的僚员、为教会、为勇士家族提供掌握生产资料之特权的保证(官庭和寺院经济)而促成他们对自己的忠诚。

⑥生产力的发展。“那种已经在新石器革命中被发现的生产力，现在可以大规模地加以运用了：耕作和畜牧业的加强，手工业的扩展，都是阶级社会增大了的组织能力的结果。这样，就出现了新的合作形式(如在灌溉农业中)或新的交换形式(如城镇和乡村之间的市场交换)”。<sup>⑧</sup>

3.如果上面所述能得到经验的支持，则这个论点也可以解释对立面的发展是怎样在社会进化中被连结的，即积累的学习过程——没有它，历史就不能作为进化(即作为一个具有方向性的过程)来译解——和人对人的剥削，后者在阶级社会中被强化。<sup>⑩</sup>历

史唯物主义是沿着生产力发展的轴线来标划直线型进步，并采用辩证思维形式来把握生产关系的发展。当我们假设学习过程不仅是在技术性有用的知识范围内进行、而且也在道德-实践意识的范围内进行时，我们就是在坚持存在生产力发展阶段和社会一体化形式发展阶段的存在。但是，剥削和压迫程度绝非与这些发展水平成反向的比例关系。从发展-逻辑的观点看来，那种通过亲族关系、并由前习惯性法律组织间的冲突促成的社会一体化与通过统治关系、并由习惯性法律组织间的冲突促成的社会一体化相比，乃是处于一个较低的发展水平上。尽管后一种社会一体化标明着进步，但在政治阶级社会中必然会出现的剥削和压迫，相较于为亲族系统所允许的、重要性较弱的社会不平等，都不得被认为是一种倒退。正因为如此，阶级社会从结构上看不能满足合法化的需要，（虽然）这种合法化是它自己创造的。这一点对于阶级斗争的社会动力学来讲，显然是关键所在。这种关于进步的辩证法应当怎样加以解释呢？

我在下列事实中发现了某种解释，即新的学习水平不仅意味着选择范围的扩展，而且意味着新的问题情境的产生。一个较高阶段上的生产力与社会一体化的发展，确实带来了被取代的社会形态中的种种问题的替代者。但是，这些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出现的问题可以——就它们与原来的问题是可比较的而言——在强化中增长。这种情形对于向通过国家组织起来的社会过渡中产生的负荷来说，似乎就是如此，至少直觉上是如此。同时，我们由以进行这种比较的侧度又被扭曲得如此之甚，因为我们没有把前国家型社会的特定负荷同时加以考虑。以亲族纽带组织起来的社会必须被更好地分离开，如果我们要根据那首先是对于阶级社会来讲才属典型的问题种类来检验这种社会的话。社会主义者关于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性概念并没有适当地区分进化意义上不同的问题情

境,而在某些异端传统中,人们的确可以发现不仅要进步概念、而且要对剥削概念作出区分的建议。很显然,根据下列情形作出区分是可能的:肉体损害(饥饿、疲乏、疾病)、个体损害(贬黜、奴役、恐惧)、精神绝望(孤独、空虚)。反过来讲,所有这一切又都有各种各样的希望相应:身体强壮和安全、自由和尊严、幸福与充实。

### 关于进步和剥削的补论

我已经试图把我们由以界定诸社会组织原则的基础组织——家庭、国家、区分出来的经济系统——纳入与历史进步的联系之中。历史进步凭借于社会一体化的发展阶段。但是,进化意义上重要的创新不仅意味着某种新的学习水平,而且意味着某种新的问题情境,即某种新的负荷范畴——二者伴随着新的社会形成。进步的辩证法可以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发现:借助于解决问题能力的获得,新的问题情境也进入到意识之中。例如,作为自然科学的医学,使一些疾病得以控制,这样就产生了同所有疾病相联系的可能性的意识。这种反思性体验乃是在准自然(naturwüchsigkeit)的概念中被捕获的——一个已经通过自身的伪自然性而被看到的生命领域,是准自然的。在某种未控制过程的可能性中遭受的痛苦,在下列程度内获得了新的性质:我们相信,我们有能力对这种痛苦施加合理的干预。这样一来,上述痛苦就成了新的需要的否定面。既如此,我们就有可能作出努力,把首先是由进化发展导致的问题和需要作为指导,去译解社会进化本身。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上,社会-进化的学习过程自身都会衍生出新的能源,这意味着新的匮乏侧度和由此而来的新的历史需求:

1.随着向生活的社会文化形式的过渡,即随着家庭结构的引入,出现了界分社会与外在自然的问题。最迟是在新石器社会,使

社会与自然环境相协调已变成一个主题。超越自然的力量作为稀缺的能源进入到意识之中。那种与外在自然的偶发性相联系的无能为力体验，不得不在神话与巫术中被译解。

2. 随着某种集体的政治秩序的引入，又出现了社会系统的自我调节问题。最迟是在发展了的文明中，由国家奠定的秩序化成就成为中心性需要，法律可靠性作为稀缺的能源进入到意识之中。关于社会压迫和专制的体验不得不与统治的合法化相平衡。这一点，是在理性化世界观的框架内完成的（进一步讲，正是通过理性化世界观，前面阶段的中心问题——力量之无有——才得以消解）。

3. 在现代，随着经济的自主化，则有社会系统与外在自然之自我调节的变换问题产生。最迟是在工业资本主义中，社会有意识地把自已置于经济增长和财富增长的规则之下，结果，价值作为稀缺的能源进入到意识之中。关于社会不平等的体验召唤着社会运动的付诸实行和与此相应的安抚策略。这些似乎将导致社会福利国家和大众民主方面的目标（进一步讲，正是在上述目标中，前一阶段的中心问题——法律的不可靠性——才得以消解）。

4. 如果后现代社会来临，就像它在今天从各种角度被想象的那样，将被科学和教育系统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所表征，人们则可以推测社会与内在自然之自我调节的变换问题的出现，稀缺的能源将再一次成为主题——不是力量、可靠性或价值的填补，而是动机和意义的填补。在内在自然的社会一体化（前面所述的需要译解的准自然过程）能在推论意义上完成的程度内，参与原则将在许多社会生活领域中走在前列。而同时处于增长之中的社会反常行为（和冷漠忧郁症）则可能唤起涉及动机控制的新的调整。届时，某种新的组织核心也许将环绕着一种新的组织原则而出现，它是一种这样的组织核心，在其中，公共教育、社会福利、自主化惩罚以及精神疾病的治疗方法等要素都将被合而为一。

我对上述观点的说明——对这些观点来说，至多只存在着一些线索——只是想阐释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一种在社会结构方面固定化了的社会力量的特殊运用模式，甚至可能比阶级统治的经济形式还要来得长久（无论是通过私人所有权的运用还是通过由“高贵者”占据的国家官僚机器的运用）。在阶级统治的未来形式中，对于社会心理方面的压力来说，“统治”（herrschaft——这个术语总是把公开的、束缚个体的、社会强力运用的政治形式在记忆中唤起，特别是欧洲封建主义的统治形式）可能会第二次——既是弱化的，同时又是被强化的——被折射出来，并且不是通过资产阶级的内战，而是通过社会福利国家的教育系统。至于这种情形是否将在扩展了的参与活动和增长中的社会管理之间、以及在成为反思性的动机形成过程和社会控制（即对动机的操纵）的增强之间必然引起恶性循环，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是不能被预先判定的（尽管存在着已经复活的悲观主义人类学颇为自信的断言）。

我已经提出了一个与社会的自身组成相连接的问题谱系，其范围是从与环境相联系的界定开始，中经自我调节和与外在自然的自我调节式变换，到与内在自然的自我调节式变换为止。伴随着每个进化意义上新的问题情境的出现，将会产生新的匮乏：适宜技术力量的匮乏、政治性确立的可靠性的匮乏、经济所导致的价值匮乏、以及文化性填补的意义匮乏。这样，新的历史需要才被推到前面。如果这个纲要是近乎合理的，则将有下列情形相跟随，即对于进化意义上新的问题领域来说，其逻辑位置已经穷尽于动机形成的内省式回转和意义的结构性匮乏。前一个循环的终点，可能意味着在某种新的水平上向问题界定的返回，也就是向社会化过程与之相冲突的内在限制之发现的返回，向新的、以上述社会个体限制为基础的偶发性之反抗的返回。

## 7

最后,我想扼要谈谈若干种其它的解释方式。结构主义、新进化主义、以及社会学功能主义都已作为进化理论的不同研究方法被提出。此外,与社会进化概念密切相关的历史进步概念,也提出了一些涉及科学逻辑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在历史哲学的批判形式中已得到处理,<sup>⑧</sup>另一方面又在某种进化伦理学的框架内得到了处理。<sup>⑨</sup>

1.阿尔杜塞和古德莱尔已经试图把列维-斯特劳斯的某些概念和假定引入历史唯物主义。<sup>⑩</sup>结构这个概念,是在研究原始社会时,与“野性思维”的类推性结构以及社会关系的家庭式结构相联系而发展起来的。结构概念涉及到这样一些基础的规范系统,它以认知、言语和相互作用为转移。这些规则不能依据表层现象来理解。它们属于深层结构,个体在创造可见的文化形成物时无意识地遵从着它们。规则并非仅对单个的个体有效,它们同样具有集体的有效性。不但如此,在每一个场合,规则都形成某种系统,这种系统使各种被创造的表达之间的转化关系的建立成为可能,结构可以理性地予以重建。<sup>⑪</sup>

这里,我不能深入讨论试图在马克思主义中采纳结构主义的基本概念的各种努力,这些努力已经促动了上述概念的更加广泛的运用,使其越出原来界线分明的人类学领地范围。结果,清晰的定义就在被要求之列了。在个体系统水平上,我们可以依次界定三种结构性侧度:认知、言语和相互作用,这意味着个体发展了这些结构和相应的资质,从而使下面所列成为可能:(1)思维运作、认识过程体验的运作和工具行为的运作;(2)语音和语法皆属完美的

语句的创造；(3)相互作用及其对行为冲突的交互式调整，而语言中的交往（以及——通过某种不同的方式——战略行为）又要求上述三种结构性侧度的结构综合。由于这个理由，语言中的话语结构（它超出了狭窄的语言学范围）很难加以分析，语言的中介意义则十分明显，在它那里，个体意识与社会意识被结合在了一起。

在社会系统水平上，我们可以——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为生产力和社会一体化形式确定不同的基础深层结构。生产力体现着技术和组织知识，可以根据认知结构被分析；制度框架和冲突调整机制体现着实践知识，可以根据相互作用结构和道德意识形式被分析。与此不同，世界观是一种高度复杂的形态物，它由认知、语言和意识的道德-实践形式所决定，结构的组成和相互间作用也不是一劳永逸地被固定的。

迄今为止，理性重建的努力主要是在那些基础深层结构较易区分的领域中取得了成果，诸如语言学，即语音和句法理论；人类学，就它所涉及的原始亲族系统而言（神话世界观对于结构主义分析来讲在下列程度内是可理解的：它仍然局限于相互作用的结构之网中）；<sup>⑭</sup> 心理学，理性重建也富有成果，这是就它（在皮亚杰学派研究传统中）涉及到的思维和道德意识的个体发生学而言。<sup>⑮</sup> 而重建努力不甚成功的领域多是些几种结构共同作用的场合，这一点可以在语用学理论那里发现；在社会语言学和种族语言学那里发现（就它们关涉到言说和理解过程的普遍性而言）；在语言的精神分析理论那里发现（该理论考察被系统扭曲的交往之条件）；在世界观的结构主义分析那里发现（该理论很少能洞察复杂传统表层下面的东西）。<sup>⑯</sup>

结构主义自然会遇到所有共时性研究的局限性。在语言学和人类学中，这一点之所以较少被注意，仅仅是因为其对象领域的统计学性质。在大部分场合，结构主义都把自身局限于现存结构的

逻辑,而没能扩及到结构形成过程的模式本身。只有皮亚杰创立的发生学结构主义——该理论研究结构形成过程背后的发展逻辑——才搭起了一座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桥梁。正如以上所表明的,它提供了把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置于抽象的发展-逻辑观点之下的可能性。

以经过个体发生学分析的认知发展诸阶段为模本,来勾画技术的发展史,从而使生产力发展的逻辑成为可见的,这一点确属可能。但是,生产方式的历史系列之能够依照社会组织的抽象原则予以分析,只有在我们确定了哪些世界观结构相应于社会一体化的个体形式、以及这些结构是怎样制约着现实认识的发展时,才可能办到。换句话说,恰恰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才指向世界观发展的结构分析,世界观的进化成为相互作用结构的发展阶段和技术性有用的知识进展之间的媒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中,这种情形意味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通过意识形态而发生着作用。

2. 19世纪晚期的进化人类学理论〔摩尔根、泰勒(Tylor)〕,在我们这个世纪,已被功能主义学派的文化相对主义观点驱逐到角落里,只有 V·G·柴尔德(Childe)和 L·怀特(White)这样一些作者仍然坚持一般发展阶段的概念。<sup>⑤</sup> 在具有统治地位的文化人类学〔克劳伯(Kroeber)、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米德〕的影响下,发展的理论观点,正如 J·H·斯塔沃尔特(Steward)的“多线路进化主义”所表明的,<sup>⑥</sup> 只是以某种非常谨慎的形式呈现出来,并使之适应于文化生态学。然而,近来生物进化理论的成功却为社会-科学的进化主义的复兴提供了促动力,社会进化不再仅仅作为含混的有机进化的延续过程而出现了。取而代之的,是新进化主义者〔帕森斯、卢曼、兰斯基(Lenski)〕<sup>⑦</sup> 开始酝酿的思想:社会进化可以和业经很好分析与检验过的自然进化模型相一致而得

到解释。生物学模型的启发作用无须争论,值得怀疑的是,生物学模型是否指出了一条通向一般化的进化理论之路,从而对自然发展和文化发展都同样有效?<sup>⑨</sup>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生物学模型依赖于自身调节系统的自我维持概念,这种系统把自己从极为复杂的环境中界分了出来。在环境与调节系统之间,有着一个复杂性间距,边界维持系统则面临着发展自身复杂性、使之能适宜地减小环境复杂性的任务。自然进化的承担者乃是物种,每个物种都被一种特定的、能使自身再生产的遗传构造所代表。物种是在群体形式中再生产着它们自己,这种群体形式使它们得以在其生态环境中稳定化。反过来说,这些物种又由个体有机体所组成,个体有机体在它们自身之间以及自身与环境之间产生着相互作用。进化学习过程立刻应用于遗传构造。通过突变过程(该过程可以被理解为遗传信息传递中的某种错误),各种歧异的表现型被生产了出来。在环境的选择压力下,这些表现型被加以选择,从而使依赖于环境条件的群体的稳定化成为可能。这种非目的论式的学习过程导致某种可以目的论式地予以译解的结果——物种能够在形态学和行为学的意义上被排列-顺序化,也就是说,物种可以根据其肉体组织的复杂性和反应潜能的范围而被排列-顺序化。

在把这种模型应用于社会的发展时,出现了三个基本难题:什么东西与突变过程是等效的?什么东西与群体生存能力是等效的?什么东西与各个物种占有的进化阶梯是等效的?

(1)在我看来,生物学模型的启发作用在于它把我们的注意力直接引向了进化学习机制。在文化传统基础上,显然有着一个产生变异的机制,它在某种目前还不甚明确的意义上,与突变相应。自然进化并非被这样一些个体有机体的个体学习过程——这类过程拓展并改进了遗传设计规定的行为——所影响,因为行为的改

进被限定于单个有机体的生命周期之内，而不能再将其纳入下一轮遗传构造的再生产中。与此不同，在发展的社会文化阶段，学习过程一开始就是社会式组织起来的，因此，学习结果可以被传递。这样一来，文化传统就提示着某种中介，通过这种中介，产生变异的发明创新能够在自然进化机制已经停止工作以后操作运行起来。

突变过程和社会学习过程间的区别是一目了然的。<sup>⑤</sup>在社会进化的场合，学习过程的发生并不是通过遗传构造的变化，而是通过知识潜能的变化，基因型与表现型的区分在这个水平上失去了它的意义。被传递的、主观际享有的知识乃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而不是孤立个体的所有物。因为他们之成为个体，只能是在社会化过程中完成的。自然进化在一个物种的成员中间导致某种或多或少是相似的行为保留成分，而社会学习过程则归结为一个加速的行为多样化结果。这类比较还可以继续下去。但是，我所看到的一个基本困难却存在于下面这个事实中：当生物化学近来已经在突变过程的分析方面取得成功时，那种构成如此复杂的文化传统现象之基础的学习机制，却几乎还一无所知。认知和分析发展心理学在这里又一次作出某些许诺，它们主张，学习机制既有新的认知结构学习中的适应和同化，又有动机基础生产中的验明和投射。然而，只要这些机制还没有得到适宜的分析，我们就不能断定突变与传统之间的比较是否仅仅是一种比喻；构成社会学习机制根基的东西，是否在某些方面确有与突变过程等效的功能。有一个区别应该唤醒我们的怀疑，那就是当突变过程生产出偶然的变异时，意识结构的个体发生却是一个高度选择的、有方向的过程。

(2)在自然进化中，学习过程的成功乃是依据群体在给定环境中使自身稳定化的能力来衡量的，而且，种的再生产归根结底要

依赖于个体有机体的生存能力。我们可以依次测定一个有机体避免死亡能力的各种准确数据,但这并不适于说明一个社会避免死亡之能力,甚至连社会避免死亡能力的含义为何都不是很清楚的。当然,满足再生产要求的一定数量成员的肉体生存,对于社会维持其自身同一性来说,确是一个必要条件,但它并不是充分条件。

规范地讲,社会同一性决定并依赖文化价值,同时,这些价值又可以作为学习过程的结果而发生变化。不存在可明确测定的目标-功能,似乎根据这种测定,社会的超稳定性就能被衡量。杜恩(Dunn)曾就此指出:

一个新行为的适当与否乃是根据它对目标汇合点的贡献来检验的。如果它未能通过检验,那么通常情况下它将无法在行为“保留节目”中赢得一个永久性位置。然而,由于在导向目标汇合点方面的失败,这一新行为不仅可能被验明是具有不适应性的新的行为模式,还可能使目标本身的适当性成为问题。简而言之,正如目标形成着对适应性行为的检验进而导致对行为观念的修正一样,行为观念有时亦形成对目标适宜性的检验并导致目标本身的修正。<sup>⑧</sup>

我不想继续追踪杜恩和卢曼在最高级系统价值的进化意义估价方面提出的建议(系统确立目标),<sup>⑨</sup>因为他们没能引导我们走出关于社会生命的自我参照性定义的毫无希望的循环。在社会文化阶段,学习过程从一开始就是由语言加以组织的,因此,个体经验的客观性乃是结构性地与个体中理解的主观际性缠绕在一起。由于这个理由,社会化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不同于那种处于类人猿发展阶段上的样本个体与物种间的工具式关系。提出这样

的建议——即把最高级系统价值从当下所论个体知道什么并希望什么的角度工具化——同样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些个体已经在他们的社会中被社会化了。如果这里应该有关于社会超稳定性的规范立论点，我们至多也只能在这样一些语言交往的基础结构中去寻找它们，在这些结构中，社会与其所属成员一起，再生产着自身。物种使自身再生产，是在足够数量的样本能避免死亡的时候；而社会使自身再生产，则是当它们能避免过多错误蔓延的时候。如果有机体的生存能力对于种的学习过程也是一种检验的话，那么，对于社会来说的相应的检验就存在于生产的尺度和技术性、实践性有用知识的功利化过程之中了。

(3)最后，在把生物学模型转用于历史发展时，还有一个困难见之于下列事实：关于增长中的复杂性的观点，并不足以跨越发展的进化门栏或水平。杜恩曾经建议在三种社会发展阶段之间作出区分：第一阶段，社会系统是在和外在自然的风险打交道时拓展其整体适应能力；第二阶段，与其它社会系统打交道所需要的适应性成就已经多于驾驭自然所需要的成就；第三阶段，那种和自然与社会环境打交道时发展起来的适应成就已成为反思性的，即对学习的学习。<sup>⑥</sup>卢曼则建议划分可根据三种基本进化功能的分化程度来进行，即根据变异、选择和稳定化的逐步分离。尽管这些标准都可以应用于历史物质，但并不令人满意。从功能主义的观点出发，我们确实能够区分复杂性的程度，但却不能区分进化的阶段。

甚至在自然进化中，复杂性程度对于确定一个物种在进化系列中的位置也并非充分条件，因为肉体组织或生活方式等方面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往往被证明是一种进化上的死亡终局。只有当我们知道一系列结构形态变化或反应潜能扩展的内在逻辑时，一个可信赖的进化分类才有可能。这里，中枢神经系统在种系发生比较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很典型的。如果我们要根据这个系统的发

展状态去划分不同的物种,我们就必须知道 CNS (中枢神经系统的英文缩写——中译者)的一般结构及其发展逻辑。<sup>⑤</sup> 社会进化也是这样,除非我们知道社会学习过程的一般结构和发展逻辑,否则是无法根据社会的发展状态去划分社会的组成的。这里,相应于中枢神经系统的,乃是基础认知结构,技术知识和道德-实践知识就是在该结构中被创制的。

3. 社会-科学的新进化主义通常满足于增长中的转向(或适应)能力的方向性尺度。从这个优势点出发,那种沿着系统理论之线发展起来的功能主义的概念和问题就被引入发展的理论之中,例如,现代化理论就进入了这种方法论框架。系统理论和进化理论之概念精品的结合在研究扩展着社会转向能力的结构变化时,无疑具有优势。另一方面,这个分析的获得物却又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错误地导致把学习能力的结构与社会复杂性相混淆。自我-满足的功能主义没有能鉴别如下事实,即无论在什么场合,复杂性方面的增长都只是在有关社会的组织原则中已经获得的学习水平上,才是可能的。但是,在不清楚特定于社会化过程的基础结构以及这些结构的发展逻辑时,我们就不能解释新的组织原则的建立。一个特定于对象领域的学习能力的阐释显然要先于复杂性的分析。

这一点可以在关于交往媒介的系统理论概念的运用中见到。最基本的交往媒介显然是语言,写作言语的固定化乃是在进化方面颇有意义的一步。有意义的另一步则是通过特殊媒介建立起来的各子系统的分化:通过法律建立的政治系统;通过货币建立的经济系统;通过真理建立的科学系统,等等。<sup>⑥</sup> 功能分析在这里只能表明上述创新是在增加着社会的复杂性,但不能解释以语言为基础的交往媒介的发展,如何在结构上是可能的,正像功能分析很少能解释为什么某种特定媒介可在某个给定的社会一体化形式中被

引入一样。这里，我不能详细说明交往理论如何可能从言说和行为的基础结构中将各种媒介导出，但是我想至少要指出一个结果。

只有当我们成功地根据某种发展逻辑把一系列组织原则顺序化、并确定相应的社会进化阶段时，关于复杂性的分析才能发现它自己的适当位置，从而服务于解释社会在适应生态条件和历史情境过程中所经历的特殊进化。如果我们不能用功能主义关于特殊进化的检验来补充发生学-结构主义对一般进化的研究，个体社会的社会文化形态学就将必然从进化理论中遗漏掉。<sup>⑥</sup>

4.在总结我们全部思考的时候，我打算再一次回到每种发展理论都具有的规范含义问题上来，甚至自然进化理论都不得不提供某种方向性尺度，以使对形态特征和反应能力的估价成为可能。这个尺度的选择在自然进化的场合显得较少麻烦，仅仅是因为我们可以求助于“生存”（或“健康”）的基本价值。有机生命与这种生命的再生产是如此之同义，以至我们并不把所有健康状态的规范性区别归结于观察者，而是归结于生命系统本身。在生命系统中，有机体自己制造着对效果的评价，即自我维持优于系统的毁坏；生命的再生产优于死亡；健康优于孱弱及其风险。进化理论家感到自己被免于作出价值判断，他们似乎仅仅是重复着有机生命再生产形式中已经给定的“价值判断”，这当然是一个逻辑谬误。从生命系统诉诸某些状态而非另一些状态的描述性陈述中，并不存在一条途径，似乎来自观察者的肯定性评价亦将随之作出。

或许，人们可以这样说，正因为进化理论家自己也是一种生命存在，他才自发地不仅倾向于把逃避死亡的一般特征当作某种自然现象来观察，而且还赞同它。无论如何，只有这种赞同才能解释许多生物学家的态度，他们把进化的方向看作某种好的事物，又根据物种在进化系列中占据的位置，不仅区分、而且评价着这些物种。总而言之，只有在这个假设前提下，那种试图发展出一套进化

伦理学的努力才是可理解的。<sup>⑥</sup>

在C·H·瓦丁顿(Waddington)看来,进化伦理学乃以生物学家的元伦理学洞见为基础(“生物智慧”),“伦理信仰的功能就是充当人类进化的媒介,而且进化本身也显示出一些可认可的进步方向”,<sup>⑦</sup>他相信他自己能避免陷入自然主义的谬误:

我认为,如果我们运用规范的科学方法去考察伦理信仰在世界发生的因果联结中被卷入的方式,我们将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伦理化功能乃是充当人类进化之进步的中介,这个进步现在主要是在社会领域和心理学领域内发生着。我们也将发现,这个进步在作为整体的世界范围内,亦展示着某种方向,即作为生理健康的概念,从良好或病弱等方面得到定义。把上述两点综合到一起,我们就能界定某种尺度,就其有效性而言,该尺度不依赖于任何预先存在的伦理信仰的认可。<sup>⑧</sup>

但是,如果由进化选定的任何伦理性的生物智慧都是在下列事实、即它促进了进化和社会系统的学习能力中得以表达的,我们就不得不预先假设:(1)我们知道社会进化是如何被衡量的;(2)我们把社会进化视作好事。瓦丁顿则是从这样一种想法开始:上面两点预先假设已经在生物学中恰如其分地被证明,因为:①自然进化的方向性尺度被认为同样适用于社会进化;②在生命再生产中,健康作为某种客观价值被肯定。但瓦丁顿忽略了即便①是没有问题的,②也存在一种自然主义谬误:生物学家决不是被迫把观察到的、内在于有机生命的自我保存倾向当作他自己的偏好来采纳,除非他承认他自己也是一种生命存在。但认识主体在自己的客观式态度中,很容易忘记这个事实。

而在语言交往——作为理论家，我们必须总是（已经）依赖于它——之规范基础的场合，情况就不甚相同了。在采纳一种理论态度时，在从事演讲论辩时，或者在任何形式的交往行为中，我们都总是（已经）作出了——至少是隐含地——一定的预先假设，在这个预先假设之下，单独的交感才是可能的——例如，像这样一种假设：真实的陈述优于虚假的陈述，正确的规范（也就是可证明其正当性的规范）优于错误的规范。对于一个在普遍语言交往结构中保持自身的生命存在来说，言语的有效性基础具有普遍的、无可回避的、以及（在这个意义上）超验的假设前提的约束性力量。<sup>⑧</sup>理论家在面对内在于言语的有效性要求时，并不拥有像他面对有关健康的基本生物学价值时所具备的选择的可能性，否则，他将不得不否定一些预先假设，而这些预先假设一旦被否定，进化理论也就毫无意义了。这样一来，如果我们并非自由地拒绝或接受与人类认知潜能密切相关的有效性要求，那么所谓“决定”赞成还是反对理性、赞成还是反对理性化行为潜能的扩展，也就毫无意义可言了。<sup>⑨</sup>鉴于以上这些理由，我不认为对进步的历史唯物主义尺度的选择是一种专断，生产力的发展，连同社会一体化形式的成熟，同时在两个侧度上意味着学习能力的进步：客观知识方面的进步和道德-实践洞见的进步。

## 第五章

# 现代国家中的 合法化问题

这篇文章是为 1974 年 10 月召开的德国政治科学学会的一次会议而作，文中与会议有关的部分已被省略。

去了解人们在说些什么总是有益处的。这一点对于合法性问题的处理犹为正确。……在（1）作出若干项概念区分后，我打算（2）考察现时代的合法性原则，然后，我将表明（3）现代的合法性问题是怎样产生于资产阶级国家结构的，（4）这些问题又是如何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转换的，（5）将以确证这里所用的重建性概念为目标，去检验几种合法化概念。

## 1

合法性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有着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这个定义强调了合法性乃是某种可争论的有效性要求,统治秩序的稳定性和依赖于自身(至少)在事实上的被承认。如此,这个概念就首先既是历史地、又是分析地用于这样一些情境,在其中,某种秩序的合法性乃是被质疑的,而且,就像我们所说的,合法化问题正在其中出现:一边否认、而另一边维护着合法化。这是一个过程——塔列朗<sup>〔注〕</sup>力图使波旁王朝合法化,这种类型的过程在现代组织化国家中(由于反对派制度的存在)表现得较少戏剧性,即它们表现为无危险性并被规范化。由于这个缘故,在今天把合法化当作一个恒常问题来讨论是很现实的。当然,在这个框架内,合法化冲突也能够突然燃起对原则的质疑之火(就像1864年关于普鲁士议会预算权力的质疑那样),这一类冲突可能导致合法化的暂时取消,还可能在某些情境中,招致威胁着一个政体继续存在的后果。如果这种合法化危机的结果又与不仅是该国家、而且是作为整体的该社会的基础制度的改变相关连,我们则用革命来称之为(而当像宗教改革、或机械织造术的引入、或德国唯心主义一类都被称之为革命、从而使这个术语大大膨胀时,它并不用来代表这些事情)。

较少琐碎的是合法性概念的应用领域。只有政治秩序才拥有着或丧失着合法性,只有它们才需要合法化。跨国公司或世界市

〔注〕:塔列朗(Talleyrand),拿破仑前外交大臣。1814年春,塔列朗借各国联军进入巴黎,组成临时政府,迫使拿破仑退位,路易十八即位,波旁王朝由此复辟。——中译者

场不会有合法化问题。这一点对于前国家型社会即所谓原始社会同样是正确的。原始社会乃是根据亲族关系而组成,在这类社会中,存有某些对自然和社会秩序作出译解的神话,神话把部落集团中的关系(及其制约性)加以固定,从而促成着某种集体同一性。但在这里,神话世界观与其说具有随之而来的合法性意义,不如说具有构成性意义。<sup>①</sup>

我们首先把合法性与政治秩序相联系。历史上的政治统治乃是围绕着皇室法律的功能,围绕着建立在被认可的法律规范基础上(而不再仅仅通过专制暴力)的冲突调节中心得以具体化的。这个水平上的司法管理确立起一种地位,从而使司法权威归结于法律系统制裁力量的支配权,而不再仅仅诉诸亲族地位(和专制者的中介作用)。法官的合法性力量能够成为统治系统的核心,当社会完整受到威胁时,社会就把干预功能赋与统治系统。<sup>②</sup>确实,国家自身并没有建立起社会的集体同一性,国家也不能通过不属于其处置范围的价值和规范,自己实现社会的一体化。但是,由于国家被假设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决策权保证着对社会分化的阻遏,国家力量的行使就与将社会保持在其规范地被决定的同一性内的要求系在一起了。这样一来,国家力量的合法性就据此得到了衡量,如果它将继续存在的话,它就必须作为合法的而被认可。

在更加晚近的政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试图解释现代国家的产生)中,同一性的获得、合法化的实现、以及社会一体化都是作为一般系统问题被列出的。<sup>③</sup>当然,关于这些概念的系统理论的再阐述遮蔽了对政治统治来讲本是构成性的联结要素。政治子系统承担有保护社会、并使其免于分化的任务,但它不能自由处置社会一体化或界定性力量的蓄积力——正是通过界定性力量的蓄积力,社会的同一性才得以巩固。在通过国家组织成社会的这个进化阶段上,不同形式的同一性已经得到发展:帝国、城市国家、民族国

家。确实,这些国家仅仅与一定类型的政治统治相容,但并非与它重合。一个世界帝国、一个希腊城邦、一个中世纪社团、一个民族——所有这些都表达着不同的政治秩序与不同生活形式(性格、气质、民族精神)的结合。<sup>④</sup>这样一来,如果国家建筑和民族建筑是相互依存的话,现代化研究把二者作为两个不同的过程来处理,就是正确的。

合法性范畴对通过国家组织起来的社会限定并非无关宏旨,这种概念确定具有经验性的含义。对此,我打算提出下列几点:

1、如果把合法力量与政治统治相等同,我就不得不坚持,在不求助于合法化的情况下,没有一种政治系统能成功地保证大众的执久性忠诚,即保证其成员意志的遵从。在对M·韦伯类型的法律统治的多方面讨论中(这种统治被认为仅仅是通过技术程序使自身合法化),只有C·施密特(Schmitt)和N·卢曼(Luhmann)接近于这样的立场:在现代国家中,通过法律作出的决策乃是在无机机的情况下被接受的。而在一个稍许不同的水平,我们则发现这样一种见解,即通过价值和规范获得、又由国家权威保护的社会一体化,在原则上可以被系统一体化所取代,即被非规范性社会结构(或机制)的潜在功能所取代。<sup>⑤</sup>与此相应的则是如下这种断言:系统的施行能使合法化成为多余的,那种中性的、可遵守的国家机器或经济系统的效用(这种效用不仅被参与者所感觉,而且被参与者所评价)本身就具有合法化的效果。<sup>⑥</sup>这些观点与前面建议的合法性概念的应用都是不相吻合的。

2、进一步讲来,根据合法化概念的应用,合法性问题并非只为当前时代所特有,像合法帝国或合法统治这类表述在古罗马和中世纪的欧洲亦到处可见。<sup>⑦</sup>在欧洲,如果不是从梭伦开始,那么至迟也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政治学理论就从事于合法化统治兴衰

存亡的研究。<sup>⑧</sup>而且,还可以举例说明合法性冲突自身在所有古老文明中,甚至是在这样一些古代社会中的存在,在这些社会中,伴随着自身的殖民化,被征服者与征服者(他们来自以国家形式组织的社会)之间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在传统社会里,合法化冲突采取的典型形式是以先知和救世主运动反抗宗教派系中的官方变种,这种官方变种通常使国家或祭司统治、教会或殖民统治合法化。在这个过程中,起义者诉诸该教派最初的宗教内容,有关的例子包括以色列的先知运动、古罗马帝国中早期基督教的扩展、延续到中世纪农民战争中的异教徒运动,还有近代土著居民中的救世主千年盛世运动(这些土著居民只是把殖民统治者的宗教反过来与统治者相敌对,用以批判统治者的合法性)。V·兰特纳利(Lanternari)曾引用过祖鲁人先知的启示性语言:“最初,我们拥有土地,而你们拥有《圣经》;现在你们拥有土地,我们却得到了《圣经》。”<sup>⑨</sup>我不能理解,面对这些世界范围的现象,人们怎么还能坚持把合法化问题继续限制在资产阶级社会和现代国家之内。

3、我发现这样一些断言甚至更无法理解,即认为合法化问题与阶级冲突完全无关。随着政治控制中心的分化,逐渐产生了使劳动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可能性和通过亲族系统对社会式生产出来的财富的占用、以及根据统治关系把亲族系统重新加以组织的情形,这种结构可能性在所有文明中都得到了利用。这样,一个阶级结构的产生,与其说是作为某种阶级之间的社会经济分工而出现,毋宁说是作为等级、种姓、身分、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的特权结构而出现。所有征候表明,正是在等级对立、剥削、面对面的社会力量中,(以古老帝国为基地)建立起了更加先进的国家。人们只需研究一下刑法的历史就会发现,结构性冲突已被构入这些传统社会的内部,这些冲突不得不在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中爆发。关于这种联系,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在罗斯特弗采夫(Rostovtzeff)的论

著中看到,论著是有关戈莱奇(Gracchi)和古罗马政治与社会动乱的开端的。<sup>⑩</sup>

在中世纪的欧洲,由农民、雇工和城市团体发动的反叛亦有很大扩展,这些反叛大多没有超出对合法化的批判范围。但是,当反叛与异教徒运动相结合时,却时常超出对合法化的批判范围。例如圣灵的兄弟姐妹组织——一个泛神论教派,它在公元1300年前后已在莱茵河下游两岸发展起来;<sup>⑪</sup>或如14世纪意大利北部各城市的激进的方济会各会。<sup>⑫</sup>农民战争不过是一系列以异教徒为基础并具有社会动员力的运动的最后一个重要环节。<sup>⑬</sup>这里,没有必要再在资产阶级革命的阶级背景方面浪费笔墨了。

下述一点没有什么可惊奇的,即阶级对抗处于各种不同的反合法化现象形式之后,因为社会的国家组织对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结构来说,乃是最为重要的条件。当然,合法性冲突作为某种规则,并不等于经济冲突所蕴含的规则,而是建立在使教义合法化的水平上。合法性不得不与集体同一性的定义相联系,而集体同一性又只能以这样一些结构为基础,这种结构使统一得以建立,并保证着交感——诸如语言、种族背景、传统、或者(确实还有)理智——的进行(我所知道的唯一例外是共产党。共产党曾在某些时候决定着工人运动的同一性。尽管工人运动最初只是一个导致冲突的结构,但由共产党领导的运动的目标却被认为将会使作为一个党的共产党本身成为多余)。

现在,让我们简略归纳一下以上概念分析的结果。关于合法性,我把它理解为一个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合法性要求则与某个规范式决定了的社会同一性的社会一体化之维护相联系。合法化被用来证明合法性要求是好的,即去表明现存(或被推荐的)制度如何,以及为什么适合于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去运用政治力量——在这种方式中,对于该社会的同一性具有构成意义的各种价值将

能够实现。合法化是否是可信服的,是否是被认可的,自然依赖于经验动机。但经验动机亦非独立地形成,它的形成有着合法化自身的(可规范式分析的)证明力量的影响,换言之,经验动机并没有独立于合法化潜能,并没有独立于可动员起来的基础或理智。那种作为理智而被接受的东西,那种具有产生交感之力量、并因此而形成动机的东西,依赖于给定情境中要求的证明水平。由于我打算在某种重建方法中运用合法化概念,在此先简短地考察一下证明的内在结构这个问题。

## 2

P·Von·克尔曼斯格(Kielmannsegg)已经对韦伯类型的合法性提供了一个清楚的评论,并且建议我们把传统主义和领袖人物的超凡能力当作每一种合法秩序都会假设的情形来理解。我们当然可以从合法力量的诸多形式中,从诸多统治类型中,区分出合法力量得以建立和维持的这些方面。这里,我们将再一次把合法性基础和统治的制度化合分离开来,某些制度系统与给定的证明水平是相吻合的;某些则不相吻合。

我不能(像似乎是必要的那样)根据被表征物的规范性质去表征那些历史上相似的证明水平。作为代替,我想用若干事例加以说明:(1)在早期文明中,统治家族乃是借助于原始神话证明自身的正当性。这样,法老们首先把自己说成是神——例如,作为赫鲁斯神(Horus),奥西瑞斯(Osiris)的儿子。在这个水平,只需有叙述性基础就足够了,这就是神话传说。(2)伴随着古代文明帝国的发展,对合法化的需要也在增长。现在,不仅是统治者本人,而且整个政治秩序(据此统治者方可以为所欲为)的正当性都需证明,这个目

标的实现是由以宇宙论为基础的伦理学、高级宗教和哲学来完成的。这些东西回到了伟大的创始者那里：孔夫子、佛祖、苏格拉底、以色列先知、还有耶稣。<sup>⑭</sup> 这些理性化的世界观具有可教义化知识的形式，论证代替了叙述。这里确实有终极式基础、统一化原则。统一化原则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自然和人类的世界）来解释。思维的本体论传统也建立在这个水平上。（3）在现代，特别是自现代科学产生以来，我们学会了更精确地区分理论论证和实践论证，这使终极基础的地位发生了动摇；古典自然律被加以重建；使现代国家的产生合法化的新的自然律理论则自称，它的有效性独立于宇宙论、宗教、或各种本体论。

由于卢梭和康德，新自然律理论的发展导致了下述结果：理性的形式原则在实践询问中取代了诸如自然或上帝一类的物质原则，而实践询问涉及到规范和行为的证明。这里，证明并非仅仅以论证为基础，因为论证同样适用于以哲学形式出现的世界观框架。既然终极基础不再被认为是合理的，证明的形式条件自身就获得了合法化力量，理性协议本身的程序和假设前提变成了原则。在从霍布斯和洛克到 J·罗尔斯的各种契约理论中，<sup>⑮</sup> 关于某种自然状态或初始状态的虚构也具有确定这样一些条件的含义：在该条件下，协议不但能表达所有涉及者的公共利益，并且可以被认为是合理的。而在从康德到 K-O·阿佩尔的各种带有超验倾向的理论中，<sup>⑯</sup> 这些条件，作为普遍的和不可避免的理性意志构成物的假设前提，则或是被转换纳入到理性意志的主体中，或是被纳入理想的交往共同体内部。在这两种传统中，都是可能交感形态的形式条件而不是终极基础拥有合法化力量。

综上所述，我把证明水平理解为基础或理智可接受性的形式条件——即这样一种条件，它有助于使基础或理智的效用合法化，有助于使基础或理智创造交感并形成动机的力量合法化。这些水

平可以分层次地加以列定。被取代阶段的合法化,不管其内容如何,在向后一个较高阶段的合法化过渡时,都会发生“贬值”。并不是这一种或那一种理智、而是这种类型的理智不再被信奉。这种整个传统的合法化潜能的贬值,在文明时代是伴随着神话思维的萎缩而发生的;在现代则是伴随着宇宙论的、宗教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的萎缩而发生的。我的推测是:这些贬值式转换乃与向新的学习水平的社会进化性过渡相联系,新的学习水平同时在客观思维和实践洞见两个方面确定着学习过程的可能性条件。我不能在此深入讨论这些问题了。无论如何,对于现时代的合法化问题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证明水平已成为反思性的。现在,证明的程序和假设前提本身就是合法化之有效性立于其上的合法性基础,某种协议——这种协议乃是在作为自由的、平等的全体涉及者中间产生——的观念决定着现代合法性的程序类型(与此不同,合法性的古典类型则由某种秩序化世界的可传授知识的观念所决定)。与此相应的是主体地位的改变。神话是在一种天真素朴的态度中被误认为真实的;关于上帝、宇宙和人的世界的弥撒祷告历<sup>〔注〕</sup>式的知识,则是以作为智者或先知的历代传授的形式被认可的;而那些在理想化条件下制定协议的人们已经把译解能力掌握在自己的手里。<sup>①7</sup>

合法性的程序化类型首先是由卢梭创立的,标志着与自然相决裂的《社会契约论》提出了一种新的行为调整原则:社会。这种新的行为调整原则表明通过什么途径“正义可以在(人类)行为中取代本能。”那种每一个个体都能在其中整个地把他自己和他所有的准自然权利交付给共同体的情境被总括为一种条件,在该条件下,只有这些调整才被认为是合法地表达了公共利益,即一般意志,“因为如果每一个人都把自己整个奉献了出来,情形对所有人

〔注〕弥撒祷告历,是罗马天主教对弥撒和祷告所作出的指示日历。——中译者

就都是同样的;而且,如果情形对所有人都是同样的,也就没人会起意使它不利于他人了。”<sup>⑩</sup>当然,卢梭并没有把他的理想契约仅仅当作一种证明水平的界定来理解,他混淆了某种新的合法化原则的引入和将一种正义规则制度化的建议。*the volonte' générale* (一般意志)被认为不仅解释着有效性基础,而且标志着主权地位。这一切已经使迄今为止关于民主权的讨论混乱不堪。

我正在思考关于议会民主问题的讨论。<sup>⑪</sup>如果人们恰恰是把这样一些政治秩序——这些政治秩序使合法性的程序类型得以满足——叫作民主的话,那么,所谓民主化的问题就变成一种组织化问题了。因为这样一来,民主化就将依赖于具体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依赖于支配权限,依赖于信息以及其它类似的东西,这些东西表明着组织类型,而且在每一种情形下,其作用机制都能更好地适用于程序上合法的决策和制度的产生。自然,人们在这里必须用过程范畴来思考。我可以把民主地调整一个社会的努力仅仅当作一个自我控制的学习过程来想象,这是一个发现可构成下列假设前提之基础的调整的问题,该假设前提就是:社会的基本制度及其基本政治决策,将与所有作为自由和平等的涉及者(如果他们能参与进来的话)的非强迫性赞同在推论式意志形成物中相结合。民主化不能意味着对某个特定组织类型——例如,对所谓直接民主——的先验的偏好。

以规范的民主理论的代表为一端,以“现实的”或经验的民主概念的代表为另一端,两者之间的讨论已经作为有害的东西被放弃。<sup>⑫</sup>如果对民主的区分是根据理性的合法化原则从其它统治系统那里作出,而不是根据先验制定的组织类型,那么对立双方的相互批评就失去了他们的标靶。J·熊彼特(Schumpeter)及其追随者把民主归结为选择杰出人物的某种方法,我认为这种见解是成问题的。但这并不是因为这种杰出人物间的竞争与基本民主形

式不相吻合：人们可以想象一些初始情境，在其中，竞争性的民主程序很有可能产生出具有理性合法性前提的制度和决策来。我之所以认为熊彼特的概念有问题，是因为他是根据这样一些程序来定义民主，这些程序与自由协议及推论式意志形成物的程序和假设前提完全无关。杰出人物的民主统治程序乃是在某种决断主义方式中被理解的，所以这种程序不可能与证明——以可一般化利益为基础的证明——的观念相吻合。另一方面民主的规范理论倒是没有因为坚持这种程序合法性而碰壁。但是，当民主的规范理论把关于统治的证明水平和统治组织的程序混为一谈时，它们又使自己暴露在已经证明为正确的各种批评面前。如果统治的证明水平与统治组织的程序没有保持在分离状态中，人们就可以提出卢梭的观点作为反对的理由：从来没有过、将来也绝不会有一种真正的民主。

对统治有效性之基础和统治制度之间的区分，显然已在现代国家理论中引起了困难。例如P·Von·克尔曼斯格就相信，协议和赞同虽能为统治的合法性实施创造条件，但不能成为合法性的基础，因为合法性只有通过“诉诸那无条件有效的东西”才会产生。<sup>②</sup>显然，克尔曼斯格没有理解合法性力量向证明的反思水平过渡的现代意义。现在，只有协议的程序和假设前提享有无条件的有效性：一个协议被认为是合理的，也就是说，是某种一般利益的表达，只有当协议已在下列条件下——即它单独创造着合法性——得以实现时才是如此。另一个相似的误解则出现于W·汉尼斯(Hennis)的议论中(在本篇文章为之准备的这次会议上，汉尼斯先于哈贝马斯作了发言——英译者)。据他看来，现代国家中统治施行的合法性依赖于“倒属第二位的基础”，在他的解释中，“最终基础”这个术语仅仅标志着合法性统治的限界。当然，汉尼斯考虑的是信仰力量的利己主义化问题——借助于此，宗教战争才得以结束，而

今天的所有战争之船则在多元论的旗帜下扬起了风帆(这面旗帜掩饰的东西要多于它所揭示的东西)。但是,如果不是那从霍布斯开始、中经黑格尔流传下来的观点——也就是,这样一种论证,它为调整存在于所有涉及者利益之中的要求提供着根据或基础——的话,又是什么使国家的宗教中立合法化的呢?今天,既不是最终的,也不是倒属第二位的基础提供着合法化,是谁支持着它的问题乃是中世纪水平应该处理的。现在只有那些规则和交往性假设前提——它们使得以自由和平等为基础的一致或协议与偶然的、被迫的交感的区分成为可能——才具有合法性力量。至于这些规则和交往性假设前提能否借助于自然律建构和契约理论,以便在某种超验哲学的概念中、或在某种语言的语用学中、甚或在关于道德意识发展的理论框架中得到最好的译解和阐释,在目前场合倒是次要的问题。

证明的现代水平同样被这样一部分人所曲解,这些人感到自己首先是旧式的欧洲人,他们相信,对于程序合法性的取代,在理性协议的意义,可以通过统治施行之形式特征这种含义上的“程序”来作到。<sup>②</sup>确实,实在的规范性力量并不是奇想,但它却是一个标记,说明许多已被建立起来的规范乃是与那些遵从者的意志相依托的。在统治规范可以在没有理智的情况下被大多数人接受以前,我们的行为动机至此在其中形成的交往结构已经被彻底破坏了。当然,我们不会作出形而上学的担保,说这种情形将不会发生。<sup>③</sup>

### 3

现在,我打算简短考察一下现代国家中出现的合法化问题。我

们是根据这样一些特征,诸如合法性力量的垄断化、集权化的和理性的(在韦伯的意义上)管理、区域性等等来表征这个阶段的。这些特征勾画出的一个国家组织的结构之所以成为可见的,只是当我们放弃狭窄的、固定在国家上的政治视角,而考虑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时,才是如此。这种社会要求一种不同于帝国时代阶级社会的国家组织,那些帝国乃是通过非中介的政治形式而组成的(如古埃及、中国、印度、以及欧洲的封建主义)。让我们把这个过程的内在方面和外在方面试加区分如下:

1、从内在方面讲,现代国家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经济系统分化的结果,该经济系统乃是通过市场——也就是通过一种非中心化的、非政治的手段——对生产过程加以调节的。国家提供这样一些条件,在该条件下,作为竞争行为和战略行为之私人主体的公民,能够从事生产过程。国家自身并不从事生产,除非(也许)作为对企业的某种辅助(在这种情况下,一定量功能上必要的投资对企业来说不是、或不再是营利性的)。换言之,国家发展并保证着资产阶级的民法,保证着货币机制以及相应的基础结构,保证着从道德规范和使用价值指向中逸出的非政治化的经济过程之继续存在的先决条件。由于国家不亲自介入资本主义企业的事务,不得不通过吸吮私有收入作为维持自身存在的源泉。现代国家是一种建立在税收基础上的国家(熊彼特)。从这些决定因素中,产生了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一直热衷于分析的国家 and 公民社会相配合的结果。<sup>②4</sup>

与封建主义国家或古代帝国相比较,现代国家获得了更大的功能自主性,那种现代管理机构在面对公民和特殊集团时维护自身权利的能力也在一个更强有力的功能特化的框架内增长起来。然而,国家进入其中的、与经济的互补关系,却又第一次使国家支配范围方面的经济局限变得一目了然。“由于(国家)被排除于资本

主义生产过程之外而同时又依存于它……它就不得不为生产和积累的创造正常的以及(日益增长的)物质条件;而且,这也是为了保证生产和积累的继续不致陷于物质的、时间的和社会的不稳定状态,后者乃是内在于资本过程对社会的无政府主义适应的特性之中的。”<sup>②5</sup> 前现代国家也曾面临过在不能自由支配关于社会一体化的诸多能量的情况下,保护社会使其免于分化的任务。但是,现代国家却把国家秩序上的成就直接指向对某个子系统与自身主权领域的界分,这个子系统用通过交换关系建立起的系统一体化取代了(至少是部分地取代了)通过价值和规范实现的社会一体化。<sup>②6</sup>

2、至于新的国家结构的外在方面,现代国家是作为一个国家系统出现的。它形成于16世纪的欧洲,在那里,传统的力量结构已被瓦解,而文化的同质性却得到普遍化;世俗的和精神的权威已经分道扬镳,贸易中心则发展了起来。<sup>②7</sup> 瓦勒斯坦因(Wallerstein)曾指出,现代国家系统产生于“欧洲世界经济”——也就是一个由欧洲国家统治的世界市场——之中。<sup>②8</sup> 然而,中心与边缘的力量分化并不意味着任何一个单一的国家都已获得控制世界范围内各种交换关系的力量,而意味着现代国家不仅是与内在的经济环境一起,而且也是与外在的经济环境一起形成的。这种情形也解释了根据与其它国家的主权关系而被界定的国家主权的特殊形式。个体的私人自主性、战略性行为、经济主体都是以这样一种相互认可为基础,该认可乃是通过法律促成并能普遍地加以调整。对个体的政治自主性、战略性行为,国家力量则是以另一种相互认可为基础,该认可以军事力量的威胁为转移,并由此保留着——尽管有国际性协议——特殊的和准自然的性质。对于现代国家系统来说,战争和建立一支常备军以备战时动员是一个构成性要素,因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注,见下页)以来,此要素已经存在了长达300年之

久。这种强制性需要对税收管理机构、一般意义上的中心调整设施机构的形成所给予的推动，至少不亚于直接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组织性需要所给予的推动力量。<sup>②</sup>

如果我们谨记国家结构的内与外在这两个方面，那么下述一点就将变得很清楚：国家建构的过程必然对集体同一性的形式发生作用。那些大的帝国就是由这样一个事实加以表征的，即作为带有普遍性要求的复杂的统一体，大帝国能够仅仅通过合并、对附庸国的镇压、联合等途径外在性地——也就是从并未精确确定的疆域外围着眼——来界定自身。这种帝国的同一性不得不内在固定于一小部分上层人物的意识中，并和那些并非严格地加以一体化的、具有古代原初形式的各种前国家同一性相并存。民族的出现表明，这种类型的集体同一性是怎样在现代国家结构的压力下发生转化的。民族是一种（还未加以适当分析的）意识结构，这种意识结构至少在两方面满足着规则性要求：（1）它使存在于内在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民法的规范性平等结构（以及后来的政治民主结构）主体性地与存在于外在关系中的主权国家自我维护的特殊结构相吻合；（2）它又使一种高级的大众社会动员成为可能（因为所有的人都拥有民族意识）。法国革命为此提供了一个典型事例，这个民族是与资产阶级组织化国家和普遍兵役制一道产生的。

我已经回顾了国家建构和民族建立的过程，以有助于译解伴随着资产阶级国家形成的合法化主题。如果为了简单起见，我们把自己限制于关于国家理论的讨论，则可以（非常粗略地）区分出五种复合体，<sup>③</sup> 这些主题层次存在于若干个世纪中。前两个层次反映着新的证明水平的组成，后三个则反映现代国家和民族的结构。

---

〈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由法、德两国签订，以此结束30年战争。——中译者

1. 世俗化。伴随着公共管理和政府任务的功能特化,发展出一种政治概念,它要求获得具有政治内在性的证明。这样,把国家力量的合法化从宗教传统中拆分出来就成了第一等级的争论主题。就我所知,帕度亚(Padua)的马塞琉斯(Marsilius)如果不是第一个、也是第一批人中的一个(在他的1324年写的《抗御之协定》中,借助亚里士多德)批评了转置兵权(translatio imperii)的理论以及所有的理论性证明。<sup>⑩</sup>这个争论一直延续到19世纪,当时,一些保守的理论家如鲍耐尔德(Bonald)和麦斯特(Maistre)等人再一次试图为教会、君主政体、以及社会等级特权等传统力量寻求宗教根据。

2. 理性的法。关于理性自然律与古典自然律的伟大的辩论(其影响也深入到19世纪之中),集中于解决合法化的程序类型问题。<sup>⑪</sup>从霍布斯始到卢梭和康德,关于理性协议和自我决定的主导观念被引伸到这样一种程度,即涉及司法和公共福利的这类问题已经被剥去了所有本体论的内核。这个辩论无疑使依赖于世界观的证明水平发生了贬值。

3. 抽象权利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理性自然律当然不仅具有规范性一面,而且也具有物质性一面。从霍布斯和洛克开始,中经苏格兰的道德哲学家(休谟、斯密、米勒)、法国启蒙哲学家(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到黑格尔,出现了一种公民社会的理论,它把资产阶级的民法系统、公民的基本自由以及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当作某种保证着自由和最大福利的秩序来解释。<sup>⑫</sup>在这个新的证明水平,只有一种沿着普遍化之线组成的国家和社会秩序才能得到辩护。与传统主义者的辩论涉及到资产阶级理想所需要的历史代价,即涉及到特殊权利、理性的局限性等问题——这当然是从现今“启蒙辩证法”的角度而言。

4. 主权。内部和外部君主统治权的建立激发起一种冲突,这种

冲突首先是沿着宗教战争而展开的〔参见 1572 年圣·巴塞洛缪之夜(St·Bartholomew's Night)以后新教徒的政治出版物〕。这样,从鲍丁(Bodin)到霍布斯,主权问题就是在有利于专制主义的情形下被解决的。而在 18 世纪,出现了一种重新思考王侯主权、并把它变为人民主权的努力,如此,国家的外在主权才能借助于政治民主得以统一。当然,人民主权乃是一个传播开的战斗口号,它是在 19 世纪的制度辩论中被提出来的。在这个口号中,各种各样的思想主题都混杂在一起:作为某种新的合法化原则之表达而出现的国家主权;作为第三等级的统治权;作为民族同一性的权力表现等等。

5. 民族。作为最后一个复合体,民族拥有某种特殊地位,这是就民族意识在独立运动中引起人们对它的关注之前,常常以某种共同语言为基础,并在非常不同的文化中不甚显眼地发展起来而言的。实际的民族同一性(在 19 世纪)成为一个争辩的主题,只是在那些现代化过程被延缓的地方才是如此,就像 1804 年被分解的、帝国的后继者那样。而那种服务于析分内部敌人的民族主义——例如俾斯麦帝国之于 Reichsfeinde(国家之敌。包括社会主义者、波兰人、天主教徒)——已不再反映资产阶级国家在它的形成时期所具有的合法化主题,毋宁说,这种民族主义现在反映的是一种合法性冲突,说明这个国家在下列一点——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解阶级结构、而是第一次作为社会经济的阶级结构给阶级结构以纯粹的表达——变得日益清晰时,已深深陷入民族同一性的冲突之中。<sup>④</sup>自 19 世纪以来,这种震荡在由国际工人运动所构成的对合法性的威胁面前,已经成为持久性的现象。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现代国家的建立而产生的合法化主题。它们是在这样一个范围内表达着自身,即只要人们(就像汉尼斯那样)把自己局限于阶级

斗争的少量事例内部，局限于少数在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合法化危机，局限于资产阶级革命，那么，这种表达就将保持隐而不露。对象被合法化的程度之能被推测，只有当人们深入思考长达若干世纪的压迫、思考那些巨大的战争、思考那些小规模起义暴动及其胜败——所有这一切都为现代国家的产生铺垫了道路——时，才成为可能。例如，我正在思考被那些现代化研究称之为“渗透过程”（行政管理力量的建立）的反抗，诸如饥饿者的反抗（食品供应短缺时）、赋税者的反抗（对公众的剥削无法忍受时）、对招募新兵的反抗，等等。这些局部性的、反对现代国家各分支结构的造反，在19世纪汇成一股股细流。<sup>⑤</sup>尔后，这些造反又被手工业者、现代工业中的工人、农村无产者的社会反抗所取代。所有这些都促动了新的合法化问题的产生，资产阶级国家不能再单纯依靠民族意识的一体化力量，它不得不试图去遏止内在于经济系统的种种冲突，并把它们——作为某种超越分配问题的组织化斗争——引入政治系统。哪里成功地作到了这一点，哪里就将采取社会福利国家和大众民主的现代形式。

#### 4

关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合法化问题，我打算只就下列几点作出若干评论：（1）现今导致合法化问题的一个基本冲突；（2）问题解决的限制性情境；（3）合法化消解的两个阶段。

1、“社会福利国家和大众民主”这种表达涉及到对合法化来说颇具效果的政治系统的两个特征。这种表达一方面告诉我们，那种在工人运动中出现的对系统的反抗已经被政治党派间调整了的竞争卸去了导火索。除其它事情外，这种对“对系统反抗的导火索的

卸去”还使对立的角色制度化，使合法化过程正常化和永久化，使合法化中的变异定期化，使通过政权更叠形式而实现的合法化的收回通畅化，它还把每一个人都作为有选举权的公民卷入到合法化的过程中。

另一方面，对合法性威胁的解除又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成为可能，即国家令人信服地把自己呈示为一个社会福利国家，这种国家阻遏了经济过程中机能不良的一面，并使它对个体成为无害的。国家所进行的阻遏，既是在产生机能不良的事实之后（通过某种社会保障系统，以此缓解与市场中较弱地位相联系的基本风险），又是在产生机能不良的事实之前（通过某种生活条件的促成系统，这种促成系统被认为主要是借助在接受正常教育方面机会均等的方式发挥其功能）。在大众民主中，满足这种社会福利国家的设计要求，即使不是基础，至少也是合法性的一个必要条件。自然，这种设计预先要求着一个相对来说摆脱了动乱失调的经济系统的存在。这样一来，国家就从自身设计上被假设拥有弥补经济过程中功能缺陷的职责。今天，已没有人否认深深渗入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结构性风险，这种风险首先是与以产业循环为条件的积累过程的受阻、私人生产（这种生产不能自如地应付它自己创造的问题情境）的外在代价和特权模式（其核心是结构性决定了的财富与收入的不平等分配）的存在相关连。

这样，现今政府据以评价其政绩的三大职责领域就是：是否形成一项保证增长的产业政策；是否通过诉诸集体需求影响生产结构；是否纠正社会的不平等。问题并不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对上述事项的处置被期望于国家，国家不得不通过自我设计、自己承担的形式来对之进行处置；毋宁说，冲突——在这些冲突中，借助C·奥菲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合法化问题的根据——乃是存在于这样一种事实里，即国家被认定要执行所有这些职能并要在不破坏

资本主义社会的功能条件的情况下作到这一点，而不破坏资本主义社会的功能条件又意味着不能破坏那种把国家从经济系统中排除出来、同时又使国家依赖于经济原动力的互补性关系。<sup>⑥</sup>

历史地看，国家从一开始就被视为具有保护社会（该社会是在其同一性中规范地被决定的）并使其免于分化的功能，但又不具备自由处置社会一体化的能力，不能使自己驾驭社会一体化。现代国家首先通过为独立于国家的私人经济系统的继续存在提供担保而满足了这一功能性要求。只要被伤害的利益可以被当作私人利益并被分割，积累过程中的失调和不合意愿的结果就不致引起合法化的取消。然而，在资本主义经济过程渗透到更加广阔的生活领域、并使生活领域服从于自身的社会适应性原则的程度内，资产阶级社会的系统特征得到了巩固。这些曾经属于私人领域的条件的相互依赖性增强了对失调的敏感性，而且给失调以政治的标尺。这样一来，经济过程结果中的功能失调就可能越来越少地从个人彼此间的意义上被分割，而是中和式地与国家相联系了。正是从这里产生出与这类缺陷有关的国家的一般性职责和国家消除这些缺陷能力的假设，这一切都把国家置于某种自相矛盾的窘境之中：一方面，对缺陷的限定和处理缺陷的成功的标尺存在于必须加以合法化的政治目标领域中，因为如果国家打算承担上面所述的各项任务，就必须运用合法化力量；另一方面，国家在承担各项任务的过程中，又不能采取通常方式运用合法化力量，不能通过对决策的约束来作到这一点，而只能通过调整他人的决策，这个他人的私人自主性可能还没有被侵害。间接控制乃是走出矛盾窘境的选择，但对间接控制效果的限定则标志着这个矛盾窘境的持久性。<sup>⑦</sup>

现今，国家的合法化问题已不是如何掩饰国家行为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功能性联系以利于公共福利的意识形态定义了。这种掩饰已不再是可能的，至少在经济危机期间是如此。而且，由

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揭露也不再是必要的了。毋宁这样说,国家的合法化问题乃在于如何把资本主义经济的成就作为下列事象来显示,即作为相对来说可能性最高的对一般利益的满足,或者至少能暗含这种事象。这样,国家就使自已有计划地承担起把功能失调的效果面保持在可接受的限度内的义务。在这种角色委派中,国家对要求合法性的社会规则提供了合法性支持。

2、国家之证明自己有助于合法化,只是在它成功地处理了它计划要承担的任务时,才成为可能。而且,在相当程度上,这一点是可以被检验的。既如此,现今处于突出位置的合法化主题就可以被置于专家治国理论和参与模式的连结线上。我现在不打算继续深入讨论这个问题,<sup>③</sup>只想指出若干限制性情境,正是在这些情境中,今日的国家必须有效地为合法化完成其任务:<sup>④</sup>

(1)国家与经济之间的互补关系导致某种目标冲突,而且出现反映这种冲突的日益明朗的实在意识,特别是在产业循环处于萧条的阶段时。目标冲突存在于下面两类政策之间:一类是稳定政策,它不得不调整自身尺度使自已适应于独立的周期性运动的经济过程;另一类是改革政策,它意味着要补偿资本主义增长的社会代价,要求一种不考虑经济情境和利润动机的投资。<sup>⑤</sup>

(2)世界市场的发展,资本和劳动的国际化<sup>⑥</sup>也已经确定了民族国家行动范围的外部界限。确实,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的、从国际分层中产生的问题可以被分割开,但直到这一点,在那里,它们仍不会对发达国家中的合法化过程产生反作用。但是,民族经济彼此交织的结果(例如,跨国公司的影响)不可能是中立化的,只要政府不得不运用国家决策垄断性地宣布自身的合法性、并因此而对民族发展(这种发展是极不同步的)产生作用,那种在超国家水平进行协作的要求就不可能轻易被满足。

(3)直到20世纪中叶,民族同一性在先进的欧洲国家中仍然

得到了如此有力的发展,以至于如果没有其它办法的话,合法化危机能够借助于民族主义手段加以遏止。但在今天,却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不仅民族意识因过度刺激已近于枯竭,而且一个变腐的过程正在所有古老民族中向前推进着。世界范围的系统一体化机制(世界市场、武器系统、新闻媒介、人际交往)与地区性的国家社会一体化之间的不相称(对上述情形来说)可能是一个促进因素。人们再也不能如此容易地根据民族特征去区分内部敌人和外部敌人了,而与反对该系统有关的种种特征则作为替代者发挥着作用(就像近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中的“激进法令”那样)。然而,系统中的全体成员似乎也不能确立起一种肯定性的同一性特征。

(4)同样不能确定的是特别有利于“意识形态计划”(卢曼)的社会结构条件。教育系统在横向、纵向两方面的扩展,确实使通过大众媒介实现社会控制这一点变得更容易了。但是,政治的符号化使用〔在M·埃达尔曼(Edelmann)的意义上〕也因此而变得越来越受自我矛盾的种种行为的影响〔在晚间新闻中,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详细说明投资控制乃是一项“向前看的产业政策”,第二天,公民们却在《明镜》杂志里读到维纳尔(Wehner)对此的否定:“我们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语义学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当然,我在这里暂时忽略了《明镜》杂志的选择性销路。〕

3、如果在上述限制性情境中,国家不能把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功能失调的效果面保持在选民可接受的限度内,如果国家在自我降低其可接受性的临界值方面仍然是不成功的,那么,合法化的消解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这种情形的第一个标志就是日益尖锐化的关于分配问题的斗争,分配乃是根据国家享有份额、工资份额和利润率之间的零-整体游戏规则来进行的。通货膨胀率、国家金融危机以及失业率——它们只能在一定限度内相互替代——都是保证稳定这一任务失败的标尺。改革政策的夭折则标示着改变

不情愿的生产结构和特权问题的任务的失败。目前,上面所述的某些征候,可以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中发现。然而,这些征候在政治学领域内的反响却极为微小。我手头暂时还没有能使我们满意地解释这种情形的资料,而这样的资料将允许我们对某些特殊因素的份量作出正确的估价——例如,从大学中扩散开来的转向之风所发挥的作用,这种转向是通过恐惧的唤起、大量的人类学悲观主义、以服从为美德的誓约、以及有关的争论等有意识地造成的。

这个水平上的合法化的消解预先假设着分配斗争由以进行的各种酬报范畴本身是无可争议的,人们要求金钱、自由的时间和和安全,这些“基本的善”乃是作为获致某种非限定的具体目标之多样性的中立化手段被呈现的,而这些具体目标的选择则依据于各种价值。当然,有一些高度抽象的手段可以用于若干目的,但无论如何,这些中介物显然还是规约着被限定的“机会结构”。在这些中介物中得到映射的是一种生活形式,一种私人商品所有者的生活形式,这些商品所有者把自己的所有物——劳动力、产品、或支付手段——纳入交换关系中并使之适应于资本主义的财富运动形式。<sup>④</sup> 我不想更详细地讨论诸如家庭、职业、以及文明利己主义等的有关特征,也不想对使自身拥有的个体主义明朗化的生活形式作出评判(莫福森),但是,我怀疑:在今天,这种以适合于酬报的系统为镜鉴的生活形式是否还能像霍布斯的时代那样,根据资本主义发展本身已公开表明的新境况,充满信心地证明自己为合法。当然,如果合法化力量能成功地把实践问题重新界定为技术问题,甚至能成功地阻止资产阶级社会的价值普遍主义激进化的问题产生,那么,这样一类与合法化相关的问题甚至不需要被考虑。

此外,“对幸福的追求”在未来也许会意味着某些不同的东西。——例如,不是要积累作为私人所有的物质对象,而是要造就某种社会关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中,相互共存将占据统治地位,满足也不

再意味着一个人在压制他人需要基础上的成功。对这种关系来说,重要的是教育系统能否再一次被结合到职业系统中去,以及涉及我们在住房、教育、宗教、立法机构、计划管理机构、行政机构、还有一般文化生产等方面需要的译解——这种译解在很大程度上被外部条件所控制或被传统所禁锢——的推论式凝固化能否被避免。

## 5

最后,我想返回到我们思考的概念-分析出发点,我用来分析合法化问题的重建性概念,其意义究竟何在?

在今天,社会科学家(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家<sup>③</sup>)对合法化问题的处理,大多进入了M·韦伯的“影响领域”。一种统治规则的合法性乃是根据那些隶属于该统治的人对其合法性的相信来衡量的,这是一个“相信结构、程序、行为、决定、政策的正确性和适宜性,相信官员或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具有在道德上良好的品质,并且应该借此而得到承认”的问题。<sup>④</sup>(例如)系统理论家帕森斯、伊斯顿(Easton)、卢曼等就曾提出这样的询问:借助什么机制,一个适宜的合法化之建立才能被完成?或者,通过什么样的功能等效物,失策的合法化才能被取代?<sup>⑤</sup>学习理论家则通过某种服从动机的理论——该理论涉及对合法性的信仰由以产生的社会心理条件——与上面所述的问题相呼应。<sup>⑥</sup>结果,用这些东西对合法性问题的经验主义的取代,就允许进行有意义的社会学研究了(其价值将根据系统理论和一般行为主义方法的成功来决定)。

但是我们可以提出如下的问题:经验主义者必须为其对象的重新界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如果该对象领域乃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被设想,即并不是合法性规则,而仅仅是规则——它们被认为是

合法的——才隶属于该领域，那么，存在于交往行为中的理智与动机间的联系就被逐出分析范围之外了。至少，任何独立的对理智的评价都方法性地被排除了，研究者自己避开了任何系统的关于理智的判断，而对合法性的要求恰恰以这种理智为基础。自从韦伯以来，这种情形一直被当作是件好事。然而，即便人们采纳这种解释，下面的怀疑仍然没有消除：合法性、对合法性的相信、以及遵循某个合法性规则的意愿都与通过“健全理智”形成的动机有关，但这些理智是否是“健全的理智”，只有在论辩参与者的施行性态度中才能验证，而不能通过对这个或那个论辩参与者认为是健全理智的东西的中立性观察来确定。确实，社会学家关心的是有效性要求的事实性——例如，关心这样的事实，代表某种政治秩序提出的合法性要求是在某些特定群体中、以特定频率被认可的——但他们忽视了另一个事实，即规范的有效性要求与自身的被认可相遇乃是由于（除了其它理由之外）这些有效性要求被认为具有推论式证明自身为正确的能力，并能证明自己有良好的根基。这正与真实性要求的情形一样。这种要求的普遍性使社会学家有可能系统地核察一个断言的真实性，而不管该断言在某个特定群体中是否也被认为是真实。对于分析来说，知道一个群体是在正确的、还是在错误的意见基础上来行动（例如，去确定某些认知性谬误或其它原因对观察到的错误是否在原则上负有责任），可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样的情形也可以见之于关于政治组织的规范有效性要求，例如，人们可能想知道一个政党如拒绝服从国家，是否是因为该国家的合法性已失去真实意义，或是还有其它因素在发挥作用。要想作出这类判断，我们就必须能通过某种合理的、主观际可检验的方式来系统地评价合法性要求，我们能作到这一点么？

汉尼斯对此的回答是肯定的，他把“合法性与不合法性的批判的、规范的界分”看作是绝对必要的事情，但却未能确定这种界分

的程序或标尺。他虽提到了若干合法性因素：个人权威、管理公共事务的效率、对结构的称许等，但个人权威被认为“来自不可能找到合理根据的源泉”；怎样才算是有效率的工作管理，又要看它所依据的标准是什么，这样，他所列的众多因素又都与某些结构有关。关于这些结构的合法性，汉尼斯只能言之曰：它们是在不同的理性变体中自我建立的。他并没有讲什么东西才可以视为统治合法性的基础，要讲清这一点，要求有一个具有规范内容的合法性概念。汉尼斯没有向我们呈示这样的概念，但这样的概念在他的脑子里肯定有——至少是隐含地。他论证策略中的古欧洲风格使我开始怀疑这种观点与政治学的古典教义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

古典政治学的传统中（该传统可溯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有着若干重要的学者，他们仍然执着于道德的实体概念、善与公共福利的规范概念、以及诸如此类的一些东西。<sup>⑦</sup>特别是在H·阿兰（Arendt）、L·斯特劳森（Strauss）、J·理特（Ritter）和其他一些人的著作中，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经历了一次复兴。理特研究亚里士多德的专著叫“形而上学和政治学”，书名即暗示着他们所处位置的困难。古典自然律乃是一种依赖于世界观的理论，对于身处18世纪末期的C·沃尔夫（Wolff）来讲，下面一点仍然是十分明显的，即实践哲学“在其全部学说中，预先假设着本体论、自然心理学、宇宙论、神学，也就是说，预先假设着整个形而上学。”<sup>⑧</sup>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如果离开了与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的联系，将是不可想象的，正是在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中，诸如形式、实体、行为、潜能、最终因等基本概念，得到了展开。如理特所指出，在古希腊城邦中，那种“根据自然权利”的东西之所以能实现，是因为“借助于城邦，人的本质得到了现实化……而在那些没建立城邦的地方，人作为人只能是在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中存在。”<sup>⑨</sup>在今天，要想使这种形而上的思维方式显得有理，已经不再是容易的事了。新亚

里士多德主义的文献没有包含系统理论，而多是些具有高度译解技巧的著作，它们通过解释来暗示古典本文的真理性，而不是为古典本文寻求根基——这一点倒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结果，某些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还原形式就获得了一个较好的机会。这些人把实践哲学的理论要求撤走，而将实践哲学还原为关于善、德行、正义等日常概念的释义学，以证明某个不可更改的道德实体的核心在这种知识的精细运用中得到了保持。如汉尼斯把亚里士多德的《论辩篇》用于政治科学；再如伽达默尔对尼科马库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的解释，这一解释如下：

哲学伦理学处于每一个人都发现在他自己的同样情境中。在对我们自己或他人作出判断时，什么东西是正确的，什么东西应该赞成或反对，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关于什么是善的和正义的一般性观念。但一般性观念只是在特定场合的具体现实中才获得真正的确定性，这不是一个应用一般规则的问题……一般的、典型的、只是在某种沉迷于概念一般性的哲学研究中才被单独提及的东西，并非本质地不同于在每一个实践-道德反思中指导着整体上看是非理论性的、平均一般的规范意识的那个东西。首先，前者并非不同于后者，是就下列意义而言：它承担有同样的应用于给定情境（这个情境属于所有道德意识）的任务，它之作为个体的任务，绝不逊于代表每一个人而行动的政治家的任务。<sup>⑨</sup>

但是，如果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理论所领悟的并不比那在不同群体的日常规范意识中获得的东西多，而且，如果它甚至不能通过某种不同方式去领悟，那么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理论就不可能

有根据地(begründet)区分开合法性统治与不合法性统治。不合法的统治也得到过赞同,否则它就不能持续存在(人们只需回顾一下这样的情景:许许多多的人聚集在广场和大街上——没有人强迫他们这么作——向一个帝国、一个人、一个领袖欢呼,这是不是一个非理论性的、平均的规范意识的表达呢?)。同时,如果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理论被认为揭示了一般意识的道德内核并作为道德的规范性概念去重建一般意识,那么,它们就必须确定标尺并提供理由,必须创制理论性知识。

一个带有同样困惑的、饶有兴味的语言分析变体(它是被维特根斯坦的工作鼓舞所致)可以在H·佩金(Pitkin)的《维特根斯坦与正义》这本书中发现,它提供了一个关于苏格拉底和智者特莱塞马库斯(Thrasymachus)之间有关正义问题对话的解释(这段对话柏拉图曾在《理想国》的头一部书中述及)。⑥如果我们从当前的讨论角度来看特莱塞马库斯,那么,他代表的是经验主义的立场,对他来说,正义不过是强者特殊利益的代名词。苏格拉底则发展了正义的规范主义概念,不管谁说某事为非正义,都必须运用一定的标准,并能为标准确立根基。争论双方都是从下述事实出发的,即某种巨大的差异已经在古希腊人所理解的“正义”概念的规范性内容和现实的制度、行为、实践——所有这些皆被认为是合法的并体现着正义——之间产生了出来。然而,苏格拉底是批判性地使概念和现实相对抗,而特莱塞马库斯则贬低概念,去描述以正义的名义而进行的行为。

佩金给出了两种语言游戏间语法上的差别。在这里,运用的是同样的术语,但在一个场合,带有引号标记,另一个场合则没有。说“我喜欢这张图片”与说“这张图片很漂亮”时,已呈现出不同的、经“语法性”调整了的态度(因为在第二种场合,可以继续说“但是我并不喜欢它”)。既如此,那么当我们说“X是为正义的事业而战

斗”或者说“X 宣称是为正义的事业而战斗”时,就与前一个例子是很相似的(因为第二种说法也可以加上“但他实际是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我们在运用诸如正义、美丽、真实这些规范概念(它们乃与普遍的有效性要求相联系)时所呈现的态度,显然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的生活形式。一种相对于中立的观察者位置的态度上的变化,必然会改变这些词汇术语的意义。但是,对于有效性要求的重建和这些概念的规范性内容来说,跟随词汇术语变化而来的将是什么呢?据佩金讲:“我们的概念是习惯性的。但这些概念由以依托的习惯本身并不是任意的,它们乃是根据人类的条件和行为,根据我们的生活形式得以形成。”<sup>②</sup>这可能是对的。但是谁来担保,这些生活形式的语法不仅调整着习惯,而且也给理性以表达呢?从这种依据语言游戏所作的对传统的挪用到M·奥克舍特(Dakeshott)的传统主义,仅仅是很小的一步,<sup>③</sup>这也正是汉尼斯所在的位置,因为当他把美德和正义事先假定为合法统治的有效性基础时,他无论如何只能求助于习惯。

我已经讨论了两种合法化概念:经验主义的概念和规范主义的概念。前者可以应用于社会科学,但不甚令人满意,因为它乃是从关于有效性的系统论根基中抽象出来的;后者应用于社会科学故然令人满意,但有累于自身被嵌入其中的形而上学背景,也很难立住脚跟。有鉴于此,我打算提出合法化的第三种概念,这种概念我称之为“重建性的”。

我想从这个假定开始:陈述“X 是合法的”与陈述“X 存在于一般利益(或公共利益)之中”具有同样的意义,这里,X可以是一个行为,也可以是一个行为规范,甚至是一个规范系统(在当下场合,则指一个统治系统)。“X 存在于一般利益之中”意味着与X相联系的规范的有效性要求被认为已得到了确认。<sup>④</sup>竞争中的各有效性要求的可证实性决定于可能的证明系统,一个单独的证明则被称

为一种合法化。给定合法化的重建首先可以存在于对某证明系统S的发现中,该系统允许把给定合法化作为在S中有效或无效来评价。“在S中有效”仅仅意味着,任何接受S——一种神话,一种宇宙学或一种政治理论——的人也必须接受在有效的合法化中给定的基础。这种必要性表达着某种由证明系统的内在关系引起的相容性连结。

在把证明推进到这一点时,我们已经解释了合法性中的信仰并验证了它的相容性。然而,仅仅沿着这条释义学的路子走,并没有达到对被相信的合法性的判断,那种合法性中的信仰与已确证的制度系统的比较也没能使我们前进得更多。假如观念和现实并非相互分离,真正需要的则是被重建的证明系统自身的进化,这就把我们引回到实践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中。在现时代,这已经作为一个程序和先决条件——在此条件下,证明将具有构造交感的力量——的问题被反思性地提了出来。我已提到过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他曾考察初始情境怎样不得不被制度化,以利于一种关于基本决策和基本社会结构的理性交感的产生;P·洛伦赞(Lorenzen)则检验了言语实践所具有的排列有序的规范,正是这些言语实践使理性交感在上述实践课题中成为可能;最后,K-O·阿佩尔通过诉诸实践论辩的普遍、必然的——也就是说,超验的——先决条件,使这个问题更趋于根本化,交往之普遍的先决条件的规范性内容也就因此而被认为形成着言语的普遍伦理学的核心。<sup>⑤</sup>这是一个聚焦点。以此为指向,那些试图更新实践哲学的努力,在今天似乎正在刻意奋斗之中。

尽管我们赞同这些论点,下列异议仍然很容易浮上脑际:每一种一般的证明理论在与合法性统治的历史形式相联系时,都特殊地保留着某种抽象性。如果人们把哲学推论式的证明标准强加在传统社会上,人们就是在一种历史的“不公正的”方式中行为着。那

么,是否有这样一种取代物,它一方面取代了一般理论的历史不公正性,另一方面又取代了仅仅是历史解释的无标准性呢?我所看到的唯一有希望的方案就是这一理论:它能结构性地澄清各种不同证明水平的、具有历史可观察性的序列,而且能把这一序列作为一个发展的、逻辑的联结加以重建。<sup>⑤</sup> 那种已得到很好证明并已经通过这种方式重构起道德意识之个体发生学模型的认知发展心理学,至少可以作为一个颇具启发力的向导和一种鼓舞来理解。

## 注 释\*

### “英语本序”注释

1. 参见“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讨论的文献报告”〔“Literaturbericht zur Philosophischen Diskussion um Marx und den Marxismus”〕,载《哲学周报》〔*Philosophische Rundschau*〕5(1957),pp165~235;重载于《理论和实践》〔*Theorie und Praxis*〕(Neuwied,1963),PP261~335。

2. 参见“哲学与科学之间:作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Between Philosophy and Science: Marxism as Critique”〕载《理论与实践》〔*Theory and Practice*〕(Boston,1973),PP195~252。

3. 参见“与社会哲学相联系的古典政治学说”〔“The Classical Doctrine of Politics in Relation to Social Philosophy”〕,载《理论与实践》,PP41~81。

4. 同上, P79。

5. 《文献》, P310。

6. “关于社会科学逻辑的文献报告”〔“Literaturbericht zur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载《哲学评论》(Beiheft,5,1967);重载于《为了社会科学的逻辑》〔*Zur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Frankfurt,1970),PP71~310;《认识与意趋》〔*Erkenntnis und Interesse*〕(Frankfurt,1968),英译为《认识与人的意趋》〔*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Boston,1971)。

7. 《为了社会科学的逻辑》,PP251~290;英译为“对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一书的评论”〔“A Review of Gadamer's *Truth and Method*”〕,载 F·道尔麦和 T·默伽塞主编的《理解与社会探究》〔*Understanding and Social Inquiry*〕(Notre Dame,1977),PP335~363。

---

• 本注释据英译本注释译出,为方便查找,凡文章标题、书名、杂志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皆在译文后附上原文,用方括号括起。出版地址则一律不译。——中译者

8.《认识与人的意趋》，第10章到第12章。

9.“释义学的普遍性要求”〔“Der Universalitätsanspruch der Hermeneutik”，载K·O·阿佩尔等《哲学释义学和意识形态批判》〔*Hermeneutik und Ideologiekritik*〕（Frankfurt, 1971），P138。

10.《认识与人的意趋》，P269。

11.《为了社会科学的逻辑》，PP164~184, 305~308；还可参见“社会理论还是社会技术论？与N·卢曼的争论”〔“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oder Sozialtechnologie? Ein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Niklas Luhmann”〕，载《社会理论还是社会技术论——系统研究提供了什么？》〔*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oder Sozialtechnologie——Was leistet die Systemforschung?*〕（Frankfurt, 1971），PP142~290。

12.《为了社会科学的逻辑》，PP181~182。

13.同上，PP176~177。

14.参见《为了社会科学的逻辑》1970年版“序言”。在这篇“序言”中，哈贝马斯警告不要把“自我理解过程与它们的结果”相混淆，并声称他将要（1970）在另一个方向上继续展开此处提供的“讨论片段”。在“《认识与人的意趋》跋”（载《社会科学的哲学》〔*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1973，PP157~189）中，他又提醒我们，这里试图提出的仅仅是一个“绪论”（P159），尽管他仍然想“坚持本书的系统性概念”，但当某些必要的改进已经作出时，“这个观念就呈现出不同的情形”（P158）。

15.这篇演讲作为附录，载于《认识与人的意趋》，PP301~317，此处引自P314。

16.这里有一个重要例外，即关于论辩的观点和与此相联系的“理想言语情境”的概念。参见“走向一种交往资质理论的准备性意见”〔“Vorbereitende Bemerkungen zu einer Theorie der kommunikativen Kompetenz”〕，载《社会理论还是社会技术论》，PP101~141；“真实性理论”〔“Wahrheitstheorien”〕，载《现实与反思：W·舒尔兹纪念文集》〔*Wirklichkeit und Reflexion: Festschrift für Walter Schulz*〕（Pfullingen, 1973），PP211~265；或参见T·默伽塞《J·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The Critical Theory of Jürgen Habermas*〕（Cambridge, Mass, 1978），第4章第2节和第3节。

17.参见“社会化理论概说”〔“Stichworte zur Theorie der Sozialisation”〕，载《文化与批判》〔*Kultur und Kritik*〕，PP118~194；“角色资质概念札记”〔“Notizen zum Begriff der Rollenkompetenz”〕，同前书，PP195~231；R·道伯特、J·哈贝马斯、G·努纳尔-魏克勒主编的《自我的发展》

〔*Die Entwicklung des Ichs*〕的“导论”，(Köln, 1977); 还可参见默伽塞《J·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第4章第4节。

18. “历史与进化”〔“Geschichte und Evolution”〕, 载《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Zur Rekonstruktio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Frankfurt, 1976), PP200~259, 这里引自 P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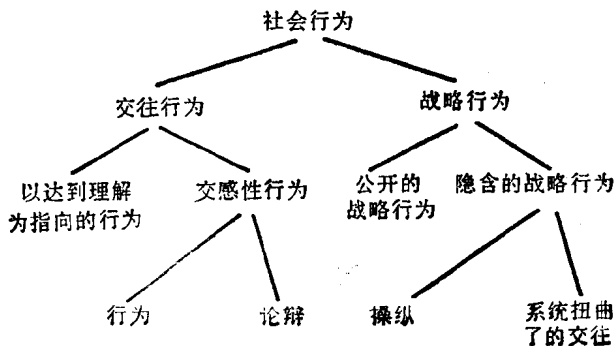
19. 《合法化危机》〔*Legitimation Crisis*〕(Boston, 1975)。

### “什么是普通语用学”注释

1. 迄今为止，“语用学”这个术语一直被用于分析语言运用的特殊关联域，而不是用于对语言运用（或在话语中运用语句）之普遍特性的重建。我虽引入了“普遍的”语用学以便区别于“经验的”语用学，但已不再满意于这个术语，“规范语用学”——作为“规范语义学”的延伸——可能更合适一些。“规范语用学”（“Formalpragmatik”）乃是F·舒兹（Schütze）在《社会学发生角度的语言》〔*Sprache Soziologisch Gesehen*〕（第2卷，Munich, 1975）中提出的一个术语，参见该书摘要PP911~1024。

2. 我想集中讨论这样一类理想化了交往行为类型，即“交感性相互作用”。在其中，参与者同享某种传统，他们的倾向性亦被规范式地统一到这样一种程度，即他们都从同一种情境界定出发，而且不存在对他们相互满足的有效性要求不予认同的现象。下列图表给出了交感性相互作用在一个拥有不同社会行为类型的系统中的极端情形。以这个分类为基础，剩下的问题则是参与者将提出哪些范畴的有效性要求并对之作出响应。

这些行为类型可以根据它们与言语的有效性基础的关系被区分如下：



(1)与战略行为相对应的交往行为。在交往行为中,相互认可的有效性要求的基础是预先设定的,这与战略行为中的情形完全不同。在交往性态度中,有可能达到一种倾向于有效性要求的直接理解;而在战略性态度中,正好相反,只有以限定性标示物为媒介的间接理解才是可能的。

(2)与交感性行为相对应的以达到理解为指向的行为。在交感行为中,对隐含提出的有效性要求的认同可以根据共同的情境界定被预先假定 为一种背景性交感,这样一种认同被认为能在以理解为指向的行为中实现。对以达到理解为指向的行为来说,战略因素能够被使用——这当然是以它们乃是达到直接理解这一目的的手段为前提。

(3)与论辩相对应的行为。在交往行为中,隐含提出的有效性要求可以被兑现(或通过问答而直接体现)这一点,乃是一个自然的假设。与此不同,在论辩中,关于陈述和规范的有效性要求则被当作假说用括号括起,并受到主题性检验。和交往行为中的情形一样,论辩的参加者也保持着某种合作态度。

(4)与系统扭曲了的交往相对应的操纵行为。在系统扭曲了的交往行为中,至少有一个参与者就下列事实作出了自我欺骗,那就是交感行为在这里只是表面地被维持着。另一方面,操纵者又就他自己的战略性态度至少欺骗了其它参与者中的一个,在这种战略性态度中,他乃是以一种伪交感的方式蓄意而行的。

3. K-O·阿佩尔“言语理论与超验语用学——伦理规范问题”〔“Sprechakttheorie und Transzendente Sprachpragmatik—Zur Frage Ethischer Normen”〕,载K-O·阿佩尔主编的《语用学与哲学》〔*Sprachpragmatik und Philosophie*〕(Frankfurt, 1976), PP10~173。

4. 在德国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框架内, E·拉斯克很早就把“超主体的有效性”概念(该概念与语言表达的意义、陈述的真实、以及词汇艺术的完美相联系)作为应被认可的价值加以重新构建。拉斯克的有效性哲学把许多人的主张结合在一起,如洛兹(Lotze)、布伦坦诺、胡塞尔、李科(Rickert)等。“真正的价值B是被认可了的价值,即认可-价值,它应该受到遵从,应该被归功,因而亦被需要或要求。有效的是价值、需求、规范……,所有这类术语如‘价值’、‘应该’、‘归功’、‘需求’等都是相互关连的概念,它们都指向相应于有效性的主体行为——该有效性应该通过一定的方式被处置,它需要一定的行为。”E·拉斯克“逻辑系统”〔“Zum System der Logik”〕,载《著作集·卷3》〔*Gesschriften*〕(Tübingen, 1924), P92。

5. Y·巴·希莱尔在他对我的批评(见“关于哈贝马斯的释义学语言哲学”[“On Habermas's Hermeneutic Philosophy of Language”],载《综合》杂志[*Synthese*] (1973), PP1~12)中没有能看到这一点。他的批评是建立在——一篇我已表明其临时性的文章基础上的(指我的“对一种交往资质理论的初步说明”一文[“Vorbereitende Bemerkungen zu einer Theorie der Kommunikativen Kompetenz”],载J·哈贝马斯和N·卢曼《社会理论还是社会技术论》(Frankfurt 1971), PP101~141)。我感到,Y·巴·希莱尔对我产生误解的地方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在细节方面作出答复将毫无意义。我只能希望在目前这篇概略文章中,使我的观点(它仍然带有强烈的方案性质)甚至对这样一类读者——他们带有敌意的倾向,且不乏释义学的、而非特殊的直率——显得更清晰些。

6. 例如,可以参见K·O阿佩尔的《哲学的转化·卷2》[*Transformation der Philosophie Vol. 2*] (Frankfurt, 1971), P406,或“一种超验语用学观念的纲要性述评”[“Programmatische Bemerkungen zur Idee einer Transzendentalen Sprachpragmatik”],载B·奥萨·托姆丛书126(Tuku, 1973), PP11~35。

7. C·莫里斯“符号理论基础”[“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载《统一化科学大全》[*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卷1, P2 (Chicago, 1938),以及《符号,语言,行为》[*Signs, Language, Behavior*], (New York, 1955)。

8. 参见我在《为了社会科学的逻辑》(Frankfurt, 1970)一书中对莫里斯的评论, P150。

9. Y·巴·希莱尔“索引性表达”[“Indexical Expressions”],载《语言诸方面》[*Aspects of Language*] (Jerusalem, 1970), PP69~88,以及“语义学和交往”[“Semantics and Communication”],载H·海德利希《语义学和交往》[*Semantics and Communication*] (Amsterdam, 1974), PP1~36。把Y·巴·希莱尔的观点当作出发点,A·凯舍尔也提出一种把语言表达置于超语言情境中的规范性理论,见“走向语言施行理论的一步”[“Astep Forward to a Theory of Linguistic Performance”],载Y·巴·希莱尔主编的《自然语言的语用学》[*Pragmatics of Natural Languages*] (Dordrecht, 1971), PP84~93;还可参见R·C·斯泰尔纳克“语用学”[“Pragmatics”],载达维森和哈尔曼合编的《自然语言的语义学》[*Semantics of Natural Languages*] (Dordrecht, 1972), PP380~387。

10. R·M·哈雷《道德语言》[*The Language of Maorals*] (Oxford,

1952); G·H·Von·怀特《规范和行为》[*Norm and Action*], (London, 1963); N·瑞舍尔《哲学逻辑中的主题》[*Topics in Philosophical Logic*] (Dordrecht, 1968)。

11. L·阿波斯岱尔“关于问题分析的建议”[“A Proposal on the Analysis of Questions”], 载《分析的逻辑》[*Logique et Analyse*], 12(1969), PP376~381; W·库贺曼《理论与批判之间的思考》[*Reflexion Zwischen Theorie und Kritik*] (Frankfurt, 1975)。

12. S·图尔敏《论证的运用》[*The Uses of Argument*] (Cambridge, 1964); W·C·萨尔孟《科学推理的基础》[*The Foundation of Scientific Inference*] (Pittsburg, 1967); 还可参见R·P·鲍萨《语言学假说的证明》[*The Justification of Linguistic Hypotheses*] (The Hague, 1973) 中概要性的一章“非示范性推理”[“Non-Demonstrative Inference”], PP25~72。

13. F·凯弗尔“论假设前提”[“On Presuppositions”], 载F·凯弗尔 and N·鲁威特主编的《欧洲的生成语法》[*Generative Grammar in Europe*] (Dordrecht, 1973), PP218~242; K·H·埃伯特“言语的潜在前提”[“Präsuppositionen im Sprechakt”], 载卡特和约登斯主编的《语言学展望》[*Linguistische Perspektiven*] (Tübingen, 1973), PP45~60; F·帕多菲《语言学和哲学中的假设前提》[*Präsuppositionen in Linguistik und Philosophie*] (Frankfurt, 1974)。

14. H·P·戈瑞斯“谈话的逻辑”[“The Logic of Conversation”], 未出版, Ms(1968); D·戈登和G·拉考弗“交谈准则”[“Conversational Postulates”], 未出版, Ms(1973)。

15. J·R·罗斯“论陈述性语句”[“On Declarative Sentences”], 载雅科布·罗森鲍姆主编《英语转换语法研读》[*Readings in English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Waltham, Mass, 1970), PP222~277; J·D·莫考勒“语法中语义的作用”[“The Role of Semantics in a Grammar”], 载巴赫和汉姆斯《语言的普遍性》[*Universals of Language*] (New York, 1968), PP125~170; D·冯特利希“论言语”[“Sprechakte”], 载麦斯和冯特利希《语用学和言语行为》[*Pragmatik und Sprachliches Handeln*] (Frankfurt, 1972), PP69~188, 还有他写的“言语行为中的因袭性”[“Zur Konventionalität von Sprechhandlungen”], 载D·冯特利希主编的《语言的语用学》[*Linguistische Pragmatik*] (Frankfurt, 1972), PP11~58。

16. C·J·费尔莫“语用学和对论辩的描述”[“Pragmatics and the

Description of Discourse”]未出版, Ms(1973); G·波斯纳尔《本文语法》[*Textgrammatik*](Frankfurt, 1973)。

17. J·莱昂斯《理论语言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oretical Linguistics*](New York, 1968); J·J·卡兹《语义学理论》[*Semantic Theory*](New York, 1972)。

18. P·F·斯特森《逻辑-语言论集》[*Logico-Linguistic Papers*](London, 1971)。

19. A·C·丹托《行为的分析哲学》[*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Action*](Cambridge, 1973); S·汉姆普舍尔《思想和行为》[*Thought and Action*](London, 1960); D·S·施威特《行为层次》[*The Stratification of Behavior*](London, 1965); 凯尔和兰兹曼主编的《行为理论研究》[*Readings in the Theory of Action*](London, 1968)。

20. P·魏林赤《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联系》[*The Idea of a Social Science and Its Relation to Philosophy*](London, 1948); C·泰勒“解释行为”[“Explaining Action”], 载《探索》杂志[*Inquiry*]第13期(1973), PP54~89; H·Von·怀特《解释与理解》[*Explanation and Understanding*](London, 1971), “论因果联系的逻辑与认识论”[“On the Logic and Epistemology of the Causal Relation”], 载P·休波斯主编的《逻辑, 方法论与科学哲学》[*Logic,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卷1, 4(1973), PP239~312。

21. W·P·阿尔斯顿《语言哲学》[*Philosophy of Language*](Englewood Cliffs, N·J·1964)。

22. J·贝纳特“意义唯名论者的战略”[“The Meaning-Nominalist Strategy”], 载《语言的基础》[*Foundations of Language*]10(1973), PP141~168; S·R·希福尔《意义》[*Meaning*](Oxford, 1972)。

23. 参见E·Von·萨威尼为J·L·奥斯丁《言语行为理论》[*Zur Theorie der Sprechakte*](Stuttgart, 1972)一书所写的提要, 该书 PP203ff。

24. G·戈莱温多弗“无关联域的语言”[“Sprache ohne Kontext”], 载D·冯特利希主编的《语言的语用学》, PP144~182。

25. H·P·戈瑞斯“意义”[“Meaning”], 载《哲学评论》[*Philosophical Review*]66(1957), PP377~388, “言说者的意义、句子意义以及词的意义”[“Utterer's Meaning, Sentence Meaning, and Word Meaning”], 载《语言的基础》4(1968), PP225~242; D·L·莱维《习惯》[*Convention*](Cambridge, 1969)。

26. J·哈贝马斯《为了社会科学的逻辑》, PP184ff。

27. H·G·伽达默尔在他的《真理与方法》[*Truth and Method*](New York, 1975)一书中强调指出了这一点。

28. G·赖尔《心的概念》[*The Concept of Mind*](London, 1949)。参见E·Von·萨威尼在《规范语言哲学》[*Die Philosophie der normalen Sprache*](Frankfurt, 1974)中的解释(该书 PP91ff)。

29. R·卡尔纳普与W·施泰格缪勒《归纳逻辑与或然性》[*Induktive Logik und Wahrscheinlichkeit*](Wien, 1959), P15。

30. D·冯特利希《语言学的基础》[*Grundlagen der Linguistik*](Hamburg, 1974), P209。

31. 指关于在合理重建意义上一种解释意味着什么的分析, 参见H·施纳尔伯赫《反思与讨论》[*Reflexion und Diskurs*](Frankfurt, 1977)中关于“解释性讨论”[“Explikativer Diskurs”]的一章, PP277~336。

32. N·乔姆斯基《句法理论概观》[*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Cambridge, Mass, 1965)。

33. 冯特利希《语言学的基础》, PP210~218。

34. R·P·鲍萨《语言学假说的证明》, PP75ff, 其中, 在内在的语言学根据与相对应的外在语言学根据的联系中谈到这一点。

35. 冯特利希《语言学的基础》, P216。如果我没有理解错, 希耐尔在《语言哲学与语言学》[*Sprachphilosophie und Linguistik*](Hamburg, 1973)中对这种语言学变体的理论模型给予了某种经验性解释, 见该书PP82~114。

36. 鲍萨《语言学假说的证明》, P224。鲍萨认为: 一个言说者不但可以错误地报道一个正确的语言直觉, 而且还可以有错误的直觉; 但是对前理论知识的构造却不允许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我认为, 从下列观念出发, 鲍萨的断言是有意义的, 这就是语言直觉可以是“错误的”, 只有在它们来自无能力的言说者的时候才有可能。另一个问题是在句子的可接受性之扩散性判断的形成中, 语法性的与非语法性的(例如感知性)认识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为何, 即是把语法性规则意识的表达分离出来, 还是把真正的语言直觉分离出来。

37. 在这种联系中, U·奥沃曼曾经指出它与皮亚杰反思性抽象概念之间的一种十分有趣的平行关系。也许合理重建程序仅仅是一个类型化了的东西, 并似乎控制着儿童的反思性抽象的形式——例如, 当这种程序在儿童的工具性行为中“读出”构成其行为基础的方案构架时。

38. W·J·M·莱费尔特《语言学与心理语言学中的规范语法》[*Formal Grammars in Linguistics and Psycholinguistics*], 卷1~卷3

(Amsterdam, 1974)。

39. 莱费尔特《语言学与心理语言学中的规范语法》，卷3，PP5~7。

40. 同上，PP14ff。

41. 为了回答鲍萨提出的关于“清晰例证原则”的质疑（见他的《语言学假说的证明》，P224），我想引证J·J·卡兹和B·G·贝福尔在一篇批评经验主义的文章中对类似怀疑的论驳。该文的标题是“经验主义的兴衰”〔“The Fall and Rise of Empiricism”〕（未发表，Ms Feb 1974），在PP38~39有这样一段文字：

这种理论……试图根据语音构成理论去解释与语音性质相互联结的直觉；根据句法构成理论去解释与句法性质相互联结的直觉；根据语义构成理论去解释与语义性质相互联结的直觉。而语法理论则根据在某种语法模式中表达出来的系统关系，最终去寻求对不同类性质间相互联结之直觉的解释——该语法模式在语言中，把一个单独一体化了的语音-意义关系理论中的各构成部分连在了一起。

当然，这些议论旨在描绘一种理论理想。但是既然该语法理论在推进这个理想方面已经走了一步，它就不但为语法的构建确定了界标，为语法结构提供了更丰富的解释，而且还表明了远为宽泛的语法性质类别及其联系。在这样作的时候，它呈现出一个语法特性领域，此领域远较在原始直觉基础上所能作的更清晰、更独特，也更可靠。正如弗德尔(Fodor)颇具洞见地指出过的那样，这样一种理论乃是在自身不断进步的过程中界定自己的对象物：“如此，就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含义，科学必须在其中发现其底蕴。科学通过对下列情形的发现来作到这一点，这就是它为解释某类现象而使用的定律和概念可以十分有效地用于解释其它类型的现象。从而只有在回溯中，我们才能说，所有那些由一个单一理论框架所包容的现象都正是我们所意味的，例如，这样一些前系统性术语‘物理事件’、‘化学反应’、或‘行为’，就这些术语或其应用乃是新词创造而言，它们的应用确由这样的洞见所导致：一个成功的理论可以提供非常深刻的相似性，以此构成诸多从表面看来似属异质的事件的基础”（J·A·弗德尔《心理学解释》〔*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New York, 1968, PP10~11）。

42. H·勒宁格尔、M·H·米勒和F·缪勒的《心理语言学》(*Psycholinguistik*)(Frankfurt, 1973)、《语言学与心理学》(*Linguistik und Psychologie*)(Frankfurt, 1974); H·勒宁格尔“语言学与心理学”[“Linguistik und Psychologie”], 载R·巴什和威诺曼主编的《语言学与相邻科学》(*Linguistik und Nachbarwissenschaften*)(Kronberg, 1973), PP225~241。

43. E·H·兰涅伯格《语言的生物学基础》[*Biologische Grundlagen der Sprache*](Frankfurt, 1972), “我们中的一个”[“Ein Wort unter uns”], 载兰涅伯格与他人合著的《语言学与心理学》(*Linguistik und Psychologie*), PP53~72。

44. L·柯尔伯格“阶段与序列”[“Stage and Sequence”], 载D·格林林主编的《社会化理论与研究手册》(*Handbook of Socializ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Chicago, 1969), “从是到应是”[“From Is to Ought”], 载T·米切尔主编的《认知发展与认识论》(*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Epistemology*)(New York, 1971), PP151~236。

45. 关于这一点, 请参看U·奥沃曼“资质与施行”[“Kompetenz und Peformance”, 未出版, Ms(1974)。

46.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的N·K·史密斯英译本(New York, 1961), P138。

47. B·斯特劳德“超验性论证”[“Transcendental Arguments”], 载《哲学杂志》(*Journal of Philosophy*)9(1968), PP241~254; M·S·戈莱姆“超验性论证”[“Transcendental Arguments”], 载《精神》杂志[*Nous*]5(1971), PP15~26; J·辛蒂伽“超验性论证”[“Transcendental Arguments”], 载《精神》[*Nous*]6(1972), PP174~281; M·S·戈莱姆“范畴与超验论证”[“Categories and Transcendental Arguments”], 载《人与世界》[*Man and World*]6(1973), PP252~269。

48. R·比特纳“超验性”[“Transzendental”], 载《哲学基本概念手册》[*Handbuch Philosophischer Grundbegriffe*]卷5, (Munich, 1974), PP1524~1539。

49. 例如, 爱尔兰根学派(the Erlangen School)对康德学说的接受就仅仅是在一个有限意义上为前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假设了某种超验性。参见由G·鲍姆主编的《前物理学》(*Protophysik*)(Frankfurt, 1975)。

50. 皮亚杰的康德主义在这方面可谓典型。

51. 参见K·O·阿佩尔为C·S·皮尔士的《著作集》[*Schriften*](Frankfurt, 1967和1970)卷1和卷2所写的导言。

52. 参见我《认识与人的意欲》一书的“跋”，载《社会科学的哲学》3(1973)，PP157~189；还可参看R·布纳尔“超验释义学”〔“Transzendente Hermeneutik”〕，载西蒙·沙费尔和泽麦尔利主编的《精神科学理论》〔*Wissenschaftstheorie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Hamburg, 1975)，PP57~70。

53. F·卡姆巴蒂尔《经验与结构》〔*Erfahrung und Struktur*〕(Frankfurt, 1968)。

54. J·哈贝马斯“真实性理论”〔“Wahrheitstheorien”〕，载《W·舒尔兹纪念文集》〔*Festschrift für Walter Schulz*〕(Pfullingen, 1973)，PP211~265。

55. W·萨雷尔“作出假设”〔“Presupposing”〕，载《哲学评论》63(1954)，PP197~215；P·F·斯特沃森“对萨雷尔先生的答复”〔“A Reply to Mr. Sellars”〕，载《哲学评论》63(1954)，PP216~231。

56. U·奥沃曼“个体发生过程理论”〔“Theorie der individuellen Bildungsprozesse”〕，未出版Ms(1974)。

57.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奎因和乔姆斯基之间的争论：N·乔姆斯基“奎因的经验论假设”〔“Quine's Empirical Assumptions”〕和W·V·O·奎因的“答复”〔“Replies”〕。两篇都载于大卫森和辛蒂迦主编的《词与对象》〔*Words and Objections*〕(Dordrecht, 1969)，PP 53~68和PP292~352；W·V·O·奎因“关于目前语言学理论的方法论反思”〔“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on Current Linguistic Theory”〕，载大卫森和哈尔曼主编的《自然语言的语义学》〔*Semantics of Natural Language*〕(Dordrecht, 1972)。H·史纳尔的《语言哲学与语言学》〔*Sprachphilosophie und Linguistik*〕(Hamburg, 1973)也是语言学理论中典型的方法论行为主义。

58. J·L·奥斯丁《如何用词作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Oxford, 1962)，可参见E·Von·萨威尼为该书德文版(Stuttgart, 1972)编写的有关言语行为理论的内容提要，PP204~209，J·L·奥斯丁“施行性话语”〔“Performative Utterances”〕，载《哲学论文集》〔*Philosophical Papers*〕(Oxford, 1970)，PP233~252，和“施行性-断言性”〔“Performative-Constative”〕，载C·E·凯顿主编《哲学与日常语言》〔*Philosophy and Ordinary Language*〕(Urbana, Ill, 1963)，PP22~33。关于奥斯丁的介绍还可参见Von·萨威尼的《哲学与一般言语》〔*Die Philosophie der Normalen Sprache*〕，PP162~166。

还可参看J·R·塞尔“什么是言语行为？”〔“What is a Speech Act?”〕，载M·布莱克主编的《美洲哲学》〔*Philosophy in America*〕(Ithaca, 1965)，

PP221~239, 重载于罗森伯格和特雷弗斯主编的《语言哲学研究》[*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Englwood Cliffs, N. J. 1971), P 614~628; “奥斯丁论以言表意行为和以言行事行为”[“Austin on Locutionary and Illocutionary Acts”], 载《哲学评论》77(1968), PP405~424, 重载于《语言哲学研究》, PP262~275; 《言语行为》[*Speech Acts*](London, 1969); “语言学与言语哲学”[“Linguistik und Sprachphilosophie”], 载巴什和威诺曼主编的《语言学与相邻科学》, PP111~126。

其它资料包括: W·P·阿尔斯顿《语言哲学》[*Philosophy of Language*]和“语言行为”[“Linguistic Acts”], 载《美国哲学季刊》[*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1(1964), PP138~146; L·J·柯亨“是否存在以言行事力量?”[“Do Illocutionary Forces Exist?”], 载《哲学季刊》[*Philosophical Quarterly*]14(1964), PP118~137, 重载于罗森伯格和特雷弗斯主编的《语言哲学研究》, PP580~598, “言语行为”[“Speech Acts”], 载《语言学的当前趋向》[*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12(1970); R·M·哈里“意义与言语行为”[“Meaning and Speech Acts”], 载《哲学评论》79(1970), PP3~24, “奥斯丁关于以言表意行为与以言行事行为的区分”[“Austin’s Distinction Between Locutionary and Illocutionary Acts”], 载哈里《实践推理》[*Practical Inference*](London, 1972); D·霍德克劳弗特“施行性和陈述”[“Performatives and Statements”], 载《精神》杂志[*Mind*]83(1974), PP1~18; P·F·斯特沃森“言语行为中的意向和惯性”[“Intention and Convention in Speech Acts”], 载《哲学评论》73(1964), PP439~460, 重载于罗森伯格和特雷弗斯主编的《语言哲学研究》, PP599~613; S·色沃“埃贝蒂克与以言行事行为间的区别”[“The Distinction Between Ehetic and Illocutionary Acts”], 载《分析》杂志[*Analysis*]32(1972/73), PP177~183; C·特雷弗斯“一种衍生的言语行为理论”[A Generative Theory of Speech Acts], 载罗森伯格和特雷弗斯主编的《语言哲学研究》, PP629~644; G·J·瓦尔诺克“哈里论意义和言语行为”[“Hare on Meaning and Speech Acts”], 载《哲学评论》80(1971), PP80~84; 冯特利希《语言学的基础》, PP309~352。

59. 乔姆斯基《句法理论概观》, PP3ff。

60. 这些限制条件请参看后面关于塞尔的可表达性原则的讨论。

61. P·F·斯特沃森《论个体》[*Individuals*](London, 1959); M·杜姆特《弗莱格与语言哲学》[*Frege, Philosophy of Language*](London, 1973); E·图根哈特《语言分析哲学导论讲座》[*Vorlesungen Zur Einfu-*

hrung in die Sprachanalytische Philosophie)(Frankfurt, 1976)。

62. 关于意向性和意向表达的分析, 请参见 W·斯莱尔“经验主义和精神哲学”[“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载《形而上学》[*Metaphysics*](London, 1968); W·斯莱尔和 R·柴斯霍尔姆“意向性和心智”[“Intentionality and the Mental”], 载《明尼苏达研究》[*Minnesota Studies*], 卷1(1963), PP507~539; W·斯莱尔《科学和形而上学》[*Science and Metaphysics*](London, 1968); E·图根哈特“现象学与语言分析”[“Phänomenologie und Sprachanalyse”], 载《伽达默尔讨论集》[*Festschrift für Gadamer*]卷2(Tübingen, 1970), PP3~24; J·辛蒂伽《知识与信仰》[*Knowledge and Belief*](Ithaca, 1962); C·泰勒“解释行为”, 载《探究》杂志13(1970), PP54~89。关于可表达性言语行为的分析, 参见 P·M·S·海克尔《洞见与幻想》[*Insight and Illusion*](Oxford, 1972), 第7、8、9章。

63. 参见 B·B·斯坦伯格和雅克鲍威茨主编的《语义学》[*Semantics*](Cambridge, 1971), PP157~484; H·E·布克《语义学》[*Semantik*](Munich, 1972)。

64. 在这方面, P·W·阿尔斯顿的著作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65. F·Von·库舍尔《语言哲学》[*Sprachphilosophie*](Munich, 1971), PP117~161; H·史纳尔《言语哲学与语言学》, PP190~240; 冯特利希《语言学的基础》, PP238~273。

66. P·瓦兹罗维克、J·H·贝温, D·D·雅克逊“人类交往语用学”[*Pragmatics of Human Communication*](New York, 1967)。

67. 一个试图重建以达到理解为指向的行为之条件的交往理论要求某种基本分析单位, 该单位不一定必须是成对的互补性言语行为——也就是那种相互施行并接受的言语行为——但至少是一个言说者的话语, 它不但可以被理解, 而且至少能为另一个言说与行为主体所接受。

68. D·冯特利希“言语行为中的惯性”[“Zur Konventionalität von Sprechhandlungen”], 载 D·冯特利希主编的《语言学的语用学》[*Linguistische Pragmatik*], P16; 还可参考该文提出的语言特征化的标准形式以及冯特利希在《基础》一书中提供的有关分析, 见该书 PP349ff。

69. 这方面的异例见之于呈示性言语行为, 当这类言语行为被明确表达时, 也可以采取否定形式, 例如“我并不要(特此)隐瞒于你……。”

70. 与通常应用相背离, 我并不认为通过下列方式把陈述与断言区分开是可取的, 这就是所谓陈述确实是通过被断言而被嵌入某个特定言语情境中, 但却又没有从那里得到断言性力量。我认为, 一个陈述的断言性力量

不能被重建,除非是因为任何处在有能力言说者位置的人都会提出自己的有效性要求(这个要求是为了它并在对它作出断言时提出的)。这样一个要求是否能够——如果必要的话——被推论证实,也就是说,该陈述是否为“有效的”(真实的),这要看它是否满足了一定的真实性条件。确实,我们能够独自地看待一个陈述,即把它视作某种带有抽象的真实价值的符号结构而没有涉及言说者。但这样一来,我们恰恰是在言语情境中进行着抽象,在这个情境中,一个陈述性内容——归功于它乃是作为一个陈述被断言的事实——承受了某种与现实的关系,也就是满足了或真或伪的条件。这种抽象自然暗示着自身(而且经常甚至避开逻辑学家的眼睛),因为由言说者加以满足的真实性要求乃是普遍的,即恰恰具有这种性质:虽然它是在某种特定环境中提出来的,却能够抵御来自任何人的疑虑。

71. S·康格塞尔“语义学和语用学概览”[“Aspekte zur Semantik und Pragmatik”],载《语言学报道》(*Linguistische Berichte*)24(1973), PP1~28,这里所引见P5。

72. 冯特利希《基础》,PP337ff。

73. 参见前注释2中的图表。

74. I·多恩巴赫《灵长类的交往》[*Primatenkommunikation*](Frankfurt, 1975)。关于儿童语言发展中不同类型言语行为的早期分化,可参见M·米勒的拓荒性论文“早期语言发展逻辑”[“Die logik der frühen Sprachentwicklung”], (Univ of Frankfurt, 1975)。

75. 在一封给我的信中, G·戈莱温多弗引证了下列反例:签定一个合同,请愿,等等。这些同时性行为使相应的以言行事行为客观化了。但是只有如下选择才似乎是可能的:①合同的签定乃是借助于施行性话语的帮助才得以合法地实现,在这种场合,根本不存在客观化的问题;②非语言性的合同签定行为由下列陈述所伴随:“S签署了合同X”,在这种场合,则是有两个独立的以言行事行为平行地得到实现(这里通常有一种角色分工:政府官员签署合同,报道者报道合同的签署)。

76. L·J·柯亨“是否存在以言行事力量?”, P587。

77. W·P·阿尔斯顿“意义和应用”[“Meaning and Use”],载罗森伯格和特雷弗斯《语言哲学研究》, P412“我没能发现这样的情形,在其中,意义的相同不是有赖于以言行事行为的相同”。

78. 对于个体发生学研究来说,我认为把皮亚杰学派关于与操作对象相联系的认知发展图式的意义理论(参见H·G·弗斯《皮亚杰与认识》[*Piaget and Knowledge*] Englewood Cliffs, N·J. 1969)和米德学派关于

与相互作用相联系的概念发展的意义理论(参见阿贝斯格卢普、贝利费尔德、索什罗根主编的《常识,相互作用和社会现实》[*Alltagswissen, Interaktion und gesellschaftliche Wirklichkeit*]卷2, Hamburg 1973)结合在一起,似乎是颇有希望的。

79. B·理查兹反对这一点。他在“塞尔论意义和言语行为”[“Searle on Meaning and Speech Acts”](载《语言的基础》[*Foundations of Language*]7 (1971), P536)一文中争辩说:“奥斯丁认为像这样一种语句 $R_a$ (我许诺我将在一年之内付钱)绝没有断言任何事情,它或许为真,也可为假,即它绝没有断定陈述。我们对此表示同意,但这并未推翻下列主张: $R_a$ 无论如何是表达了一个陈述……一个关于 $R_a$ 的陈述。”在这里,理查兹没有把言语行为的陈述性内容 $R_a$ 与从属性语句“我将在一年之内付钱”的陈述性内容等同起来,而是与客观化了的言语行为 $R_a$ 的内容等同了起来,而这却必须被嵌入一个进一步的言语行为 $R$ 中,例如:“我告诉你,我已经向他许诺我将在一年之内付钱。”我把施行性语句与陈述客观化了的语句之间的混淆看作是一种范畴错误(这种错误减弱了理查兹反对塞尔的可表达性原则之论证的价值,特别是在反对塞尔的下列建议方面,这个建议就是要根据在言语行为中使用的句子的意义去分析标准形式的言语行为的意义)。

80. 正是从这个建议出发,每一种普遍语用学的子理论,也就是关于以言行事行为的理论和基本语句理论(以及意向表达理论),都能为意义理论作出独特的贡献。在奥斯丁对意义和力量这两个术语的选择中,仍然反映出一种描述主义的偏见——它是一种如果不是始于洪堡(Humboldt)至迟也是始于维特根斯坦的早已过时的偏见——根据这种偏见,基本语句理论(它可以澄清含义和参考依据)能在意义理论中要求某种垄断地位(自然参考语义学也是从这种偏见出发的)。

81. 奥斯丁《如何用词作事》, P132。

82. 同上, PP147~148; 塞尔《言语行为》, PP64ff。

83. 奥斯丁《施行性话语》, P248。

84. 奥斯丁《如何用词作事》, P144。

85. 同上, PP145ff。还可参考“施行性-断言性”一文的 P31。

在开始时,事情很清楚:如果我们确认一个施行性话语并非是不愉快的,即作者已经愉快地施行了他的行为并带有全部真诚性,它仍然不足以逸出批评所能达到的范围,总是有各种侧度可供批评

者选择。例如,假定在所有情境都是适当的、所有进行此事的条件都已满足时,我对你说“我劝你作这件事,”事实上我已在劝你去作它,而不是在作出陈述——它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虚伪的——即我在劝你,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施行性话语。然而,这里仍然出现一个问题:这个劝告是好还是坏呢?不错,我是带着全部真诚来说此言的,我相信这样作将符合你的利益。但是,我的判断正确么?我的信心在这些情境中验证过么?或者是否在事实上、或事情的发展将表明,这样作正是你的利益所在,虽然这个问题也许较少疑问。这里存在着我的话与情境间的对抗以及情境与已提出的着眼点之间的对抗。我可能已被充分地证实,但我是对的么?

86. 奥斯丁《如何用词作事》,PP144~145。

87. J·哈贝马斯“对一种交往资质理论的初步说明”,PP111ff。

88. 奥斯丁“施行性话语”,PP250~251。

89. 同上,P251。

90. 奥斯丁“施行性-断言性”,PP31~32。

91. 塞尔《言语行为》,P63。

92. 冯特利希关于规劝之一般关联域条件的分析则是这样的(见《基础》,PP349ff):

S使下列情形成为可理解的(也就是,S给H的规劝,只有在下列条件已获得,且H亦相信他们已获得这些条件时才有意义):

1. S知道、相信并假定(根据过去的交往):

- 1) H发现自己处于某种不愉快的情境Z;
- 2) H打算或希望达到其它的、更好一些的处境 $Z' \neq Z$ ;
- 3) H不知道 $Z'$ 如何能达到;
- 4) H正在作h。

2. S相信或假设:

- 5) H已经不愿作h;
- 6) H能通过作h、而不是通过任何其它的行为 $h'$ 达到更愉快的情境(相对适意的情境)。

3. S知道或相信,下列义务对H来说当是绝无问题的;如果上面所列从1)到6)诸项子条件中的一项没有获得(或者更精确地讲,如果H知道、相信、或假设它没能被获得),那么H将通过一种

惯常方式使S理解这一点。

93. D·霍尔德克劳弗特忽略了这种差别(见“施行和陈述”[“Performatives and Statement”]《精神》杂志83(1974), PP1~18), 并因此得出错误的结论, 即只有那些我们称之为团体化约束的言语行为才在语句意义上受到习惯的调整: “一个语句类型是施行性的, 如果、而且仅仅如果它的文字以及一系列话语能够组成一个行为的施行, 这种行为施行是根据习惯作出的, 而该习惯并非仅仅是语法性或语义性的习惯。”

94. 在冯特利希对规劝的分析中, 他的条件B4—6构成了义务的内容。

95. H·达尔修斯“自我逻辑陈述的真实性特征”[“Zum Wahrheitscharakter egologischer Aussagen”], 载布罗克曼和豪弗主编的《费解的实在性》[*Die Wirklichkeit des Unverständlichen*](The Hague, 1974), PP 38~77。

#### “道德发展与自我同一性”注释

1. R·道勃特和G·诺纳尔·辛克莱“晚近资本主义社会中冲突与倒退的潜势”[“Konflikt-und Rückzugspotentiale in Spätkapitalistischen Gesellschaften”], 载《社会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1973), PP301~325; R·道勃特和G·诺纳尔·辛克莱《青春期危机和同一性的形成》[*Adoleszenzkrise und Identitätsbildung*](Frankfurt, 1975)。

2. J·哈贝马斯“释义学的普遍要求”[“Der Universalitätsanspruch der Hermeneutik”]载《文化与批判》[*Kultur und Kritik*](Frankfurt, 1973), PP264~301。这篇文章的一部分已被译成英文, 标题是“论系统扭曲了的交往”[“On Systematically Distorted Communication”]载《探究》杂志, 13(1970), PP205~218。

3. H·马尔库兹“精神分析理论的过时”[“Das Veralten der Psychoanalyse”], 载《文化与社会》[*Kultur und Gesellschaft*] 2 (Frankfurt, 1965), PP96~97, 英译为“弗洛伊德人的概念的废弃”[“The obsolescence of the Freudian Concept of Man”], 载《五次讲演》[*Five Lectures*](Boston, 1970), PP44~61。

4. T·W·阿道尔诺“社会学与心理学的相互关系”[“Zum Verhältnis von Soziologie und Psychologie”], 载《社会学》[*Sociologica*](Frankfurt, 1955), P43, 英译为“社会学与心理学”[“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载《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 46(1967), PP67~80 和 47

(1968)PP79~97。

5. J·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Legitimation Crisis*](Boston, 1975)。

6. T·W·阿道尔诺《否定的辩证法》[*Negative Dialektik*](Frankfurt, (1973), P294, 英译为《否定的辩证法》[*Negative Dialectic*](New York, 1973)。

7. 自我心理学: H·S·萨勒温《现代精神病学的概念》[*Conceptions of Modern Psychiatry*](New York, 1940)和《精神病学的人际理论》[*The Interpersonal Theory of Psychiatry*](New York, 1953); E·H·埃里克森《儿童和社会》[*Childhood and Society*](New York, 1963)和《同一性与生命周期》[*Identity and the Life Cycle*](New York, 1959); N·塞安弗尔特《自我与社会》[*Self and Society*](New York, 1966); D·J·德拉威特《同一性观念》[*Der Begriff der Identität*](Frankfurt, 1971); G·和R·布兰克《走向一种精神分析发展心理学》[“Toward a Psychoanalytic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载《美国精神分析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1972), PP 663~710。

发展心理学: J·皮亚杰《儿童的道德判断》[*The Moral Judgement of the Child*](New York, 1965)和《生物学与智慧》[*Biology and Knowledge*](Chicago, 1971); H·弗斯《皮亚杰与认识》[*Piaget and Knowledge*](Englewood Cliffs, N·J·1969); L·柯尔伯格《阶段与序列》, 载D·格斯林立编的《社会化理论与研究手册》(Chicago, 1969), “从是到应是”, 载米切尔主编的《认知发展与认识论》(New York, 1971), PP151~236; J·H·福莱维尔《儿童角色承担与交往技巧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Role-Taking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Children*](New York, 1968); H·瓦尔纳和B·卡普兰《符号形成》[*Symbol Formation*](New York, 1963)。

相互作用主义: C·H·考勒《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New York, 1902); G·H·米德《精神, 自我与社会》[*Mind, Self and Society*](Chicago, 1934); H·吉尔斯 and C·W·密尔《特征与社会结构》[*Character and Social Structure*](New York, 1953); T·帕森斯 and R·F·巴莱斯《家庭社会化与相互作用过程》[*Family Socialization and Interaction Process*](Glencoe, 1964), 第二章, PP35~133; C·哥尔顿 and K·J·吉尔根主编的《社会相互作用中的自我》[*Self in Social Interaction*](New York, 1968); G·E·斯万森《米德和弗洛伊德:

他们在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相关性”〔“Mead and Freud; Their Relevance for Social Psychology”〕,载J·G·麦尼斯和B·N·米尔泽主编的《符号化相互作用》〔*Symbolic Interaction*〕(Boston, 1967), PP25~45; L·克莱普曼《同一性的社会学侧度》〔*Soziologische Dimension de Identität*〕(Stuttgart, 1969); H·杜贝尔《同一性与制度》〔*Identität und Institution*〕(Bielefeld, 1973); N·K·丹兹因“早期童年中自我的产生”〔“The Genesis of the Self in Early Childhood”〕,载《社会学季刊》〔*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1972), PP291~314。

8. J·哈贝马斯“角色资质概念札记”〔“Notizen zum Begriff der Rollenkompetenz”〕,载《文化与批判》, PP195~231。

9. “在每一种关于发展的心理学理论的中心,都有一个发展阶段的概念。这个概念已经在认识主义传统范围内获得了最强有力的和最严密的形式(皮亚杰,柯尔伯格)。这些作者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讨论认知发展的阶段问题(J·H·福莱维尔‘关于认知发展系列的分析’〔‘An Analysis of Cognitive Developmental Sequences’〕,载《发生心理学专集》〔*Genetic Psychology Monographs*〕86(1972), PP279~3507);(1)各个阶段的认知图式在性质上是彼此有别的,而思维之特定-阶段类型的个体要素却相互联系以至于形成一个结构整体。行为的特定方式与其并非仅仅是客体化-特定化,并反应外界的刺激,不如是可以理解为某种构造环境之特定形式的衍生物。(2)特定阶段的图式乃是在某种恒定的和层次性的结构系列中加以顺序化。这意味着如果不历经所有前面的阶段,后面的阶段就不可能达到;不但如此,在较后的发展阶段上,早先阶段的各要素被转化(aufgehoben)乃至重新综合到一个较高水平,对作为整体的系列而言,某种发展方向可以由此被确定(从刺激性和较多的客体性到增长中的独立性)。(3)这些发展阶段鉴于以下理由首先拥有某种心理学意义,这就是:从个体总是把问题的解决相应地诉诸于他们所达到的最高阶段,而已取代阶段所具有的图式则通常被废止这一事实出发,可以推断发展并非仅仅是一个外在构成的、可归因于外在力量的秩序化图式,而是与某种具有心理学和动力学意义的现实性相对应。”R·道勃特和G·诺纳尔-辛克莱“晚近资本主义社会中冲突与倒退的潜势”, P302。

10. J·休明与E·休明《自我与环境》〔*Ego and Milieu*〕(New York, 1967)。

11. E·图赖尔“青春道德发展中的冲突与转变”〔“Conflict and Tra-

nsition in Adolescent Moral Development”],载《儿童发展》[*Child Development*](1974),PP14~29。

12. 请比较对照前面“什么是普遍语用学”结论部分关于“自我界定”的讨论(英译者)。

13. E·H·埃里克森《同一性与生命周期》(New York, 1959), 第三章“自我同一性的问题”, PP101ff。

14. J·劳温格尔“良心的起源”[“Origins of Conscience”], 未出版, MS(Washington Univ, St, Louis, 1974)。

15. J·劳温格尔“自我发展的意义与衡量”[“The Meaning and Measurement of Ego Development”], 载《美国心理学家》[*American Psychologist*]21(1966), PP195~206; J·劳温格尔和R·魏斯勒《自我发展的衡量》[*Measuring Ego Development*](San Francisco, 1970); J·劳温格尔“关于自我发展的最新研究”[“Recent Research on Ego Development”], 未出版, MS(Washington University, St, Louis, 1973); J·M·布劳顿的专题论文《青春期和早期成人阶段自然认识论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Natural Epistemology in Adolescence and Early Adulthood*](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 1975)。

16. T·帕森斯《社会系统》[*The Social System*](London, 1951)和“社会相互作用”[“Social Interaction”], 载《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 of Social Science*]卷1, 7, PP429~441; J·哈贝马斯“社会化理论词条”[“Stichworte Zur Theorie de Sozialisation”], 载《文化与批判》, PP118~194; H·姚斯《社会学角色理论的当前状况》[*Die gegenwärtige Lage der Soziologischen Rollentheorie*](Frankfurt, 1973)。

17. J·哈贝马斯“论社会同一性”[“On Social Identity”], 载《泰勒斯》[*Telos*], 19(1974), PP91~103。

18. A·W·吉尔德纳“交互性规范”[“The Norm of Reciprocity”], 载《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60), PP161~178; 还可参见他的《进入柏拉图》[*Enter Plato*](New York, 1965)。

19. J·冈德勒“超我的概念”[“Zum Begriff des Über-Ichs”], 载《心灵》杂志[*Psyche*](1964), PP721~743, 812~828; R·A·斯皮兹《自我形成的发生学实验理论》[*Genetic Field Theory of Ego Formation*](New York, 1959); E·雅克布逊《自我与对象世界》[*The Self and the Object World*](New York, 1964); M·米希尔利希“理想化问题”[“Probleme der

Idealisierung”],载《心灵》杂志,(1973),PP1106~1127。

20. A·弗洛伊德《自我与防卫机制》[*Ego and the Mechanisms of Defense*](New York 1946); G·E·斯旺森“个体抵御内心冲突的决定要素”[“Determinants of the Individual's Defenses against Inner Conflict”],载J·C·戈莱德威尔主编的《父母态度与儿童行为》[*Parental Attitudes and Child Behavior*](Springfield, 1961), PP5ff; P·麦迪逊《弗洛伊德关于压抑与防卫的概念》[*Freud's Concept of Repression and Defense*](London, 1961)。试图(与认知类型的研究相结合)去发现问题解决与防卫策略(竞争与防卫机制)间的相互关系当然是很有兴味的;可参考 T·C·克劳伯“自我机制的竞争功能”[“The Coping Functions of the Ego-Mechanisms”],载R·W·怀特主编《生命研究》[*The Study of Lives*](New York, 1963), PP178~200; N·汉恩“自我功能的三联式模型”[“Tripartite Model of Egofunctioning”],载《神经与精神疾病杂志》[*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1969), PP14~30。

21. G·C·吉尔塞和 D·伊海尔毕希“衡量防卫机制的一种客观手段”[“An Objective Instrument for Measuring Defense-Mechanisms”],载《正常与临床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Norm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1969), PP51~60; B·诺恩道尔弗《性,同一及人-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构》[*Geschlecht und Identität und die Struktur der Person-Umwelt-Interaktion*],专题论文,(Berlin, 1976)。

### “历史唯物主义与规范结构的发展”注释

1. A·韦尔莫《批判的社会理论》[*Critical Theory of Society*](New York, 1971),“交往与解放:关于语言学向批判理论回归的反思”[“Communication and Emancipation; Reflections on the Linguistic Turn in Critical Theory”],载J·奥纳个主编的《论批判理论》[*On Critical Theory*](New York, 1976), PP231~263; J·哈贝马斯“论历史的主体”[“Über das Subjekt der Geschichte”],载哈贝马斯《文化与批判》(Frankfurt, 1973), PP389~398。

2. I·费舍尔《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Karl Marx und der Marxismus*](Munich, 1967); O·内格特“作为合法科学的马克思主义”[“Marxismus als Legitimationswissenschaft”],该文乃是A·代伯恩和 N·布查尔因《辩证唯物主义与机械唯物主义的论争》[*Kontroversen über dialektischen und mechanistischen Materialismus*](Frankfurt, 1969)一书

的导言, PP7~50。

3. U·奥威曼“个体形成过程理论”〔“Zur Theorie der individuellen Bildungsprozesse”〕, 未出版, Ms(1974)。

4. H·瑞希尔特《卡尔·马克思资本概念的逻辑结构》〔*Zur logischen Struktur des Kapitalbegriffs bei K·Marx*〕(Frankfurt, 1970)。

5. H·J·萨德库勒和R·De·La·威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和伦理学》〔*Marxismus und Ethik*〕(Frankfurt, 1974)。

6. K·O·阿佩尔“言语理论与伦理学的构建”〔“Sprechakttheorie und die Begründung der Ethik”〕, 载K·O·阿佩尔主编的《语用学与哲学》(Frankfurt, 1976)。

7. J·哈贝马斯“什么是普遍语用学”, 见本书第一章。

8. J·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Boston, 1975), PP8ff。

9. J·皮亚杰《儿童的道德判断》(New York, 1965); L·柯尔伯格“阶段与序列”, 载D·格斯林主编的《社会化理论与研究手册》(Chicago, 1969), “从是到应是”, 载米切尔主编的《认知发展与认识论》(New York, 1971), PP151~236。

10. 三个“领域”中的头一个“领域”——法律和道德——乃是在下篇文章得到处理; 下面接着给出的是对另外两个“领域”——世界观和集团同一性——之间被猜测“相似性”的一个简短描述(英译者)。

11. 这并不是一个纯线性发展过程, 在从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的过渡中, 也存有某些倒退性环节。例如, 可以参考D·埃尔金特“青春期的自我中心主义”〔“Egocentrism in Adolescence”〕, 载《儿童发展》〔*Child Development*〕38(1967), PP1025~1034。

12. J·皮亚杰《儿童的时间概念》〔*The Child's Conception of Time*〕(New York, 1970); 《儿童的物理因果性概念》〔*The Child's Conception of physical Causality*〕(London, 1966)。

13. R·道勃特“现代宗教和宗教运动的相关物”〔“Modern Religion and the Relevance of Religious Movements”〕, 未出版, Ms(1975)。

14. B·诺恩道尔弗“性的同一性, 人-环境-相互作用之结构过程”〔“Geschlechtliche Identität, zur Strukturierung der Person-Umwelt-Interaktion”〕, 专题论文(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 1976)。

15. J·哈贝马斯“角色资质概念札记”, 载《文化与批判》, PP195~231。

16. E·哥弗曼《记号》〔*Stigma*〕(Englewood Cliffs, N·J·1963)。

17. G·H·米德《从一个社会行为主义者立场出发看到的心灵、自我与

社会》[*Mind Self and Socie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rist*], C·W·莫里斯主编(Chicago, 1934), G·H·米德的社会心理学》[*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George Herbert Mead*], A·斯特劳森主编(Chicago, 1956)。

18. M·卢塞尔“人称代词与主体性”[“Personalpronomen und Subjektivität”], 载A·赖斯特《唯物主义的言语理论》[*Materialistische Sprachtheorie*](Kronberg, 1975); 还可参考该书的内容提要。

19. R·道勃特和G·诺纳尔-辛克莱《青春期与同一性构建》[*Adoleszenzkrise und Identitätsbildung*](Frankfurt, 1975); H·斯泰尔林《分离过程中的父母与子女》[*Eltern und Kinder im Prozess der Ablösung*](Frankfurt, 1975)。

20. 可参考由U·奥威曼提出的图式, 重载于《文化与批判》, P231。关于对习惯性角色理论的批评, 参见L·克莱普曼《同一性维度》[*Dimensionen der Identität*](Stuttgart, 1969); H·姚斯《社会角色理论的当前状况》[*Zur gegenwärtigen Lage der Soziologischen Rollentheorie*](Frankfurt, 1973); H·都贝尔《同一性与制度》[*Identität und Institution*](Gütersloh, 1973); D·盖伦《社会化了主体》[“Das Vergesellschaftete Subjekt”], 卷2, Diss. (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 1975)

21. 哈贝马斯此处可能指“角色资质概念札记”一文, PP222ff(英译者)。

22. T·拉科曼“论社会世界的边界”[“On the Boundaries of the Social World”], 载M·耐德森主编的《现象学与社会现实》[*Phenomenology and Social Reality*](The Hague, 1970), PP73~100。

23. V·兰特纳利《被压迫的宗教: 关于现代救世主崇拜的研究》[*The Religions of The Oppressed; a Study of Modern Messianic Cults*](London, 1963)。

24. G·德沃莱奥克斯《正常与异常》[*Normal und Anormal*](Frankfurt, 1974)。

25. 参见J·哈贝马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Zur Rekonstruktio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Frankfurt, 1976), PP260~207。

26. J·哈贝马斯《大众结构演变》[*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Neuwied, 1962), 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

27. 马克思曾经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分析过这种双重同一性, 这自然是针对卢梭的。参见《青年马克思论哲学与社会》[*Writings of the Young Marx on Philosophy and Society*], L·D·伊斯顿和K·H·古塔特编

辑并翻译, (New York, 1967), PP216~248。

28. W·威特“德意志联邦国防军缺乏敌方目标么?”〔“Bundeswehr ohne Feindbilder?”〕, 载《和平分析》〔*Friedensanalysen*〕 (Frankfurt, 1975), PP96~114。

29. 例如, 可参考B·R·杜朗《布列塔尼问题》〔*La Question Bretonne*〕 (Paris, 1975)。

30. 在讨论中, K·埃德曾提出这样一种观点, 即认为只有在习惯性(角色)同一性阶段, 才存在与个体同一性相应的集体同一性; 而后习惯性阶段的自我同一性则不再需要来自集体同一性的支持。关于世界大同的构想, 关于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 关于某种自由劳动者的联合, 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也将仅仅标志着如下阶段的到来, 即这样一种集体同一性的分解。例如, 康德就曾提出过把世界理解为“以自身为目的的普遍王国”, 他认为“伦理共同体的概念总是与所有成员之总体性的观点相联系, 正是在这当中, 它与那种政治共同体的概念区别了开来。”理性存在者的王国乃是一种理想, 后者绝不可能由所谓世界大同秩序加以经验地实现。但无论如何, 这样一种同一性设计还是显示出了某种普遍式调节的交往行为领域的条件所在, 根据这种条件, 那些暂时构建起来的、以特定集团为依托的集体同一性可以作为相对物来处理, 并使之成为可变的。从这一角度出发, 一种复杂社会能否构建理性同一性的问题似乎不得不这样来回答: 只要绝大部分社会成员由社会结构所驱使丢弃了他们的角色同一性(不管它是多么普遍化), 并去发展自我同一性, 集体同一性就将成为多余的东西。同一性观念——这种观念在未来社会中将作为反思性的被集体构建起来——现在乃是最后一个带有幻觉的躯壳, 直至这种集体同一性最终被抛弃并被所有参照系统永恒的变化所取代。当然, 这样一种状态的设想仍然带有乌托邦性质: 因为在这种状态下, 所有战争——作为组织化了的集体努力(该集体需要其成员的牺牲意志)——都只有作为退化现象的发生, 才是可想象的, 而绝不再是什么制度上可以期待的东西。

31. J·哈贝马斯《认识与人的意趋》(Boston, 1971), 《走向一个理性的社会》〔*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Boston, 1970)。我要对T·莫伽塞深表谢意, 他在工具行为、战略行为和交往行为诸概念的分析方面, 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参见J·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The Critical Theory of Jürgen Habermas*〕(Cambridge, Mass, 1978), 第1节第2部分“劳动与相互作用: 工具理性批判”)。还可参考J·凯纳“哈贝马斯论劳动与相互作用”〔“Work and Interaction in Habermas”〕, 载《竞技场》杂志〔*Arena*〕38

(1975), PP51~63。

32. 关于这个问题的展开,也可参考A·韦尔莫“交往与解放:关于语言学向批判理论回归的反思”。

33. 关于系统扭曲了的交往这个概念,可参考J·哈贝马斯“释义学的普遍性要求”[“Der Universalitätsanspruch der Hermeneutik”],载《文化与批判》,PP263~301。英译者——还有些相关的基础性论述,见于“总结与答复”[“Summation and Response”],载《连续》杂志,〔*Continuum*〕8 (1970), PP123~133,“论系统扭曲了的交往”[“On Systematically Distorted Communication”],载《探究》杂志,13(1970), PP205~218。

34. 在这里,我主要是想强调与不同行为方面相联系的各理性化过程之间的区别。马克思则试图去构想这些理性化过程的统一,并利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去表征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各阶段中个体与社会的关系。C·格尔特在《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Marx's Social Ontology*] (Cambridge, Mass, 1978)一书中曾就重建这个理论构架作出了颇为引人的努力。

35. J·H·福莱维尔“关于认知发展系列的分析”[“An Analysis of Cognitive Developmental Sequences”],载《发生心理学专集》[*Genetic Psychology Monographs*], 86(1972), PP279~350。

36. M·古德莱尔《经济中的理性与非理性》[*Rationalité et irrationalité en économie*] (Paris, 1966),《马克思主义人类学透视》[*Perspectives in Marxist Anthropology*] (Cambridge, 1976)。当然,古德莱尔的工作显然是以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为基础的。

37. L·古尔德曼《文化创造与精神结构》[*Structures Mentales et Création Culturelle*] (Paris, 1970),《马克思主义与人文科学》[*Marxisme et Sciences Humaines*] (Paris, 1970),《现代社会中的文化创造》[*La Création Culturelle dans la Société Moderne*] (Paris, 1971)。

38. A·托尔兰尼《社会的生产》[*Production de la Société*] (Paris, 1972),《为社会学辩护》[*Pour La Sociologie*] (Paris, 1974)。

39. M·魏斯特《作为学习过程的无产阶级的形成》[*Die Entstehung des Proletariats als Lernprozess*] (Frankfurt, 1970); O·内格特和A·克鲁吉《大众与经验》[*Öffentlichkeit und Erfahrung*] (Frankfurt, 1972)。

40. C·奥菲《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结构问题》[*Strukturprobleme des Kapitalistischen Staates*] (Frankfurt, 1972); 还可参考M·雅尼克《政治体制的危机》[*Politische Systemkrisen*] (Köln, 1973); W·D·纳尔和C·

奥菲主编的《福利国家与大众的忠诚》〔*Wohlfahrtsstaat und Massenloyalität*〕(Köln, 1975)。

41. C·奥菲《职业教育改革》〔*Berufsbildungsreform*〕(Frankfurt, 1975)。

42. T·W·阿道尔诺“文化与管理”〔“Kultur und Verwaltung”〕, 载《社会学论文集1, 全集》〔*Soziologische Schriften 1, Gesammelte Schriften*〕卷8, PP122~146, “晚近资本主义还是工业社会”〔“Spätkapitalismus oder Industriegesellschaft”〕, 同上书, PP354~372。

43. M·戈瑞弗哈根主编的《国家与社会中的民主化》〔*Demokratisierung in Staat und Gesellschaft*〕(Munich, 1973) H·Von·汉蒂格《政治的重建》〔*Die Wieder Herstellung der Politik*〕(Stuttgart, 1973)。

44. 在原导言中, 这里往后还有两段文字, 其中, 哈贝马斯概述了该书的内容, 并就R·道勃特和K·埃德对该书观点形成的贡献表示感谢, 最后再一次强调了这些观点的方案性特征(英译者)。

### “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注释

1.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的第一部分和《政治经济学批判》〔*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的序言中。

2. 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方面的关系, 可参考L·克莱德尔《马克思的民族学与人类学》〔*Ethnologie und Anthropologie bei Marx*〕(München, 1973)。

3. J·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Dialectic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New York, 1940)。

4. I·S·康《20世纪的历史哲学》〔*Die Geschichtsphilosophie des 20. Jahrhunderts*〕, 卷2, (Berlin, 1966); E·M·祖考夫“论世界史的分期”〔“Über die Periodisierung der Weltgeschichte”〕, 载《苏维埃科学》〔*Sowjetwissenschaft*〕(1961, no. 3), PP241~254; E·恩格尔伯格“世界史上的进化与革命问题”〔“Fragen der Evolution und der Revolution in der Weltgeschichte”〕, 载《历史科学期刊》〔*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13, (1965), PP9~18; E·霍夫曼“社会演进中历史发展后果的两个问题”〔“Zwei Aktuelle Probleme d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sfolge Fortschreitender Gesellschaftsformationen”〕, 载《历史科学期刊》16 (1968), PP1265~1281; G·莱温“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演进理论的讨论”

〔“Zur Diskussion Über die Marxistische Lehre von den Gesellschaftsformation”〕,载《东方研究所的报道》〔*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Orient-forschung*〕(1969),PP137~151;E·恩格尔伯格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中的问题》〔*Probleme der Marxistischen Geschichtswissenschaft*〕(Köln,1972)。

5.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L·伊斯顿和K·古塔特编辑的《青年马克思论哲学与社会》(New York,1967),P409。

6.关于行为类型的界定,可参考J·哈贝马斯《走向一个理性的社会》(Boston,1970),PP91ff。

7.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P421。

8.同上,P409。

9.同上,P402。

10.R·伦希《人类:从人到半个上帝》〔*Homo Sapiens; from Man to Demi-God*〕(New York,1972);E·莫林《人类之谜》〔*Das Rätsel des H-umanen*〕(München,1974)。

11.C·F·豪克特和R·艾舍尔“人的革命”〔“The Human Revolution”〕,载《当代人类学》〔*Current Anthropology*〕(Feb,1964),PP135~147;G·W·汉威斯基“灵长类交往与语言的手势起源”〔“Primate Communication and the Gestural Origin of Language”〕,载《当代人类学》(Feb,1973),PP5~29。

12.关于脊椎动物中的乱伦界线,可参考N·毕希弗“乱伦禁忌的生物学基础”〔“The B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 Incest-taboo”〕,载《社会科学信息》〔*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6(1972),PP7~36。民族学研究没有考虑到,正是父亲与女儿之间的乱伦界线第一次扫清了通向家庭结构的文化创新之路。可参考M·弗兹“亲族与社会秩序”〔“Kinship and the Social Order”〕,载《当代人类学》(April,1972),PP285~296。

13.E·W·康特《存在与生成:Biogram论集》〔*Bing and Becoming; Essays on the Biogram*〕(New York,1973)。

14.J·哈贝马斯“相互作用资质的发展”〔“Entwicklung der Interaktionskompetenz”〕,未出版,Ms(starnberg,1974)。

15.莫林《人类之谜》,PP115ff。关于时间意识的个体发生,可参考皮亚杰《儿童的时间概念》(New York,1970)。

16.D·克拉森《本能,精神,效果》〔*Instinkt, Psyche, Geltung*〕(Opladen,1967)。杜尔克海姆(Durkheim)已经研究过行为规则的强制性特征,这

种特征首先是在矛盾心理感觉的约束方面,产生出自身的制裁力量;可参考E·杜尔克海姆《社会学和哲学》[*Sociology and Philosophy*](New York, 1974):“进一步讲来,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概念也显示出同样的双重性,这就是神圣。神圣的东西逐渐灌输到我们心中,如果不是恐惧的,那么当然是充满敬重的,这使我们与它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同时,它又是一个爱与欲求的对象,我们热切地希望接近它,我们为达此目的而努力奋斗。这样,我们不得不具有了某种双重的感觉。”还可参考A·盖伦关于“非确定性义务”的思想,见《原始人与晚近文化》[*Urmensch und Spätkultur*](Bonn, 1956) PP154ff。

17. 关于“内在”自然与“外在”自然的概念,可参考J·哈贝马斯《认识与人的意趋》(Boston, 1971),《合法化危机》(Boston, 1975), PP3ff。

18.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19. J·帕希尔卡“马克思主义关于早期阶级社会分析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Von der asiatischen Produktionsweise Zu einer marxistischen Analyse der frühen Klassenge Sellschaften”], 载 *Eirene* (Prague, 1967), PP141~174; L·V·丹尼洛娃“关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理论中的若干论争问题”[“Controversial Problems of the Theory of Precapitalist Societies”], 载《苏联人类学与考古学》[*Soviet Anthropology and Archaeology*]9 (Spring, 1971), PP269~327。

20. M·古德莱尔《马克思主义人类学透视》[*Perspectives in Marxist Anthropology*](Cambridge, 1976)。

21. O·马科特《历史哲学遇到的障碍》[*Schwierigkeiten mit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Frankfurt, 1973)。

22. 见前一章。

23. 在一篇未发表的、关于进化理论的手稿中, N·卢曼提出了在这种联结中运动概念的可应用性的疑问。

24. 卢曼在《注 23》提及的手稿中已经指出了这一点。

25. 参看我 对卢曼的批评, 载 J·哈贝马斯、N·卢曼《社会理论》[*Theorie der Gesellschaft*](Frankfurt, 1971), PP150ff; 还可参考 R·道勃特《系统理论与宗教解释系统的发展》[*Systemtheorie und die Entwicklung religiöser Deutungssysteme*](Frankfurt, 1973), PP66ff。

26. 例如, H·吉瑞克在“封建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Zur Dialektik von Produktivkraft und Produktionsverhältnis im Feudalismus”], (载《历史科学期刊》16(1966), PP914~932)中就曾把“增

长中的更高水平的对自然的控制”和“增长中的更成熟的社会共同生活形式”二者区分开来：“在历史进步中，最最重要的尺度和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乃是生产力的改进，特别是直接生产者那种自觉的、有目的的、以成功为标向的活动的增长，以及变更了的生产关系，后者使更多的人有权力参与、并积极介入到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的过程之中”(PP918~919)。

27. K·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New York, 1970), “序言”, PP20~21。

28. K·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Die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卷2, (Berlin, 1927), 第1册, PP817~818。

29. 参见A·托莱尼《后工业社会》[*La Société Post-industrielle*](Paris, 1969); D·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New York, 1973)。

30. 古德莱尔《马克思主义人类学透视》。

3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32.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33. 古德莱尔《马克思主义人类学透视》。

34.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载L·费尔编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 政治与哲学基本著作集》[*Marx and Engels: Basic Writings on Politics and Philosophy*](New York 1959), P19。

35. I·塞尔诺“原始社会秩序的解体”[“*Die Auflösung der Urgemeinschaftsordnung*”], 载K·埃德主编的《论阶级社会的形成》[*Die Entstehung von Klassengesellschaften*](Frankfurt, 1973), PP69~112。

36. S·莫斯卡维希《自然的人类史》[*The Human History of Nature*], (New York, 1977)。

37.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P21。

38. A·盖林“技术人类学观点”[“*Anthropologische Ansicht der Technik*”], 载盖林《技术时代的技术》[*Technik im technischen Zeitalter*](Düsseldorf, 1965); 还可参考我在《走向一个理性的社会》中的有关评论, PP87ff。

39. J·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The Principles of Genetic Epistemology*](New York, 1972)。

40. E·C·维尔斯科夫“场景变换与进步脉冲”[“*Schauplatzwechsel und Pulsation des Fortschritts*”], 载E·舒林主编的《普遍的历史》

[*Universalgeschichte*](Köln, 1974), PP122~123。

41. 霍夫曼“两个现实问题”。

42. V·G·柴尔德《历史中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 in History*](London, 1964), PP55ff; C·M·希普拉“两个革命”[“Die Zwei Revolutionen”], 载《普遍的历史》, PP87~95。

43. 丹尼洛娃“关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理论中的若干论争问题”, PP282~283。

44. E·R·色威斯《原始社会组织》[*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New York, 1962)。

45. K·埃德《国家组织化社会的形成》[*Die Entstehung Staatlich Organisierter Gesellschaften*](Frankfurt, 1976)。

46. 帕希尔卡“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

47. K·古塞尔“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构成和系统特征”[“Herausbildung und Systemcharakter der Vorkapitalistischen Gesellschaftsformationen”], 载《历史科学期刊》16(1968), PP1204~1211。

48. 吉瑞克“封建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

49. 正是这些现象促使 K·雅斯贝尔斯去构建他的“轴心时期”的观念。参见他的《历史的起源和目标》[*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New York, 1976)。

50. F·托凯《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Zur Frage der Asiatischen Produktionsweise*](Neuwied, 1965)。

51. M·芬莱“奴隶与自由之间”[“Between Slavery and Freedom”], 载《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6, (April, 1964)。

52. J·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 PP17ff; K·埃德“合成, 进化与历史”[“Komplexität, Evolution und Geschichte”], 载《社会理论, 增刊》[*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Supplement*], 1(Frankfurt, 1973)。

53. L·柯尔伯格《阶段与序列》, 载 D·格斯林主编的《社会化理论与研究手册》(Chicago, 1969), “从是到应是”, 载 T·米切尔主编的《认知发展与认识论》(New York, 1971), PP151~236。

54. 埃德《国家组织化社会的形成》。

55. L·克拉德《国家的形成》[*Formation of the State*](New York, 1968)。

56. 这种理论最重要的代表是 F·瑞采尔(Ratzel), P·W·施密特(Sch-

midt); F·奥本海默尔(Oppenheimer); 还有 A·鲁斯塔夫(Rüstow)。

57. W·E·缪荷曼“统阶与国家”[“Herrschaft und Staat”, 载《种族、民族与文化》(Rassen, Ethnien, Kulturen)(Neuwied, 1964), PP248~296。

58. 这种观点最初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 后来有了许多的信奉者。V·G·柴尔德就是一个很好的代表, 这在他的《旧世界的前历史》(Old World Prehistory)(London, 1938)一书中已初见端倪。

59. G·E·兰斯基《力量与特权》(Power and Privilege)(New York, 1966)。早些时, 我也曾支持过这种观点, 见我的《走向一个理性的社会》P94, 《社会理论》PP153~175。

60. R·L·卡纳尔罗“一种国家起源的理论”[“A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State”], 载《科学》杂志(Science)169(1970), PP733~738。

61. K·A·维特弗格尔《中国社会历史》(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Philadelphia, 1946), 《东方专制政府: 关于总体力量的比较研究》(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New Haven, 1957)。

62. R·柯尔伯恩“文明社会兴衰的结构与过程”[“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the Rise and Fall of Civilized Societies”], 载《历史与社会比较研究》8(1965~1966); 卡纳尔罗“一种国家起源的理论”。

63. 在此, 我利用了K·埃德提供的概略, 见《德国社会学家代表大会》(Deutschen Soziologentag), 16(in Kassel, 1974)。

64. 同上, P14。

65. 同上, P15。

66. 同上。

67. “深深扎根的矛盾在于: 对自然的控制和人的自我实现有时不得不处于对立之中, 因为前一个过程为了自身的增长效果要求把奴役作为实现组织化和动员劳动力量的手段, 而后者却把自由当作自己的目标和基础。确实, 归根结底, 对自然的控制只有在人的自我实现, 人的关系的人性化得以成功时才有意义。”维尔斯科夫《场景变换与进步脉冲》, P131。

68. K·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London, 1966)。

69. C·H·瓦丁顿《伦理动物》(The Ethical Animal)(Chicago, 1960)。

70. 参见W·莱普尼斯和H·H·李特主编的《野性思维的位置》(Orte

*des Wilden Denkens*](Frankfurt, 1970)。

71. 皮亚杰也把这一点视为可以将结构主义的各个支脉统一起来的要素。参见J·皮亚杰《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New York, 1970)。

72. C·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The Savage Mind*](Chicago, 1968); M·古德莱尔“历史上的神话”[“Mythe et Histoire”], 载《编年史, 经济, 社会, 文明》[*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73. L·柯尔伯格“阶段与序列”, “从是到应是”。

74. S·吉波特和H·C·吉波特《语言与精神分析》[*Sprache und Psychoanalyse*](Heidelberg, 1973); R·道勃特“由远古宗教体系向发达文化的宗教体系的过渡逻辑”[“Zur Logik des Ubergangs von archaischen Zu hochkulturellen Religionssystemen”], 载K·埃德主编的《阶级社会的形成》[*Die Entstehung von Klassengesellschaften*], PP330~363; B·舒莱尔本-兰格《语言学的语用学》[*Linguistische Pragmatik*](Stuttgart, 1975)。

75. V·G·柴尔德《历史中发生了什么》(New York, 1946); L·A·怀特《文化科学》[*The Science of Culture*](New York, 1949)。

76. J·H·斯塔沃尔特《理论与文化变异》[*Theory and Culture Change*](Urbana, 1955)。

77. T·帕森斯《社会: 进化与比较透视》[*Societies, Evolutionary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Englewood Cliffs, N·J·1966); G·兰斯基《人类社会》[*Human Societies*](New York, 1930); 可参考P·J·尤兹的批判性评论“进化主义再探”[“Evolutionism Revisited”], 载《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 15 (1973), PP227~240; N·卢曼《目的概念和系统合理性》[*Zweckbegriff und Systemrationalität*](Frankfurt, 1974)。

78. E·S·杜恩《经济与社会发展》[*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Baltimore, 1971), PP80ff。

79. 同上。

80. 同上, PP160ff。

81. 这个建议载于未发表的关于社会进化理论的一篇文章中。

82. 杜恩《经济与社会发展》, PP97ff。

83. H·W·尼森“种系发生比较”[“Phylogenetic Comparison”], 载S·S·史蒂文斯主编的《实验心理学手册》[*Handbook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New York, 1951), PP34ff。

84. N·卢曼“对符号生成的交往媒介理论的导引性评论”[“Einführen-

de Bemerkungen zu einer Theorie Symbolisch generalisierter Kommunikationsmedien”],载《社会学期刊》[*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June 1974),PP236~255。

85.我把这种见解的得出归功于与K·埃德的讨论。

86.J·赫胥黎《进化论:现代的综合》[*Evolution; The Modern Synthesis*](New York,1941),《伦理学的试金石》[*Touchstone for Ethics*](New York,1942);T·杜布赞斯基《人类自由的生物学基础》[*The Biological Basis of Human Freedom*](New York,1956);D·D·莱费尔“达尔文主义和伦理学”[“Darwinism and Ethics”],载S·A·巴纳特主编的《一个达尔文的世纪》[*A Century of Darwin*](Cambridge,1958)。

87.瓦丁顿《伦理动物》,P59。

88.同上。

89.K-O·阿佩尔“交往共同体的超验性和伦理学之基础”[“Das Apriori der Kommunikationsgemeinschaft und die Grundlagen der Ethik”],载阿佩尔《哲学的转变》[*Transformation der Philosophie*](Frankfurt,1973),卷2,PP358~436;J·哈贝马斯“什么是普遍语用学?”,见第1章。

90.参见J·哈贝马斯“关于实践讨论的两种议论”[“Zwei Bemerkungen Zum Praktischen Diskurs”],载哈贝马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Zur Rekonstruktio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Frankfurt,1976),PP338~346。

### “现代国家中的合法化问题”注释

1.通过一定方式,亲族系统自身亦拥有合法性力量;一个人在家庭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着 he 可能提出什么样的要求。罗马法中“合法继承”的概念把这层意义输入到了民法之中。然而,私人权力意义上的合法化却预先假设着某种合法性秩序。

2.K·埃德《由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之形成》[*Die Entstehung Staatlich Organisierter Klassengesellschaften*](Frankfurt,1976)。

3.S·罗肯“国家构建与民族构建的比较分析”[“Die Vergleichende Analyse der Staaten und Nationenbildung”],载W·塞夫主编的《社会演变理论》[*Theorien des Sozialen Wandels*](Köln,1969),PP228~252。

4.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概念比起同一性概念来,更少有制度色彩。参见J·李特“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中的政治学与伦理学”

〔“Politik und Ethik in der Praktischen Philosophie des Aristoteles”〕,载李特《形而上学与政治学》〔*Metaphysik und Politik*〕(Frankfurt, 1969), PP106~132。

5. N·卢曼“论大众社会”〔“Die Weltgesellschaft”〕,载《法哲学与社会哲学档案集》〔*Archiv für Rechts-und Socialphilosophie*〕(1971), PP1~33;还可参考我在“综合社会能不能形成合理的同一?”〔“Können Komplexe Gesellschaften eine vernünftige Identität ausbilden?”〕一文中的有关批判性评论,载哈贝马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Frankfurt, 1976), PP92~126;这些评论中的一部分曾以“论社会同一性”〔“On Social Identity”〕为题被译成英语,载于《泰勒斯》杂志〔*Telos*〕19(1974), PP91~103。

6. 参见P·克尔曼斯格的有关论证,“作为分析范畴的合法性”〔“Legitimität als analytische Kategorie,”〕,载《政治季刊》〔*Polit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12(1971), PP367~401,特别是PP391ff。

7. T·沃尔坦伯格《合法性国家的统治》〔*Die Legitimität Staatlicher Herrschaft*〕(Berlin, 1973)。

8. C·麦耶尔“‘民主’概念的形成”〔“Die Entstehung des Begriffs ‘Demokratie’”〕,载《政治季刊》10(1969), PP535~575。

9. V 兰特纳利《被压迫的宗教:关于现代救世主崇拜的研究》(London, 1963), P316:

“当白种人的压迫使自身在社会内显露出来时,土著人开始求助于《圣经》,而后者在福音传播的那些世纪,总是被土著人所拒绝。许多土著人团体的这种“自我-基督教化”是在白种人闯入自己的生活环境,并创造出非常相似于促使早期基督教产生的条件的情形下发生的。正如中东、古罗马的头一批基督徒一样,非洲、亚洲、大洋洲和美洲的土著居民也面临着同样的境况,即压迫和对立面同时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严格的教会等级,另一方面是国家的权威力量。”

10. 被提出的各种法——土地改革、兵役缩减、关于结社的民法——为大土地庄园的贵族所有者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对抗投下了一束背景之光。试图在希腊模式基础上建立某种民主制度,试图从元老院的职责中抽回尽可能多的东西赋予更大众化的众议机构,试图改变由元老院支撑的法院的构成,所有这些都说明我们要处理的乃是一种合法性冲突。阿克塔维厄斯

(Octavius)非法性地被从军团司令官的坐椅上逐走,台比留斯(Tiberius)同意并不合乎法律程序地第二次把自己作为候选人提出,元老院并未根据法律去追究台比留斯在街上的谋杀罪行,这一切又都说明了在现存制度合法性方面发生的急剧倾斜。

11. E·沃耐尔和M·埃伯斯托塞《中世纪平民的意识形态问题》[*Ideologische Probleme des Mittelalterlichen Plebejertums*](Berlin, 1960)。

12. M·贝克尔“弗洛伦萨政治与14世纪宗教异端的扩散”[“Florentine Politics and the Diffusion of Heresy in the Trecento”], 载《大场景》杂志[*Spectaculum*]34(1959), PP67~75。

13. N·库亨《千年盛世的追求》[*The Pursuit of the Millenium*](London, 1957); J·B·罗素《中世纪的宗教异端》[*Religious Dissent in the Middle Ages*](New York, 1971)。

14. K·雅斯贝尔斯《伟大哲学家们》[*The Great Philosophers*], H·阿兰特编辑, (New York, 1962)。

15. J·罗尔斯《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Cambridge, Mass, 1971)。

16. K-O·阿佩尔“交往共同体的超验性和伦理学之基础”[“Das Apriori der Kommunikations Gemeinschaft und die Grundlagen der Ethik”], 载《哲学的转变》卷2, (Frankfurt, 1973), PP358~436。

17. R·道勃特“由远古宗教体系向文化发达的宗教体系过渡的逻辑”[“Zur Logik des Übergangs von archaischen zu hochkulturellen Religionssystemen”], 载K·埃德《阶级社会的形成》(Frankfurt, 1973), PP330~363。。

18. 卢梭《社会契约论》[*The Social Contract*]卷I, 第6章。

19. H·戈莱宾“民主的民间表征和同一”[“Volksrepräsentation und Identitäre Demokratie”], 载《政治季刊》(1972), PP162~180; J·菲雅尔科夫斯基“关于讨论观念与界限的评论”[“Bemerkungen zu Sinn und Grenzen der Rätediskussion”], 载M·戈莱芬哈根《国家与社会的民主化》[*Demokratisierung in Staat und Gesellschaft*](München, 1973), PP124~139; F·沙尔弗“参与民主”[“Demokratie als Partizipation”], 同上书, PP117~124; H·Von·翰蒂《政治的再生》[*Die Wiederherstellung der Politik*](Stuttgart, 1973)。

20. P·巴荷莱赫《民主精华论: 一种批判》[*The Theory of Democratic Elitism; A Critique*](Boston, 1967); C·培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Theory*](Cambridge, 1970); Q·斯金纳“经验的民主理论家及其批判者：一场对双方都无益的争论”[“The Empirical Theorists of Democracy and Their Critics, A Plague on Both Their Houses”], 载《政治理论》[*Political Theory*]1(1973), PP287~306。

21. Von·克尔曼斯格“作为分析范畴的合法性”, P381。

22. N·卢曼《借助于程序的合法化》[*Legitimation durch Verfahren*](Neuwied, 1969)。

23. J·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Boston, 1975), PP142~143。

24. L·巴梭《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社会与国家》[“Gesellschaft und Staat in der Marxschen Theorie,”], 载巴梭《社会形态与国家形式》[*Gesellschaftsformation und Staatsform*](Frankfurt, 1975), PP10~46。

25. C·奥菲《结构改革》[*Bildungsreform*](Frankfurt, 1975), PP24~25。

26. 参见我在《合法化危机》中提出的“系统危机”概念, PP24~31。

27. C·梯利“关于欧洲国家形成史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tate-Making”], 载梯利主编的《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Princeton, 1975), PP3~83。

28. I·瓦勒斯坦《现代世界系统》[*The Modern World-System*](New York, 1974)。

29. S·E·菲耐尔“欧洲的国家建构与民族建构：军队的角色”[“State and Nation-Building in Europe,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载梯利主编的《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 PP84~163。

30. T·冯坦伯尔格《国家统治的合法化》[*Die Legitimation Staatlicher Herrschaft*](Berlin, 1973)。

31. D·斯坦伯格“合法性”[“Legitimacy”], 载《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卷9, PP244~248。

32. 这种表达亦曾为C·J·弗里德里克所运用, 参见他的“政治角度的合法性”[“Die Legitimität in Politischer Perspektive”], 载《政治季刊》(1960)。

33. C·B·莫福森《所有权个体主义的政治理论：从霍布斯到洛克》[*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Hobbes to Locke*](Oxford, 1962); W·由赫纳《利己主义与公益》[*Egoismus und Gemein-*

wohl)(Frankfurt, 1973); H·诺恩道尔弗《利益的概念》(Der Begriff des Interesses)(Frankfurt, 1973)。

34. H·U·沃贺勒尔《德意志帝国史》[*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Kaiserreichs*](Göttingen, 1974)。

35. C·梯利“现代欧洲的食品供应和公共秩序”[“Food Supply and Public Order in Modern Europe”], 载《民族国家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PP380~456。

36. C·奥菲和V·劳恩吉“论资本主义国家概念的创立”[“Thesen zur Begründung des Konzepts des Kapitalistischen Staats”], 未出版, Ms (Starnberg, 1975); C·奥菲《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结构问题》[*Strukturprobleme des Kapitalistischen Staats*] (Frankfurt, 1972)。

37. S·斯卡尔帕利斯-斯帕克等“通往社会主义的彼得麦那道路”[“Ein biedermeierlicher Weg Zum Sozialismus”], 载《明镜》杂志[*Spiegel*] no·9(1975)。

38. J·哈贝马斯《走向一个理性的社会》(Boston, 1970); C·库赫和D·桑戈海斯《专家治国探讨的文献》[*Texts Zur Technokratiediskussion*] (Frankfurt, 1970); J·《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 PP130~142。

39. O·麦辛“议会改革方略的限制性社会-经济条件”[“Restriktive Sozio-ökonomische Bedingungen Parlamentarischer Reformstrategien”], 载《政治社会学》[*Politische Soziologie*](Frankfurt, 1974), PP123~138。

40. B·古根伯格“统治合法化与国家危机”[“Herrschaftslegitimierung und Staatskrise”], 载戈莱温、古根伯格和斯特劳森合著的《国家危机》[*Krise des Staates*](Neuwied, 1975), PP9~10; J·O·康纳尔《国家的财政危机》[*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New York, 1973)。

41. 弗罗拜尔、汉瑞兹·克莱因和桑凯尔“劳动与资本的国际化”[“Internationalisierung Von Arbeit und Kapital”], 载《利维坦》[*Leviathan*], 1(1973), PP429~454。

42. C·奥菲和V·劳恩吉“论资本主义国家概念的根据”[“Thesen zur Begründung des Konzepts des Kapitalistischen Staats”], 未出版, Ms (Starnberg, 1975)。

43. R·米里般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New York, 1969)。

44. R·M·米莱尔曼“学习与合法性”[“Learning and Legitimacy”],

载《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0(1966), P548。

45. H·布绍夫《作为政治理论的系统论》〔*Systemtheorie als Theorie der Politik*〕(München, 1975)。

46. K·D·奥普“法律实施的一些条件”〔“Einige Bedingungen für die Befolgung Von Gesetzen”〕, 载K·鲁德森和F·萨克主编的《反常行为》〔*Abweichendes Verhalten*〕1, (Frankfurt, 1975), PP214~243。

47. J·H·沙尔“现代国家中的合法性”〔“Legitimacy in the Modern State”〕, 载P·格林和S·莱维森主编的《权力与共同体》〔*Power and Community*〕(New York, 1970); PP277~327; R·斯帕尔曼“自由统治的乌托邦”〔“Die Utopie der Herrschaftsfreiheit”〕, 载M·雷德尔主编的《实践哲学的复兴, < I >》〔*Rehabilitierung der Praktischen Philosophie I*〕(Freiburg, 1974), PP211~234。

48. J·理特“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权力论”〔“Naturrecht bei Aristoteles”〕, 载《形而上学与政治学》〔*Metaphysik und Politik*〕 PP133~182, 这里引自P135。

49. 同上, P169。

50. H·G·伽达默尔“一种哲学伦理学的可能性”〔“Über die Möglichkeit einer Philosophischen Ethik”〕, 载伽达默尔《短论集(1)》〔*Kleine Schriften 1*〕, PP179~191, 这里引自PP187~189; W·汉尼斯《政治学与实践哲学》〔*Politik und Praktische Philosophie*〕(Neuwied, 1963); H·库亨“亚里士多德与政治科学的方法”〔“Aristoteles und die Methode der Politischen Wissenschaft”〕, 载M·雷德尔主编的《实践哲学的复兴< I >》, PP161~190。

51. H·佩金《维特根斯坦与正义》〔*Wittgenstein and Justice*〕(Berkeley, Calif, 1972), PP169~192。

52. 同上, P272。

53. M·奥克社特《政治学中的理性主义及其它》〔*Rationalism i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 1962)。

54. 在此, 我受到了V·海爾特的启发。可参见他的《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New York, 1970); 海爾特又受惠于H·L·A·哈特的《法的概念》〔*The Concept of Law*〕(Oxford, 1961)一书。

55. 罗尔斯《正义论》; P·洛伦赞《规范逻辑与伦理学》〔*Normative Logic and Ethics*〕(Mannheim, 1969); F·凯姆巴特尔“实践哲学的构建可能

性何在?”〔“Wie ist Praktische Philosophie Konstruktiv Möglich?”〕, 载凯姆巴特尔主编的《实践哲学与构建性科学理论》〔*Praktische Philosophie und Konstruktive Wissenschaftstheorie*〕(Frankfurt, 1974), PP6~33; K-O·阿佩尔“言语理论与超验语用学: 关于伦理标准的思考”〔“Sprechakttheorie und Transzendente Sprachpragmatik; Zur Frage Ethischer Normen”〕, 载阿佩尔主编的《语用学与哲学》(Frankfurt, 1976), PP10~173; 关于德语世界中的有关讨论情况, 可参考 M·雷德尔主编的《实践哲学的复兴》I, II (Freiburg, 1972, 1974); R·巴纳尔的“实践哲学的复兴”〔“Eine Renaissance der Praktischen Philosophie”〕, 载《哲学周报》〔*Philosophische Rundschau*〕22(1975), PP1~34。

56. 参见前两章的内容。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交往与社会进化

作者=(联邦德国) 哈贝马斯 (Habermas, J.) 著; 张博树译

页数=252

SS号=10219016

DX号=

出版日期=1989.03

出版社=重庆: 重庆出版社

书名

前言

目录

第一章 什么是普遍语用学

第二章 道德发展与自我同一性

第三章 历史唯物主义与规范结构的发展

第四章 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第五章 现代国家中的合法化问题

注释